

白朗文集



- 散 文 集
- 报 告 文 学 集



白朗文集(3—4)

Bailang Wenji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310,000 开本：880×1168 1/32 印张：16 插页：6

1986年4月第1版 1986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9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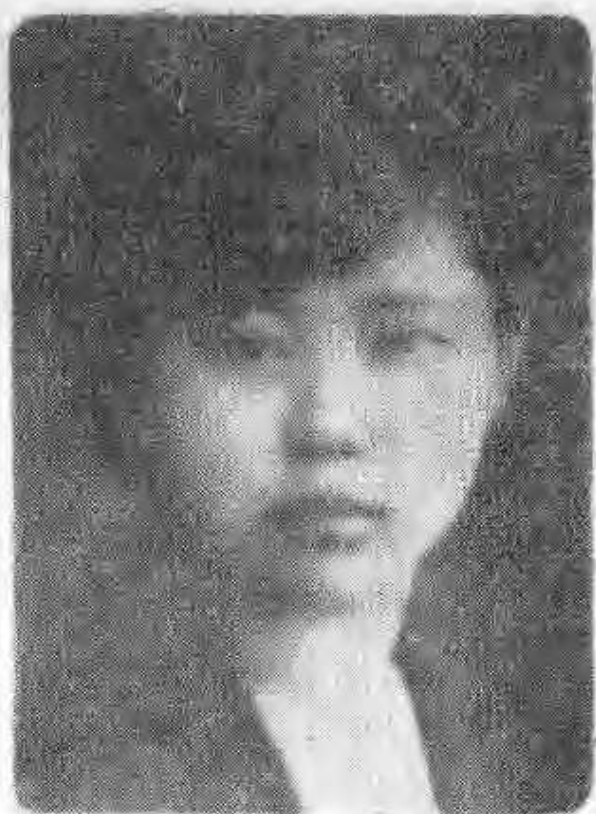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郭 锋

责任校对：唐惠凡

封面设计：李勤学

统一书号：10158 995

定价：2.65 元



1933年摄于哈尔滨

夫：胡弄，不為無謂美。

這小娘姓是誰呢？

這就是百年前做以下：她就是先夫的小
稱情使公人馬的好心。一當輪船好姐妹。一當
運身向遠處大院的去者忘美——陳淑仁。

革命：革命。這名詞原來新鮮，陳淑仁所
要加上作的時候，這等也不合寫哩。她最難求
的是這出來人身上的是誰，是說在此一見也地
後，即分指去持好悲慘地像。地行，時候河老
來不美產流供下：

地長到十七歲，田叔公後地地過一級熟
飯。後給地算出一件例爾衣袋，姐，大娘那手
，香美了二月據地姐，買下以尺長布，大淑仁
高眼曉得事也自土美呵哭，看金笑開，是，香
後不事時信也微感，新名不酒美十七小地以十
分食：一言之也道人呼，望人嘗由地是地地
一地地公法地會以自送之，地會地不不來
，地地公法地會以自送之，地會地不不來
地地公法地會以自送之，地會地不不來

DE 2017

目 录

散 文 集

狱外集

- 1. 沦陷前后..... 3
- 2. 保 重.....12
- 3. 混 乱.....21
- 4. 无言的会见.....26
- 5. 礼 物.....35
- 6. 探 望.....41

西行散记

- 1. 流 亡 曲.....57
- 2. 一封不敢投寄的信.....60
- 3. 帽 子.....67
- 4. 月夜到黎明.....70
- 5. 祖国正期待着你.....73
- 6. 我迟疑地走下扶梯.....80
- 7. 弃 儿.....87
- 8. 苦难的人们.....90
- 9. 西行散记.....98

10. 我踟蹰在黑暗的僻巷里·····	102
11. 到前方去·····	105
贺·····	110
谁不热爱英雄? ·····	114
和平与胜利的象征·····	119
向普天下的父母控诉·····	125
和平, 人类的母亲! ·····	131
我要歌颂她们·····	138
对战争的庄严宣判·····	147
心连着心·····	156
和平的音讯·····	162
保卫我们的孩子·····	170
三 年·····	179
英雄的时代·····	183
母亲——战士·····	193
我怀念着远方的朋友·····	199
友谊的花·····	215
在斗争中成长·····	218
祖国在昂进中·····	225
变 化·····	231
春天的消息·····	237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随感	
1. “我们一定要到社会主义!” ·····	241
2. 说说心里话·····	246

报告文学集

东北抗日联军巾帼列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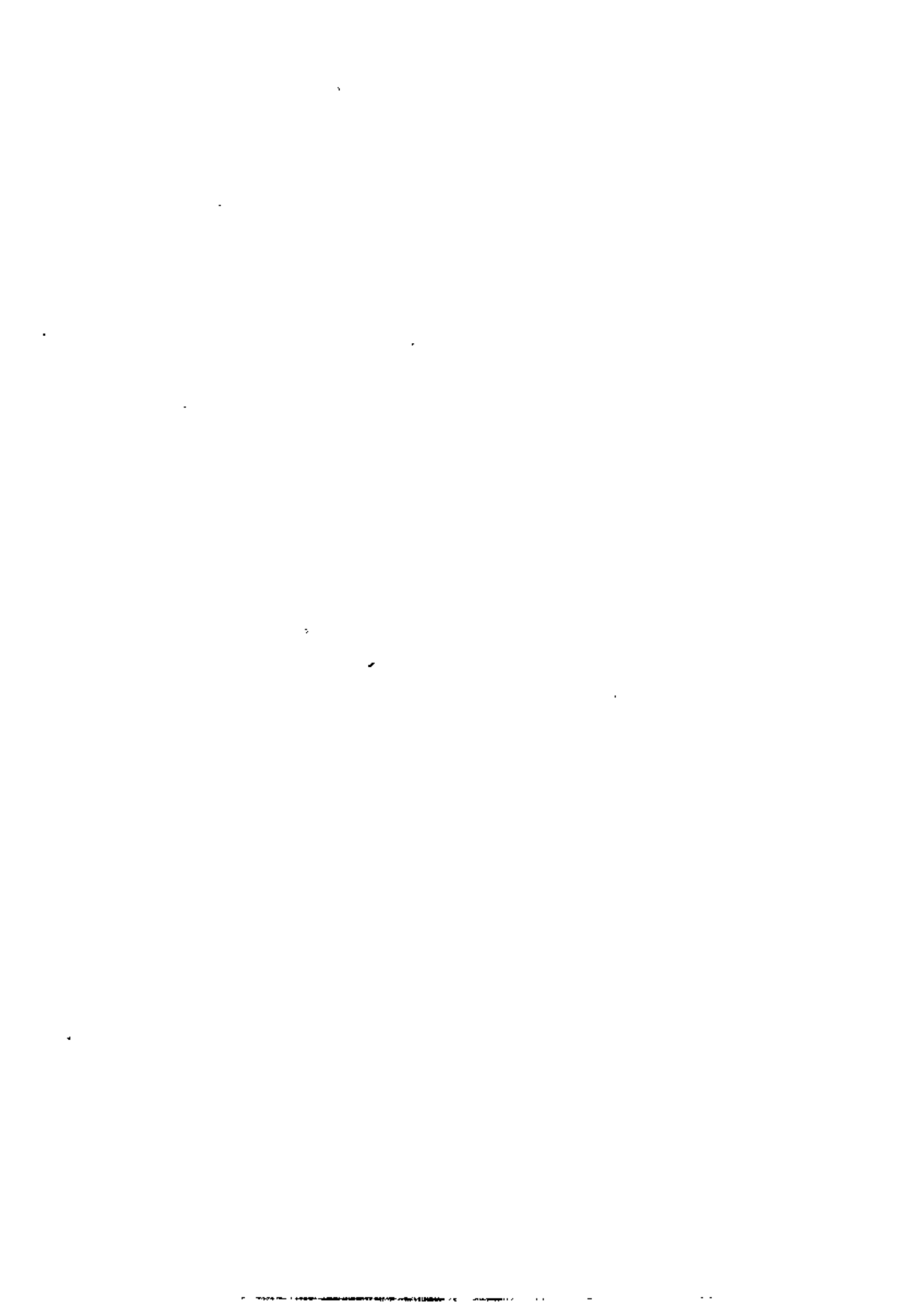
1. 赵一曼..... 253
 2. 裴大姐..... 259
 3. 王勤夫人..... 265
 4. 民族女英雄李秋岳..... 272
 5. 张宗兰和她的嫂嫂..... 280
 6. 小妹妹..... 293
 7. 八女投江..... 301
- 国境线上的伏击手..... 309
- 不平凡的劳动..... 322
- 锻 炼..... 328
- 理 想..... 343
- 开路的人..... 353
- 老母亲..... 380
- 小保姆..... 386
- 张景林..... 392
- 火 花..... 397
- “管得宽”小传..... 419
- “我最亲最亲的人！”..... 431
- 平壤七日
1. 不屈的城..... 440
 2. 劳动带来了希望..... 444

3. 她们不计较个人忧患..... 450
4. 血海深仇..... 455
5. 重新投入母亲的怀抱..... 461
6. 俘虏们..... 466

人·物质·精神

1. 《假如我是一个旅客》..... 476
2. 从一粒粮食说起..... 491
3. 搭桥过河的人们..... 500

散 文 集



狱外集

1. 沦陷前后

我记得很清楚，而且，这记忆永远不会从我的脑子里溜走。

1931年，9月18日的晚上。

望着那条柔和地分开水和天的神秘的线，我和勃坐在松花江畔赭色的堤石上。江水是那么沉静而幽深，仿佛沉思般地悄悄地流着。明朗而又似惨淡的秋月之光，满撒在广渺无涯的江面上，波纹起伏着，放着绚烂的光闪，相映着夜空中映眼的群星，构成了一幅美丽的夜景。风丝，回旋在空气里，不是冷，只是描写不出的醉人的清凉，好象饮了一杯葡萄酒似的，我陶醉了，我的心随着那缓缓东流的江水在飘泛着了……

夜空宛如一块庞大的深蓝色的天鹅绒，又仿佛一片无边无涯的雄伟的海，它俯瞰着闪光的松花江，我们被盖在它们两者之间，好象两颗细小的砂砾，显得是多么渺小。

夜已深了，我们仍然不想归去。我爱松花江，我爱它的伟大，把身心一投入它的怀抱，就会忘却尘世的一切悲哀与

烦扰，它是那么安闲而平和，悠闲地躺着，尤其在夜里。

我张着被松花江畔美妙的秋夜所陶醉了的眼睛，眺望着南方，眺望着远天，那颗发光的星星下面，不是我的故乡吗？

一想起故乡，便会回忆到黄金的儿时，儿时最爱的几处游地，我的心又回到故乡了，故乡的景色是值得留恋的呢！我向勃说：

“万泉河的荷花恐怕已经萎谢了吧？莲子是成熟的时候了！”

勃照例地在做着他的深思，仿佛睡着了的樣子在半闭着眼睛，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我摇了摇他的肩头，又说：

“那假山旁，小溪边，我们小时候的足迹，不晓得已经盖上多厚的灰尘了呵？”

“嗯！”回答我的仅是一声鼻哼。在黑暗中我把眼光贯注在他的脸上，我看见他的眉头皱了一下，好象我的话扰乱了他的沉思，我心里想：他一定又在细嚼那本书上费解的理论吧？然而，现在，那回忆使我兴奋得完全象一个孩子，我不管我的话是否搅扰了他，是否使他讨厌，仍在继续地说：

“离开故乡很久了，我们几时回去呢？”

“你想它吗？”他耐不过我的纠缠，这样问了一句。

“为什么不呢？松花江虽然可爱，哈尔滨却是满染着罪恶的都市，它怎及我们淳朴的故乡呢？”

“你想它，你回去好了，我却不愿意离开‘满染罪恶的哈尔滨’。”

“为什么呢？”我惊奇地问。

“因为，哈尔滨使我知道了好多事情，如果在故乡，也许，直到现在我还是一个混虫！”

“不，哈尔滨有你的情人！”我鼓起嘴故意地气他。

“对啦，哈尔滨有我的情人，那么，你的情人在沈阳？”

勃是那样淡漠着故乡，淡漠了我对故乡的怀念。直到睡到床上，故乡的影子才从我的回忆里逝去。

然而，天晓得，就在那天夜里，我那美丽的、淳朴的故乡竟而沦陷，它首当其冲地被悍敌攫为囊中物了！

当我从报纸上得到这个不幸的消息时，我的心突然起了一阵痉挛，几几乎痛哭失声；同时，对它的怀念更加迫切了。

我忧郁了！

我每天看报。每天向勃探询——当他下班回来的时候。

“有没有好的消息？关于我那沦亡了的故乡的？”

“你是这样关心它吗？”当我接连着问询他几天之后，他这样对我说，“仅仅关心是没有用的，还是想法救救它吧；不然，你爱的松花江也将不保呢！”

是的，应该想法救救它，象那些抗敌的英勇的战士一样。然而，看了看自己的凸出的大肚皮，我失望了。

从此，勃越发爱沉思，越发忙碌了。这之前，他不过偶尔地在晚间独自出去，可是最近，却是几乎每天晚间都要出去了，并且，提前了上班的钟点。他本是早晨八点钟过江乘

火车到松浦上班的，由家里起程最早也不过七点半钟，现在却有时六点刚过，便慌忙地走掉，连每日必需的早餐都不吃了。我奇怪地问他，他却说是火车改了点。然而，我特意去看了一下九月二十日新订的行车时刻表，那上面分明写着：马家船口到松浦镇第×次列车上午八时二十分开出。我疑心我是看错了行，再仔细地看一遍，没有错，还不是八点二十分。

单是两件事，还不是引我注目的焦点，最使我莫解的却是他那近乎古怪服装的更换。勃一向是不修边幅的，他经常递换穿着那两套不花钱的哗叽制服，即使参加什么宴会，他也不肯穿一件稍微讲究点的衣服，朋友们奚落他，他自己并不觉得寒酸。有时，当他要去参加同事的结婚典礼之前，我便把他那套可身的西装捧给他，甚至是央告地求他穿上，他却一定不肯，为了这，我常常气得同他吵嘴。可是，他却变了，每当晚间走出去的时候，总要换上一件衣服。制服、西装、便衣，轮流着在身上穿上脱下。那套仅在结婚时穿了一次的漂亮的西装，也常随着他出去夜游了；即使那件叠折了的灰布长袍，也由箱底翻了出来，穿在他那好几年不穿长袍的身上不止一次了。这种怪异的举动，不能不使我怀疑，我会疑心到他是害了精神病，也幻觉着他真的有了情人，虽然我是万分地相信他。

于是，我开始注意他了，象密探似的侦查着他的一切。

那两只眼睛，仿佛松花江的水——沉静而幽深，清瘦的面颊分明是更加清瘦了。他是越发沉默、越发不爱说话了。

一回到家里，便静静地躺在床上，眼睛注视着天花板，作着他的深思；我跟他说话，他把眼光掉转来望望我的脸便算是回答，有时，我气极了，便跳起脚向他嚷道：

“莫非你变成了哑巴？”

他微微笑了笑，讪笑我：

“孩子气，看看自己的肚子吧！”

真的，我在他面前，的确显得太孩子气了，虽然他还不过是刚届成人期的二十二岁的青年，然而，从他的沉着态度上看去，却已经是一个五十岁以上的老头儿了。

一天夜里，他穿着那件灰布长袍由街上疲倦地回来，一进门，我便注意到他那微微鼓起的衣袋，那长方形的东西。我心里想，说不定那就是一叠情书呢！我板着面孔向他要，把伸平了的手掌递给他：

“拿出来看看——衣袋里的东西！”

“什么？”他态度一点都不慌张地反问我，同时敏捷地把长袍脱掉，挂在衣架上，“什么也没有呵！”

当我去摸那衣袋时，已经空无一物了。我想搜查他身上所有的衣袋，因为有婆婆在面前，便不好意思同他纠缠，暂时把要搜查的心隐藏了起来。

临上床的时候，他照例地拿了他那本费解的什么社会科学书，我也把一本小说放在枕边。

我们俩默默地看着书，谁也不说一句话。那黑色的如豆的字，一行一行地从我眼前溜过，可是，我并没有看它，我的心在想着另外一件事。

过了很久，我故意的把眼睛闭了，书本由我手里滑落到枕头上，勃连忙欠起了上半身，他的呼吸温暖地呼到我的脸上，我晓得他是在看我闭着的眼睛。他自语着：

“睡虫！”

书本轻轻地落在写字台上，我听得很清楚，是两次。

我把眼睛闭得更紧了，为了使相倍我已经睡熟。现在，我是完全利用我的两只耳朵了。我听着，听着，他的每一动作，仿佛看见了一样，我都能很清晰地感觉得出：他的手从写字台边缩回来了，在掏压在枕头下的裤袋，拿出了什么之后，便面壁而卧了；当我微微听到翻弄软纸声音的时候，我的心突然有点似兴奋又似惊骇的颤抖，眼睛随着就张开了。

压制住心的冲动，暂时又静卧了一刻，待听到第三次翻弄软纸的声音时，我再也不能忍耐，于是，我象猫一般敏捷地翻转了身子，同时把手臂飞过去，紧紧地、紧紧地把他手按住了。他一点都没有提防，惊得几乎喊了出来，用臂肘打着胸部无力地呻吟着，可是，他的两只手却一点也不肯放松地握着那件认为神秘的东西，握得那样紧，竟使我没有办法把他的手掰开。

“松开，松开！”勃非常急躁而且愤怒地低声吼着。

“哼，松开？看你这回还怎么秘密。非看不可！”我庄严地板起面孔坚决地说。

他也庄严地板起面孔说道：

“你真的要看吗？……也好，本来我早想让你看的，并

且希望你肯看，不过，我有一个条件，就是不许你向别人说，无论任何人。”

这话，简直使我莫名其妙。既然希望我肯看，为什么又对我秘密？看，当然我要看的，而且是急于要看，不过，不许我说，我却不敢应诺，倘如那是于我不利的。我踌躇了，然而，为了急于使他把手松开，我终于不自信地果断地说：

“可以，我绝不向任何人去说！”

“一定？”

“我几时骗过人？”我象受到了污辱般地急忿地努起了嘴。

“我相信你是从不说谎的。”于是，他把手松开。映进我眼帘的竟是我从未见过的长方形的油印小册子。那蝇头般端正的小字，极其清晰地跳跃在白色的纸上，连我这视力不佳的眼睛也看得很清楚。

“九一八的大炮，失去了我们的沈阳……”这第一句便使我感到非常兴奋，非常需要，于是，我由勃的手里把它接过来，舒服地把头放在枕头上，仔细地一行行一页页看了下去，一直到完。

那上面，除了拯救亡省的策略和步骤之外，对于促成未来新社会的建立，有更周密的计划与理论。在我，那完全是一种新的发现，我相信，也正是一般人所不了解的。

我兴奋，兴奋得完全象一个拾得珍宝的孩子，我用责备的口气问勃：

“这样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早给我看！”

“这是为了你太诚实了，怕你不能隐瞒，倘如你……”

我和勃一直谈了一个通宵，没有疲倦。他讲给我好多那本小册子上也还没有提到的事情。直到太阳从东方升起，我们才带着兴奋的心闭了一会眼睛。

从此，我打开了眼界，我开始踏上了真正人生的道路，追求着真理，追求着光明，追求着我所不懂的一切。对于勃的态度，我不再怀疑了，反而，非常同情他的行动，渐渐地我也竟学会了沉思。

勃常常看着我满意地微笑着。他说：

“这才是我理想中的伴侣呢。”

勃把秘密向我公开了以后，他的行动便自由得多了，精神也显得十分愉快。他带回来的东西，我可以替他严密地保管，他不必东藏西藏了。晚间，他也不再跑出去，而我们家里却添了许多勃的父母认为行迹可疑的生客。每当一个来客走了之后，勃的母亲便要诘问勃关于客人的来历，只要她在家。

勃编造的答话，往往使她不能全信，那个机警的老太太，早在暗暗地怀疑而侦察着勃的行动了。这样，我和勃感到非常苦恼。我们曾经计划把家庭改组，但，这幻想在当时没有实现。

好在，我们这些新的客人的降临，差不多全在黄昏之后，而勃的父母每当吃过了晚饭，便被我们动员到朋友家里去玩牌，或者看戏；如果不是例外，他们是很难碰头的。

十月一日的晚间，他们召开第一次反日会，一共有七个

人在我家里集合着。那是多么可爱的七个人物呵！他们不拘礼貌，没有虚伪，没有骄矜，服装是那么朴素而随便。讲起话来是那么动听，是那么使人兴奋，尤其是那个小商人打扮、勃呼他为老张^①，竟没有办法把他从我的记忆里挖去。

他那两只适合而孔的智慧的眼睛，闪闪地发着锐利的光，然而，当他沉思的时候，却又变得非常庄严而沉毅；那眼睛显示着机智与勇敢、坚决与果断。他赭色的面孔，分明是饱受风吹日晒了。最使人不能忘记的是他那张会说话的嘴，他的话宛如一篇曼妙的诗歌，又如一阙雄壮的音乐，任何人也不能不为所动的。他每次发言，都象背熟了的讲演稿似地滔滔不绝地说下去；熟练，动人，有节奏，有抑扬，那简直使你感到他不是说话，而是在读诗。我迷恋他的话甚于迷恋伟大的松花江，在他那曼妙的言词里，我获得了不少真理，那真理是一向埋藏在深山幽谷中，不许人发掘的东西。我奇怪地问勃：

“老张的嘴怎么那样会说话？而且他又晓得那么多的事情？”

“这有什么稀奇呢？……他，十年了！……”

这可敬的十年的奋斗，是怎样悠久的时光呵！然而，他还不过是一个二十七八岁的青年呢！

故乡，没有好的消息给我，尽管人民的情绪如何激愤，尽管义勇军的战斗力如何加强，然而，终敌不过敌人飞机大炮的轰击。故乡，仍在敌人的掌握中。故乡的同胞，被嗜杀

^①即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军长杨靖宇同志。

无忌的魔鬼生吞活剥了，开肠破肚了，奸淫抢掠了！

而且，正如勃所说，松花江也将朝不保夕了。

从开过了第一次反日大会之后，勃更加忙碌起来。他买来了很多花色的报纸，由老张派人送来一架油印机。由此，我们的工作便开始了：写标语，印传单……关于一切宣传的工作，都由我们两个来包办。黄昏一过，我们便倒锁了门，在室内活跃起来。一批工作完了，一批新的工作又来了。我们不断地忙着，有时，一连几个通宵不休息、不合眼，然而，我们不感觉疲倦；我拖着沉重的肚子，腿和脚完全肿胀起来，但是，我也并不感觉痛苦，前面的光明在指使着我兴奋的心。虽然故乡仍在虎口，松花江也将被吞蚀，可是，我们并不灰心，并不焦虑。我们相信：组织起来就是力量，如果我们坚决地奋斗到底，故乡终会失而复得；而且，面前的光明，也正在向我们招手呢。

我“感谢”这次事变，它把我从昏聩中解救出来！

我懂得了，用什么手段，才是正确的反攻！

1935年在上海

2. 保 重

我依然木立在电话机旁，我的手也没有丢开听筒，然而，我的神志却已经模糊了。我无法计算时间的久暂，总之，我确曾有过一度的昏厥。

当我苏醒过来的时候，夫役老张正在用惊恐的大眼睛凝视着我。看我醒来，他走近两步，很关切地问道：

“葛先生，你头昏吗？要一个凉手巾擦一擦脸吗？”

“是有一点儿昏。”我一边挂上听筒，一边回答着他。这时，我发觉我的两只手心湿淋淋地象刚刚用水洗过了一样，同时更感到了彻骨的寒凉，那黑色的电木听筒，也被汗液浸湿了，它正象雨后的柏油路，闪烁着油光。“也好，你绞一个凉手巾给我吧。”

很快地，老张把一条凉的湿毛巾恭恭敬敬地递了过来，而且向我说：“你把它放在额头上冰一冰吧。”

我怀着感激的心情接过毛巾，把它敷在发烧的前额上，而后揩去了手心里的冷汗。它虽然没有使我的手恢复正常的温度，而我的神志却立刻清爽了许多，沉涩的眼睛也可以张大一些了。于是，老张松了一口气说：

“暖，天太热啦。”

实际，天并不算怎样热。北方的初夏，正如南国的春天，温暖的风夹带着清沁的馨香，柔媚的春光还正在跳跃在树的枝桠间和嫩绿色的原野里。如果说享受，那么，在北方，初夏这个理想的季节，也要算人们的一种享受了。假如不是过分劳动的话，不要说是昏厥，连汗也不大会流的。

而我为什么竟突然昏厥了呢？虽然，那不幸的消息足以敲碎我的心，足以击昏我的脑，但，它会促使我越发地坚强，我决不会脆弱得无力抵抗以至于昏厥的，更何况那遭遇又是早在意中呢？我想：许是刚刚流产后的身子太虚弱了的

缘故。勃今天早晨临出门时，不是还在嘱咐我请几天假休养一下吗？他说：

“你的脸色和嘴唇，简直苍白得怕人哪！”

一向，我是多么尊重勃的一言一行，然而，这次我却违背了他。我忠实着、热爱着我的工作，只要我的精神和体力还能支持，我是决不愿意把我已经做得熟练的工作交给一个不熟练的生手去负责的。这样，我就没有听从勃的体贴的劝告。终于支撑着软瘫无力的四肢爬下了床，直到坐在编辑室的靠椅上，我的两条腿象受了压力后的弹簧一样，总在颤巍巍地抖动着。

现在想起来，我倒有点懊悔：要是勃知道了，又将为我的健康而不安了。

第二次凉毛巾又递过来了，我第二次又揩前额，于是，我的眼皮不再沉涩了，神志也反常地清醒过来——象突被噩梦惊醒。然而，这却不是梦，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呵！

编辑室原来是平和而宁静的，象每天早晨一样，除了我和夫役老张而外，其他的同事，大都还没有起床，他们是夜间办公的。现在，壁钟的时针已经指到十点，校对丁子才挂着满脸烟气懒洋洋地走进来了。我想再挂电话给报馆，向告我那消息的勃的同事探问个究竟的企图被他的到来而打消了。

我若无其事地离开电话机，安安静静地坐在属于我的办公桌前。我的口腔虽然干渴得急需一点水润一下，可是，老张送来的一杯浓茶，还静静地摆在那里，它早已冷却了，我竟

好象没有工夫去喝。我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存在，也忽略了一切的痛苦。最后一次的工作占满了我整个的脑际，那许许多多琐碎事务，我必须以最敏捷的速度在最短的时间里交待清楚，否则，后来者将会摸不到头绪的，因为明天，属于我的办公桌，也许属于另一个主人了。

首先，我得发好明天出版的副刊“国际公园”这是急待付排的，校对先生在等着校对，取稿的小学徒也已经来过一次了。

选择了几篇检查通过的文章发了下去，于是让工作占满的脑腾出了一点空隙。紧接着，后天的“文艺周刊”也需要马上发排。这虽是一个相当大的篇幅，而它所需要的字数却并不使我犯难，因为文章早已准备好了。我很轻松地想：这项工作最多二十分钟就可结束的。我从抽屉里拿出了那一叠稿子，一篇一篇地标着红字，当我发到最后一篇的时候，一个难题使我踌躇起来。

我的头脑变得意外地混乱，我的手象发疟疾似地突然抖索起来。

心在胸腔里跳跃着，我无法辨别那情绪，是恐惧还是悲愤！

《离散之群》的原稿在我抖索的手上轻轻地颤动着。我的眼睛注视着那一行行匀整的钢笔字，心仿佛生了翅膀，冲出躯壳，盲目地飞向不可知的方向去了。《离散之群》是在“文艺周刊”上连载的勃的一个未完成的中篇，在侵略者无情的摧残之下，它已几经忧患了。有时整段整段地被检扣、

被删掉，甚至被检查者龌龊的笔随意地涂改，它早已是残肢断臂，到处呈露着不能愈合的伤口。此后呢？更将随着它受难的主人永埋在黑暗的角落里，也许要永无自由和完成之日了！

吃人的野兽已经把勃抓去了，而且正在张牙舞爪地向我扑来，但，我一点都不畏缩，我准备用头颅去迎接那锐利的爪牙。当一个人决心把生命归依于患难和死亡的时候，还有什么足以使他畏惧的呢！因此，我有足够的勇气把《离散之群》继续发排。于是，我用因过分激动而发抖的手提起笔来，歪歪斜斜地在题目上写了一个鲜红的“出”字，又在勃的笔名上写了一个“2”字。在文艺版上标着这样大的题目和署名，在我的记忆里，是前所未有的，而我当时却破例地这样做了，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这样做是为了纪念勃呢，还是故意向敌人示威。

然而，我激动的情绪慢慢安静下来了，突然，一个属于我自身以外的灾难预感命令我再加考虑。那就是：在勃已经被敌人逮捕了以后，还发表他带有彩色的文章——虽然那彩色不是他们愚蠢的眼睛所能透视的——会不会影响到报馆的安全呢？

经过很久的考虑，为了不因我个人的行动连累了一个虽在敌人统治下而还敢伸张正义的报纸，我决定把我的原意撤销了。这样，也可免得被敌人发现地下活动的勃同时是一个文艺工作者而更加重他的罪名。

小心地把《离散之群》折叠整齐，而后谨慎地装进衬衫

的口袋里，象一个慈母爱护她的婴儿一样，生怕他受到一点损伤。而今勃的作品，即使是一个字，在我也是万分珍惜的。假如我的自由不被剥夺，我誓以全副精力保护着它们。它们将是我孤寂生命中唯一的知心伴侣。

工作已经结束了大半，我的脑子也有着更多的空隙了。可是，我不敢休息一下，我怕那些不愉快的念头闯进我的脑子，于是，我连忙拉开抽屉，在半抽屉的稿件中，把决定退还的来稿拣出来，通统封好交给老张。这工作费去我相当长的时间。看看壁钟，将近十二点了。这时，老张走过来问我要不要到馆子去叫饭，因为到吃午饭的时候了。我摇了摇头，告诉他我还不饿。可是老张却劝我说：

“能吃就勉强吃一点吧，我看你象是病啦。”

“怎么，病了吗？”朋友老金插问了这么一句，就出现在我的面前了。大概他是我和老张说话的时候走进来的。

“没有病。”我同时回答着他们两个。老张替我们倒了两杯茶就走开了。

“你的脸色真不好，也瘦了，真的没有病？”

“病是有点小病，不过主要的还是前天夜里流产了——一个庸医给我吃错了药。”

我是那么平静地向他叙述着这一个平凡的事件，而他竟又愤慨起来了。他大声疾呼地声言要铲除所有的庸医，唾沫都喷到我的脸上。

“老金，不要骂他，我正在感谢他呢。”

“感谢？当然，你这样年轻，是不需要孩子的，只可怜

那小小的生命……算这个，你不是已经死了四个了吗？”

“那又算得了什么呢？”我凄然地笑了笑，“他们都是识时务的孩子，我统统感谢他们。”

老金不同意地鼓了鼓嘴，而后郑重地说道：

“你一定要好好休养才行，这对你的健康关系太大啦。”

“是的，明天，我也许就要休息了，也许永远……你看我已经准备交待了。”我是想把话题慢慢地转到勃的身上，若是他一走进来我就把那不幸的消息告诉他，这位热情的朋友，也许会悲愤得叫起来的。

“你是想要放弃这个工作吗？”他惊异地看着我。

“不，我永远不想放弃它，怕的是有人强迫呵。”接着，我使用只有我们两个人才可以听到的声音，把勃被捕的消息告诉了他。他多肉的脸颊涨红了，一直红到脖颈，在那深度近视镜的后面，我看见了一对发光的眼睛；这位热情的朋友，他几乎要哭了。

“勃为什么写了一篇《离散之群》呢，难道他早有预感吗？”他的喉咙里带着颤音，无论怎样压缩着声带，可是他那天赋宏亮的嗓门，也是无法密谈的；尤其当他激动了的时候。我向他使了一个警告的眼色，他才把嗓门压低了些，而后很伤感地说：

“我们现在竟真的变成离散之群了！”

说完，他痛苦地沉默起来。我知道，由于勃的遭遇，又使他连带着怀念起一周前悄悄出走的黎和莹。在他们出走的

前一天，我们曾在季硕家里举行了最后一次聚会。那天，大家都喝了很多酒。为了不让别离的悲戚压倒，趁着酒兴，我们竟纵情地欢腾起来。唱歌，唱京戏，讲笑话……尤其是平素最爱沉默的勃，竟也孩子似地嬉戏着了，他是那样天真地拼着所有的精力和黎摔起交来。他简直就象斗牛一样，地板几乎给他踏断了。那是怎样的欢畅呵！虽然，连季硕的夫人在内我们不过七个人，而那欢腾的笑声、掌声，已经使那宽大的屋子容纳不下了。

当他们厮斗到精疲力竭的时候，两个人才带着疲倦和喘息，一齐卧倒下去。仅仅经过了片刻的沉静，勃却突然伤心地悲泣起来。室内的空气立刻凝结了，每个人都低垂了头，谁也不想、同时也不能去安慰他，因为，每个人也都正在寻找一个痛快发泄机会。

可是，如今想起来，却又不能不为黎和莹庆幸了，如果他们迟走一周，谁敢保证他们不为勃的事件受累呢？虽则他们和勃并没有工作上的联系，而他们之被注目，却是有了子勃的。

“这虽是一个绝大的不幸，”我对沉默着的老金说，“可是另一方面，我们却应该替投奔祖国的黎和莹祝福，他们毕竟脱离险境了。”

老金点了点头。过一会儿，他忽然瞪圆了眼睛提醒我说：

“你不能再多耽搁，应该赶快回家呀，家一定也要被搜查的。”

“搜查让他搜查去吧，事情业已到了这一步田地，我还有

什么可怕呢！”

“你的家里没有什么‘犯法’的证据吗？”

“管他呢，反正我已经准备和勃一道去啦。”

我的泰然，使这位陷入激情的朋友的脸更红了。他皱起眉头，象用绳子束起来的口袋似的，显着很难松开的样子。

听了我的话，他更焦急起来：

“傻瓜，你不要没有信心呀，但能营救，我们还得设法营救他……”

不等他说完，我抢着说：

“我真不敢那样妄想。几年来的事实告诉我，一个陷入虎口的人，是很少有生还之望的！”

“你也不能那样想，要紧的是不能让敌人抓住他‘犯法’的证据。同时更要保重你自己，笠，你应该理智些，不要太感情用事了。”

他的喉咙已经开始放大。好在丁子正捧着一本“唐诗”摇头摆尾地在吟诵，没有注意到我们的谈话，否则，秘密会被他发觉的。

听信老金的劝告，我决定不看“清样”而赶回家去了。和老金临分手的时候，我嘱咐他把这消息赶快传给季硕，希望他最好躲避一下，因为他和勃曾经共同工作过。

老金好象有什么不放心似地站在路边看着我走上电车，一直到车铃响了，他还在挥着手向我叮咛：

“笠，自己保重呵！”

我说什么呢，我只能还给他一个无言的苦笑。

3. 混 乱

在归家的途中，我什么也没有看，什么都不能想，我的脑子一片空虚。

“肚子饿了可以装进些食物，脑子空虚将怎样填满呢？”一路上，我尽在思索着这个问题而得不到解答。

完全象一个沉醉尚未全醒的醉汉；我的脚步虽然不蹒跚，而认识却并不清醒，一离开工作，头脑反而清醒起来了。当我轻飘飘无力的两脚踏进了位在“天堂”^①的家门的瞬间，我的头脑便陷入不可自拔的荆棘中，在内心的话，竟脱口喊了出来：

“呵，一切全混乱了！”

每道门，都可怕地敞开着，门里边找不到一个人影。无疑地，家是早被搜查过了。它已经失去了往日的整洁，变成混杂而狼藉，——是满溢着恐怖的狼藉呵！仿佛刚刚经过盗匪的掠夺，一切都摆着可怜的、惊魂甫定的脸相，象对着它们主人的我，诉说着哀怨。

地上几乎找不到插足的空隙。箱子都空着肚皮，张着饥饿的大嘴僵卧在壁角，衣服被抛了满地，有的蜷缩成一团，有的无力地摊开着。书架上那些线装书都东倒西歪，有许多被弃掷在地板上，更有的践踏上泥污，看不清面目了。

我呆呆地注视着它们，很久很久，我的目光没有移动。

^① *天堂* 即哈尔滨的南岗。

我并非怜惜那些早被遗弃的“圣贤书”——那些书，是“不安分”的勃，为了遮蔽敌人的耳目，不得已而用来装饰书架的。当他的同志蓬失踪之后，他便不得不焚毁或藏匿起他的生命——文艺书，从坟墓里把那些古董再挖出来。使我莫解的是：力倡复古的魔鬼们，竟也有意地侮辱了圣贤。

我冷笑一声，把停立已久的目光移到了床上。那平整的床单也出现了许多夹带着尘灰的皱折，被子也变换了位置。床边上，孤零地躺着一本红皮的书，它相映着蛋青色的床单，显得格外鲜艳，那是虚无主义者阿志巴绥夫的短篇小说集《血痕》，原来放在书架上的。无疑地，是搜查者挑捡出来准备带走，作为勃犯罪的证据之一。而结果偏偏遗忘了。同样性质的书并不只此一册，他们为什么单单注意到它呢！我想，一定是那颜色刺了他们的眼睛。红色，是他们企图消灭的对象，是他们的死敌。

不过，单是根据对皮的颜色而判定一本书的危险性，那不是跟见黑脸就说是印度人一样地可笑吗？

由于这本《血痕》，忽然使我记起了在书架上有一本勃正读着的那本珍贵的《资本论》来，那是黎走时留做纪念的。它的封皮虽然不是红的，然而它的危险性却是超乎《血痕》十百倍以上，倘如被敌人获得，那遗憾将无法弥补。

我仓皇地冲到书架跟前，在那些东倒西歪的书籍当中，我匆忙地寻找着它，因焦急我的两眼发热了，结果竟没有找到。

“糟糕，它一定被搜去了！”我绝望地想。

可是，最后，我终于在地板上的乱书堆中发现了它。这意外，使我的神志惊喜得失掉了主宰，我把它紧紧地抱在胸前，象天主教徒在做祈祷似的，我轻语着：

“呵呵，我的朋友，你竟没有被捕，你不会受到侮辱，你是幸运的啊……我的朋友……”

然而，为了一个恐怖的转念，我把侥幸逃脱了灾难的朋友，不假思索地抛进壁炉里去了。当那熊熊的火焰燃焦了它的肢体时，我才发觉自己的错误。那是一本不可多得的书呵，敌人既已彻底搜过了，还会再来搜查吗？于是，我悔恨地诅咒起自己来：我是比愚蠢的敌人更加愚蠢！

偏午的阳光穿着杏黄色的睡衣斜躺在地板上，她用滚热的手抚慰着躺在她周围的那些劫后灾黎。被搜查者残暴的手，揭起的灰尘仿佛还没有落尽，在太阳的霞光里可以看见它们在轻轻地飘浮，方桌和地板上都已积下薄薄的一层了。

两位老人——勃的父亲和母亲，为什么一个都不见了？厨房、厕所、洗澡间以及他们的卧室，门都在大敞着。到处都是可怕的寂静，连一点踪影都寻觅不到，他们总不会被捕吧，勃的“罪”还不致连累了上一代的人呵。

搜查的当时我虽不在场，但两位老人那种惊慌疑虑的脸色，早在我的脑子里映出了清晰的影像。今天，他们是饱受惊吓了，不然一向谨慎的老人，决不会大胆地布下空城计的。

顾不得去整理房间，我必须去寻找他们。我的思绪好象找不到头的一团乱麻，我简直想不出到什么地方去才有可能

找到他们。

正在我踌躇的当儿，勃的母亲神色仓皇地飘着斑白的发丝走了进来。她的脸可怕地苍白，嘴唇弛张着，完全没有血色。两只眼睛深深地陷下去了，仿佛刚刚害过病的人一样憔悴。

“哎哟，我去找你，你倒回来了。”一进门，她长长吁了一口气，便坐在床沿上说。

“问了多少次，才找到‘国际协报’！”

“爸爸呢？”

“他还没回来？那该死的，他说去给你挂电话，一个电话可不知挂到哪儿去啦……我等急啦，才去找你。”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着，急匆匆地，不给我一点插言的空隙。

“看吧，家也不成样啦，还用说，这一定是我那个好儿子惹下的祸，引进一群强盗来抄家……”她因恐慌而气愤。抚在膝盖上的两只枯干的手轻轻地颤抖着。她一边说着，一边无力地喘息。

“究竟来了些什么人呵？”我故作不知地问。

“还用问吗？什么人能那样凶。”她翻了翻眼珠，似乎在责备我多此一问。接着，她告诉我：吃过早饭之后，一切都是平静的，既不曾听见脚步声，也没有人来敲房门，突然地，三个鬼子和一个伪警察踢开门就进来了。“一进门，就把我们挤到墙角，‘不许动！’”她模仿着日本鬼子凶恶的口吻，“接着就东翻西翻，翻完就把东西扔在地上；什么地方都翻到啦，连厕所都用手电筒照了半天。幸亏是抽水马桶，

要不，也许连粪都掏出来检验呢……唉，这群王八羔子！”

她狠狠地骂了一句，而后把下嘴唇紧紧地咬着，表现出无比愤怒。忽然，一点笑容在她那愤怒憔悴的脸上闪现出来，她用手掌拍打着膝盖悄声对我说：

“幸好那块地板，杂种们没撬开，那一柳条包的书要是翻出来，不是要命了吗？”

这时候，勃的父亲以他那敏捷的步子匆匆忙忙地走了回来，勃的母亲不等他开口，便抢着用责备的口气问：

“一个电话挂到这时候？”

“电话挂不通，我跑到报馆。”他简单地辩解着，然后就把那副紧张得发青的脸转向了我：“你箱子里那本日记可写些什么？他们看了半天，还有许多信，都带走了。”

“一本日记能写什么呢？还不是因为放在箱子里引起他们的疑心。”虽然，在那本日记上，也可以找出来一些勃“犯罪”的线索，——不过，我是很技巧地用着只有我自己能理解的语言——我却不能不这样回答。

“到底是你们两个谁惹了祸？是不是你发稿惹了乱子？要不，怎么单单拿你的日记呢？”勃的父亲从齿缝间倒抽了一口冷气，揣测地质问我。

听着两位老人的口气，知道他们还在梦中。为了缓和一下他们那过分不安的情绪，我暂把勃被捕的事隐瞒起来。我安安静静地回答勃的父亲的质问，我说：

“绝对不是，我发的文章都是经过检查的，您还不知道。这几天家家都在受搜查呀，我们当然不能例外……”

勃的父亲察看了一会我的神色。我平静地去迎接他那探索的目光，终于，他半信半疑地点了点头。勃的母亲却在一旁决然地说道：

“反正，是祸躲不过，听天由命吧……儿子大啦，父母还管得了吗？”

说着，她爽然站起身，气昂昂地走回她的卧室。

4. 无言的会见

已经是几夜没有睡过一个甜蜜的觉了。日里，工作、奔走与愁思，已经使我病态的脑过分地疲劳。夜来临时，我便深切地感到再也支持不起了。我几乎是闭着眼睛脱下长衫的，仿佛头一接触枕头，就会立刻睡去似的。可是，当我的神志一开始迷乱时，勃的影子便出现了，那是在似梦非梦中。就这样，我很快地就清醒过来，任凭怎样努力，再也不能恢复一点睡意了。

每夜，我伴着彻夜不熄的电灯，象一只守夜的狗，睁着眼睛渴盼着黎明。鸡鸣、犬吠，更夫的柝声，轮流地在静夜中逡巡，这些使我憎厌的动静，足够敲碎我不眠者的心了。

我很想趁着这不眠的夜读一点书。但，可怜的很，我的书架上、箱笼里，残存着的只是一些线装的“圣贤书”。在勃的父亲的查禁下，我更不敢借书回家，带着标点符号的书，在我们的家庭中已成为违禁的东西。就连我那本被敌人逮捕了而又释放了的日记，都让勃的父亲强制地给丢进火炉

里去了。他似乎比敌人更加苛刻地监视着我呀！

没有书读，只有整夜地在床上辗转着，让疲倦的脑受着痛苦的煎熬。我真担心，它不久就变成残废了。

电灯的光芒照淡了窗外的月影，但窗外的夜色却象白昼一样地光明。和勃别离时，月儿正象一把明亮的镰刀。夜夜，我望着她那逐渐发胖的脸已经是皮球一样地滚圆了。而我却正和她相反：逐渐瘦了。我那红润的、丰满的脸，已在开始苍黄、凹陷。到月缺时，我的脸是否能再恢复原形原色呢？

不眠，带来了无限的夜寒，虽是晴好的夏夜，然而，午夜一过，我的全身便打着寒战，于是，我只好盖起棉被。这使我联想起勃的那一身单薄衣裳。

象电流触到神经似的，我决然地推开棉被，跳下床去。在勃的衣箱中挑选出两套衬衫衬裤和一件顶厚的睡衣。我下了决心，不管怎样，明天早晨我一定亲自给勃送去，同时我要要求和他见面。

从见过山田以后，几天来，没有得到一点消息。那狡猾的敌人，他怎么会援助我呢？我不能再等待下去了。生或死，我总希望有个明快的结果。已经注定的灾难，迟早是要降临的。

今夜的夜更长，黎明来得更慢。为了消磨漫长的夜，我特为勃缝了一条白色的小丝巾，并用红色的绒线绣了两个字——“珍重”。

我走到街上的时候，路旁的商店刚刚开门。在一家小商

店里，我买了一个搪瓷牙缸，还有牙刷、牙膏、肥皂和一条毛巾。把它们小心地裹在衣包里面。这些东西全是新的，是的，应该给勃送一些崭新的东西，因为，这也是他新生活的开始。

位在南岗兴义州街的“驻哈尔滨日本领事馆”，距我的家不远。——我的家住在南岗大直街的尽头，和兴义州街相距不过里许，——步行只要十几分钟便到了。然而，短短的距离，对于我和勃却象隔着几重险峻的高山，要相逢竟是这样的不易！我伫立在那禁卫森严的门外，看着两个敌警的凶残相，我几乎没有勇气进去了。那脸相真有点使人胆寒哪！

他们早在注视我了。我刚刚走上第一段石阶，右边的敌警便横起枪将我拦住，吼道：

“你的，什么的干活？”

我坦然地再走上一段石阶，向门内做了一个手势。

左边的敌人也吼叫起来了，比右边那个更蛮横些。

我依然不动声色，坦然地再走上一段石阶，指指衣包，指指门里边。

左边的敌警一下就把我的衣包夺了过去，把它扔在地上，胡乱地翻弄着，衣服一件件地提起来乱抖。结果，把我刚刚买来的盥洗用具完全抖落在石阶上，那只白色的搪瓷牙缸一直滚到马路边，我拾起来一看，已经有几处脱瓷了。我简直气得浑身发抖。可是他们却满不在乎地把那些衣物揉成一团还给了我。

全是些崭新的东西，霎眼间，就被敌人残暴而肮脏的手

捣毁了、弄脏了，这怎好送给我的勃呢？我只有按捺着快要
在我的胸中爆裂开的气愤，把被揉搓折绉的衣服铺在胸前，
用手熨展开那些绉折，重新包好。

当我再挟着衣包前进时，左边那个敌警又挥着手吼了起
来：

“走开！”

我感到在我面前的，不是用两脚站起的人类，而是不通
人性的四脚野兽，他们也许会咬伤了我，甚至吃掉了我，然
而，却没有引起我一点担心和戒备，我只感到一阵痛心的侮
辱，在人的世界里，我还是第一次尝到它。

为了勃，我似乎应该开始忍受了。假如我真的走开，那
就等于他们胜利了，我却变成一个失败者，因而会一无所
得。可是怎样才能达到我的目的呢？我知道，暴躁是不行
的，只好递给他们一张名片，心想，这完全是一种滑稽的举
动，犹如对着张牙舞爪的猛兽卑躬屈节一样可笑。但，意外
的事发生了，他们两个几乎是同时接过我的名片，同时抢着
看，而又同时向我微笑起来。虽然我明白那种笑并非出自善
意，——他们是背诵着待人接物的教条——我的悬虑总算得
到了一些安慰。

“现在，办公的没有。”右边那个敌警弯下腰端详着挂
在我胸前的报馆徽章，很有礼貌地说：“八点钟，来吧。”

门里边，静悄悄的，大概他不会骗我吧。我看了看表，
才七点一刻。我在领事馆附近的大街上整整消磨了四十五分
钟，当我准时回来时，是两张笑脸迎接着我。我大大方方地

走进去。曲折的走廊，使我迷茫起来，我不知道向哪方面走才对。乱窜了一阵之后，终于被我发现了“警察署”蓝地白字的搪瓷牌子。

里面的人很多，有点使我眼花缭乱。我不加选择地向正中的一张办公桌走去，把衣包和名片一齐放在办公桌上。

正在批阅公文的日本人抬起头来，惊异地看我一眼，再看了看办公桌上两件东西，面后用他那生硬的舌头说了一句难以领会的华语：

“什么的？这个？”

“衣服，送给申勃的。”我顺使用自来水笔在名片上写了勃的名字。

“申——勃？”他伸着细长脖子重复着，“他是你的什么人？”

“我的丈夫，我要看看他。”

这时，五六个人离开办公桌，四面八方向我包围过来，全是嬉皮笑脸地凑到我身边。内中的一个接腔道：

“申勃，就是新进来的那个共产党吧？你是他的太太？”

我看了看那张精明外露的白脸，不高兴地反驳一句，

“什么共产党，他是嫌疑犯。”

他笑嘻嘻地没有作声。受了细长脖子的日本人的命令，他打开我的白色衣包，仔细地检查着，不仅裤衩的小兜被他翻转来，就连串着宽紧带的裤腰上，细密的折绉都被拉展开来，仿佛怕那里面会藏着什么可怕的禁物似的。结果，他只

挑选出一套衬衫裤和毛巾，余下的全交还给我。

我三番五次地要求他统统留下，可是，他总是用“用不着”三个字回答我。最后我把睡衣丢给他，说：

“这件睡衣无论如何请你收下。”

“用不着。”他依然这样拒绝着，更夸耀地说，“我们这里边的睡衣比这件还要漂亮呢。”

我默然了。正当我考虑着用什么话可能满足我的愿望时，那五六张嬉皮笑脸竟趁势夹攻上来：

“你很爱他？”

“你几岁啦？”

“你小孩有吗？”

这一句句充满着戏谑的问话，恰象流氓的轻薄眼睛侮辱了我一样。但我不理睬他们。我庄重地重复我的要求：

“我要会见申勃！”

因为五六个人包围着，细长脖子的日本人是什么时候走开的，我全没有注意到。现在，他听到我的话回来了，他做个手势，领我走进另一个办公室。门框上的搪瓷横牌是这样三个字：高等系。

进门第一眼我便认出了山田。他正背向着一扇大玻璃窗坐着。他仅仅用淡漠的眼光扫视了我一下，不跟我握手，也没有笑容，甚至更找不出一点曾经见过的表示，完全象看到陌生人一样。他和细长脖子的日本人附耳低声地谈了半天，他就是答应援助我的山田呵。

他象想起什么，突然站起来，向我做了个跟他去的手

势，我便默默地跟在他的身后。一个很年轻的朝鲜人尾随着我。我猜不出他们将把我引到哪儿去。直到停在那间空无一物的小屋子里，我的心还在狐疑着。

皮鞋声和木屐声，自远而近地传来了。我循着脚步声从适才走进来的那座小门外发现了细长脖子的日本人。在他的身后，紧接着是一张熟悉而瘦削的脸出现了。我眨了眨因失眠而枯涩的眼，呵！那不正是我要求会见的人吗？我疯狂了，我不顾一切地向他扑去，很想投到他的怀里，哭诉出几天来的哀痛和忧愤。可是，他似乎早已察觉出我的弱点，他赶快用坚毅冷酷的眼光斥责我。我羞赧了，于是，我用不自然的微笑掩盖了即将表露的一切。

勃瘦了，也黄了些。他拖着一双敌人发给的一双木屐，但那并没有改变他走路的姿势，胸膛依然挺起着，只是那套白的汗衫和裤衩已被汗渍浸黄了。这分明是告诉我：牢狱里是肮脏而闷热的。我所体验的夜寒，不过是狱外人的感受罢了。

我们沉默的相对着。我不敢讲什么，因为我怕暴露了我的哀楚的声音。我只是用尽所有的力量握住他的手，希望他能从那力量中，感到我无言的倾诉。

山田仿佛一个准备登台的演唱者，他打扫了一下嗓门，摆正了姿势，然后端庄而做作地说了一大串我听不懂的日本话，经过那个朝鲜人翻译之后，我真厌恶得要呕吐了。

我不爱听那些卖淫妇式的甜言蜜语和传道士式的说教，因为它已经毫不新鲜了。你想用伪善者的欺骗诱变勃的气节

吗？那才是幻想家的梦想。是的，勃那双闪光的眸子和紧紧胶合的嘴唇，不是已经很明白地告诉他了吗？

“奉了天皇的意旨”，收回你的慈悲吧。允许我们例外会见的“恩惠”，正如同你们把有毒的糖果散给小孩一样的卑鄙！然而，我们却不是那贪吃的、无知的孩子。这不但不能引起我们一点点的感激，反而加深仇恨了。

希望勃动摇，做一个“满洲国”的良民吗？这无耻的企图，只等于让高空中的鹰鹫，永远收起它的翅膀，归依于人类。然而，即使把它的两翼剪掉，或把它关在樊笼里，而它的心却是永远向往着晴朗的天空，对于你们这些无耻的掠夺者会永久唾弃和仇视的。

朝鲜人译完山田的话，他们那四只探索的目光象利箭一样向我们射来。勃带着冷漠和敌意去接触了它。接着我仿佛听到了勃那愤怒的心声，他的脸更加苍白了。我们手越握的紧，我的心越痛的厉害，聚结在心头的万千倾诉使我的胸膛爆裂了。让我们的手永远这样紧握着吧，直到我们的心声化为语言的时候。

然而，这希望马上被山田向我们伸出的四个指头打碎了。他眯着眼睛，注视着手表，把伸了伸的四个指头又屈了回去。而后朝鲜翻译说：

“注意，允许你们四分钟的谈话，现在，开始——”

四分钟，多么短促的四分钟呵！我应该在这宝贵的时间里对勃说些什么呢？他们那些只监视的眼睛已经把我的思维搅乱了。勃为什么还不开口呢？

我的头在开始膨胀，我的心逐渐下沉了。两只扣抱着的手掌已被汗液浸湿。一分，两分，天哪，三分钟一晃便消逝了。等到山田小指向我们无情地竖起来的时候，我便将被迫和勃分离了：是暂别，还是永诀，我真不敢设想，更不堪设想。

突然在我的毫无戒备中，勃猛地把我的手松开了。他竟是那样地毫无留恋，向我说了一声“再见”之后，便倔强地头也不回地向门外走去。望着他那愤怒的背影，象初见时那样惊喜激动了我的心，它不规则地跳跃起来了。同时惜别的泪，象决堤的河水似的，无阻地奔流出来，但，我立刻用手帕揩去了它。

在死的威胁和生的诱惑中，勃没有屈服，他是用无言的反抗把敌人的美梦粉碎了。山田的小指还未及竖起，勃便把手臂整个地垂下来转身走去。细长脖子的日本人为勃的举动大为吃惊，仓皇地追赶前去。

朝鲜人凑近我，带着不屑的表情说：

“他一点都不爱你呀！”

我傲慢地瞪了他一眼，想狠狠地骂他一句什么，可是我没有说出来。我向山田挺了挺傲慢的胸脯，以迅速的步子夹着衣包走出接见室。

这时，山田那卖淫妇似的甜言蜜语还仿佛在我的耳边荡漾：

“申君，你有父母，有妻子，有美满的家庭，我们不忍眼看你在万恶的主义下牺牲。假如你肯招认，自由、幸福和

生命，我们将双手奉还。申君，望你考虑，愿你了解我们大日本帝国的苦心……”

我竭力镇定着自己，不让我的感情过分地奔放。然而，当我平静地回忆刚才所发生的一切的时候，山田那甜言蜜语的余波，竟以另外的一种力量把我内心的恐怖擒住了。他使我很清楚地看见了在我面前安排好了的勃的命运：刑逼、永久的禁锢和光荣的牺牲。

无疑地，“美满的家庭”将不会美满地存在了。勃正如一个夜航中的舵手，遭遇了不可抗御的暴风雨，将全船倾覆于险恶的海上，而那船上的生命正是他的父母、妻子和他自己。

在今天以前的一切希望和幻想全化为烟雾了。留在我眼前的是无边的黑暗。我的生命仿佛是海上的一具浮尸，让海涛打着，无止境地漂流着……而后腐烂了，消灭了！

带着梦一样的幻想向前蹒跚着。突然，汽车喇叭的一声尖叫，把我从梦幻中唤醒。

于是，我自语地反驳着自己：

“然而，勃做错了吗？难道他的行为还有什么可指责的吗？”

5. 礼 物

经过多方面的介绍，我认识了日本人山田。我们俩互怀着利用的心理，做着虚伪的亲善。

我不是傻子，当然不受他利用。可是山田在我的眼里却是一个天大的混蛋，他竟把我的虚伪当作了真实，虽然他有着那样一副高深莫测的眼睛，又是那样老经世故的将近五十岁的人。否则，他为什么不干脆拒绝我呢？

我要求他的事情似乎在进展着……

一天，两天……山田预约答复我的日期到了。

我的灵魂中仿佛弥满了焦躁的小虫，它们爬遍了我每一个神经系统，这样，搅得我一刻都不能安静。坐在监督者的眼皮底下（当时他在让渡后的中东铁路兼职），我不时地望一望窗上的日影和腕上的表，时间过得如何的慢哟！太阳也怠了工吗？

我的手因焦急而为汗液浸湿，纸上的字常常被它们润脏，错字也不断地出现，于是，我一页又一页地调换着纸张，那监督者鼠样的眼睛，狡猾地向我斜视，发着阴冷的笑。

一切我都无暇理会，一切我都漠视着。

四点敲过，我解脱了束缚，急急地走出那雄伟的建筑物，透了口轻松的气。然而，这以后的时间，仍旧不是属于我自己的，紧接着又得钻进那另一个夜的办公室了。于是我的焦急依然继续着，滋长着，时间越是迫近，我的心情也就越是烦乱。好在，这是一个自由职业，毕竟还有我脱身的余地，发完了一部分稿子，和山田约定的时间到了，我便跳上一部人力车，这时我的焦躁被另一种情绪占有了。

一个憧憬，一个期待，一个奇迹，一个强烈的欲求，和

一种莫名其妙的饥渴，我的灵魂中喷射着希望的火花，街头上每一盏电灯，每个人的被灯光耀映着的脸都象喷射着我希望的火花；忽而当车子拖到山田的门边时，我的心却完全战栗而飘悬着了。

我怕那是使我昏厥的失望呵！

带着无节奏的心跳，轻轻地敲了山田的房门，隔壁发出一声脆快的回响：

“噤——”

尾音拖得那么长，正如跑马戏的山东女孩子豁亮的吆喊。接着那回响，我听见木屐的声音，门轻轻地开了，然而那仅是一条隙缝，隙缝中露出一只妩媚而一瞬变为无情的眼睛。我认识那是山田的太太，我问她：

“山田先生在吗？”

“没有。”满含着嫌恶的简单的答语，使我的希望冷了一半。门不知什么时候关了，我被摒于门外。

呆立好久，我才清醒过来，那一半的希望也幻灭了。

这是我的奇耻大辱。愤怒撕裂了我的肝脏，对强敌的仇恨怒潮般的汹涌，我的眼睛冒着复仇的火焰。然而，我没有向她报复的勇气，只有移着疲倦的脚，沉重地、失神地再让人力车拖回那夜的办公室。对于自己的怯弱，我不禁产生了疑问：

“难道我真是这般软弱吗？在一个敌人面前竟不敢报复？”

一次、两次……五次、六次我见不到山田，十次之中，

至多有两次他践守约言，余下的八次，就只有让我受辱的份儿了。

山田是一只忙碌的猎犬，他做着特务工作，不分昼夜的忙着，有时也因规避我，故意失约。因此，我会到山田的机会反不如会到他太太的机会多了。而我的失望，我的愤怒，也逐渐膨大起来。

山田的太太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主妇。她家里没有仆役，而且她有两个不懂事的孩子，整个的家务完全由她一个人负担，同时她还要照顾着在高中读书的大儿子，那实在是够劳碌了。然而，她的家却总是那样清洁、明朗、有秩序，无论什么时候到她家，地板上总不会找出一星星尘埃。日本妇女治家的精神，确是不能不使你吃惊的。

她生着一副很好看的显示出精明强干的面孔。在山田面前的时候，那面孔表现得非常谦虚，非常和蔼可亲，可是，却是那么善变哪，当山田不在家的时候，她给我的总是一副极端无情的脸相，这脸相我看到实在不止二十次了。

除掉星期日，我多半是下午七点钟到山田家里去的。那时山田的太太也许在烧菜，也许在洗盆盥……总之，她常是在厨房里的。临着甬道的门，只有厨房和客厅，对了，我晓得了：山田即便在家，倘若没有客人在，他也不会客厅的，所以我只有敲厨房的门了。然而，当我的指头未接触那扇门之前，我是多么矛盾呵，敲呢，还是赶快掉转身去走开？

那张善变的无情的脸，那句简短而满含厌恶的答话，尤

其是那扇微启的门和那“砰”然一声的闭门羹……这些都使我难以忍受。有时，她分明是知道山田马上就会回来的，可是她却绝不肯打开门让我进去等候。她完全把我当作一个窃贼或者是一个坏女人看待。生平我不会侮辱人，更不会受辱于人，如今我竟受了这么多难堪的对待，而且是受之于一个仇敌的女人！以我倔强的性格，这都是不能忍受的。然而，我终于默然地忍受了，而且忍受得很久……

怎能不忍受呢？我的希望，我的幸福，我今后的前途，都间接地握在她的手中呵！

新年到了，寒冷施展着淫威，那白色的残酷的严冬使我恐怖，狱中人的佳音象月亮那么难以获得，我的心仿佛被悬在空际了，时时担心着狱中人会被白色的严冬毁灭。

狱中人的生命是在山田的掌握中的。

可是，我已经有一个星期没有会到山田了，过去偶尔会到，所得到的也不过是些搪塞之词。

为了换得一点精神安慰，我便不得不乘这新年之便，做一点较大的物质牺牲了。于是，在除夕的头两天把年终的奖金和全月的薪水完全为送山田的礼品而花费了。除了一张礼物券而外，还给他的孩子买了两个重价的洋娃娃，我想：这次也许不会被摒之于门外吧？

山田的两个孩子正在甬道中做着竞赛游戏。孩子是天真的，他们见了我总是显得很亲热，听了我的皮鞋声，马上停止了追逐，四只小手向我张来：

“刘山……刘山……爸爸的没有！”

我把三个匣子交给了两个孩子，让他们抬着。孩子看见玻璃匣里的洋娃娃，欢呼着飞跑了。

厨房的门开着，由里面飞散出浓郁的油烟，那一定是山田太太在预备着新年的晚餐。

我还没有走到门边，山田太太满面春风地迎出来了。她是那般鸟一样的噪着，向我深深地鞠着躬，一个又一个，口里不住的：“阿立丫豆，古扎一麻丝……”^①并且要她的孩子们向我致谢。

这真使我惶惑起来，我说什么呢？我怎能有那样厚的脸皮向她一个又一个地还礼呢？

她手拉着手把我牵进会客室，让我坐在那高贵的沙发上，双手递给我一杯香茗，而且出我意外地摆上四样茶点，一样一样地亲手送到我的唇边。她忙乱得头在冒着汗珠，嘴和眼睛都是稀有地欢笑着。我不禁为她的无耻可怜起来，同时也感到我的礼品对她施了一点报复。

“多么浅薄的女人！”我心里在骂。

她忙乱完了，嘘了一口气，坐在我的身边了，非常亲热地拍着我的肩头，拉长了声音说：

“你的大大的好人哪！”

我感到嫌恶，送给她一个勉强的笑。

“山田先生不在吗？”

“五分……五分钟。”

她点着头，说着生硬的中国话，并且用手指表示着数

^①日语，多谢的意思。

目。

我们没有什么话可说，彼此的语言是不通的。她只是不住地反复着“阿立丫豆……”、“大大的好人……”两句话。这真使我局促不安，我有些坐不住了。半点钟过去了，我忍不住又问：

“山田先生不回来吧？”

“斯固卡耶里马笑。”^①

我还有三个小时的工作，实在不能久候，几次要走，都被她拦住了。不得已，只好给同事李打了一个电话，请求他替我发发稿子。我便坐在山田的客厅里翻着山田太太拿给我的几本贴满相片的本子。

一直等到十一点，山田也没回来，山田太太曾经几次地打电话各处去找，终于没找到他。

我只好怀着失望走了，山田太太还在挽留。

此后，我到山田家去时，一变而为山田太太的上宾了，并给我加了一个“大大的好人”的头衔。

6. 探 望

我搜集了那么多传说，厚厚地在我脑子里堆积起来，而且膨胀着呢。

它象深秋里的败叶一样，每片都不是我希望得到的，我竭力把它扫除，然而，不知哪儿刮来一阵风，又聚拢在一

^①日语，马上就回来的意思。

起，于是又堆积起来，在我的脑子里膨胀着……

渐渐地，它们聚嵌在我的脑子上了，于是，我的脸上也出现了败叶的颜色。

同事们不晓得我脑子胀得多么苦，他们仍是把他们采访来而不能发表的新闻，作为谈话的资料。他们是多么漠不关心，用一种讲故事的方式与神态讲述着。我听着，胸口塞闷，心脏紧缩，然而，也只有默默的叹气而已。

当他们故事讲述到最高潮的时候，也是我心痛最厉害的时候。我翻弄着一篇篇稿件，眼前闪动着模糊的字迹，两只手不停地翻，翻来、翻去，而精神却离开它们好远好远，很久，都不能选出一篇满意的文章。我只知道：白的纸，黑的、蓝的字。我怕听，我尽可能地蒙蔽着听觉，不让他们的故事搅碎我已非完整的心。然而不能，越是想要回避，越是回避不了，那一句一句刺心的话语，仿佛一柄锐利的钢锥，毫不留情地刺进我的耳朵，我没有力量使我的耳朵抗拒这柄残酷的锥子，只有任它穿凿、穿凿……

那不平凡的故事，使整个编辑室的空气都显得紧张，每个人全停下了工作，把眼光贯注在演说者的嘴角，连取稿的小学徒，也把身子依在写字台边，大张着嘴巴，望着发言人的脸，映着他天真的眼睛。惊愕、叹息、不平的低吼、愤慨的呼声，使讲述者加强了讲述的勇气和力量，他在指手划脚地描绘着那故事中最残酷的场而。我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充满了悲惨的影子。它溜过我的心，钻进我的脑际，最后终于停止在我的脑子里了，牢牢的象一片胶，我竟无法把它揭

掉。

我始终缄默着，埋头翻弄着一篇稿件。我不敢抬起头，也不敢插言，默默地忍受着心的剧痛，让那柄钢锥任情地锥着我的耳朵，穿凿着我的心。如果我不自觉接谈起来，那么，我激愤与悲痛的泪水就会洒在人前，但，我又怎能把心头郁结的创伤展示给他们呢？

也许是我的缄默引起了他们的怀疑？也许是我的遭遇早被他们探悉？虽然当时我在竭力地避免和他们交谈，而那并非善意的警句却接二连三地向我飞来：

“刘先生，发稿要当心哪，你呀……这是什么世界？”

“岂止发稿呢，就是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不能越轨一步呵！”整天和麻雀牌厮混的赌徒小张，绷紧了眼角，补充着伟天的话。他的眼光针一样的对着我的脸。

“真的，刘先生，你要特别小心才是呀！……嘿嘿！”单是这语尾的一声狡猾的笑，就可以知道基督教徒曹峰如何的阴险了。在报社里几位进步同志面前，他常以革命先辈自居的，而且，我也正是他们眼里的危险人物。整个报社所有的同事，他是最坏的一个，也是和我敌对的一个。因此，他这满含敌意的讽语，使我再也不能缄默了，尤其是在悲愤交集的当儿。于是，我放弃了平日对他的戒心（他是随时可以做汉奸，随时可以把一个热血青年送入虎口的），冷冷地反驳着说：

“我有什么呢？老鼠一样蹲在编辑室里，为什么我该特别当心呢？真是岂有此理！你们整天和社会接触，哼，才真

是危险呢！”最后的一句诅咒，算是我对他的报复。

曹峰翻了翻他那整年给红丝爬满的眼球，又阴险地笑了：

“嘿，干文化工作的人，顶容易遭祸，这你是知道的，特别在这个年头，特别是女人，而特别是你……”

他的话一句比一句紧迫着我，我的愤怒快要胀裂胸膛了。

“你为什么一口咬住呢？女人怎样？我又怎样？”

“嗨，难道你没有听说，上次东洋宪兵队捕获的那批间谍全是女人？”他伸长了脖子问我。

“这，我倒没有听说，我只晓得那次被义勇军掳去枪毙的十几个汉奸，内中有三个是贵教教徒。”

曹峰对这侮辱没有辩驳什么，然而，他那长满横肉的脸却红了。他眨着眼睛，好象在思索着用更尖锐的话来报复这侮辱似的。

和事佬丁子看着我们俩已经到了短兵相接的状态，为了打破这危机，他叹了一口气，把话题又勾回到那刺痛心灵的故事上去：

“唉！这年头的人命是不值钱的呵！……喂！老李你接着说，掌管绞人机器的刽子手是中国人，还是东洋人？”

于是，故事又继续讲述下去了。

由于悲痛而变成愤怒，……再沉入悲痛的深渊，我的心仿佛是被投入绞人的机器里在旋绞着了！我哆嗦着冒着冷汗的手，把那些一个字都不曾看的稿件塞进抽屉里，故作镇静

地走出编辑室，眼前闪烁着金色的小星星。

一走到街上，便不再镇静了，我疯狂一样，向着我的“希望”，向着禁锢我的“希望”的方向，疾走着……以至于气喘了。

望着那森严而坚实的黑色铁门，望着那高不可攀的墙垣，象往常一样，我又失望了。

仅是一堵墙呵，它隔断了我的视线。那宛如一座峻峭的山，墙头上插着破碎的玻璃，正象山路上的荆棘。恨我没有一双透视一切的眼睛，不能把视线穿过这山腰望一望我日夜悬念着的人，我更缺少健全的手足，爬不过这遍是荆棘的山。倘如我有着飞行者一样敏捷的身子呵，我不是可以很轻快地飞过这座高山去实现我的希望吗？

在铁门之边、高墙之下，已经踏遍我的足迹了。每当我听到了可怕的传说之后，或是被相思揉搓得要发疯了的时候，我总是带了一种不可捉摸的心情，跑到这里徘徊一次的。我了望着，了望着院深处的房群，那坚实的灰色建筑物中，该是勃受苦的处所吧？然而我看不到勃，我视线所接触的全是一些陌生的、迈着自由步子的人；勃是没有这种自由了，他被吞进这灰色建筑物的铁栏里了。也许，早已被它埋葬！

看不见勃那副刚毅的面孔，即使听一听他那沉着的声音吧，我也会感到满足的。我竭力用眼睛和耳朵搜寻着。然而，一切都使我绝望。于是，我诅咒那高墙、那铁的栏栅和守卫在门旁的哨兵。倘若我身边有一枚炸弹，我会把这些障

碍统统粉碎，然后，自由地跑到我所要去的地方。

现在，我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能，唯有注视着那些障碍物发呆，直到眼球胀痛，眼眶里流出失望的泪水。

眼前的一切渐渐地模糊起来，街灯的眼睛放出昏黄的光，那黑色的铁门沉重地关闭了，我沉重地蹒跚着发颤的步子迷糊地进了电车。

火一样的希望逐渐冷了下来，当达到了失望的顶点时，我绝望了。车身摇撼着，我的脑子和心脏也随着摇撼，现在，我完全混乱了，这繁华之街，这都市的夜景……什么全不能闯进我的眼帘，我的眼前闪动的是那些可怕的传说和传说中扮演着的角色。

秃坐在车厢的角落里那个骷髅似的青年，他一定是被监牢里的饥饿与毒刑折磨成那副枯瘦形骸的，他的肺病怕是近三期了？是的，他是一个囚徒，看他的头发该多么蓬乱而灰长呵！

那个扶着拐杖的残缺者，为什么他会失掉一只腿呢？噢！他的腿是被那架绞人机碾掉了，他是从刑场逃脱了的死囚吧？

满头是新的伤痕，臂上缠着绷带，腿也缠着绷带，一只手抚摸着腰部，痛苦地呻吟着。

那个褴褛的汉子，他一定是刚刚受过严刑拷问的，不然，他的眼睛怎会放着那样怕人的愤恨之光呢？

那个佝偻着腰的婆子……

苍白色嘴唇，凸出着眸子，那个十四五岁的孩子……

.....

整个车厢里的乘客，都变成我幻想中的囚徒了，这些凄惨的景象，摄住了我的视力，我的神经被他们紧紧地捉住，全身情不自禁地发起抖来。

每张脸孔我都仔细端详过，我献出了极大的同情与悲愤环视着他们，每张面孔我都感到亲切。然而，那里面没有勃，勃的面容或许比他们更枯瘦、更可怕些，倘如他侥幸没有被魔鬼活啖，那么，见到他的时候，说不定我会认不得他了呢！

然而，我能够再见到勃吗？

车厢里的人完全走光了，我的眼前却还在排演着那一幕的悲剧，直到车长来催我下车了，我才从混乱中清醒过来，原来电车已驶到终点了，离我该下车的地方已经越过七站了。

是多么远的路程、那么长的时间哪，回想着适才的景象，仿佛做了一个噩梦。

别时，正是春深，庭园里经勃亲手培植起来的花儿，全欣然地向着太阳咧着嘻笑的小嘴。现在呢，花儿凋谢了，结下了来年的种子。窗下的老榆，只剩下秃老的枝干，孤独地站着。庭园里连一片落叶也找不到，都让秋风给卷走了。

秋已残了，丛茂繁荣的庭园，如今是一片荒凉。望着这萧条的景色，我郁闷的心头更加一层悲凄。然而当我抚摸着那一粒粒肥硕而坚实的种子时，我又释然了。

勃依然没有半点儿消息，有的，仍是那些我怕听、而当人们讲说时我却又不肯漏过一句的传说。

整整五个月了，这一百五十多个漫长的昼夜，是怎样悠久，怎样凄凉的岁月哟！但朋友们却都这样安慰着我：

“这，这是伟大而值得骄傲的别离呀！”

是的，这别离是伟大的，是光荣的，但同时，也正是我生命史上最惨痛的一页呢！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一个平凡的年轻女人，我没有克制感情的理智，也没有一把锋利的匕首斩断绵绵的情丝；敌人的残酷的强盗行为，更使我不能把那些传说看作谣言不去理睬。虽然，我从没有把忧郁的脸色显示给人们看过，虽然，我从不会在人前流过一滴懦弱的泪水，但当人们都已安息了，却正是我心灵受着熬煎的时候。

一天的工作，够疲劳了，我需要休息，我需要甜甜睡上一个通宵。可是，身心一静下来，所有的忧愤都蜂群一般地涌上心头，尤其是那些传说，又在我的脑里加速地膨胀起来。

睡魔变得那么懦弱，它竟驱不散这群窜扰神经的大虫。我辗转着，周身仿佛都有大虫爬噬，于是我披起睡衣踱出屋外。

夜，悄静的夜，每个家庭都点了灯火。我独自个儿倚着楼栏仰视着秋的天空。那颗残缺的月亮投给我一个冷清清的面孔，她好象新寡的孀妇那么忧郁着，然而，她并不比我更孤独呵！周围不是那么多的星儿伴着她吗？而能够给我以光

和热的人呵，却都已星散了！

我的眼睛爬过错综的楼顶，在不远的那一方，隐约地可以看到那坚实的灰色的建筑，我要向它喊：

“还我良人！”

秋夜寂寞，秋风够冷了，我孤独者的心灵呢，比秋风更寂寞，也比秋风更冷。

不知什么时候，我又倒卧在床上了。不知什么时候，我见到了勃。

除了勃那双长睫毛沉毅的眼睛是我所熟悉的，眼前的勃的一切，只有在我的幻想中才出现过。

勃蓬发下那黄蜡色面孔，并不见得比往日消瘦，它是臃肿着。他的腰已经伛偻了，周身遍是未痊的伤痕，鲜血斑斑地染红了他薄薄的衫衣。光着腿，赤着脚，拖了双破旧的木屐，木屐也几乎被血染遍了。两只手紧紧地被扣在手铐里，他夹在两个武装日警的中间一瘸一瘸地走进一个暗黑的屋子。

我站在铁窗之外，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一个门，我敲打着铁栏，疯狂地喊着：

“勃，勃，我在这儿，你穿那么薄的衣裳，不冷吗？”

勃好象早已看见我，他一点都不惊喜，只是淡淡地、然而非常有力地说：

“笠，不要记挂着我，我的热血已经沸腾，哪会冷呢！”

接着勃的话，两个日警的刺刀在勃的身上跳舞了，勃的

热血在流了，但，他不皱眉，也不喊痛，大张着眼睛在狂笑。

我拼命地，但不知是什么塞住了喉咙，运足所有的气力也吼不出声来。于是我不顾一切地敲击着窗棂，用拳，用头，拳破了，头昏了，我的耳朵和眼睛什么也听不见看不见了。

“魔鬼们，你们缚得住我的躯壳，却缚不住我的灵魂……”

是一声夹着激愤的怒吼，是一声沉痛的反抗的狂呼。我被这声音唤醒了，张开沉重的眼皮，呵！传说的惨剧终于鲜明地摆在我的眼前：

那黑暗的屋子里聚满了武装的、西装的日本人。狰狞的面孔，眼睛放着凶残的光。他们团团地把勃围在了中间。勃是被倒悬在房梁上，他的头部已经充满了血，一条条的脉络青虫般凸胀起来。刺刀、皮鞭、火焰……纷纷地吻着勃多骨的身子，鲜红的血都淋湿了日本鬼的衣襟……

“嘿，天杀的！剜开肚肠，也休想我屈从！”

勃咬紧着牙关，声嘶力竭地喊，声音低沉而悲壮。

望着受着非刑的勃我哭出声来了，沉痛的泪水蒙蔽了我的眼睛。我沁血的心，一片片被魔鬼吞噬着。

“好，把他的心剜出来，看他这反满抗日的乱党还反抗不？”

一个矮胖子日本鬼说着十分流利的中国话。

勃由房梁上被解了下来，马上又被紧紧地缚在一条备好的长凳上，面孔望向天棚，他仍在挣扎，嘶哑地吼着。

一把闪光的尖刀冲向勃的胸部。

我狂喊一声，猛力撼动铁的窗栏，突然窗栏断了，房子也随着倒了下来，我被压在里面。我从噩梦中惊醒过来。

冬，夹着白雪来了，我的希望好象被冻结住，我的心也被冻结住了！

我还年轻，我还是刚从礼教家庭中逃出来的孩子，我需要一个导师——一个刚毅象勃的导师，因此，我不能失掉勃，没有他，我的生命暗淡无光，没有他，我的前途将是一个莫知底止的深渊，我会堕到那里面没人拯救。

无论朋友们怎样在为我流着绝望的泪，我却永久抱着那一个缥缈的希望，自己骗着自己。

那希望约束着我能安分地、鼠一样地生活着，把满腔的热血与激愤深深地、深深地埋藏在胸膛里，除非在知己朋友面前，连半句愤慨的话都不敢说，我谨慎着行动，忍受着一切侮辱与欺骗，那都是为了不让我那陷入虎穴的勃更受到迫害，而早些实现我的希望。然而，我的希望是梦，是幻想，象海中的明月那么难于捕捉呀！

倘若那些传说不是谣言，倘如我那可怕的梦境是真的现实，那不是什么全完了吗！

我整天在寻觅着，寻觅一个探听勃的消息，或是可以见到勃的机会。

机会，呵，机会终于来了！

警察厅刑事科的留置场^①经过日本人扩充改造之后，他们为了宣传他们对囚犯的“优待”，为了宣传他们那“伟大的建筑”，特于十一月二日约请新闻界前往参观，我便被报馆当局派遣为这次参观的代表。

是多么偶然、多么难得的幸运呢，我欣喜得几乎发狂，一颗兴奋的心怎么也按捺不住了，它一直跳跃着，这幸运反而使我坐立不安。我怨恨着时光走得太慢，为什么今天的日子这么长呢？

我瞪着眼看着外面的天色，看着太阳落到西边，又看着它从东方升起。我们报馆一共去了两个代表，那一个却偏偏是我的敌人曹峰。当我们一同走出报馆的时候，在我欣喜的心灵上突然罩了一层阴霾。

勃的事情他真的知道了吗？不然，为什么路上他总在对我不停地狞笑呢？

他问我：

“以往无论什么事你也不肯代表报馆出席，这一次，你怎么没有推辞呢？而且很高兴去的样子？”

“这就是好奇。”我淡淡地回答。我的肺快要爆炸了，为了避免和他谈话，我加快了脚步，走到他的前边。

我向着铁门傲视，向着高墙傲视，尤其对那对岗警，我用胜利的眼光瞥了他们一下，在心里说：

^①这是规模最大的拘留所，可容犯入一千余名，在那里有被羁押三年以上的囚犯，在那里可以执行死刑。没有待遇可言，它的凶残，怕是超过幻想中的地狱了！

“哼，你看，我是被请来的呵！”

十三个参观者拉成一个错杂的行列走进我最熟悉的灰色建筑，不，它现在是披了一件雪白的孝衣——重新刷了一次石灰粉——以新的姿态站立着。

人还没有挨近门边，一股浓重的气息便强烈地扑打着鼻腔，仔细嗅了嗅，原来这监房是曾经洒过多量的石炭酸。甬道中新洒的石灰，把人们的皮鞋底很自然地镶了一道白边。一切全是崭新，然而那阴湿晦暗的甬道，已经明白地告诉了我，这里是永年也受不到阳光拂照的。

我的心里丛集着多种情绪，我无法分析它究竟是兴奋、是悲痛，还是恐惧抑或仇恨，它只是失常地跳跃着，一刻都不停歇。

两个日本警官同一个翻译做向导，他们边走边谈，我孤独地做了这队伍的尾巴。参观者是怎样赞美这“伟大的建筑”，向导者是怎样叨述这地狱“天堂般的待遇”，我完全无心去听，实际，那些天谄媚的肉麻话，那些虚假的自我宣传，我不需要听，事实会证明一切的。

甬道两旁排列着的监房，寂静无声，恐怖的气氛十分浓重。每个铁门全紧闭着，从门上留着的方形洞孔，如果不挨过门边张望，仅能看到受难者的头顶。他们谁都不那么认真地向里张望，总在向前走着，谈着，那不是参观，好象特来听敌人的宣传。他们把全部精神贯注在谈话上而，我走在他们身后，我的行动不会被他们注意，因此，我可以大胆地运用我不安定的眼睛了。

我把面孔放在一监号铁门的洞孔上，视线在房里迅速地扫着。

是一个不满方丈匣一样的小屋，里面没有窗，也没有床，已经到落雪的季节了，犯人们还依在那冰凉的水门汀地上，衣服是那么褴褛而单薄。地上除了一些烂布或破布之外，什么都没有铺。他们脸色发青，还有点儿臃肿，一个拥着一个，看去是十分吃力地排坐在地上，眼睛没有神，然而却都放着渴求的光，好象在说：

“同胞们，救救我们吧！”

看着那十几个受难的同胞，我的心开始绞痛了。那里面有我的勃？我看不出，我恨我的眼睛太不中用，在那些臃肿青白的脸上，竟寻不到不同的特征，一个个全是令人心酸的憔悴呵！

他们已走过三个监号了，我不得不随着前进。我刚离开第一监号，里面突然有人狂喊：

“把这里的惨状宣布到世界上去吧！”

紧接着，第二，第三……监号也开始骚乱了；几个红黑的团子由方洞飞了出来，有一个恰好打在我的肩上。

“看吧，这就是我们每日的食粮……”

我把粘在肩头上的东西用手帕揩了下来，那是红紫色的秣米饭粒，放在鼻头嗅了嗅，一股酸臭的气味，真是令人欲呕。

“家人不能接见，连棉衣都不许送呵！”

“我们快被饥寒疥疮治死了！”

这时招待参观者的日本警官向后转了，无论他们怎样故作镇静，那种仓皇暴怒、手足无措的神态已经天真地暴露出来了。

二十多个监房里所有的囚徒，同时呼喊着的，声音一会比一会嘈杂，使我听不清他们的申诉，但，我已经为了那呼声兴奋欲狂了。

我屏息地听，在那些受难者的愤呼声中，我寻找着勃的声音；同时，当经过每个监号时，我总不忘记把面孔放在方洞上搜索一周，即使我那匆匆的一瞥不会认出形容改变的勃，如果，他在这里边，那么，他是一定会认得我的。

火一般的希望，终于降到零点以下，前边只有一个监号了。

当我绝望地把面孔贴近最后一个方洞时，我完全呆住了呵！那个长发蓬散、倚在一犯人臂里立在铁门内的不就是勃吗？

倘如没有那些传说生根在脑里，我绝不会相信那就是勃，因为勃钢铁般健壮的体格，不致那么虚弱得要人搀扶呵！

“笠！”

六个月不曾听这一声亲切的低呼了，然而我听来却是多么熟悉呵！

看着勃闪着泪光的眼睛，看着勃苍白的微笑的嘴，我真想由这方洞中钻进去投到他的怀里痛哭一场。

我仿佛是一个呆子站在原位不动，也不会说话。等我觉醒了向里探望时，人们已经快走到甬道出口的铁门了，曹峰

正掉转头来用他侦探的眼睛在寻视着我。

我不知道怎样才好，我不忍离去，又不能不离去。我有不尽的别情要向勃倾诉，然而，匆促间我又找不出什么话可以表达那不尽的别情。

终于，我转过头来，我突然晕旋了，几乎昏倒在甬道上。

在我浸满泪水的眼窝里，永远留着勃微笑着的影子。

西行散记

1. 流亡曲

虽然是冰天雪地的塞北，然而我爱它，我并不曾感到冷的难熬，我们是习惯于那种气候的。有谁相信呢，这温暖的南国，冷起来，反而有时使我招架不住了。那阴霾的天，好象寡妇的脸，悲凄而憔悴。风，夹着恼人的冬雨，凉森森的，一直吹入骨髓，肌肉永在痉挛着，痉挛着，连脑子里的血液都凝结了。怎么也伸展不开胸腰，仿佛一个胆怯的战士，总喜欢缩着脖子，因此，一到天冷的时候，人就显得矮小了些。

长江里混浊的水还在不息地奔流。松花江呢？那清澄的液体却早已结成坚实的冰了。每逢我横渡长江的时候，望着那起伏着的波涛，我的冥想远驰了，让长江里的浪花把它涌送到松花江畔吧，我怀念起平明如白银般的松花江面和那穿行似梭的爬犁，多么爽快呵！坐在那软绵绵的铺着皮褥的爬犁上面，箭一样的在冰面上滑行，那比汽车更快，也比汽车更舒适些。清新的风拂着裸露的面庞，会使你的头脑特别清醒。我常坐在爬犁上面运用着思维，在想着一篇小说的结构。

我不是生在松花江畔，然而松花江是我的第二故乡，它

给予我许多温暖，也给予我许多痛苦，然而是多么宝贵的人生经验！我仿佛一颗刚出土的嫩苗，经过了松花江水的灌溉，才慢慢地成长起来、坚强起来。因此，除了故乡之外，我更爱松花江，我怀念我的第二故乡，有时，更甚于生我的沈阳。

这时候，似乎不该是怀乡的时候了，倭奴的炮火已经轰遍了中华的领土，烽火漫天起来。辗转流亡的孩子们，还有什么资格与余暇，永在忆想着蹂躏在敌人铁蹄下的故乡呢？

竭力、竭力地想把它忘却，不让宝贵的脑汁白白浪费，然而，怎么能够呢！两三年来，总在流亡的人群里生活着，尤其是近几个月，许多的朋友——都纷纷地让敌人迫出了家乡，做了逃亡之客。骨肉离散了，家园里正驰骋着敌骑。大家聚在一起，谈起来，常是把话题引到个人的故乡去；故乡里的骨肉，故乡里的田园；故乡里受难的同胞和朋友；尤其是那无尽的富源哪，使人怎能忘怀呢？

不知是从什么时候起，我们的楼上忽然流行起《松花江上》那支流亡的歌曲。那些日子，仿佛大家都有着说不出的苦闷，文章不能写，也很少交谈，整天只是仰起面孔胡乱地哼着。

老杨唱，老陆唱，后来，竟连从不唱歌的老太太也唱起来了，唱着，唱着，她便深深地打着沉闷的唉声。

日里唱，睡在床上也唱，总之，只要一有空闲，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一个唱，大家便都习惯地随唱起来。于是，这支感人的歌子时刻地回荡在我们楼上的两间房子里。它已经变成了我们的口头禅，变成了孩子的催眠曲。有一次，住在楼下的舅父问我：

“你是高兴呢，还是发愁？怎么半夜里还在唱歌？”

“我是哄孩子睡觉呵！”

“怪不得，夜夜我都听你唱‘森林煤矿，大豆高粱……’”

舅父说。接着他又惋惜地叹了一口气：“唉！真可惜，咱们东北那么多的富源，如今，都让小鬼子享受了……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回去呢？”

“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

无意中我又唱了起来。

舅父摇了摇头，又打了一个唉声。

不久，这流行病也传染到了舅父，舅父也常常在楼下唱了。

起初，大家是从头至尾一句不漏地唱着，后来，也许是嫌歌词太长了的缘故吧，竟断章摘句、东一句西一句地乱哼起来；再后来呢，就只剩下最末一段了：

哪年哪月，

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哪年哪月，

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

爹娘呵，爹娘呵，

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

即使是真的把故乡忘了，这样一来，又怎能不引起乡思？

最喜欢唱的要算老杨了。早晨，大家还没有起床，一睁开眼睛，便可以听到隔壁老杨的歌声，更有时，他嘴里嚼着饭，“松花江上”还在他的喉咙里打转。

歌子唱的烂熟了，自己都好象感到了烦厌，老杨常常一个人在他的房里自言自语：

“不唱啦，老唱这伤心的歌又有什么用呢？”

刚唱了半句，便自己下着警告，于是，歌声马上截住了；可是，过不了一刻，又照例唱了起来。

“不唱啦，老唱这伤心的歌有什么用呢？”我学着他的口吻警告他。

隔着板壁，老杨带着伤感的音调说：

“真的，什么时候我们才能不唱这伤心的歌子呢？许能有那么一天？”

“有的，怎么没有？打回老家去呵！”我坚定地确信地答着。

“对啦，我们应该拚着命打回老家去，那时候，我们就不唱这个歌了，那时候，我们将摇着祖国的大旗，高唱凯旋的歌子踏上故乡的土地……你说，到了那一天我们应该怎样高兴呢？”

“字典里怕是找不出形容那种高兴的字吧？”

2. 一封不敢投寄的信

春色染绿了枯黄的江南，春光跳荡在草丛里、溪流中、树的枝桠间……也跳荡在人们的心上。从那酷寒的严冬，转

入了这一年一度的幸福美丽的温暖的季节，人们的心该是怎样的欢愉呵！

然而，我的故乡呢？故乡里是没有春天的，它永远蜷卧在白色的严冬里，受着风雪的鞭笞，受着无情的残害。它衰老了，憔悴了，奄奄一息了！

春色染不绿故乡的原野，故乡的原野已经变成了荒芜的废墟。故乡的草丛里、溪流中以及树的枝桠间……更没有春光在跳荡。那里跳荡着的，是一些恐怖而凄厉的光芒。春风虽暖，却吹不开人们让冰雪封锁了的心扉，人们的心终年终月让白色的冬天冻结着，痉挛着……七年了，得不到温暖，更没有欢快！

春风拂上我的脸，我是这样幻想着我的故乡，当怀乡的情绪窜扰着我的神经时，一幅凄惨的、有时也是美丽的故乡的图画，便在我的梦中展开了。

幻想与梦魔，交替地苦痛着流亡者的心，故乡是握在恶魔的巨掌之中了，关于它，我怎能有一点美丽的幻想呢？

远离了故乡，快三年了，三年间，我的心神没有一刻不是向往着它的。故乡里，有着思念我的妈妈和弟弟，同样，我又是在怎样担心着他们的安危。在遥遥的两地，我们的心是在互相接近着、粘合着。然而，我们的身影呵，却是相距得如此遥远。

幻想吧，除了幻想之外，我能得到一些什么真实消息呢？除了在梦中见一见我忆念中的故乡和骨肉，亲热地呼一声“妈妈”之外，要到哪年哪月才能再和他们重逢一叙离情呢？

三年间，音讯是不会隔绝的，然而，那例行公文式的家书，也只能够助长烦愁。看了它，仅仅可以知道对方还在活着，至于在怎样的活着，那只有天晓得了。

一些无谓的祝福，既不会使收信人郁闷的心头稍感轻松，而那报告平安的字句，更怎能使对方深信不疑？

当每次给妈妈写信的时候，我的心便感到一种沉重的悲哀，泪水蒙蔽着我的眼睛，我的手，握着那支用不惯的干秃的毛笔不住地抖索着，然而我却能很熟练地、不假思索地写着那已经背熟了的字句：

义母老大人膝前福安，敬禀者：

睽违慈颜，倏经数载，渴想之殷，无时或释。敬维，大人福体康泰，凡百如意，为颂为慰。但不知原弟身体已否康复？业务繁忙否？念甚。女家老幼均安，生意亦颇兴隆，此地市面平静，故生活相当舒适。千祈大人勿以为念。

大人春秋已高，诸希珍摄。专此敬请金安。

义女××叩禀×月×日

陈旧的字句，陈旧的格式，旧式的信纸上稀疏地排列着一行行黑大的字。另外，再套上一个旧式的信封，一封家书便完成了。那里面没有诚实的语句，更失掉了真挚的感情，这一切都让魔鬼吞噬了！连呼唤“妈妈”的自由也让魔鬼剥夺去了，这是多么痛心的事哟！

忍痛地寄出了那不诚实的信，我的心就更加沉重起来。
于是，幻想与梦魔又来向我挑战了。

几年来，这苦闷没有了时。“不自由，毋宁死！”这幽囚的岁月何时休止呢？

在黎明，在黄昏，在梦回的午夜……我迫切地期待着自由的归来。

伟大的时代到了，抗战的号角响了。是它，淡漠了我怀乡的感情；是它，洗去了我思亲的热泪。我怀着无限的兴奋与希望，准备去拥吻那失掉了七年的自由与河山。

为了生活，我离开了那漫天烽火的沪滨，不久，它竟也成了敌人的掠夺物。从此，隔离着故乡越发遥远了，而消息也更加渺茫。曾有一个时期，和故乡完全断绝了消息，当我再接到妈妈来信的时候，那已经距离她发信的日期两个多月了。近来，邮递虽已不似那样阻滞，但，一封信的往复，最少也要三个月的时间。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里，三个月的日子是多么悠久呵！那例行公文式的书信，双方竟也都是如此的难以获得了。

关于祖国伟大的抗战，在故乡，是不会得到真实的报道的，无疑地，敌人定会以那狡猾的惯技，以那无耻的宣传来欺骗故乡的同胞，故乡的同胞被蒙在鼓里了，故乡的妈妈和弟弟被蒙在鼓里了。

妈妈是怎样在猜疑中度着被压迫的岁月？也许，思儿的泪哭花了她的双眼？也许长夜不眠熬白了她的发丝？

在兴奋与烦闷的交战中，我几次提起笔来，想把祖国英勇的战绩、卫国健儿壮烈的牺牲……报告给故乡的妈妈和弟

弟，使他们在极端苦闷中痛饮一杯兴奋的琼浆，使他们在被压迫的岁月里获得一点精神的解放。然而，那獠牙，那血口，那狰狞的面目，在残酷地警告我未来的不幸，于是，我又几次地颤栗着把笔放下。

那些欲诉无从的话语，仿佛一条火鱼的脊骨梗在我的咽喉，那刺痛，使我怎能忍受呢？终于，在一个飘雪的薄暮中，我写下了这样的信：

亲爱的妈妈和弟弟：

妈妈，这亲热的称呼，已经是三年不呼自我的口中和笔下了。为了你们的安全，只好忍痛呼你作“义母”。妈妈，为了这，你一定也偷偷流过不少眼泪吧？但有什么法子呢？我们是逃狱的囚徒，不这样，将会使你们遭受到比牢狱更悲惨的不幸！

妈妈我永远忘不了故乡惨别的晚上，在逃亡的危途中，我们不敢在久别的故乡再多一分钟的勾留，我们更不敢重访那睽违十二年的庭院。妈妈，当我们在旅馆门前分手的时候，你那充满着悲哀的刚强的惨笑；弟弟用那帽沿掩盖的恋别的泪眼，这一切忧凄的影子竟不时地在我的梦中浮现。

妈妈，虽然我们不能见面，但，在梦中我却常常和你亲吻，不是吗？你不也常常梦到你的女儿吗？

妈妈，从踏进了祖国的土地，我们便蜷伏在上海租界里。为了信仰的关系，我们依然不能畅所欲言，依然受着无形的监禁。然而，从抗战发动以后，祖国

总算解放了我们，我们的信仰已获得了广大的同情。如今，我们可以自由地在人群中高呼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了。妈妈，你该高兴，你的女儿已经跳出了苦闷的陷阱，让无限的欢欣与兴奋拥抱着了。

此刻，外面正飘着非常大的雪，这美丽的雪景，从离开东北之后，我还是第一次欣赏呢。看了它，使我嗅到了故乡的气息，使我感到一种还乡的欢愉。妈妈，弟弟，请擦干你们的眼泪吧，在这洁白的雪夜，让我告诉你们一些可喜的佳音。

半年来，祖国的同胞都投入抗敌的热潮中。所有的士、农、工、商、妇女和儿童，都已经组织起来了。在祖国，已经基本上消灭了党派的矛盾，大家密切地携起手来，以全生命和全力量来打击日本强盗的侵略。在这伟大的过程中，有着不少可歌可泣的故事，就如：死守宝山县姚子青营长全营的壮烈牺牲；在上海的四行仓库，有孤军死守的八百壮士……象这样轰动全国甚至全世界的悲壮的故事，真是不胜枚举的。妈妈，弟弟，听着吧，还有呢，还有我们威武的空军，曾在武汉的上空和敌机发生过激烈的空战，结果，竟击落敌机三十六架之多。他们还曾出国建立过奇勋，在台北，四十多架敌机被炸毁了。这都是最近的战绩，以前的还不算，但，这已经够了，这已经够使你们振奋了吧？

妈妈，告诉你，祖国是在春光灿烂中，敌人却已

走到了日暮穷途。我们英勇的抗战，使得敌人丧胆了，厌战的心理，弥漫了敌人的阵营，敌人的经济已濒于崩溃，他们国内人民反战的呼声非常强烈，不久侵略者定会遭到惨败的。

这些消息你们是不会得到的，现在，我简略地报告给你们，希望你们把这消息也广播到故乡每一个同胞的耳里、心里。同时，更希望你们切莫听信敌人无耻的宣传，不要为他们的荒谬的谎言而颓丧。

妈妈，弟弟，不要悲伤，不要失望，我们已拥有了一个美丽的期待，保留着你们那珍贵的泪水，待失地收复，我们荣归故乡的时候，再尽量地流吧！

好了，再谈吧，以后，我一定把祖国的消息随时报告你们。祝你们美丽的期待！

你的女儿××1938年4月5日

鼓着万分的勇气，写完了这封几次要写而未写成的信，心地突然开朗了，轻松了。然而，当我兴奋地重读一遍之后，我所有的勇气与轻松又让那狰狞的鬼影毁灭无余。

第二天，又接到故乡妈妈的来信，她殷殷垂询着我们“是否平安”，照例地，我把那例行公文式的家书又默写了一遍：

“父母老大人膝前福安，敬禀者……”

1938年5月于武汉

3. 帽 子

除了一顶发的小帽之外，三年了，他从没有买过帽子，也从没有戴过帽子。

当严冬来到时，我提议：

“你该买一顶帽子了。”

“不，决不，——”他坚决地摇着头。

“为什么呢，你不冷吗？”

“不，还不到时候。”他庄严地抗议着。

让冷风吹拂他细软的发丝，让寒气侵袭他光秃的前额。在雨天，在飘雪的日子，他走出去，雨点润湿着他的短发，大片的雪花飘落到他的头顶上，融化了，水点落了，从他的脸颊流下，从他的颈际流下，一直流到胸部与脊背，冰冷的，刺激着他的皮肤。

不皱眉，不叹气，更没有怨言，他以绝大的坚强意志，抵抗着风、雨、雪与严寒的胁迫。

南国的火样的夏呵！那酷热，竟使我们生长于塞北的孩子不能忍受。太阳，仿佛一个庞大的火炉，它散发着无比的热，放射着无数道金色的光芒，那宛如亿万只烧红了的火箭，向着大地逼射，穿过屋顶，烘热了竹床，人的皮肤被烤焦了，头晕眩了，有时，甚至晕倒，于是，我又提议：

“你该买一顶帽子了。”

“不，不，决不——”他坚决地摇着头。

“为什么呢，你不怕太阳晒吗？”

“不，还不到时候。”他庄严地抗议着。

任太阳烘烤着他的短发，任火箭刺痛着他的头顶，发丝不断地脱落着，脸颊变成了漆黑，连前额的皮肤也在剥落了。

不皱眉，不叹气，更没有怨言，他以绝大的坚强意志，抵抗着炎日无情的烘烤。

五年前，在东北，他以叛逆的罪名，作了敌人十个月的俘囚。当他重新获得自由时，他捧着那顶和他共患难，伴他坐了十个月的监牢的帽子说：

“新生活的开始，我该换过一顶帽子了。”

于是，他买了一顶灰色的毡帽，预备戴着它离开那牢狱似的东北。

可是，不久，他又二次作了敌人的俘囚，而且戴着那顶新生活开始的伴侣。

经过了十小时严重的刑讯之后，他被暂时释放回来。

“明天九点钟，听审不误！”敌人严厉地说。

“是的，听审不误。”他附和着。

“扣下你的帽子！”敌人伸出了贪婪的手。

“可以。”

从此，那顶灰色的毡帽替代他作了敌人的俘囚。从此，他也没有买过帽子。

在逃亡的途中，我常常要想起那顶被监禁的帽子，而讥笑敌人的愚蠢。他咬紧着嘴唇发誓地说：

“即使我不能从敌人的手里夺回我的帽子，总有一天，我要戴着一顶崭新的帽子重回我的故乡。”

前年冬，他到西战场去了，那里正是飘雪的时候，在那样严寒的季节，去到那样严寒的地带，无论如何，帽子是不可少的了，在他临行之前，我又提议了：

“这回，你总该买一顶帽子了。”

“不，还不到时候。”他微笑着，露出了更坚决的表情。

“要到什么时候呢？”

“倘如我能够参加到抗战的队伍里去，那时候，不用你劝，我自会戴起帽子的。”

坚守了四年的誓语，我没有更好的方法说服他，虽然我是怎样担心他会为北方的严冬冻病呵。

在车站上，朋友驰从头上摘下了自己的皮帽，热情地、强迫地移到了他的头上。他为此真挚的友情所感动，只好接受了。但，当他走进车厢之后，那顶皮帽却又被他转送给另外一个没有帽子的旅伴了。

狂风吼着，吹痛了我有着浓发的头。我蜷卧在床上，在想着北国的严寒。我又禁不住给他写信，劝他买一顶御寒的帽子。然而他的回信仍是说：

“倘如我能够参加到抗战的队伍里去，那时候，不用你劝，我自会戴起帽子的。”

4. 月夜到黎明

月夜里，飘着幽灵样轻风，随着银色的月影，它也悄悄地爬进我的窗棂。

在这所高耸的小楼中，我蜷卧在床上，享受这风与月的温存。温存呵，它们比睡在我身边的孩子的嫩红的小脸更加温存。

让春风轻抚我蓬松的鬓发，任夜月狂吻我枯干的唇，我陶醉了，我陶醉在这稀有的清新、稀有的温情抚爱中。

轻轻地，我闭上了醉态的眼睛。

风儿仍在轻抚，月儿仍在偷吻。

踏着银色的大地，我踽踽独行，闪闪发光的星群，集中了视线不时向我跟踪，它们笑了，笑的是那么猥亵而阴森！

“笑什么？鬼东西，你们是不是在笑我愚蠢？”

讥笑、监视，都听凭你们，无论如何，我也要完成这有计划的夜的途程。

我踏过了一片青春的原野，又爬上了青春的峰峦，一座又一座，无数的峰峦庄严地向我投送着雄伟的注视。爬呀，爬呀，爬上山坡，爬上顶峰，由这一顶峰跳上另一顶峰，那里充满着灿烂的青春，流荡着活力与鲜明。然而，我疲倦了，两只腿的软瘫通过了全身。我拥抱着最高的山峦，用口水润了润不感疲倦的喉咙，向着环绕的山峰，向着原野，向着银色的月，也向着渺小的、藐视我的星星，吐出了我的歌

声，

.....

粉碎呀，粉碎侵略者的迷梦，
 争取中华民族的自由与生存，
把敌人打个落花流水，
 建立起真正的和平。
永远呀，永远也不做被压迫的奴隶，
 永远也不再受人欺凌，
中国的领土是我们的，
 我们才是中国的主人！

.....

一声脆快的霹雷，震断了我激昂的歌声。仅仅一瞬，整个地球失去了光明，皎洁的月亮遮住在黑云背后，温柔的春风变成激昂的吼鸣，光明被黑暗吞蚀，黑暗在暴风雨里打滚，雷声断续地轰响，象要震倒那巍巍然的山峰。

站在黑暗里，我迷失了方向。

霹雷，闪电，怒吼的风和无边的黑暗。

突然，大雨带着冲锋杀声倾泻下来，象瀑布，象山洪，闪着白色的光亮。我俯首瞰视，青春的原野竟变成了无边的海，海水继续增长，增涨，呵，它竟与山峰并肩了，白色的飞沫，带着骇人的吼叫冲向山峰了！

“我不能，我不能让海水卷去我的生命呵！”我想，

“我还有待哺的孩子，我还有……”

“快跳上来，我把你送上彼岸。”

一个轻巧的舢板，在海浪上颠荡，我顺从舟子的招引，跳上那救生的小船。青年的舟子满身流汗了，他拼命地撑住那修长的篙杆，飘呵，荡呵，和海浪搏斗着。终于，我看见了不远的光明的彼岸。

“呵，我们已经凯旋！”

庞大的海的欢呼，使我展开了蒙眬的视线，原来这无边的海里正飘荡着数不清的小船，在我面前展开了青春的原野和黎明的春阳。我兴奋地握住了修长的篙杆，用力一撑，船便悠然靠岸。一声清脆的遽然的鸡鸣唤醒了我，身边的孩子正惊恐地哭着，挣扎着。我恍悟地松开了我的紧握住孩子肥胖的臂膀的手，唱起催眠歌：

好宝宝，不要哭，不要怕，

妈妈扶着你的小臂膀，

冲破了汹涌咆哮的小海浪。

如今哪，如今已经到达彼岸。

晨光熹微了，

光明的太阳就要出现，

新中国的伟大任务，

要你勇敢地担当！

5.祖国正期待着你

——遥寄故乡的弟弟

春天，我想着故乡那夹带着寒风的温暖；夏天，我便想着故乡的无比的清凉；秋天虽然不免显得凄凉了些，但是呵，冬天里那白色的雪、那透明的玻璃砖样的冰，是把冬天的故乡点缀得如何的美、如何的幽静呵！

故乡，它是具有着诱人的魔力的，它牵制着每一颗流亡者的心，每一个脱离它怀抱的儿女，谁不在关怀着它？谁不在向往着它？如今，“怀乡病”已经是普遍在蔓延着了，没有身受过这病症的痛苦的朋友们，请不要骂他们自私吧，即使是在这样动荡而伟大的时代里。

两年来，漫天的烽火，已把我怀乡的情绪变得暗淡无光；同时，也没有更多的脑力总对它发着那些浪费的空想。然而，人毕竟不是一块冷酷的岩石，而且我的灵魂里还正充满着无限浓厚的恋情，要想根治这缠绵已久的病痛，除非祖国的旗帜重飘在东北的万里晴空。

我没有攀登过长白山头，更没有游览过金碧辉煌的金銮宝殿。而那盛开着荷花的小河沿，以及丛生着苍松翠柏的东陵和北陵，虽是我儿时嬉游的处所，但，年深日久，它们的影子在我的记忆里已经淡了，远了。更何况美景胜迹到处皆然呢？

使我深深怀恋的，不是那美景，也不是或许早被敌人摧

毀了的胜迹，而是被践踏在敌人蹄下度着幽囚般岁月的嫡亲的骨肉。

想起来我是多么后悔，倘不是逃亡匆匆，当我们经过故乡的时候，也许把我那时候不能忘怀的骨肉带上驶往祖国的海船，使他们不致沦陷为奴隶以及未可知的遭遇。然而，当时在敌人重重侦视之下，我们是一切都无暇顾及，虽然临别时弟弟泛红着眼眶低泣着说：

“姐姐，你们奔向祖国了，我呢？……从此，只剩我一个了……”

我没有泪，巨大的愤怒与危难把我的感情摧毁了，虽然弟弟的控诉并不是不使我无动于衷，但，我毕竟一句话也没有说，便挥着手告别了走向暮年的母亲和生气勃勃尚未成年的弟弟。

愁苦，牵念，不自由的漫长岁月，我不知他们是怎样度过的。每当我闭起眼睛，在我的记忆里搜索着那些熟悉的面容时，首先出现的，便是两鬓斑斑眼泪婆娑的慈祥的老母，紧接着，弟弟那年轻的细高的身影，便把母亲整个儿遮没了，于是，我的心也被卷入极端痛苦的浪潮里。

弟弟那张沉默悒郁的脸，那无言而深沉的凝视，仿佛在向着我控诉着无限的孤独与埋怨。他更瘦了，他那孱弱多病的身子，怎经得起那样无情的摧折吗？

的确，弟弟太孤独了。礼教的家庭把他养成一种孤僻的个性。他八岁那年，我们的父亲便逝世了，几乎象陌生人一样的父亲的死，我们不曾感到怎样悲痛，可是，祖父的溺爱

和他固执的庭训，却在我们幼小的灵魂里注入了也许是有毒的汁液。

祖父对我们的选择，有着严苛的训示，我们不能随意和邻儿嬉戏。课本以外的书籍，祖父是无论如何也不许我们阅读的。因此，在我和弟弟天真的童年里便充满着暮气。慈祥然而固执的祖父，剥夺了我们的一切自由，每天放学回来，除了死啃着书本和在房里默默地孤独地玩耍而外，我们真不知课本以外还有着更好更多的东西。

弟弟是在十三岁那年，便奉了祖父之命，和一个大他八岁的美丽的少女结婚了。然而，在一个礼教森严的家庭里生长起来的孩子，他能懂得什么呢？因此，结婚刚刚一年，那个美丽的少女便向她名义上的丈夫提出离婚。这一个大波浪，对于弟弟虽不是怎样重大的打击，但在他童真的脑子里却已印下了不可磨灭的暗影，而祖父却因这一打击一病不起了。

在弟弟离婚的同年，我和勃结了婚。从此，我跳出了不自由的圈子，开始了新的生活；开始走上人生的正轨，也开始懂得了许多事情。而弟弟呢？却依然幽囚在那礼教的牢笼里，伴守着老病的祖父和寡母，过着死气沉沉的日子。他唯一的姐姐，却已离开他千里之外了。沉静、寡言，醇厚和诚挚，是弟弟的个性。这个祖父一手培植起来的少年，是相当可爱的，不过，因为择交的严苛，弟弟却很少有他理想的友人。在这种情势之下，我和勃便成了他最崇拜、最信任的人物了。他曾经对我说过：

“姐姐，我并不奢望着更多的朋友，有你们两位做我的导师我已经满足了，只要你们肯领导我，不把我抛弃。”

可是，婚后和弟弟聚首的日子实在太少了，除了在信里给他一点人生的启示，对他是很少帮助的。但，仅是一点点启示，已经使他有着飞跃的进步和觉悟。当我第一次归宁的时候，看见懂得了很多道理的弟弟，我不禁拍手欢笑起来。

不幸得很，就是这样通讯的启示也没能持续多久，很快地，武士道的魔剑便斩断了和弟弟的联系。在往复的函件中，一切都不能自由叙谈了，弟弟感到了比我更深的苦闷。而不久，为正义为真理奋斗着的勃——弟弟最崇敬的——也被魔爪携去，幽囚在铁的牢笼里。

足足半年，我隐瞒着，我不曾把这足使弟弟痛绝的消息向他宣布。然而终因久久不见勃的亲笔函件而引起弟弟的疑虑，终于，在短短的三天春假中，弟弟喘息着从千里之外的故乡跑了来。他一进门，便惊慌地问道：

“勃哥呢？”

“出差了。”我镇静的回答。

“我不信，姐姐，我什么都明白，请不要骗我吧！我求你……姐姐……”

看见比自己高出一头的十七岁的弟弟，和他那乞求、焦躁的泪汪汪的眼睛，不知为什么我的泪竟涌了出来。我用两手蒙住了眼睛，一句话也说不出。

“姐姐……快说……勃哥的生命有没有危险？”弟弟哭了。

“没有。”我忍住了哭，郑重地说，“好弟弟，你别急，什么都没有，你好好休息一下吧。”

“不，姐姐，你不要骗我，在你们以往的启示中，我已经料到了。姐姐，只要你诚实地告诉我：勃哥的生命没有危险，我就放心了！”

“你放心吧，他很快就要自由了。”

弟弟一直是怒睁着他沉郁的眼睛，不说话，直到我把勃遇难后的一切叙述完了，半天，他才深深地吐出一口悠长的叹息。

“姐姐，我不念书了！”突然，弟弟发狂般地吼了出来，这吼声是我从未听过的。

“为什么呢？你还这样小，不念书做什么呢？”

“不管怎样，我也不念了。”弟弟坚决地说，“在敌人统治压迫之下，念书有什么用呢！念到归终，还是一个奴隶！”

“哟！”我警告着，因为弟弟的声音太高了，被罩在侦察网里的我们，连谈话都得戒备的。“只要你脚跟站稳，只要你不忘祖国，只要你不受敌人的毒化，在怎样环境里读书都是没有关系的，……”除了安慰他，我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

“但是，姐姐，从我们不能自由地通讯以后，我对于一切都好象没有一点儿遵循，姐姐，你叫我怎么办呢？……我太孤独了。”

“好弟弟，孤独，你暂时忍耐吧，等勃自由之后，我们

便回故乡了，那时候，你不是不孤独了吗？”

听了这话，弟弟乐得几乎流泪了，他抓住我的手叮问：

“真的吗？”

“谁骗你哟！”其实，我自己又何尝知道我的话是否含着欺骗呢。

仅仅住了一夜，弟弟便匆匆南返了，在车站握别时，我还附着弟弟的耳边叮咛着：

“弟弟，别灰心，不要忘了我们的祖国，不要忘了我们的敌人，更不要忽略了我们所负的收复失地的使命呵！”

“当然，姐姐，一切我都牢记着，我只希望勃哥早日脱险，早日回到故乡。姐姐，一切我都等着你们哪！”

弟弟走了，他带走了那渺茫的希望。车开之后，在伸出车窗的弟弟的稚气的脸上，我看见黄豆般大的两颗泪珠，从那深沉的眼睛里滚了出来，我知道，这一次的别离是最使他痛心的。

半年之后，勃真的自由了，而且我们真的回到了故乡。那一切都等着我们的弟弟，在那样突兀的相逢之下，竟惊喜得哭了起来。可是，当他知道了我们在故乡仅有一小时的停留时，他简直变成个痴呆的木偶。这过分短暂的相逢，把弟弟的心击碎了。谁知道此别不是永诀呢？我仿佛看见他那颗鲜红的完整的心，在一瓣一瓣地撕裂着。

别来已逾五年，五年的时光不算短促。如今，稚幼的弟弟已经成为壮年了。五年来他的来信里，我看出他的心灵中埋藏着比前更多的苦闷，更大的悲愤。四口之家——不久也

许将有一口小生命出世了——的生活重担，使他不得不忍辱吞声地做着那繁重的奴隶工作。一个有为的青年，将在那样重压之下衰老下去了！

“姐姐，你们奔向祖国，我呢？……从此，只剩下我一个……”

这一句凄怆哀楚的临别词，总是在我耳边荡漾，它使我的心阵阵疼痛着。然而，几年来，自己的生活是在风雨飘摇中度过，又怎能把弟弟从那奴隶的命运里拯救出来呢？

神圣的抗战发动了，许多的东北青年同胞，都回到祖国的怀抱。然而，那里面没有我亲爱的弟弟，在兴奋与悲哀的交流中，几次想写信去召弟弟来参加这伟大的战斗，但为了多方面环境的限制，终于我没有那种勇气。

对于衰老的母亲，除了想念之外，我没有更多的挂虑。可是，弟弟的面孔一经在我的脑里出现，便很难隐没了。同时，对于他前途的多种杞忧，竟常使我悲伤而不能自抑。

弟弟会不会中了敌人的怀柔毒计而俯首贴耳做着驯顺的奴隶呢？弟弟会不会被迫而参加到敌军的队伍里来屠杀他自己亲爱的同胞呢？弟弟会不会……

刚想到这，仿佛狮般的巨吼突然在我耳边响起，

“……姐姐，一切我都牢记……”

那是弟弟坚定的诺言，它把我耻辱的幻想打断了。弟弟仿佛受辱般地在瞪视着我。是的，弟弟具有着钢铁般坚强的意志，具有着青年的热血和复仇的心，他又怎肯向暴敌低头呢？

我默默地虔诚祷祝，但愿我亲爱的弟弟，不忘姐姐的启示和叮嘱，履行那坚决的诺言，在敌骑践踏了的故乡里做一点对得起东北三千万苦难同胞、对得起祖国的神圣工作——即使是一点点。那么，你留在沦陷了的故乡便不算是毫无意义，而你的姐姐对你再也没有任何牵虑了。

弟弟，亲爱的弟弟，奋斗吧，祖国正期待着你们！

6. 我迟疑地走下扶梯

对于敌人的憎恨，在我的记忆中铸成了难以消灭的痛苦烙印。“九·一八”、“一·二八”、“七·七”以及“八·一三”抗战的开始，一桩桩的流血事件，看见了的和听见了的，已经够多了，然而它不能使我的神经麻木，不能使我的听觉与视觉习惯下去，我永远睁着惊惧的眼睛，张着畏缩的耳朵，看着听着那残酷的描述，也常常从恐怖的幻觉中惊颤起来。

怕见流血是我童年时懦弱的根性，每见到邻儿划破了手指，跌破了皮肤，看着那涔涔流下的鲜红的血，毛孔便不自禁地展开来，于是跳着一颗无限惶恐的心，闭起眼睛远远地跑开。即使杀一只鸡或是一尾活鱼，我都感到那是过分的残忍，我不敢看，更不敢动手。直到现在，这懦弱的根性还不曾完全铲除，因此常常惹起朋友们的讥诮：

“象你这样还喊什么革命？……你敢上战场和敌人肉搏吗？”

敌人近逼到沪滨，如今这流血事件已经展开在我的面前了，比任何一次都更接近些。是第一次听见这样猛烈的炮声，也是第一次看见这样多的飞机在空中翔鸣。我的心让兴奋拥抱着，没有一丝恐怖的感觉，只是在憧憬的战场上千千万万卫国的健儿在和敌人肉搏的英勇和他们伟大的牺牲。我渴念那没有牺牲性命的在痛苦中挣扎着的负伤勇士，我希望着期待着一个和他们会面的机会，同时用这机会来消灭我懦弱的根性。

机会终于来了，我们十几个人拉成一个错综的行列，持着“文艺界战时服务团”的白色大旗，掬着捐来的毛巾和袜子向西门路一个伤兵病院出发了。

天空耀射着毒热的太阳，刺着每一张枯黄的脸，枯黄的脸上虽是涔流着被压迫的汗水，但是并没有丝毫的畏惧，我们不去躲避那肆虐的炎阳，而是故意在它的下面前进，十几颗滚热的心都趋向一个目的。

一走进伤兵病院的大门，空气便显得异样，其实，那里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标志，那异样的感觉不过是个人的心理作用而已。

当我们的一个代表向院内的负责人去交涉的时候，我们暂留在院心。这时，我又被可怖的幻影包围了：一片血的流，一群残肢断腿血肉模糊的人逐渐在我的眼前扩大起来，我似乎听到了那凄苦的呻吟，我的心剧烈地痛着，我再也无法回避这幕流血惨剧了！

心跳着，随着慰问的队伍走上扶梯，把我们带来的慰劳

品一批一批地配置好了之后，一个病院的负责人向我们嘱咐：

“他们虽然都是轻伤，可是我们的院规是绝对拒绝慰问者和他们谈话的，尤其是关于前方的军事，原因是怕他们精神上蒙受刺激。”

这嘱咐我们自然接受了，虽然是感到微微的失望。

直到临近病房的门窗，还听不到一点声息，这原是出乎我的意想之外的，——难道他们的伤不痛吗？

用足尖轻轻地踱进了第一号病房，为什么我的鼻管会发酸了呢？我想哭，泪水就要滴落了。是感激？是怜悯？是兴奋？还是悲哀或同情？直到现在我还不能分析清楚，而且，永远也不会分析清楚了。

坐着的，卧着的，斜倚着的，每个人占据着一面床，白色的床单，白色的绷带，他们都无声地用感激的微笑的眼睛接收了我们的慰劳品，我也用湿润的眼睛向他们致一个无言的敬礼。

折了臂，断了腿，子弹贯穿了脑壳的，谁说这是轻伤呢？倘如我自己的手指切断了一只，我也会痛昏的。然而，我怎么也听不到他们的呻吟，病房里是那样的寂静，除了几个熟睡者的鼾声。

每个面孔我都感到十分的亲切，我想向他们表示我对他们的崇敬，但我一句话都说不出，只是用眼睛表白了我的心意。

为了院内负责人的嘱咐与监视，很久，我们大家都还保

持着缄默，在室内轻轻地慢踱着。然而，我的心却在强烈地跳动。我并不是一个富于感情的人，而且，在我童年的记忆中，“丘八”之类的人物，给我留下了一个“残暴者”的印象，我憎恶他们，畏惧他们。但这次，为什么我会被他们如此地感动了呢？为什么会对他们发生了无限的崇敬呢？这问题是不待解答的。

我们的同伴分布到另外的四个病房里去，我刚想离开第一号病房，突然一声长叹阻止了我移动的脚步。那是一个断了右臂的年轻士兵，他用渴求的眼睛在扫射着室内三个来慰问的人。我停立在他的床前，注视着他，他接连又是几声长叹。不知为什么今天我竟如此的敏感，我的毛孔也因他的长叹张开了。我不知他为什么长叹，伤处痛吗？不是的，象他那样一个英勇的青年（这由他的刚毅面孔可以断定），决不会向人们故意示弱或乞怜的，同时，那不是呻吟而是长叹，满含着激愤与渴望的长叹。最后他把腿用力一伸，骂道：

“他妈的！”

床在颤，我的筋肉也在颤。这回，我猛然地了解了他的长叹与咒骂的意义了。他是有着无限的愤慨与衷曲欲待宣泄，他要求一个人去和他长谈。

我决心去和他谈谈，听一听他那英勇的故事。然而，我仍在踌躇着，我感到我缺少一个谈话的利器——一张会说话的嘴。我的嘴是太笨拙了，为了它的笨拙，使我失掉了这个机会。尽管心里如何的焦急，终没有去和他攀谈的勇气。

罗，静静地走了进来，于是我把这责任委卸在他身上。

他走上前去和那位勇士握了手，我看见他们两个都在凄苦地笑着，这含蕴着多少情感的笑呵，我周身的血液为它而汹涌了！

跨进第三号病房时，一个医生正为一个伤兵洗涤伤口，我的皮肤突然鼓起颗颗的小粒，一种又麻又冷的感觉象电流似地通过了周身。他的伤在左手，庞大的伤口已经超过了他的宽大的手背，骨断了，筋也断了，仅是手心的一层肌肉还在连接着，伤口的周围高高的凸起，宛如筑起的一道河堤，伤口凹下着，那紫红色的腐肉，那痛得抖颤的嘴唇，我怕看，更不忍看。仿佛在我的手上，我的手似乎在痛。我恐怖着，懦弱的根性再现了。然而，我必须看，必须看个仔细，为了消灭懦弱的根性，更为了探究敌人的弹丸是怎样伤害了他的。

别人都找到了对象在轻声地谈话了。我想，我为什么单单这样懦怯呢？恰好一个中年的伤兵正在无力地向我注视，于是我鼓着突如其来的勇气走近他的床边。他把头微微动了一下，意思是愿意我和他谈话，我问他：

“你是几时受了伤的？”

“四天了！”声音十分的微弱。

他的右臂满缠着绷带，露在外面的仅是五只粗大的手指，臂下撑着木板，肩头上竖起木架，手和木架是用几条绳索紧连着，由此可以想象他的伤势之重了。

“你的伤痛得很吧？”

“不，这只胳膊是让机关枪扫射的，一共九处伤，现在

都不痛了，都死了，只是肩膀这块伤痛得厉害，我自己明白，这只胳膊已经断了，明明是不会接起来的，可是医生要尽可能地不让我变成残废，他说也许能够保住这只胳膊，我自己明白，从此再也不能拿枪了！……”言下有无限的伤感，声音也越发的微弱。

“他的伤挺重哪！”背后有人提醒了我。是的，他的伤重，应该让他静养，我竟把这点忽略了。

我掉转了头，是一个四十多岁手腕缠着绷带的伤兵向我温和地微笑着，他又重复了一句：

“他的伤挺重哪！”

这睽别已久的乡音，使我感到了格外的亲切，故乡的怀念在这紧张悲愤的氛围中滋长起来。我用力咽了咽喉头发咸的口水，开始向他攀谈了：

“你是哪省人？”

“辽宁，沈阳。”

“噢，老乡，我也是沈阳人呢。”

“啊，——那好极了！”他感到了一点惊喜，“唉，如今我们家乡闹成什么样子了？……要是这次我们能打胜仗，我们可以回家啦！”

我苦笑了一下接着问：

“你是怎样到上海的？”

“说起来话就长了！”端正了一下身子，他开始了下面冗长的谈述：“‘九·一八’的时候，我正在沈阳张副的部下当兵，那时鬼子攻进沈阳城，弟兄们一个个都端起了枪预备和

鬼子拼命。可是上边发下了命令，不许打，只许退。从那时候起就退，退，一直退到关内，抛了家小，咳！提起了我的家，别提多伤心了，因为一件破军衣，我十八岁的儿子死在鬼子的刀下，老婆一时短见上了吊，剩下两个小女儿也不知是死了，还是被谁收养了去？六年了，我和家乡不通消息，真是国破家亡，妻离子散……”

他轻声地叹着，眼眶里含着悲愤的泪，停了一下，又继续说下去：

“天天，我都准备和鬼子拼一拼，打回家乡，去看望看望，哦，正好，‘九·一八’第二年上海开战了，我随着××军调到前线来。那次，我们打得挺顺手，打死不少东洋兵，这总算出了一口气，可是也不知是怎么回事，忽然讲和了，实在叫人泄气！我们能说什么呢？只好退下来再等机会……你看，这样的机会也真多……”

他用我们送来的毛巾揩了揩脸，脸有些发红，很兴奋，把声音提高了，满屋子的视线都集中了他，我全神贯注等待他讲述那更生动的故事。然而不幸得很，许是他声音太高了吧，把那位院的负责人惊动了来，很客气地阻止了他的谈话，也很客气地劝阻了我。

我感到万分的遗憾与留恋，迟疑地退了出来。

临行时经过手术室的窗下，几个医生和看护正在为一个新来的伤兵检查弹穿了的眼睛和小腹，我忙把视线避开了那窗口，急急走向扶梯。

当我再回头时，第三号病房的窗口探出了一个光秃的

头，那就是和我谈话的那个伤兵，他用留恋的诚恳的表情笑着向我招手。

我的心悲喜交集的亢奋着，我迟疑地走下扶梯……

7. 弃 儿

六年了，六年的日子够长久了，六年的期待还不够饥渴吗？如今，中国已在怒吼，伟大的号角在呼啸着：神圣的、解放的战争开始了！

苦闷、焦烦、牢骚都远离了我们，室内几个热血的朋友高谈阔论着，嘹亮的声音快冲破了屋顶。外面是晴朗的天，欢快的太阳笑咧着红色温和的嘴在偷偷地亲吻他热情的孩子们，孩子们的心温暖了。

在这样兴奋的日子里，谁还能静躲在家里让炮声尽情地震撼着鼓舞的心呢？许多人都准备跑出去巡礼了，我怎肯独留在家里？虽然老太太生气地阻止我，不让我捧着怀孕六个月的大肚皮到人群里去挤，我终于决然地随了出去。

路上，乱纷纷地，往日肃静的僻巷里，也挤满了人，搬家的车子一辆紧随着一辆。背着包袱携老扶幼的难民，走着的，坐着的，拥挤在路旁的人行道上，他们都有一张愁惨憔悴的脸，褴褛尘污的衣裳。这些都是抛了家、冒着敌人的炮火从战区仓皇逃出来的穷苦同胞。

有钱的早在时局紧张的时候从容地携着珍贵般的儿女搬到租界去了，高价的洋房，做了他们躲避炮火的堡垒。如今

他们正在聆听着远处的炮声，欣庆着自己的幸运。敌人的飞机从屋顶掠过了，他们安闲地嚷着：

“它不敢在租界里投弹的！”

是的，应该“感谢”，在战火弥漫的上海，祖国竟还为他们备下了这样安全的地方。有洋人保护着，还怕什么炮火呢！有资格享受炮火威胁的，也只有无告的穷苦同胞；一切灾难，永久是属于他们的！

我自己呢，穷苦的程度虽不比他们好些，可是我却也在租界里住了两年了。因此，当他们在他们面前走过时，除了怜恤与同情之外，更感到莫名其妙的惭愧，虽然我并不是为了躲避炮火才住在租界里，我所住的也并不是高价的洋房。

兴奋的情绪在这凄惨的环境中降低了，太阳也象褪去了它欢快的红霞。

走进一个不常走的僻巷里，同样拥挤。在不远的地方，在有点发湿的路边，有一个蓝色的包裹在那里静静地躺着，可是经过那里的人竟没有一个人去捡，而且都带着一点回避的姿势走开去。

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我紧走了几步，俯身看时，我的肌肉突然紧缩起来，心脏象小鼓般敲打着胸膛，原来那是一个被抛弃了的婴儿。他身上盖着一床薄薄的小被，侧卧着，由那袒露在外面的发红的头顶可以看得出来，他没有死，是在熟睡着。这可以断定那是由火线下逃出来的难民抛弃的。

我的脑神经迅速地在活动，许多悲惨的幻想都清晰地映现了出来：我看见这婴儿的母亲，当把他放在街头时那副悲

哀的表情，她是那样小心地用那慈母温柔的手盖好了那床仅有的小被，一边流着痛极的泪，一边轻拍着他小小的肢体，用哭声代替了催眠曲，婴儿熟睡了，她才悄悄地走开，是那样的迟疑，那样的难舍难离，她频频地回过头来，用盈泪的眼探望她可怜的宝宝，她一定在默默地祈祷着：“但愿有一个善心的人拾去这可怜的孩子！”

然而，有谁肯拾起他呢？一刻，他会醒来的，他会饿的，当他的哭声响彻这僻巷时，妈妈呢，早已听不见她爱儿的啼饥了！

悲惨的人世间，到处弥漫着悲惨的阴影，但，我所见到的实在不多，那许许多多听来的悲惨故事，毕竟还不能给我留下怎样深刻难忘的印象，最使我感到切肤之痛的，还是自身的经受。

去年，我自己曾抛弃了一个不满十个月的孩子，然而他是死了的，所抛弃的不过是一具僵尸，可是，这一具僵尸却使我精神上蒙受了莫大的刺激与折磨。我为他曾经失过眠，也曾为他写过纪念的文章，许久，许久，我的心在疼痛，什么事都无心去做，怎么也不能把他忘记！最可笑的是当他的小小棺材被两个雇来的不相识的人抬走了之后，我便总在担忧。我想：家里没跟去一个人，棺材是四元钱买来的，棺材里又装了那么多的衣被，他们不会走在中途把孩子抛出来抬着空棺去卖钱吗？倘如真的那样，我宝宝的尸体将暴露在露天下让犬吞食了，也许让清道夫拾去抛在垃圾箱里，也许要粉尸碎骨……

每一想起来，我便为这事痛苦，它会赶跑了睡魔使我整夜不眠，我后悔自己没有跟了去监视，以至不能知道他的下落，以至凭吊无从！

我看见这路旁的活婴，我又想起了他——那具小小的僵尸，然而，这次却不是对他的怀念和担忧，那样的怀念，那样的担忧，我觉得过分地无聊而可耻了。

在这炮火声中，在天灾人祸的威胁下，尤其是穷苦的劳动群众里，真不知有着几千万小生命和这路边的婴儿遭受着相同的命运。他们也都是父母的爱儿，哪有父母不爱他们亲生的孩子的？可是，受着环境的压迫，逼不得已，便不能不忍心把自己的孩子抛弃，任风吹雨淋，任他去遭受不可知的命运，做父母的心能不痛吗？做父母的心能不永久牵挂吗？

倘如在这悲惨的人世间再去怀念一个死去已久的婴儿——一具僵尸，也未免太浪费感情了。

心象塞住一块铅，脚也象挂了铅砣，我沉重地离开路边那可怜的婴儿。对于这个小生命我是感到怎样的怜恤，而又感到怎样的无能为力呵！

从此，再想起我那死去的孩子时，我不再悲伤了，这空隙让给那个被弃的活婴。我替他默祷着：让有力量抚养他的善心人把他收养去吧！

8. 苦难的人们

秋空是那样晴朗，犹如一面平滑的银镜，简直望不到一

块游走的浮云。一向细雨绵绵的上海，把愁云展开了。

几日来的奔走，皮肤已经发现了健康的色泽，让阳光沐浴着，似乎也有点习惯了；然而较之我面前这一群苦难的人们，还是感到望尘莫及的。

她们大半是从杨树浦逃出来的劳苦的女工，一向是在日本纱厂里出卖着血汗，受尽了帝国主义者的剥削与凌虐，过着忍泣吞声的日子，而今，更被帝国主义的炮火轰出了出卖血汗的根据地，携抱着营养不足的儿女，爬出了火线。她们没有了家，没有了财产，也失掉了工作，更有的尝受着骨肉离散的惨痛。望着一张张强颜为笑的善良的脸，我感到心酸，把无限的同情与怜恤都付予她们了；然而，这又有什么用呢？她们虽然需要真挚的同情，而比同情更迫切需要的是根本的救济，试问，我对她们又能有什么救助呢？几篓没有养料的咸菜于她们有什么补益呢？这时，我突然后悔起来，觉得那几篓用高价买来的咸菜实在是一种浪费，对那虚掷了捐款感到深切的惋惜，因为她们现在是被收容在组织比较完善的收容所里，是并不需要咸菜的。

“现在，请二位向她们随便谈谈。”收容所的一位管理人向我们要求着。他是特为我们来参观面由板棚中把一部分妇孺召集来的。

接着，他又掉转视线向难民们说：

“你们可以随便和他们二位谈话的，她们同你们一样，不要把她们看作什么小姐之类的人物，她们同情你们，今天是特意跑来看你们的，不要拘束，有什么话尽量地说吧！”

这要求使我感到畏缩，纷杂的想头不容我再延长下去。我们的周围已经坐满了一圈女人和小孩。我和同伴李伫立在中央，几十只渴望的眼睛把我们包围了，小孩子都张着嘴巴在等待。我感到局促不安，仿佛阳光突然加强了热度似地照射着我的脸，我的脸燃烧起来。

这一群，这苦难的一群，她们是经历了无数的磨难和压榨，对悍敌无耻的迫害，是比我们更感到切肤之痛的。她们一定有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悲惨的遭遇，我为什么不应该和她们谈谈呢？

我焦急，我烦躁，我的喉头发痒，然而，我的嘴只是张不开来，好象谁用胶把它粘住了。每次在大庭广众之下，都是它使我发急，这回，我真向它发脾气了，我心里在骂：

“该死的，你这没有用的东西！”

和李推诿了好久，还是她比我的勇气大些，终于她席坐在草地上。于是，无数条视线都集中在了她的嘴巴上。

我也随着坐了下去。这天然的地毯有点发热，我一边玩弄着青葱的草叶，一边环视着围坐的人群。她们都有着一张棕色的饱经风吹日晒的面孔，连小孩也一样，这充分地表现着她们生活的艰苦与劳碌。

“你们都是从哪里逃来的？”李有点腼腆的声音。

“杨树浦。”答语几乎是一致的。

“你们都是在工厂做工的吗？”

“是的，在日本纱厂。”

谈话就这样开始了，起初是凌乱的声音，没有秩序的问

答，同时，双方的语调和态度都有点生疏和不大自然，渐渐地，谈话走上了正规，也就毫不拘泥地很亲热地谈起来了。这时，我受了这些诚挚的声音的激动，也出现了一点勇气，不时地插入一句半句。

李向她们讲述了敌人的残暴与野心，她们都能深切地了解，愤骂着，吁叹着，同时，她们也把在日本纱厂里所受的压迫向我们报告了些。

一个样子非常精干的中年妇人最健谈，也最激动，她给我们叙述了下面的一段故事：

当沪战刚刚开始两天，厂方突然对她们恩典起来：每个人在早晨都可以分得两个滚热的馒头，但只限于女工。

她们是受惯了厂方的欺凌的，对这无条件的意外优待，实在觉得莫名其妙。她们猜疑地接过了馒头，然而不敢吃，猜测着这里面的奥妙。

撕开了馒头，里面是洁白的，而且异常松软，和普通的馒头没有什么两样。可是她们仍然不敢吃，大家互相警告着：

“不要吃，鬼子不会安什么好心的！”

谁也没有吃，把那恩赐偷偷地塞进衣袋里，晚上带回家去，大家聚在一起，千方百计地测验着；最后终于把馒头撕成碎块放在水里，结果，在洁白松软的碎块上，发现了粒粒的黑点。

以为这一定是致人于死的毒药了，大家的脸吓得发白，又开始研究起这黑粒的作用，终于被她们研究出来，原来那

是灭绝人种的毒药，女人吃了，一辈子也不会生育。

这一段故事虽是那个中年妇人述说的，可是其余的许多女人都在抢述着，因此费了很长的时间。我听了，真替她们庆幸，倘如吃了……

帝国主义的野心是多么可怕！他们不但要吞尽中国的土地，更要灭绝中华民族的人种，这又叫人怎好忍受呢？

悲愤与恐怖围攻着我们，很久大家没有说话。

在我们对面坐着一个大嘴的女人，她总在奶着她怀里的孩子，始终没说一句话，样子非常忧郁，深思的表情，两眼红肿着，她好象有着无限的心事，老早，我就注意到她了。当着大家都沉默的时候，我向她探询着。

刚刚说了两句，她的泪便象雨点般滴落了。原来她的丈夫还没有逃出战区。

她哽咽得已经不能说话，还是那个中年妇人替她回答了我的询问。

在沪战没有爆发之前，她的丈夫便被日本兵捕去了三次，掘战壕，扛子弹……每次都是她苦苦哀求才得免一死，被释放回来。因此，他丈夫对敌人的仇恨比任何人都来得深刻，他曾经毅然地跑到兵营去投效，但为了他的两只腐烂得很厉害的腿没有被收留。这次，他把他的女人和四个孩子送出了火线之后，自己又跑了回去，预备下大刀板斧坐在家里等待和鬼子拚命！

“他的命怕早已没有了！”大嘴女人抹着眼泪说。孩子的身上已经湿了很大一片。

大家都在安慰她，然而没有用，越是安慰她哭得就越伤心。那个中年妇人愤愤地说：

“可惜我们是女人，不会拿枪，又有这样多的孩子累着，不然，我们也上前线，杀死几个鬼子出出气，该多么痛快呵！”

我们谈话结束的时候，每个人的额上都在滴落着汗珠，天气是十分燥热的。

在那边草地上围坐着的两圈男人，不时地响起脆快的掌声，那是我们的两个男同伴扩大着激昂的喉咙在向难民讲演，并教给他们防空防毒的常识。

为了口渴，我离开那里去找水，路过第一间板棚时，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子正扶着门边啜泣，鼻涕都流到嘴里，他用舌尖舔着。我抚摸着他积满尘灰的头，轻声地问他为什么哭泣，半晌，他才抹着鼻涕告诉我：

“爸爸妈妈都不见了，是在那天逃难的时候，让日本鬼子拿着刺刀追着冲散的，现在三天了，我天天要出去找，这里的先生们死不放我出去，他们说他们一定替我找到，可是在哪里呢？连个影子都不见哪！”说着又伤心地哭了。

我将怎样安慰这可怜的孩子呢？我只好说：

“不要哭，这里的先生们一定会把你的爸爸妈妈找到的，我明天也替你去找，快不要哭了！”

然而，我欺骗了那个孩子，我能上哪里去找呢？

带着一颗沉重的心，离开了那个失掉了父母的孩子，口不渴了，一阵饭香把我引诱到厨房去。

是几根木柱支起的一个板棚，排列着六七口大锅。一个和善的老头和一个中年男人在搅混着沸滚的稀饭，几个同伴正在和他们攀谈。据说，他们两个是刚从天津跑来的，到上海仅仅两天，又做了第二次难民。可惜以前的谈话我没有听到，又不便打岔他们，只好站在那里静静地听着。

那老头说话的时候很有趣，他总是露着牙齿笑，晃着光秃的头。我问他：

“你这样大的年纪，整天做饭不累吗？”

“不——劳碌惯了，做点事倒好，要是叫我吃了就睡，睡了再吃，养猪一样，我可受不了！”

“你们这里一天吃几顿饭？”一个同伴问。

“两顿。一顿稀饭。还有菜，也许咸菜，也许炒豆芽。”似乎怕我们不满意似的，他又晃着脑袋解释着，“因为人太多，烧开水烧不过来，才吃一顿稀饭，……干饭要喝开水呵！”

“吃饭有没有限制呢？”

“没有，没有，不怕你能吃十碗也供你吃饱。”

我在地下的木盆里捧了一把发红的秈米在看，那老头连忙挥着饭勺对我说：

“那不是好的，还有比这还好呢。”

这和善的老人不住地向我们做着宣传，他对这艰苦的生活是这样地满足。

在厨房的对面，放着个新的煤炉，炒勺里在炒着辣椒和肉丝，香味四溢着，掀开木桶，里面是洁白松软的干饭，一

堆洁净的碗筷有秩序地放在红色的方盘里。我心里非常疑惑：“做了难民还要吃小锅吗？”

每个同伴都注意到了这批家具和锅里的菜，都把脚停下了。为了打破这个谜，我愤愤地问那个烧菜的女人：

“这是谁吃的菜？”声音很粗暴。

“先生们。”

“哪些先生们？”

“这里做事的先生们。”

“哦！”我们大家同时地哦了一声，那个女人被我逼问得有点胆怯了，那样子看来怪可怜。于是我又把声音放柔和些问她：

“那么，你是做什么的呢？”

“我是逃难的，是先生们派我来替他们烧饭的。”

再没有什么好问，我们很不高兴地走开去。当一个同伴去质问那女人所谓的“先生们”为什么吃小锅的时候，他们的回答是：

“人多，那几只大锅烧不下，只好单烧。”

“可是，我看到厨房里还闲着一只锅子呢，你们只有二十来人，一大锅饭还不够吃吗？……即使真的是锅子烧不下，那么你们为什么不吃一样的米呢？为什么不吃辣椒炒肉丝呢？……”

他们红着脸，再也回答不出。这批专门喝血的臭虫！

9. 西行散记

“别了这里的山河，这里的原林……”

凄切而悲壮的歌声，在我耳边荡漾起来，一阵突然的酸楚掠过我的心头。是多么熟悉的歌呵，好久不唱了，也好久不听见谁唱了；然而，这支歌曲却象永远响在我的耳边似的使我感到格外的亲切。如今，尤其是唱自流亡者的口中，又怎能不激起我的共鸣呢？

睁着同情的眼睛，在幽暗中我注视着坐在身边的勃那深沉而有点悲凄的表情，这表情是我非常熟悉的，他又是在怀想着那遥远的故乡了。他缓缓地掀动着两唇，歌声在喉中颤抖着，回旋着，那如怨如泣的低吟哪，道出了多少流亡者的苦闷。我情不自禁地也随声低唱了。

我们现在是身在祖国——身在祖国的车厢中，虽然一样是“逃”，而情形与环境却和两年前的“逃”完全不同的。按理，在目前这样充满着希望的兴奋的怒潮中，这歌曲该不会感动我了。可是，一种疼痛的回忆却被它撩动了，被它深深地撩动了。我们是曾经唱着这支歌子别了我故乡的一切的呵！

天色渐渐地晦暗下来，火车在轨道上迂缓地爬行着。所有的林树、田野、小溪、荒原……已经模糊不清了。异常拥挤的车厢中，汗臭与尘烟弥漫着。这里没有灯，看到的只是些晃动的人形。语声嗡嗡，婴儿啼叫着，女人的尖喉咙不时

地响彻整个车厢。他们是为黑暗而喧哗，他们是为闷热而焦躁，最使他们担心的是，不远的前面松江附近那一段徒步的艰难的旅程。

这样熙攘的环境，竟打不断我们低沉的歌声，我们俩在静静地反复合唱着。那酸心的回忆，牢牢密密地在我的脑子里织着庞大的网，我的汗为了心绪的凄凉已经不再流了，神经被回忆迷惑着，仿佛是置身在两年前逃亡的车厢中，心情也完全让离情别绪、悲愤与仇恨占有着，脑子里再也没有一点空隙去顾虑到前面那瞬息将至的艰难的途程；虽然片刻之前我还在焦忧不安。

沿途不见一线灯光，漆黑的天，漆黑的旷野，漆黑的车厢中越发地闷热，人们的心也越加惶恐起来。荆棘的路已迫在眼前了。

车停了，在极度紧张的气氛中，我瞪大两只无用的眼睛，被一个朋友把我这笨重而背着包裹的身子扶下了五尺高的车梯，两个人几乎一齐滚倒在轮下。天空中闪耀着淡而稀疏的星星，人们是沾不到一点光的。我们摸着黑，踏着满铺尖石的坡道，踉跄地一步一滑地向前爬行。为了双重的负担，我不断地跌着交，几次要滑落河滨都被人拉起。这样危险的途程，还是初次尝受呢。倘如那一段桥梁不被炸毁，倘如不是为了防范敌机投弹，我们不是可以含着笑在光明中安然到达南京吗？这黑暗，这危难，都是谁给的呢？

爬完这四里危途，又拥坐在车厢中，经过极端的纷扰，车子才缓缓开行。这时，我那曾昏厥的神经开始恢复了清

醒，新仇旧恨一齐涌上心头，那曾经一度被打断了的回忆，更清楚地串演起来了。

是同样的夜，同样的车厢，也是同样的季节，然而情景是怎样的悬殊呵！

三年前，在帝国主义铁蹄践踏着的松花江畔，为了不屈服，勃被吞进了虎口，受尽了残酷的折磨，受尽了长期不自由的痛苦，侥幸的是没被虎牙嚼碎，他带着完整的肢体和更完整的意志归来了。然而，我们仍是无法逃避敌犬严密的监视的，虽是整天作着逃亡的计划。

终于不久，勃被二次逮捕了。他受了一整日的刑讯，竟而巧妙地负着伤痛在黄昏时挣脱了敌人的绳索。一小时之后，我们冒着敌人的爪牙跳上了逃亡的车子，含着辛酸的泪别了美丽的松花江，别了送我们逃亡的两位热情的朋友，开始向祖国流浪了。

汽笛的一声长啸，敲碎了一对逃亡者的心。我们俩把头探出窗外，湿润着惜别的泪眼，贪婪地望着眼前飞过的一切景物。一切景物都将别了，几时我们才能再见呢？

“别了——这里的山河，这里的原林……”

凄切的歌声，就在这时响起。我们放大了喉咙，高亢地、激昂地歌唱着。让晚风把它送向天边，响彻在沉郁的夜空，夜空也为之凄恻了！

一路上，车轮滚动着，我们和着这愤怒的音乐断续地唱着，没有交谈什么。是离情，是别绪，是悲愤与痛恨把我们围袭了。这极度猛烈的围袭竟把恐怖的心情压倒。在这危机

四伏的旅途中，我们没有一点畏惧。在别人的眼里，我们简直不象是一对逃亡之客，我们表面上似乎比一般旅客更沉静，更悠闲，因为我们是在不断地唱着别离之曲。

这别离之曲一直把我们带进了睽别十二年的故乡。是多么欣欢的重逢呵，然而，又是多么悲惨的别离呵。瞬息之后，我们又继续踏上逃亡的征途。这美丽的故乡，这童年温暖的怀抱，竟没有重温的机会，一瞬的相逢哪，反把我们无限的愁思撩起。

慈母的热泪与叮咛，把我们送出了河山变色的故乡，给慈母留下的是无尽长的怀思，是漫漫长夜中的思儿的泪。

寂寞而危险的旅途中，我们无法排遣这漫长的日夜，烦闷的时候，只有唱着那支凄切的歌曲来发泄无限的悲哀与愁愤，一直到祖国的海岸。

事情隔两年了，如今记忆起来，仿佛就在今日，我又在迫切地怀念着故乡了。

回乡的梦，已经好久不敢作了，即使是那样一瞬的相逢，也已绝了望，这绝望是两年来祖国给予我的。

两年后的今日，祖国复活了，抗敌的炮火燃炽了我怀乡的情绪。故乡呵，我们相逢有日了。

侧听着急驶过去那一系列列的军车，我的心在激动。血液亢进着，他们就是捍卫祖国的勇士，他们就是收复失地的先锋。不久的将来，我们将高唱着凯旋的歌子踏进故乡的土地，重温着旧梦，那支悲凄的别离之曲将永不再唱了。

虽然被两年前惨痛的回忆纠缠着，而且，距离故乡越发

遥远了，却总还有着欣喜与兴奋温暖着凄怆的情绪；虽然这一段途程受了比两年前更多的危难，而幻想中闪耀着的火样的希望呵，如果能真的实现，即使再受些更大的折磨，我也心甘情愿的。

随着车轮的隆隆，我的冥想起伏着，蔓延着，没有止境……

是同样的夜，同样的车厢，也是同样的季节，然而，情景是怎样地不同呵！

1937年“813”后于武汉

10. 我踟蹰在黑暗的僻巷里

孩子的出世，给我带来了无限的烦愁。

勃的突兀归来，也给我带来了无限的忧郁。

忧郁挂上了眼角，烦愁涌集在心头，我的脸上再也找不到一丝的笑容了。即使勉强地笑一下，而那皱锁着的眉头，依然不能舒畅地展开。那笑，使我的面颊胀痛；那笑，使我的心头塞闷。那苦的笑，那忧郁的笑呵！

“你怎么对我这样冷淡呢？”勃从归来之后，便常常这样似怨似怒地叮问着我。

还给他的仍是一个冷淡的微笑。

的确，我对勃实在太冷淡了，这意外的从未有过的冷淡，是够使他伤心的。我说什么呢？我能为我的淡漠的态度

剖辩吗？

为了我，为了拯救我冲出家庭的樊笼，重新走上憧憬已久的、光明的、自由的革命阵地，他冒着冬寒，带着一张风尘仆仆的脸儿，高高兴兴地从辽远的西战场上归来了。而我呢？对这梦一样的相逢，对这善意的援引，竟没有表示一点惊喜与感激，忧郁的火把所有热情全焚毁了。

我的嘴在不断地询问他途中的见闻和工作的成绩，然而，他那不厌烦琐的答话，连一句都不能灌进我被忧郁蒙蔽了的耳朵。我抱着襁褓中的孩子，我的眼睛痴呆地注视着渺茫的远处，什么都不曾看见哪……一个不能解决的问题，在我的脑子里纠缠着。

那仿佛是一团无头的乱丝，我的脑正如一堆晒干了的蒺藜，二者搅缠在一起，不经过相当的努力与摘理，怕永远也不能分解的。

夜残了，黑暗已成过去——黎明的霞辉在向我诱引……

孩子醒来了，那围绕在密长睫毛中的黑大的眸子，天真地在凝视着我，凝视着我，凝视着，凝视着。他菱形的小嘴绽开了，嫩红的饱满的腮边，陷下两个深深的笑涡。我吻着，吻着那滚圆而微温的小嘴。于是，那个不能解决的问题，越发加紧地在我的脑里纠缠起来。

仿佛我立刻就要和我的孩子告别了，惜别与留恋侵蚀着我的心，我的心在酸、在痛，两颗圆大的眼泪，热乎乎地滚出了眼角，滴落在孩子的前额上。

可爱的还没有智慧的孩子，仍在凝视着我，在向我憨

笑。这凝视使我的心酸楚，使我想到了孩子未来的命运。我缓缓地离开了床，而他的眼睛也缓缓地向我追逐，我走得更远些，远到他目力所不及的地方，突然，他哭了。当我再回到床前时，两道泪流已经淌进了他的耳朵。我吻了吻他那因痛哭而红涨的小脸，哭声戛然止了。他委屈得撇着小嘴无声地抽咽着。那抽咽道出了失掉了妈妈的孩子的悲哀。

孩子已经认识妈妈了，妈妈又是怎样爱着他呵，然而，也许不久的将来，妈妈心一狠，这孩子就变成无母的孤儿了！

“把应带的东西整理好，我们尽可能地早一点动身……”勃几次地这样催促着我。

“孩子呢？”

“孩子！孩子丢给老太太！”

“经济来源呢？将用什么喂养这个孩子？”

“再说吧！”

问题哪是这样容易解决的呢？如果那样，一切问题也都不成问题了。

“把孩子丢给老太太吧！”有的朋友也这样劝我，不曾做过母亲的人，决不能了解做母亲的心情。

也曾经几次下过决心：“丢掉孩子，走！死或活，凭他去吧！”然而，一看见孩子滚圆的小脸儿，那没有智慧的憨笑，那觅乳时的迫切，以及想到孩子未来的不幸的命运，我的心立刻又软了下来。

这可爱而又可怜的孩子呵，我又怎忍把他丢下？

横在我面前的是两条路，光明的坦途与黑暗的僻巷。

初春的太阳指射着那条光明的路。在这伟大的时代里，那条路是宽的，希望是大的，我是多么渴盼着把握它呵！

人是趋向光明的，有谁甘愿留在黑暗的僻巷里怀抱着无限的惭愧苟延生命呢？

我爱我的孩子，同时，我更爱我那伟大的工作，那工作是在怎样诱惑着我啊。然而，为了孩子，我只好暂时牺牲那工作，倘如要去工作呢，也只有牺牲我可爱的孩子了。

工作、孩子，孩子、工作，它们整日整夜地在我的脑里交战着，激起了不常有的矛盾。

勃在牵引着我走上那条光明的路。

孩子拖着我在黑暗的僻巷里。

工作、孩子，孩子、工作，直到现在还不能自决。

孩子的出世，给我带来了无限的烦愁！

勃的突兀归来，给我带来了无限的忧郁！

1938年初

11. 到前方去

最难割断的是“母子之情”，最难解决的是家庭的“生活问题”。

“到前方去”，是我两年来迫切的期待。然而，正因为母子之情难以割断，生活问题无法解决，虽然我的期待随时

都有实现的机会，而我却永久也不敢向那机会握手。我一直地隐伏在后方，整天地为生活、为孩子忙碌着，体力是劳顿的，心情也是郁闷的，对于我们神圣的抗战竟是毫无贡献。我抱着无限的惭愧与疚歉，在敌机狂暴之下苟延着还在年轻的生命，两年来的成绩是抚养了一个未来新中国的幼年主人。

创作的生活已经不适于我了，伟大的时代需要的是有血有肉的文章，而我，整天地蹲在家庭的小圈子里，除了柴米油盐和孩子而外，与外界，尤其前方，几乎完全隔阂着。题材贫乏了，头脑空虚而僵化了，写文章，在我已经感到极端的苦痛。因此，两年来的创作，真是渺乎其微的，于是乎间接地也就影响到了“生活”。

“到前方去”，也曾几次地私自下过决心，然而，那新生的孩子，我又不忍离弃。离弃了襁褓的婴儿是一种残忍的举动，施残忍于亲生孩子更是加倍的残忍。我想：离开了他，我会痛苦死的。

因为夭殇了四个幼儿，对于这孩子就特别珍爱，我爱他甚于爱惜自己的生命和前途，我誓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孩子的身上了。然而，我那可爱而又可怜的孩子他竟“生不逢时”！生前生后的几次逃亡，已经把他颠簸得逐渐衰弱，加之那整日敌机威胁下心惊胆战的生活，更使他日见瘦削下去。有时我恨我的孩子生得太晚，有时也恨他生得太早。有人说：他生得“适逢其时”，生在伟大时代里的孩子是幸福而伟大的。然而呵，倘如那幸福而伟大的孩子逃不出这伟大的时代呢？

在伟大的时代里，每个国民都该有所贡献，可是我，有着孩子的牵制，除了对未来的新中国贡献出我的孩子之外，如果长此下去，我将是一无所出的。因此，我迫切地感到我的孩子之生，是太不逢时了！

正当敌机狂炸重庆的时候，“文协”组织了“作家战地访问团”。消息传来，我真的兴奋得流泪了，我虽算不了“作家”，然而我是“文协”的会员之一，于是，我立刻下了决心：“参加访问团，到战地去！”

首先我用强硬的手段给孩子断了奶。孩子断奶是一个最大的难关，我发了最大的狠心，不管孩子彻夜的可怜的哀哭，不管他怎样迫切地追求，我一直地硬着心肠不理。

奶是断了，接之而来的是一老一小的安置和生活费的准备。重庆，正在敌人凶残的野心下逐渐地走向着残破之途，把老人和孩子留居在那里无异是送入虎口，而且，我们的老太太是一向都未脱离过依靠的——即使是太平盛世。她胆小、多虑，没有主意，她的年岁是那样大了，自顾犹不暇，再把一个未岁半的孩子丢给她，叫她整天抱着逃难，抱着在恐怖中生活，那是会致她于死命的；虽然那明达的老人对于我们的走，从未表示过一点阻挠。

访问团的组织酝酿了多久，我的忧虑便持续了多久。足足一个多月，日夜地筹思、奔走，求朋友们帮助，最后，在出发的前两天，才算把老人和孩子安置在重庆的南岸，——虽然那里也有敌人轰炸的大目标，但总比市内安全得多了，——依傍在同乡好友家眷的旁边，再蒙“文协”借给一笔

款，于是，这两个问题都算获得了解决。

决心既定，就没有更改，许多关心的好友提出各式各样的警告，而我的决心却始终没有动摇。虽然明知自己的身体不见得耐得住长途跋涉和许多难以预料的艰苦，虽然明知在敌机疯狂的摧残下，对于一老一小的安危将是一种无尽期的牵挂，但我用耐苦的决心，坚强的意志，冲破了一切难关和顾虑勇往直前去完成我的宿志，为自己的前途引起一把光明的焰火，为伟大的中国尽一点绵薄之力。

象冲出樊笼的小鸟似的，我第一次挣脱了家庭的束缚和孩子的羁绊，以后的几个月的时间，是属于我自己的了。

六月十八日，早晨五点钟，从梦中突然地醒来，心里十分兴奋，我们终于要出发了。这一个盼望已久的佳期使我喜悦，同时更感到万分的新鲜。可是一听到老太太突然带着哭声在蚊帐里哼起催眠曲的时候，我的心竟猛烈地抖颤起来。我竭力镇静着，用抖颤的手穿好了制服。老太太竟从蚊帐里走下地来，她垂着头，沉默着，不住地用她那双苍老的手整理那花白的发丝。我没有勇气向她正视一眼，这位可怜的老人从此将孤独无依了，她将怀着一颗不安的心，直到我们归来为止。

睡在床上的孩子，我一直没敢看他一眼，现在他竟醒来了。他侧卧在床边，用那双可爱的毛茸茸的大眼，稚气地、张惶地注视着我。一向是他先爬起来，用他嫩白的小手捏我的鼻子，扒我的眼睛，把我唤醒，今天却是我先他而起来了，而且穿着他从未见过的服装在地下忙乱着，他感到新

奇，感到不安，也许意识到我将抛他而去了。

我没有勇气去向我的孩子吻别，便匆忙地跑了出去。我的泪已经禁不住地流了出来。别了，我可爱的宝宝，我是用了多么锋利的刀才割断这难断的感情呵！但愿，你和抚养你的唯一的老祖母，能够平安地度过这别离的半年，也就是我最高的愿望了。

一坐到那渡江的小舢板上，我的泪便干了。混黄的江水洗去了我的悲哀。当进入车厢的时候，我是完全兴奋着，所有的离情别绪全让微雨中的清风拂去。我的身体是完全解放了，未解放的只是一颗悬着的心……

1939年6月

贺

早晨起来，展开报纸，看到赵寿山将军来到解放区的消息和他的通电全文，不知为什么，突然感到一阵心酸，接着，便很自然地引起了我遥远的一段回忆。于是，我立刻提起笔来，在无限欢欣与激动的情绪下把它写了出来。

1939年的夏天，我参加了重庆全国文协组织的作家战地访问团，到了中条山。那时正是敌人六次扫荡中条山之后。遗憾的是我们未能亲逢战役，只看到了敌人扫荡后的残破景象，到处是断瓦颓垣，遍野哀鸿，老百姓都逃避一空了。三十八军是我们在中条山一月巡礼中最末访问的一个部队。当时三十八军正驻扎在××村整编，在军部里，我们会到了赵寿山将军。

赵将军高高的个子，长长的脸形，虽然已经是将近五十岁的人了，但却还象年轻人一样朝气蓬勃。他那老当益壮的风度，使人立刻联想到当他驰骋疆场上的威武和刚勇。他身着朴素的军装，态度是和蔼可亲的；见了我们，象见了久别的故人一样，和我们紧紧地握手，愉快地谈心。我们十四个当中，虽然仅有极少数是共产党员，但我们的倾向和信仰却

多一半是一致的。事先，赵将军也了解到了这一特点，但奇怪的是他好象在为了这一特点，对我们就显得更加亲密和敬爱，而且那是诚实而由衷的，丝毫没有做作的征迹。他曾尽其所有地拿出了最珍贵的礼物（敌人疯狂的扫荡刚过，前方的物资是极感缺乏的）——雪茄烟、葡萄酒、咖啡和鲜红的苹果来款待我们。那种友谊的款待，开始颇使我们感到深切地不安，但终不能不为他的诚恳而感动，很快地，我们便毫无拘束与芥蒂地谈笑自如了。

象在我们走过的所有的非国民党中央军直系的军队一样，赵将军也有着无限的感慨和不平，不，他是有着更多的被抑压的苦闷和难言的隐痛。席间，他一面豪饮着，——他说他有两斤半的酒量呢，——一面忿忿地说：

“我们的弹药兵员没有补充，粮饷经年扣押，我们的队伍是越打越少，越战越穷，杂牌军的命运就是拼完为止！”说到这他又喝了一杯酒，接着又说，“一样抗战，两种战略；一样军队，两种待遇；我们是冲锋在先，人家是逢敌退后。抗战既有真假，待遇当然就会悬殊。但是为了杀退暴敌，还我河山，我们愿忍受这一切，只要我们始终忠于国家民族，不负人民付托之重，死也光荣！”

他冷笑了，用最末的几句话作为安慰，可是那种愤懑不平的情绪是充分地流露了；尤其当他提到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时，那忘形的悲愤使静听的我们不禁凄然了。他说：

“张、杨两将军何罪？竟至身系囹圄，徒使英雄无用武之地，这难道就是真理吗？假如现在有张、杨在，抗战阵容必将

改观，但不知两将军何日才能徒刑期满，效命疆场呵！”期待之忱，在他的眼光中闪动了。

赵将军常赞扬共产党的纪律和作风，尤其是八路军对战士的教育。当天晚上，他曾陪着我们去参观了他们战士的学习。那天正在开政治讨论会，讨论的题目是“什么是法西斯？”会开的很热闹，有着激烈的争论，战士们对学习是严肃认真的。赵将军对我们说：

“战士不单单要作战勇敢，更重要的是政治认识清楚，否则皂白不分，是非莫辨，徒具勇敢也是无法胜敌人的；不过我们的战士水准太差，能做到八路军那样就好了。”

从这点看来，赵将军对战士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

在三十八军逗留了三天，因为感情融洽，真有点不爱离去。当时因为我们的团长病危，那里没有较好的医生，只好把病人送过黄河疗养，于是我们便不得不和赵将军匆匆分手了。临行前他又设宴欢送我们，由于冲动，他多饮了几杯，一直流着眼泪把我们送到村口，颇有恋恋惜别之情。直到我们走得很远很远，赵将军还在挥手高呼：

“我们鸭绿江边相见！”

“是的，鸭绿江边相见！”

事隔八年了，而当时的情景犹历历在目，赵将军的临别赠言还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中，仿佛昨天一样。

别后不久，我便因病离团先返重庆了。一天，在都邮街竟与赵将军不期而遇。赵将军已经脱却军装，穿上中山服了。当时我很奇怪，赵将军不在前方杀敌，为什么来到后方

呢？当我向他问询的时候，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悄悄地告诉我：

“我是奉命调来受训的！”言下有无限的感怆。

我体会到了他一定有着什么难言的苦衷，因为在街上谈话不便，我便问他住在什么地方，打算去拜访他一次，可是他却说：

“我住在旅馆里，不必来看我吧，有机会我去看你。”

接着，我们便默默地分手了，以后再也没有机会相见。赵将军为什么会被调到后方受训呢？从他的态度和简短的谈话中，是不言而喻的。

赵将军在蒋介石的独裁暴政下被压抑、欺凌了十年之久，如今，终于不愿再忍受下去了，他毅然地冲破一切难关摆脱了特务的监视，来到解放区。我谨向这位为和平民主而斗争的老将军遥致崇高的敬礼。但愿有一天，我们真的在鸭绿江边相见，我想这愿望是一定会实现的，而且不会很久。

1947年7月10日

谁不热爱英雄？

在去朝鲜的途中，很荣幸地遇到了李兰丁同志。她正率领着一支英勇的青年手术队，从那风光秀丽的和平的江南，奔赴炮火纷飞的战斗的朝鲜。为了拯救因抗美而战伤的中朝勇士，她千里迢迢地迎着北地的严寒，又一次勇敢地走向保卫东方、保卫祖国的最前线。

谁不热爱英雄？当一个同志发现了李兰丁同志之后，立刻象报告新闻似地跑到寝车传播开了：

“好消息，好消息，李兰丁同志在我们的车上！”

“真的？”几个护士同时把眼睛瞪圆，惊喜地问，“就是那个模范护士吗？”

“不，模范医务工作者。”

“她也去朝鲜？”

“当然喽！英雄还能后人吗？她不但自己去，还带了五十个人的手术队呢！”

“参加我们的抢运工作？”这个天真的询问一经提出，马上引起了一阵友爱的笑声。

“看你想想的多美！人家的目的地是最前线，不打仗的时

候做治疗工作，打起仗来就到战场上抢救伤员，比咱们的任务可艰苦多了。”

“真好呵，最前线。”在这一句简单的话里，充分流露着对英雄的钦羨、尊敬和热爱；同时，每个人的脑子里，立刻浮现出一个高大、健美、英雄式的女战士的形象。于是，二十来个女孩子象一群春天里的小麻雀似的，拍着手，跳着脚，一齐鼓噪着向手术队的车厢奔去：

“走呵，去看李兰丁同志！”

“顺便请她签个字。”一句话提醒了大家，于是她们又一窝蜂地回来取小本子。随后，寝车便空起来，只留下一片叫笑的余音。

过了一会，她们又象一群小麻雀似地鼓噪着回来了。几个年纪小的象找到了什么根据，牢牢骚骚地自言自语着：

“哼，我报名的时候，领导上硬不批准，说我瘦小，刚才我偷偷和李兰丁同志比了比，她还矮我一指呢。”

“是呵，她身体多坏呀。”

一阵吵嚷过后，便有人打开小本子念道：

“‘爱护伤病员要象保护自己的眼晶一样。’‘晶’，就是那块结晶体，眼睛里最宝贵的东西。”

每本小本子上，都签了同样的字句，每个护士都反复念着，她们诚心实意要记住李兰丁同志恳切的叮嘱，决心向她爱护伤病员的精神学习。于是就有人提议：

“见到李兰丁同志真算幸运，我们应该抓紧这个难得的机会，请她讲一讲她的模范事迹，作为我们学习的榜样。”

这提议立刻引起了一阵响应的掌声：“好啊，好啊！”

从江南到东北，多少天的旅途跋涉，实在是太疲劳了。当派代表前去邀请时，李兰丁同志正要休息，但她为了满足大家的希望，竟立刻走过来了。

不算小的一间处置室，挤满了几十个男女青年，连检车员也兴冲冲挤在人群里，等待着听她的英雄故事。

李兰丁同志不象大家所想象的那样高大、健美，相反地，她是一个个子不高、体质瘦弱的江南女人。但是，谁都知道，她曾参加过两次最激烈的战争。当她1941年参军的时候，才十七岁。那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她经常领导着一组医务人员带领伤员打游击，有时在东海边上，有时在崇山峻岭中，遇到敌人就打一阵。当敌人扫荡频繁时，日里把伤员运到山里隐蔽，夜里便带着伤员转移。即使在万分危急的情况下，她也决不肯丢掉一个伤员。无产阶级的高贵品德，在爱护伤员这一点上，被她充分地发扬了。

在一个深秋的黄昏里，她带着十几个重伤同志坐着小船躲在苇塘深处，敌人的汽艇突然驶来了，正在这时，远处的芦苇丛中送出了一声女人的尖叫，随后就寂然了。这叫声是那么熟悉，不用调查，大家就完全明白了：无疑地，那是躲在苇塘里的另一组看护伤员的女同志遭到了敌人的毒手。

汽艇在到处逡巡，情况是这样地危急，但是，在逐渐暗下来的黄昏里，一个健康的人还是可以逃脱的，于是，十几个伤员同志劝她：

“小医生，”伤员都这样称呼她，“你赶快逃命吧，后

面的伤员还依靠你，我们都是重伤，死了也没有什么可惜！”

李兰丁同志心里十分难过，坚决地说：

“不，决不，我死和你们死在一起！”

伤员们看她那样坚决，又感动又焦急，最后，流着眼泪要求她：

“你是我们的好同志，你太年轻，革命正需要你，还有更多的伤员等待着你，你要是为我们牺牲了，我们的良心……”

她感激同志们对她的衷心爱护，但这却丝毫不能动摇她与伤员共生死的决心。于是，她睁大着盈泪的眼睛，抽出被伤员紧握的双手，敏捷地跳下水去，号召大家把船推出苇塘。就这样，小船很快就脱离了险境，不但保存了伤员，同时也保存了她自己。

一次，她抬着伤员过河，由于前一天刚吐了两口血，身子格外虚弱，当走在水急处，突然眼睛一黑，头便跌进了水里。但她仍拼命地擎着担架，唯恐伤员落水，最后，终于挣扎着把担架抬到岸上，只觉胸臂疼痛，以为又要吐血，就没有理它，两天过后，突然右肋上部的皮肉象刀扎一样疼痛起来，脱下衣服一看，原来肋骨被担架压断，断骨从皮肤支出来了。

她忍着疼痛，仍旧一声不响地继续工作着，不使任何人知道她的伤痛，她想：

“千千万万的同志残废了，牺牲了，多少民伕一边吐血一边抢救伤员，我的一根肋骨又算得了什么！”

十年当中，李兰丁同志一直领导着她的伙伴们在枪林弹雨中与伤员度着出生入死的艰苦岁月，不但没有丢掉一个伤病员，更从不疏忽对伤病员的看护和治疗，多少次危难都被她们勇敢机智和与群众的密切联系克服了。伤员们对她的尊敬是无法形容的，他们都说：

“旧社会说女人无用。咱们的女同志可有大用呢！”

有这么一回，一只载运重伤员过河的小船快沉了，当她发现以后，立刻从最后一只船上跳下水去，水冷刺骨，水深没胸，她顾不得寒冷和危险，呼吸紧张地直向将沉的小船奔去。这时，船上的每个人在她影响之下也都一齐跳下水去，救出了那只小船，使伤员安然到达彼岸。她出水以后，全身都结成了冰柱。

李兰丁同志的模范事迹是讲不完的。她一口气生动地讲了三个多钟头，听的人被感动得鸦雀无声，连呼吸都几乎屏住了。

从那以后，李兰丁同志的事迹，不但成了赴朝抢运伤员的护士们的谈话材料，也成了鼓舞手术队员们的动力。他们一直看着那五十个装备整齐、斜挎绣着红十字背包的医疗战士，在她的领导之下，踏着雪深没膝的朝鲜土地，英勇地向前挺进了。在他们的前面，还有着好长一段更艰难的旅程呢。

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会看到更多的李兰丁同志。

1951年“三八”节前

和平与胜利的象征

援朝的列车一个车厢连接着一个车厢，仿佛一长列严阵以待的队伍，显示出战斗的英姿，威武不屈地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司机手发出了一声进军的号召，整个列车便开始了进入战斗的行动。它载着几十个中华优秀的儿女，奔赴中朝弟兄并肩作战的前方。几十颗心一起跳动，几十双眼睛朝着一个方向——在那美丽的鸭绿江南岸，在那战火纷飞的朝鲜半岛上，有着为保卫世界和平而流洒了鲜血的中朝勇士正期待着他们；他们的责任艰巨，他们的热情奔放，一经接受了任务，便纷纷写下决心书，发下坚决的誓言：

“学习李兰丁！”

“爱护伤病员要象爱护自己的眼睛！”

“做一个白求恩式的好学生！”

随着誓言，便响起了战斗的歌声，

穿过山水云天，
走遍城乡平原，
从中国，到朝鲜，

越过淞江，
跨过鸭绿江，
不怕飞机肆虐，
哪管敌寇猖狂，
多少个医疗战士，
多少个革命青年，
高唱着战歌，
紧握着铁拳，
乘上了战斗的列车，
坚定勇敢地奔赴前方。
为了胜利，
为了前线，
一切为了伤病员。
为了祖国，
情愿牺牲流血；
为了和平，
不怕困苦艰险。
冲破了重重苦难，
满载着人民功臣，
安抵祖国的后方。
中朝人民血肉相连，
不消灭美帝誓不还乡。

列车在高歌中猛进，列车猛进中歌声越来越激昂响亮。

他们唱出了如火的热情，也唱出了他们的理想和希望，他们那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和对祖国的热爱，都变成了战斗的力量。

最值得歌颂的是在这一支年轻的铁流中，占半数以上的女护士；她们，个个是白衣、白帽，有着稚气而愉快的脸，正象一朵朵洁白的百合花，在春天的阳光下，焕发着永不熄灭的光彩，显示着青春的美和幸福的喜悦。她们有着唱不完的歌，更有着用不竭的智慧。这一群英雄的女儿，在医疗战线上，在抗美援朝的运动中，正在贡献着自己全部的智慧与力量。她们热情饱满，愉快健康，在战斗中壮大成长，百炼成钢，又勇敢又坚强。她们正如同中华的好男儿一样，是和平与胜利的象征。

她们来自各个城乡和学校，曾经在忍气吞声中度过了苦难的童年，解放以后，得以挣脱奴隶的锁链，进入和平的年代，向上的现实生活，在她们面前展开了更美丽的远景，她们怀抱着远大的理想，追求着更美好的未来。然而，强盗的铁蹄又踏破了东亚的和平门户，侵略的魔爪在制造着人类的灾难，朝鲜的美丽城市化为废墟，朝鲜人民的血染红了自由的土地，这是一声警钟，它惊破了年轻的和平的梦。当祖国发出了战斗的号召时，她们便毫不犹豫地纷起响应。为了使“九·一八”的悲剧不再重演，为了保卫美好的田园和生活，她们告别了温暖的家，离开了学习的课堂，坚决地投入了抗美援朝的斗争中。慈母的柔情软化不了她们坚强的斗志，慈母的眼泪更熄灭不了她们对敌的仇恨和爱人类的热情。在她

们的日记中，有着这样的句子：

妈妈用眼泪吻别了她出征的女儿，但女儿的心却是多么愉快，多么喜欢看见她那一刻的眼泪呀！因为这正是为了不再重见她那永远流不完的灾难的泪，——象我童年所见到的。

从此，她们便英勇地走上医疗战线，每次出发时都庄严地向祖国宣誓：

“为伤病员，愿贡献出自己的生命！”

“抢救伤病员！牺牲流血在所不惜！”

“在任何危机情况下，决不丢掉一个伤病员！”

“誓与伤病员同生共死！”

她们坚决执行着这神圣的誓言，不容许任何侵犯。

她们之中，大多数是青年团员，十五六岁的居多，最大的也不过十八岁。她们的年纪虽小，却超乎常情地完成了不知多少艰巨的任务，创造了不知多少惊人的奇迹。当抢运伤员时，为了尽早地使伤员脱离险境，她们从不估计自己的体力，用她们那幼小的身子，奋勇地背着伤员进入车厢，尽管敌机在空中盘旋甚至投弹或扫射，她们决不逃避。爱护伤员的热情增加了她们神奇的力，“与伤病员同生共死”的誓言时刻地鼓舞着她们的勇气。于是，多少动人的故事被她们创造出来了。

十七岁的小林，是一个体质不太健康的女孩子，瘦削苍

白的面孔，一双坚定而敏慧的眼睛，平常连一个简单的行李都背不上车那样软弱。可是一到抬背伤员时，却象生龙活虎一样。同志们的劝告和关怀，她都不接受，因为当她看见负伤的勇士在受着敌机威胁时，她便无法顾及自己的体力了。有一次，她竟因连背五个伤员而昏倒了，但不多久，却又被敌机投下的炸弹声震醒，于是，她又不顾一切地奔下车去，继续抢救了两个在敌机威胁下的朝鲜同志，直到伤病员全部睡在车上，她竟又昏厥过去。

刚入党不久的十八岁的小郭，个子很矮，不爱说话，在一次抢救伤员中把脚腕跌伤，只要伤足轻轻触地，就发着剧痛，一个星期以后，脚尖刚能着地，可是当任务来到时，她却又照常地积极地背着伤员上车了。在那刺骨的寒风中，她痛得汗象雨一样地流。

这不过是千百件英勇事迹当中的片断，在她们看来已经算不了什么奇迹，因为这样的行动早已成为她们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了。

由于她们崇高的品质和英雄式的行为的感动，多少被背的伤病员的泪，从她们头顶流下，和她们的汗悄悄地合流在一起，她们光荣的发辫上更不知留下了多少英雄的感激泪痕。好多伤病员都从后方医院写来慰问的信，她们不但赢得了无限的光荣和尊敬，更鼓舞了荣军的士气。

“伤好之后，一定回到前方多打胜仗来报答你们。”

这差不多是每封来信必须表示的决心。

什么力量鼓舞着她们创造下那么多光荣的事迹呢？这只

要再看看她们战斗的口号就明白了：

“多抢救一个伤病员，就是多保存一份战斗力量！”

勇敢的战斗，是为了祖国，祖国给她们以无限的力量和勇气。当列车满载了人民的功臣、排除了一切困难进入祖国大地时，整个车厢都沸腾起歌颂祖国的歌声：

**“我们的祖国辽阔广大
……”**

有着这样优秀的英雄的年轻一代，值得每个祖国人民骄傲，毛泽东时代的中华儿女，永远是和平与胜利的象征，生命力的泉源。生在这个大时代的我们，是光荣而幸福的。

向普天下的父母控诉

朝鲜的五月，是个最美丽的季节：红色的杜鹃花，丛生在碧绿的松林里，满山遍野，鲜艳夺目，每一座山都被装饰得象花坛一样。它们迎着五月的太阳，展开着幸福的笑脸。山角下，清澈的溪水悠闲地流着，小溪边，盛开着的黄色迎春花和夹竹桃亲密地拥抱着在一起，照在溪水里的倒影，越发增添了它们的美丽。

解放后和平的日子里，朝鲜幸福的儿童们，在祖国和煦的阳光照耀下，不是比野生的鲜花更自由更美丽吗？他们沉浸在学习与嬉戏的小心灵，又怎能想到和平的人间还会有什么暴力和骚扰来破坏他们的幸福？更怎能想到会从遥远的美洲，闯来人形的野兽来残害他们的生命？两年来，朝鲜的鲜花，又曾几度开放了，而朝鲜儿童的安宁与幸福，却已被强盗侵袭了！

自从美国强盗侵入和平的朝鲜以后，我曾几次踏上这曾被蹂躏的土地。乘着人类的正义和良心，即使是铁石的心肠也不能不被激起仇恨之火。美帝国主义者的人形野兽给朝鲜儿童深重的灾难是数不尽说不完的！为了受难的孩子，我不

知流过多少眼泪，那些用血、用爱、用无比仇恨凝成的眼泪，该是代表着亿万颗慈母的心。

今天，在国际保卫儿童大会发出了保卫儿童的庄严号召之后，我以一个做母亲的身分，把悲愤的回忆，变成抗议的呼声，用来纪念今年的国际儿童节，该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儿童是人类最美丽的花，是宇宙间最可爱的幼苗。普天下的父母们，有谁不爱儿女胜过自己的生命？有谁忍心使自己的儿女遭受暴雨狂风的摧折？可是，自称“文明”、“博爱”的美国大盗，竟灭绝人性地造下了滔天罪孽，千万个无罪的朝鲜儿童在他们的血手中断送了可爱的生命，千万个美丽的朝鲜儿童在他们的摧残下变成了可怜的残废，更有千万个幸福的朝鲜儿童在他们的暴行下沦为无父无母的孤儿。只要举几个极平常的例子，就足以构成敌人万世不赦的罪了。请看看下面血的事实吧：

黄海道：在敌人占领了仅仅两天的一个村子里，就有七十多个不屈服的母亲被逮捕后关在一间仓库里，于是，她们立刻失掉了她们的孩子，当孩子们挣扎嚎哭在野兽的血爪中时，母亲们便带着孩子们求救的呼声同仓库一齐火葬了。没有人性的野兽们为了施刑取乐，却不把孩子们痛快处死，他们把七十多个孤儿扔进另一个仓库里，用孩子们的哀哭作为享乐的音乐，听饱了之后才发着狞笑走开了。

那正是数九寒天，黑暗冰冻的仓库，堆挤着七十多个无辜的孩子，只有不满方尺的一扇小窗，是唯一的光明，也是孩子们唯一逃生之路。求生的欲望驱使着孩子们争先恐后地

涌向窗子，抢到窗口的便拼命地钻，没有抢到窗口的只好用小手抓着墙壁，企图从墙壁上抓开一条生路。饥饿、寒冷和生的追求促使孩子们发狂般挣扎着。然而，窗口是那样小，墙壁是如此坚硬，冻僵了的稚嫩的小手又是多么软弱无力呀！当人民军解放了这个村庄赶来营救时，孩子们竟无一生存，他们不但身子完全僵硬，就连一具完整的小尸首也难找到了！在小窗口挤着血肉模糊压扁了的孩子的头，满墙根躺着孩子们折断的指头、指甲和小手。七十多个可怜的孩子就是这样被活活治死，那惨状谁忍目睹？天下父母的心呵，怎能不为之震痛！

在平壤，一个人民小学的体育场上，我曾凭吊了一座使人难忘的坟墓，那也正是敌人亿万罪行的铁证之一。

下课铃响了，该是游戏的时间，小学生三五成群，纷纷地跑向体育场。突然，敌机掠空而来了，它散播着死亡的吼声，斜展着不祥的翅膀低空盘旋着，显然是发现了这群天真的小生命，便很快地俯冲下来。有经验的孩子们正在准备逃避的时候，炸弹却已经接二连三地落下来了。转眼之间，体育场上弹坑累累，而在那几分钟以前还是嬉笑游玩的体育场上，再也找不见孩子们活泼的影子了。当我们去凭吊那个体育场时，没有一个人能够控制住悲愤的眼泪。

美帝国主义者美丽的朝鲜半岛上造下了数不尽的罪恶，到处遗留下斑斑的血迹。这不过是他们的亿万罪恶中随手拈来的两个例子而已。两年来，他们一分钟也没停止过杀人的伎俩，不惜用剖腹挖心、割舌挖眼来屠杀着儿童，连依

僵在母体中的胎儿也竟难逃毒手，有多少才具生命的婴胎被野兽们挑在刀尖上跳舞取乐呢！

我亲眼看见无数可爱的朝鲜儿童，在不懂事的年龄时便失掉了健康，不但面黄肌瘦，甚至缺肢少臂、变聋变瞎；我更亲眼看见无数可爱的朝鲜儿童，在战争中失掉了父母，毁掉了家园，在未及收容期间，他们忍饥受寒，流浪在旷野废墟中。

然而，朝鲜的儿童正象他们的父母一样勇敢顽强，富于极大的忍耐力，一切艰苦磨难都不能挫伤他们的锐气，一切暴力威胁都不能屈服他们的意志，他们越是锻炼越坚强，越战斗越有力量。我曾访问过一所孤儿院，那里面有一百多个孤儿过着比较幸运的生活。然而丧失了父母终归是不幸的，看着那些可爱的小脸，我的心头异样沉重。但使人感动的是，当我询问大约十岁左右一个男孩的父母死难的经过时，他却没有泪，也没有叹息，只是两眼越瞪越大，小手越握越紧，最后，突然出我意外地咬着嘴唇迸出了一句：“我们要战斗，为惨死的父母报仇！”在他身旁的一个大一点的孩子马上接着宣誓了：“我们要和平，消灭敌人和刽子手！”这两个口号立刻在所有孩子的心灵上起了共鸣，他们一致愤怒地高呼：“我们要和平，消灭杀人的刽子手！”“我们要战斗，为惨死的父母报仇！”小铁拳森林似地竖起来了。这该是多么激动人心的场面呵，我为这群可敬可爱的孤儿们感动得呆住了。事情已经过去一年，而孩子们的声音面貌仿佛还在我的耳边眼前一样。

是的，在苦难与战斗中成长的朝鲜儿童，是勇敢而顽强的，一些较大的儿童，不是正以全生命在保卫祖国的事业中英勇地战斗着、创造着惊人的奇迹吗？在平壤，我曾经看过根据真人真事拍制而成的故事片《少年游击队》，那正是今日朝鲜儿童英雄的典型，他们那种机智、勇敢和临刑不屈的精神，令人永远不能忘记。

在某地（恕我不便讲出人名和地址），神话似地流传着一个动人的故事：一个九岁的小女孩自动地做了我军的侦察员，她经常跑到敌区为我军侦察敌情，竟没有一次不完成任务的。她的家原在南朝鲜，父母被杀之后，她便到北朝鲜来了。可惜关于这个女孩，我知道得太晚，竟没有来得及去看看她。

由于热爱祖国、热爱和平，朝鲜儿童更热爱中国人民志愿军。有不少孤儿一跑到志愿军里，就象回到了家一样，怎样也不肯离开，我们有些同志就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收养了这样的孤儿。某军陈主任收养的柳再生才九岁。那天，在娱乐晚会上，我抱着他看文工团的演出，当全场观众都面向舞台鼓掌欢呼的时候，他的视线却只盯注着一个相反的方向，两只大眼睛放射着仇恨、怀疑的光芒，孩子的表情显得是那样的成熟而深沉，我想他一定是陷在什么思索或回忆里了。我诧异地问他：

“再生，你看什么呀？”

“他们是美国鬼子吗？”他满含愤怒地把小下巴向来宾席一扬说。

我恍然大悟了，原来他所注意的是被请来观剧的两个外

国朋友——阿兰和贝却敌呵。我笑着告诉他：

“不，他们是我们的朋友，是反对美国鬼子的。”

孩子立刻高兴地笑了，随即用友谊热爱的眼光看了对方半天才安心看剧，那眼光里似乎也含蕴着无限的歉意呢。

志愿军经常舍身抢救朝鲜儿童的故事，在儿童们幼小的心灵上铭刻了深刻印象。志愿军这一崇高的名词，给予他们以深深的感念。

当志愿军的队伍经过每个村庄时，孩子们总是最热烈的欢迎者。有一次，我们坐着车经过一个小镇时，已是深夜，离我们一箭远的大道上，突然出现了一大群朝鲜孩子，他们岔开两腿，立在路当中向我们招手高呼。我们原以为这只是孩子们的恶作剧，便没有叫司机停车，但怕碰伤孩子，只得把速度放慢。当车子缓缓地经过他们的身旁以后，又加速度地开走了。在淡淡的月色下，在我们的车子上，忽然发现几束盛开的杜鹃花。事后我们都很后悔，为什么没有停车接受孩子们的热情和敬意呢？后来，我把孩子们献的花摘下了几枝，压在小本子里，留下了一个珍贵的纪念。

是这样一些可爱的孩子呵！那些无耻的灾难制造者，还在企图把数不尽的灾难扩大到全世界，假如容忍这种屠杀的疯狂，全世界的孩子们都将陷入痛苦的深渊。看看朝鲜儿童的苦难，再看看苏联与人民民主国家儿童的幸福，越发感到和平的可贵以及做父母所应负担的重任。普天下父母的心只有一个：制止侵略战争，争取持久和平，以保卫儿子的幸福和生存。我们要以最大的努力来实现这个心愿。

和平，人类的母亲！

和平，人类的母亲！你美丽、神圣的名字，被每个人——除了一小撮战争贩子外——热爱和歌颂着。因为，你和每个人的命运是紧紧相联的。你象征着幸福和希望，你蕴藏着人类最美好的理想，你正象空气和水一样，人人都需要你；没有你，人们的生存和安全就要受到威胁。人类的命运系于你，人类的理想也系于你。这就是为什么你被全世界人民敬爱和你的名字响遍全世界的道理；这就是为什么人人都渴望着你、人人都张开追求的手臂召唤着你的道理；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的和平使者不惜远涉重洋跨越过万水千山，那么多的和平勇士冲过千难万阻，不顾野蛮的迫害，赶来出席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集会的道理。

十月的北京，多红火呀！这座全世界人民都瞩目的城，是胜利的化身，是和平的象征。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三十七个国家派遣了他们的优秀代表来参加为人类造福的崇高事业——伟大的和平奠基礼。可敬的勇士们，他们每个人都怀着一颗善良的心和光明的志愿，带着十六亿人民托付给他们的神圣使命，满怀热情和正义走进东方和平的圣地——雄伟的

北京城。

在这座城里，在国庆节日，和平战士们以惊奇、欢欣和钦佩的眼睛看见了新中国三年来的非凡成就，看见了五十万胜利的人民检阅的无敌阵容。

“今天在这儿所看到的一切，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有着象他们这样的保卫者，要想剥夺亚洲的自由是决不可能的！”

是的，这是个和平大示威，这是给侵略者的严重警告，这是中国人民对自己的命运、对和平的骄傲保证。你看那：庄严而壮大的陆海军的阵式；勤劳淳朴的工农的庞大队伍；文艺大军不朽业绩的记录；体育家们矫健的步子和棕色的皮肤；还有成千上万系着红领巾的少年先锋队员们幸福天真的笑脸，……怎能不叫人从心里爱慕、从心里尊敬呢！

看吧，当这支胜利的队伍经过天安门的时候，欢声和光芒便汇成了一片愉快的海洋；几十万只热情的手臂伸向天安门，几十万道狂喜的目光汇向天安门，千万面鲜艳悦目的彩旗飘向天安门，千万束万紫千红的鲜花挥向天安门，千万只象征和平的鸽子飞向天安门……所有这一切，都一齐向天安门欢呼致敬。因为，在那金碧辉煌的天安门上，在那灿烂阳光照耀之下，站着胜利的舵手——我们伟大的中国人民领袖毛主席；站着他的亲密战友们；站着保卫和平、抵御侵略的战斗英雄们；站着建设世界、创造幸福的功臣们；还站着从远道而来参加盛典的边疆各民族代表和我们最亲爱的国际友人——为和平而奔走呼号的和平战士们。

在观礼台上，来自四十多个国家的我们的和平战友们，被这热烈的情景激动着，也情不自禁地伸出热爱的手臂，向着天安门，向着毛主席，向着我们勇敢勤劳的人民，向着和平的北京城，高声祝贺，欢呼万岁！

“三年，才仅仅三年哪！”惊奇和赞慕，是对我们英明的领袖、对我们智慧的人民最真诚的歌颂，这也正是我们难忘的光荣。

十月的北京，多火红呵！这里有：最热烈的欢呼，最真挚的祝福，最诚恳的赞颂和最嘹亮的歌声，以及那最美丽的鲜花，最愉快的颜色，最自由的人民和最幸福的孩子们。这一切缀成了个光辉的世界，到处洋溢着青春和喜悦；这一切结成了无敌的力量和智慧；这一切都给出席和平会议的友人们增添了胜利的信心。他们之中竟有很多人，兴奋得和我们的人民，在那霞光万道的天安门广场上，在那红星明灯的夜空之下，高歌狂舞直到次日黎明。

“争取和平，拥护和平，保卫和平！”

“反对战争，制止战争，消灭战争！”

和平，和平，你是人类的母亲，你是最动听的歌声，人人都热爱和欢迎你！

战争，战争，你是人类的仇敌，你是最凶恶的毒虫，人人都对你切齿痛恨！

共同的愿望和共同的斗争，加深了各国人民间的友谊和了解，更缩短了高山大海的距离。智利代表阿迈斯脱说，他们祖国的教师告诉学生：“中国在地球上最远的极端。”但

他们在这个国家里却完全象在家里一样，他们觉得他们和中国人民已经是老朋友了，这正是每个与会代表共同感到的温暖。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就是飞越海洋的友爱声音的大合唱。这团结起来的歌声，将第一次唱出反抗距离、反抗侵略、反抗贪婪和破坏力量的歌曲……让海洋用它滔滔不绝的波涛把我们团结起来，消灭距离，在和平与创造的道路上使人类的文化互相接近。”智利诗人聂鲁达的预祝已经是超过预期地在这会场里出现了。

在这个会场里，绝没有民族间的歧视和怨恨，一个共同的愿望把人们联在一条战线上了。谁是朋友，谁是敌人，是分得一清二楚的。比如美国和朝鲜，法国和越南，英国和马来亚，双方的代表紧紧的握手和拥抱，他们相互友爱的眼光，以及从心里迸发出来的亲切的微笑和真挚的慰问，都使你认识了人民与人民之间不可动摇的深厚友情。

美帝国主义是战争的祸首，是人类共同的敌人。可是，在这次会议当中，自始至终都表现了界限分明：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朋友和敌人。这深深感动了美国代表：“这样分清界限，使我们感到有了希望。”

“我们美国人民，赞美勇敢，憎恨残暴。”美国代表团把一株碧绿的常青树，用友谊的手献给在艰苦战斗中的朝鲜朋友，情真意挚地说，“我们请求你们把这株小树种在朝鲜的土地上。愿这棵小树象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一样成长，愿这棵小树和受着阳光与雨露滋长的生命的绿叶一起常青，用

它的绿叶，在安全、美好与和平的环境中，庇护着你们的子子孙孙。”这是美国人民的声音，人类无比崇高的友情。

日本帝国主义曾经使亚洲许多民族遭受战争和奴役的灾害。在日本人民代表的发言里，曾一再地声明他们没能制止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所应负的责任。他们是那样地诚恳和谦虚，你无论在什么地方和他们相遇，他们都亲切地向你点头微笑，那微笑流露着日本人民与亚洲人民间永远的友情。

这真是一座友爱的大花园，各色的鲜花向着和平的阳光怒放。人民的友谊比海还深，和平的愿望，把人民的心紧密地串连在一起，任何暴力也无法把它割断。

和平的路又长、又崎岖，但和平的大军会用自己的脚把它很快地踏平。当他变成一条平坦大道的时候，人民将在那条庄严的路口上竖起一块神圣的警牌：“战争与罪恶，禁止通行！”这个成功的会议，已经充分地做了这样的准备。

假如你参加了这次会议，你就无法控制你心灵的激动；假如你参加了这次会议，你就不能不沉浸于最大的欢快里。特别是你作为一个中国的人民，你会深深地感到光荣，感到骄傲——祖国的光荣和骄傲。在这个会场里，我们亲爱的祖国，被称为东方和平的灯塔、希望的信号，被称为斗争的榜样、胜利的号角。我们亲爱的领袖毛泽东，被称为亚洲复兴之父、希望的象征，“他鼓舞着全世界千百万颗绝望的心。”

代表们认为这次大会的成功，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新中

国，有了这样的北京，有了这样可敬爱的人民。甚至有人认为一篇有关和平的演说，如果没有对处在战争迷雾中的亚洲大陆上和平的灯塔——强大的中国人民致敬的话，就不能算作一篇完整的演说。

社会主义的方向就是世界人民奋斗的方向。在这和平会场里，世界和平的堡垒，拥获一切和平进步和美好事物的旗手——苏联，比春天的太阳还要温暖，它哺育着所有的理想和希望，使人们确信任何美好的事物都能够在它的扶植下成长。

英雄的朝鲜是亚洲多难的民族。在这和平会场里，它时刻接触的是同情的眼睛和关怀的心，各国人民给它的斗争献出了全力的支持，它在最高的尊崇和荣誉照耀之下，显得更坚强，更勇敢，更有胜利的希望。它那不可凌辱的意志，在骄傲地放射着不熄的光芒。

在北朝鲜那块不屈的土地上，我们最可爱的中朝人民军队，当他们在炮声间歇的空隙里，当他们在占领敌阵凯旋的时刻中，他们会听到从和平之城遥寄给他们的感激和赞颂——那诗一样的感激和赞颂：

“我们向那些高举着自由、和平和正义的火炬的勇敢的人致敬，向那些在朝鲜争取自由的无畏战士致敬……我深深感觉到我们应该如何感谢他们，他们是多么勇敢地牺牲自己去压制美国战魔血腥的欲望，为的是使我们的孩子们能够享受到他们孩子们被残酷地剥夺的和平果实。让他们从下面的事实中得到希望吧，那就是：在一个遥远的国土，有很多的

母亲，她们的慈母之心，正在为他们祈祷，把他们不但是看作朝鲜的救主，而且是全人类的救主。”

几百只勇敢的手高高举起，几百个响亮的喉咙唱出和平的歌声。他们决心不让他们的士兵穿上美国的军靴玷污朝鲜神圣的国土，为了消灭人类的掠夺和残杀，誓必力争和平！这就是和平使者的宣誓，它代表的是十六亿人民的意志。在初冬寒风里浴血战斗的中朝勇士们，这热烈的拥戴，这坚决的保证，将会使你们在严冬白雪逼近的时候也感到温暖吧！

在十月的北京，在新建的一座友谊的桃园里，和平的园丁遍撒下颗粒饱满的种子。不久，就会长出茁壮的苗，开放、鲜艳的花，结下丰硕的果实。到春暖花开的时候，就将有满园的鲜花展开她们和平的笑靥来庆祝和平的大进军。

和平园丁们已经初步完成了他们耕耘的任务，当他们离开和平之城时，他们将满载着亚洲人们的丰收的心愿、合作的友情和庄严的决议胜利归去。从此，和平的歌曲将更响亮地唱遍全世界。正在斗争的人们将会获得新的力量，动摇的人们将会因而坚定，被蒙蔽的人们也会从此清醒。而那批疯狂破坏和平秩序的罪犯，必将被人民的巨掌推进万世不拔的深渊，葬身在和平的怒浪里。

可敬的和平使者们，你们的责任是如此重大，你们的工作是如此艰辛，愿你们多多保重，平安无恙，勇往直前地走上光荣的岗位。在此，谨向你们伸出友谊的手，请接受这崇高的敬意和亲切的祝福吧！

1952年10月

我要歌颂她们

“我可以自豪地讲一句：朝鲜妇女是英雄的妇女！”金日成将军满怀自信地对我们说。他那嘴角上、眼角上展现着的微笑，是流露着多么崇高的民族自豪。正象一个母亲谈到她可爱的儿女时那种母亲的骄傲一样。我想，这不正是领袖的骄傲吗？

我们伟大的人民志愿军领袖彭德怀司令员也曾恳切地指示过我们：

“朝鲜民族是一个富于斗争精神的勇敢的民族。他们具备着中华民族的优点——勤劳朴素、英勇顽强、有着高度的民族自觉和最大的忍耐力，特别是妇女。”他着重地说，“我们的作家，应该很好地歌颂她们。”

是的，我们应该很好地歌颂她们，正象歌颂我们伟大祖国的英雄姊妹们一样。可是，每当我提起笔的时候，便深深地感到我缺乏的是清新有力的语言，又怎能把她们的喜悦、新鲜、美丽、健康的形象描绘得恰如其分呢？

但，不管怎样，我还是要歌颂她们的。

没有到过朝鲜的人，很难想象到两年来的朝鲜变成了怎

样惊人的凄惨，朝鲜人民过着怎样苦难的日子。和平居民的鲜血染红了被侮辱的土地；烈士的白骨掩埋在寸草不留的废墟上；在那些瓦砾堆中，你可以随便翻到孩子的残肢和女人的头发。美国空中强盗在朝鲜天空不断地逞凶，撒下罪恶的种子，他们血淋淋的魔爪，每分钟都在制造着人类的灾难。在朝鲜半岛上，你几乎找不到一个完整的家庭和一个没有丧失亲人的妇女，“一家团聚”那个美丽幸福的词句，在她们听来，是多么稀罕，多么珍贵呵！

可是呵，你简直无法相信，她们的遭遇尽管如此悲惨，生活尽管如此艰苦，而象“凄惨”、“悲哀”和“辛酸”……这一类消极的字眼，是不能随便安在她们头上的，虽然你是出于同情和怜恤。在我和她们的交往当中，她们一点都没给过我那样感觉。

去年五月，国际妇女调查团到达北朝鲜时，到处受到朝鲜姊妹们的热烈欢迎。她们穿着节日的服装，捧着用彩绸做的鲜花，在洁白的月夜里，排成几个长长的行列，迎接着来自十七个国家主持正义和人道的朋友们。那一片战斗的歌声，竟淹没了空中敌机的吼叫。她们愉快的欢呼，响彻山谷，简直使人幻觉到这不是在战争蹂躏的土地上，而是和平幸福国家的人民在庆祝着什么盛大的节日！

按照一般人情的想象，这些灾难深重的不幸者，一定被悲哀折磨得挺不起腰来了，抬不起头来了，为了骨肉离散、田园破毁，必然是蓬头垢面，形容憔悴，过着流泪和叹息的日子，哪里还会有欢笑的心情呢？更怎会有打扮的兴致呢？

而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却完全是出人意料的景象。

看着她们那一个个埋在鲜花里的喜悦的脸，她们鲜艳的服装以及修饰得整齐的头发的，听着那健康的歌声和笑声，好多代表不禁吃惊了。后来接触多了，大家才领悟到：这原来正是朝鲜妇女的特点。她们在长期的苦难中，经过了千锤百炼，已经炼成了不屈的钢。她们之所以喜悦，正是因为相信自己的力量；她们之所以忍耐，正是因为对光辉的未来抱着热切的希望。

“朝鲜妇女是不流眼泪的，为什么呢？难道她们的眼泪都流干了吗？”我曾经这样想过。

有一个原籍南朝鲜的女性同盟委员长，她的父母、儿女、丈夫……一家十一口人统统被敌人杀掉了，而她却依然精神饱满地为和平而奋斗不息。在她那副沉静的面孔上，一点都找不出气馁的表情，我也没有看见她滴过一颗泪水呀。

这绝不是个别的现象。在我碰到的很多朝鲜妇女，都有着类似的特点。当她们叙述着自己亲人惨死的情景时，虽然没有眼泪，也没有叹息，但在她们那愤怒的眼光里，却可以看出这样的决心：“这笔血债一定要欠债者用血来还！”当她们眼看着自己的家屋被敌机炸毁时，她们从不绝望地嚎哭，反而挺起坚强不屈的胸膛，把眼泪变成坚决的誓言：“强盗们，你们毁吧，你们毁了我的房子，却毁不了我顽强的意志，我将永远按照我自己的愿望安排我的生活。”就这样，在那荒漠的废墟上，一座座用断瓦残砖搭起来的小屋，又重新昂立在敌机虎视之下了。有一天，我们站在新义州文化宫

残破的屋顶上，曾经看见下面好多妇女、儿童正在一片瓦砾中辛勤愉快地建筑着一座美丽的花园。敌机在头上嗡嗡盘旋，他们却傲然而视，似乎在说：“看吧，这就是我们未来的美丽的远景……”

然而，朝鲜妇女真的不流眼泪吗？不，她们流的。当中国人民志愿军浩浩荡荡渡过鸭绿江时，她们流泪了；当中国人民志愿军抛头颅、洒热血解放了她们的乡土时，她们流泪了；当中国人民志愿军奋不顾身地抢救她们的生命财产时，她们流泪了；当中国人民志愿军帮助她们生产、节约粮食、救济她们的灾荒时，她们流泪了；当各兄弟国家给她们以无私的援助时，她们流泪了……她们的眼泪，只有在热情冲动、感激爱戴时才任它洒流的。有多少次，在她们亲热的拥抱中，我们友谊的泪流在一起而湿透了衣襟。

她们的性格是：既柔且刚；她们的感情是爱憎分明。她们懂得如何去爱她们的朋友，更知道怎样去恨她们的敌人。在朝鲜战场上，不但产生了很多志愿军爱民的故事，也流传着不少人民热爱志愿军的佳话。下面就是个最平常的例子。

一个寒风刺骨的早晨，在志愿军某重伤医院的洞子外边，徘徊着一个七十多岁的朝鲜老大娘，她持了一篮子新蒸的馍馍，焦急地等待着会见她的亲人。她告诉护士说：她昨天晚上才听到张万厚负伤转来的消息，便连夜磨了留作种子的麦子蒸了这一篮子馍馍。她一再要求：

“不让我见人，这馍馍总得替他留下呀！”

“不是不让你接见，赵大娘。”护士们都亲热地称呼着她，因为大家都熟识她，她就是不久前才从这里养好伤出院的赵德实老太太。“他的伤很重。在危险期中，任何人都不准接见的；至于这馍馍，你想他又怎么能够吃呢？”

赵大娘听说她的亲人生命危险，脸色立刻苍白了。她不安地徘徊了半天，才失望地挎着篮子离去。

就从那天起，赵大娘每天都要来一次。她在那冰冻的山路上，迎着严冬的冷风一跌一滑地走着，而每天都是带着失望和不安回去。

一个星期过去了，张万厚终于脱离了危险期，医院终于允许赵大娘接见了。她三步并成一步地冲进病房，一下子就扑到张万厚的床边。张万厚看见挎着馍馍、脚步蹒跚的赵大娘时，竟忘记了伤痛，感动得什么也忘了问，只紧紧搂着她的脖子叫道：“你真是我最好最好的朝鲜母亲！”赵大娘颤抖着声音说：“你才是我最好最好的中国儿子呢。”这时，她清楚地记起：敌人在撤退前如何毒打了她，而后把很多同胞一齐被活埋了；当志愿军赶来营救时，她已经是气息奄奄，四肢都被压伤了，战士张万厚把她抢救出来，立即不顾疲劳地背她到这个医院里，随后便去追赶队伍，想不到竟是这样巧……老大娘想到这里，不由得把张万厚拥抱得更紧，喃喃重复道：

“你才是我最好最好的中国儿子呢，最好的……”

善良的朝鲜妇女，是以女性的温存和母亲的慈爱去热爱自己的军队和朋友，同时却用勇敢坚决的行动去对付他们的

敌人。黄海道遂原郡女性同盟委员长李少女的行动，就是个具体例子。

在前年撤退期间，李少女没有随军撤退。一天，十七个敌兵来到她隐蔽的地方，命令她给做饭，她推说去借米，便乘机派人通知了游击队，为了拖延时间，她借来的不是米而是稻子。于是，她便坐在院子里故作忙碌地推呀磨呀，终于饭做好了，但还不见游击队的影子。不捉住敌人她绝不不甘心，她相信游击队一定会来的，可是，怎样再拖延几分钟呢？眼看敌人们快吃完饭了，她急中生智地走进厨房去，把墙上的一串干辣椒掠了下来，很敏捷地便磨成了粉末。她想：“捉不到你们也让你们吃点苦头！”当她走进屋时，敌人们正在狼吞虎咽地大吃大嚼着，她咬了咬嘴唇，用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把一大碗鲜红的辣椒面向敌人们的脸上狠命地掷去，于是，那些野兽们的眼睛沾上了那火辣辣的辣椒面。正在他们狼狈挣扎并企图报复时，游击队赶来了。十七个敌人一个也没有能够逃脱掉。

除此之外，更有无数的朝鲜女英雄、女劳动者，为了保全民族气节，为了严守机密，甚至为了抗拒野兽的凌辱，竟咬紧牙关，忍受着自己的丈夫惨遭杀戮，眼看着自己的儿女被挑死在敌人的刀尖上，而最后自己也成为无畏的烈士。成千上万的悲壮事迹，是足可写一部伟大的史诗了。

自从战争爆发以来，凡是没被杀害的青壮汉子，都英勇地走上了前线，留下来的，除了老弱残废，绝大多数是勤劳的妇女。因此，她们便成了后方生产的主要劳动力。敌机的

轰炸是疯狂的，在既无种子，又缺畜力和农具的条件下，妇女们英勇地提出了“用我们的力量保证生产”的口号。就这样，在军队和政府的人力物力帮助下，她们提前十五天完成了1951年的春耕任务，超额完成计划百分之一百零二。要不是洪水为灾，去年的收成会是很丰盛的。

界川郡劳动英雄金洛熙，是一个不大健康的十九岁的女孩子。她没有一点生产经验。可是当她的父亲被敌人惨杀后，却激起了她更高的爱国热情，决心要为“向前线多送一粒米”而斗争，结果，她不但完成了自己刨地四千坪的全部计划，还帮助无劳动力户刨了一万五千坪地，铡了马草六十吨，比她父亲生前多增产水稻二十九麻袋，终于实现了向金日成将军献出爱国米的心愿。

在工业生产战线上，同样也出现了不少劳动女英雄。但，不要忘了，她们是在怎样狂轰滥炸的威胁下，坚持着她们的生产的。在朝鲜的国营纺织厂，我们荣幸地会见了屡次获奖、曾出席国际纺织会议的缫丝英雄唐云实。她不过是个刚满二十岁的姑娘，却成了全国知名的英雄。在和平时期，她的生产量是百分之百；战争爆发后，加紧努力的结果，又超过和平时期生产量的百分之五十。她的生产能力是这样的惊人，可是当她向我们报告她的生产成绩时，却是那样的朴素、谦虚。她去年春天到过中国，她说：“中国的抗美援朝运动给我的教育和感动太深了，郝建秀同志的事迹给我们的帮助和鼓舞太大了。”

朝鲜妇女不但是生产战线上的英雄，同时也是保证运

输、支援前线不可少的动力。当你坐着车子，飞驶在那平坦的公路上时，你就不能不感激她们的一份劳绩。在那修浮桥、铺泥路的民工行列中，你可以经常看到她们活动的影子。她们挥动着最原始的工具，一锹一锹地铲着砂石，两只脚插在淤泥里，泥浆溅满了洁白的衣襟。那愉快的欢笑和不疲倦的歌声，会使你感到她们是无忧无虑的。然而，也许当她们劳动归去后，家中还没有下锅的米，甚至连一件换洗的衣服和一双多余的鞋子都没有啊！

经常是，你前一天曾经陷过车子的路，到第二天再从原路返回时，已经修得象柏油马路一样平滑。而那些修路的妇女们，当你的车子经过她们的身边时，她们更会向你招手欢呼，仿佛在显示着她们劳动的胜利，也祝你一路平安似的。

在人民军和志愿军的前沿阵地上，女医务人员、女文工团员自然是常来常往，而劳动妇女的足迹也是经常出现的。

当战斗激烈，供应困难的时期，妇女们为了保证战争的胜利，竟不避艰险地冒着敌机扫射穿越层层火网，从五六十里以外的后方，顶着上百斤的弹药送上火线，如果侥幸不死不伤，下去的时候便把伤员背回后方。在战争最艰苦的日子里，前沿的战士常常两三天吃不上饭。但敌占区的妇女们是不肯让保卫国土的勇士们挨饿的。她们宁愿自己不吃、不睡，也募集粮食连夜挑水磨而，偷偷制成一袋袋的打糕^①再偷偷地送上阵地。然而，穿过敌人的炮火是会有牺牲的。她们唯

^①用大米面做成的一种糕。

恐于粮送不到勇士们的口里，便有计划地组织起来。送一麻袋打糕，就要去五六个妇女，她们拉成一个保有相当距离的行列小心地前进，假如前边的一个倒下去了，后边的人马上扛过袋子，勇敢地冲向前去，假如第二个再倒下去，也没有关系，还有第三个、第四个……

在英勇战斗着的朝鲜半岛上，象这样可歌可泣的事迹，是到处都在传诵着，妇女英雄和民族烈士每天都在涌现着。妇女们已经成为一支不可战胜的杀敌力量。可惜我的记录不在手边，仅凭片断的记忆，是不足以描绘她们于万一的。

劳动勇敢的朝鲜姊妹们，的确无愧于英雄的称号。她们的优秀品质，是没法不叫人敬爱的。虽然我的歌颂远不如事实那样激动人心，但我还是要歌颂她们，因为，我永远要歌颂我所敬爱的。

亲爱的朝鲜英雄妇女们，我仅以一个姊妹和战友的身分，向你们致以最亲切的慰问和最崇高的敬礼！亲爱的姊妹们，更勇敢地战斗吧，你们的战斗永远不是孤立的。

1952年6月中旬

对战争的庄严宣判

维也纳——这座古老的音乐之城呵，至今，还没有从创伤中走向完整，也未能从震惊中恢复安宁，在她固有的美丽中还隐藏着生之焦虑，透露着斑斑疤痕。强盗的掠夺和仇杀还在继续着，在苦难的朝鲜半岛上，那每一颗罪恶的炸弹、细菌战、凝固汽油弹，都在提示着她未来的命运。多少年来，她没有自由，没有独立自由的权利，刚刚从门口赶走了恶犬，却又从窗户窜进了凶狼。七年来滞留不去、左右她的命运的，就是在朝鲜杀人放火的美国的狼子野心家们。在他的奴役之下，战争的阴云总是遮住维也纳半个天空，这又怎能不使人焦虑呢？

可是，值得骄傲呵，十二月的维也纳，却变成了一座光荣的城，变成了地球的中心。她勇敢地打开了和平的闸门，让千万股暖流流向她的心窝，迎着希望的浪花，她重新获得了光辉的生命。严冬又算得了什么呢。汹涌的暖流告示着：人类的春天，跟踵到来了。

十二月，虽然是地冻天寒，但冰雪却封不住高山和海洋，条条大路通往奥国的心脏。从亚洲、从非洲、从美洲、

从欧洲……从地球上每个最远的极端，开来了那么多的和平大军，高举着人民的大旗，冲破了维也纳的晨雾，唱出了人类朴素的真理。维也纳爱和平的男女，用最美丽的鲜花、最真挚的热情来欢迎他们的朋友们，他们用示威游行来支持这个正义行动。那绵延数里的火炬呵，照亮了维也纳阴霾的天空。看那一双接着一双的、骑在爸爸肩头上召唤和平孩子们的小手吧，看那些老太太眼里闪烁的泪光吧……这一切都在说明着一个真理——要自由、要和平的真理。就是这样一个真理把人们引到这里来了；是一个共同的责任和愿望把人们引到这里来了；是人类的嘱托、慈母的心愿，善和爱，幸福和理想把这些天南地北的人团结到一起来了。人们都是素不相识，各人有着各人的政治见解和信仰，可是大家一见面真象故友重逢似地喜悦呵，亲切的握手仿佛都不能表达感情和欢快了，吻呵、笑呵、跳呵，维也纳的音乐厅简直成了一个和谐友爱的大家庭。

“我觉得和我家里的人分开很久又重新见面了。不听话的孩子在家里放火，我们聚在一起来开家庭会议，研究如何管教这个孩子……”（埃及代表的话）

不，我们友爱的气氛倒象是一个家庭的聚会，但要管教的却绝不仅仅是一个“不听话的孩子”，而是一匹丧失人性的野兽，一个和平的大敌。他那喧宾夺主的恶癖，他那血腥的双手，已经使人类的尊严扫地，使世界蒙受了深重的灾难和耻辱。就在我们团结起来力图扑灭势将燎原的大火时，他却仍在拼命地制造着分裂。他唆使他的喽罗们、他的徒子徒

孙们，用尽各种阴谋诡计，公开和秘密地阻挠这个聚会，放出了各种流言蜚语，挑拨兄弟间的友谊，企图颠覆神圣的和平事业。怎能承认他是家庭的一员呢？

然而，一切阴谋破坏只能归于徒劳，和平力量已经团结成一条铁的长城，一双血手岂能撼动乾坤？恫吓与暴力斩不断爱和平的意志，牢狱和镣铐锁不住向往自由的心。终于，美国代表来了，英国代表来了，日本、意大利代表都来了，东西德更组织了一个统一代表团来了，泰国、菲律宾、冰岛……以及拉丁美洲、非洲，几乎所有殖民地代表都突破重围来到了。突尼斯代表竟在他十个战友被监禁的威胁下，只身赶到维也纳，他来的虽是一个人，但他一点也不孤独，当他那独胆勇士的英姿一在会场出现，便赢得了那么多同情和拥戴。

能来的都越过千难万阻赶来了，实在不能来的呢，也想尽办法给大会带来了他们的声音和心音。“思想是不用签证就可以旅行的”（居里的话）。一本本要和平的签名册，千万封给大会的贺电，象鸽群一样地飞来；连希腊富士监狱的四百名被判死刑的和平战士，也给大会带来充满希望和信心的贺电：

在伟大的世界人民和平大会里，希腊战士的座位将不会是空的。假如仇恨之墙挡住了我们的去路，我们却早已把白鸽握在我们的手中。我们将把白鸽放出去，让她飞到大会，再从大会的天空飞到全世界，我们等待着白鸽带回你们的消息。团结在和平战士不可战胜的旗帜

下，有千万颗热情的心。我们的队伍和我们的力量是如何地壮大，我们已经准备好迎接我们伟大的胜利……我们沉着地记住我们祖国的创伤和我们人民的灾难，我们将毫不动摇地步随我们伟大的民族英雄所走过的道路！……诅咒战争，胜利是属于人民的！世界和平万岁！

这是生命的呼唤，是伏契克的精神。纵然他们可能不免一死，可是他们的声音将永远响彻人间，而暴力却是一钱不值的。（伏契克的夫人也来了，她引伏契克的话提醒大家：“人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可要警惕呵。”）

在会场上，我欣喜地遇到了西德代表黎莉·瓦赫特。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回忆着在朝鲜那些共同战斗的珍贵的日子，那宝石一样的友情，我们真是说不出地亲热呵。别后一年半，她显得苍老多了，她怎能不苍老呢？从朝鲜一回到西德，立刻被监禁、审讯、迫害所折磨，因为她向人民说出了美军在朝鲜暴行的全部真实。可是如今她却又在为和平而奋斗不顾身了。在八十五个国家，将近两千位代表中，象她这样情况的人是很不少的，住了一年多监狱刚获自由的巴西女代表布兰柯就是其中的一个。

人们为和平正在做着各种各样的奋斗，没有奋斗，是换不来胜利的。

当主席台宣布巴西代表麦德哈拉·约奎思突患心脏病而逝世的噩耗时，多少人流了眼泪呵。认识他的人实在没有几个，而流泪的人却是那么多。人们为他那忘我的精神感动

了。这是和平的友情。他年纪大了，经过了千辛万苦在大会开幕前一刻才赶到维也纳，早已精疲力竭，人们劝他休息，他却坚持参加了开幕式，从此，他便和人们永别了。他给大会留下了不仅是沉痛的记忆，还有深切的鼓舞。人们一想到为和平而死的巴西老人，什么疲劳全忘了。

信任就是勇气，就是和平力量的保证，相互信任才能产生友爱和谅解。既然朝鲜人和美国人，越南人和法国人，马来亚人和英国人能够谈心和拥抱，这不说明人民永远是互相友爱的吗？在这个大厅里，仇视是不存在的，猜忌也已消除了。

德国神学院的宾德尔女士说：“马克思主义给人类以尊严，经过了列宁、斯大林的发展，在世界上得到了凯旋。所以她认为基督教不应该反对‘共产党宣言’，而且应该研究它。”

不能要求法国资产阶级颓废主义作家萨特和阿拉伯贡的思想立场一致。可是萨特对有着无上权威的人民中国不被联合国尊重，表示着愤慨万分。他相信两个制度的和平共处是可能的，因此他主张与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友好相处，他并高呼：“我们不要屈辱的和平，我们不要奴隶的和平！”

在联合国根据提案无理通过了朝鲜问题决议案以后，印度执政党——国大党的党员克其鲁博士，却毫不动摇地坚持了印度人民的主张，也是他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上的主张：“立即停止朝鲜的军事行动，根据国际公法全部遣返战俘。”在中印代表的联欢会上，他的话也是很动人的，他说：“印度人民永远不会成为那些要使亚洲人打亚洲人的

牺牲者。”

人们对和平力量怀抱着如此强大的信心，一向只信任上帝权威的人，也确切地相信了：人民有力量用和平的手把自己解放出来，和平的力量是可以肃清罪恶的战争的。因此，英国基督教牧师草拟了一个和平宣言，号召所有宗教信仰者在宣言上签名，签名的踊跃，也正是大会最热烈的场面之一。

中国举办的美国政府细菌战罪行展览会，使原来不相信人类会堕落到那种程度的人也确信了：细菌武器千真万确地被美军使用了。这是中国对和平的重大贡献之一，因为这种相信，将使美国战犯完全失掉世界舆论的支持。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控诉，是强有力的抗议。先不谈正处在战争灾难中的国家，听听那些殖民地的呼声吧：

哥伦比亚的农民领袖被监禁了两年之后，在1952年11月9日被杀了，仅仅因为他参加了华沙的和平大会。六年来，他们已有十万爱国者被杀，三十万被放逐离开祖国。和平工业变成了战争工业，外来的生活方式强迫人民接受……

阿尔及利亚在法国的战争“英雄”统治之下，一百七十万儿童流浪街头。他们没有自己的文化，人民中百分之九十五是文盲。十二万人中才有一个医生。征兵已达到回教徒里面了……

巴拉圭刚盖好一个生物学院，竟交给美军作兵营了。有一对青年结婚没有向警察报告，竟被送进了监牢……

埃及名义上是独立的，实际是被全副武装的英军占领着。“他们说埃及是战略要点，把我们做第一道防线，挡住

敌人。天晓得谁是敌人！”

菲律宾已成为美国廉价原料的供应者，七千个岛屿，没有一个为人民自己的。自从美国宣布菲律宾独立以来，美国已经在这个所谓独立的国家里建立了二十三个军事基地。

还有叙利亚、智利、苏丹、南非……许许多多的血泪控诉，象受了欺凌的孩子见了母亲诉苦似的，是那样痛切真诚。然而，他们虽属弱小，却已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殖民者到处遭到了抵抗。和平力量也就在这种抵抗中日益壮大起来。

这就是这些国家的代表为什么来到维也纳的缘故，也就是为什么能够来到维也纳的缘故。

希腊代表还讲了一个“两班希腊士兵夜袭美军炮兵参谋部，杀死杀伤美军官兵五十多名”的斗争故事。这小小的例子，生动地告诉敌人：人民是永远也不会屈服的。

战争使母亲产生痛苦和眼泪。母亲有延续人类的责任，就更不能容忍非人性的暴行。看看朝鲜母亲金英秀眼中明澈的泪水吧：

“你们可知道，就在你们这里开会的同时，你们的孩子正在仇杀我们的孩子！你们为什么把你们亲手教养出来的孩子派到朝鲜去做强盗呢？你们为什么用你们的爱情换取华尔街的美元，使你们的丈夫变成恶魔去送死呢？由于你们丈夫和儿子的罪恶，多少个朝鲜妇女变成了寡妇！你们能够容忍你们亲爱的丈夫和儿子的脸上永远印上刽子手可耻的烙印吗？”

在座的美国母亲、英国母亲、加拿大母亲……好多个母亲的眼里闪耀着同样明澈泪水。坐在我不远的一个英国老太太竟至泣不成声！她们的泪水似乎在回答：不能容忍，坚决地不能容忍。

“如果你们热爱幸福自由的话，就赶快召回你们的丈夫和儿子，以免遭到朝鲜妇女同样的灾难！”

义正词严的指责和控诉，使整个大厅的啜泣声融成一片。作家的心灵被深深激动了，当阿拉贡发言时，他的感情还不能平静。他说：

“我衷心请你们在讨论中，经常想起朝鲜代表的眼泪吧，在这样的眼泪面前，是不是还有什么分歧呢？”

是的，没有分歧。在有关和平的问题上永远都是一致的。美国代表庄严而沉痛地告诉大家：美国人民已经觉醒了！他们坚决支持一个简单的呼吁：“把战争的幕拉下来，把和平的幕揭开。当枪炮停止发言的时候，谈判就会变得容易些。停火吧，停下来听一听人民是怎样地呼声，不要蒙住我们的耳朵，听一听，人们一方面向我们挑战，一方面伸出了友谊的手，挑战者要看一看我们有没有力量停止战争。”他坚决地说，“人民有权利改变他们的政府的。”

美国妇女赶制了上千朵美丽的和平之花，带给各国的姊妹们。她们用花儿代替了他们渴望和平的千言万语。美国代表当中，竟有三分之二是爱和平的妇女。

兄弟般友好的会议，是奠定和平的基石。全体一致表决的结果，也许会引起诧异。但，这个会确是绝对空前的。和

平的语言已经成为人类最典型的语言。和平的声音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响亮的声音。“即使美国同意‘负起统治世界的担子’，世界人民也决不会同意负起奴隶的担子。”爱伦堡给大会做了非常真实的预言。他的发言就是一首最伟大最美丽的诗。有才能的诗人会为它写一首颂歌的。

只要参加了这次大会，就一辈子也忘不了那种民主、团结的气氛，忘不了那种热烈友好的情景。当考涅楚克发言以后（必须提一提，他的发言有如一柄锐利的匕首，一直刺进敌人的心窝），当宋庆龄发言以后，当爱伦堡、郭沫若以及朝鲜代表发言以后，你听吧，欢呼和鼓掌简直快天翻地覆了。这可以清楚地看到：人民的心倾向着什么，热爱着谁。当全体投票一致通过大会两个中心文件后，真是纸花飘扬，头巾飞舞呵，每一只手臂都牵起来了，跳呵、唱呵、欢呼呵，……纵有一百支笔也写不完那种狂欢的景象。就让我用西德老人维尔斯的话代替我累赘的描述吧：

“三十年前，我在这座大厅里听过贝多芬的交响乐。今天，假如有人不为这强有力的贝多芬合唱而深受感动，那他就是没有人心！”

一切贝多芬的音乐，都是崇高愿望的歌颂。让我们诅咒战争，宣扬和平，赞美生活的欢乐吧。让我们互相尊重，互相信赖，永远友爱吧。和平一定战胜战争，生命一定战胜死亡，和平就是太阳，太阳是永远不会停止发光的。

1953年1月

心 连 着 心

六月的鲜花，美化了丹麦的京城。世界妇女的伟大集会，赋予了哥本哈根从未有过的光荣。那座古老的大厅，被丹麦朋友们劳动的手打扮得好象一个美丽的新娘，她披了一身正义的盛装，骄傲地向全世界唱出了神圣不可侵犯的歌声。

歌声无比激昂，彩色无比新鲜。七十个国家的妇女，在不同的旗帜下，结成了一个和谐的整体，七十个国家的语言，在共同的意志下，融成了一个共同的声音：

“为了创造一个无愧于我们孩子的新世界，必须争取世界持久和平！”

这不仅是与会各国妇女的崇高理想，也代表着全体进步人类的朴素心愿。

和平就是真理，真理的太阳是永远不会停止发光的。在这个伟大的会场里，真理的光辉照亮着每一只善良的眼睛，和平的歌声激动着每一颗慈母的心灵。因为经验证明了，只有在和平的旗帜下，才有可能享受到妇女应享的权利；只有在和平的环境中，才有可能保证孩子们幸福的生活。当我们

一想到我们下一代的安全时，就不能不立刻联想起仍在进行着的对朝鲜、越南、马来亚的侵略战争。

人们把极大的关怀和最崇高的敬意特别献给了朝鲜的英雄姊妹们。她们和全国人民一起，站在为和平战争的最前哨，在那鲜血染红了的神圣土地上，在那白骨遍地的瓦砾堆中，用她们宝贵的生命，换取全人类的安全。灭绝人性的屠杀，丝毫都不能屈服她们顽强的斗志，虽然她们的苦难越来越重，而她们的精神却是越战越强。

因此，和平保卫者——英雄的朝鲜妇女，受到了最稀有的尊敬，她们也正是这个大会最瞩目的中心。人人都渴望着她们战斗的英姿在大会上出现，人人都渴望着听到她们勇敢的声音。谁都知道，她们已经暂别了在战火燃烧中的祖国，跋涉万里赶来出席这个空前的集会。在这个会场里，那么多带着亿万颗母亲的心意的、慰问朝鲜儿童的礼物在等着她们来接受，那么多热情的手臂在期待着拥抱来自英雄土地上的英雄姊妹们。英雄——这是一个多么高贵而美丽的名词呵！

然而，醉心于残暴与无耻的敌人，对她们却怀着无比的敌意和恐惧，正因为她们是反对残暴、创造和平的英雄典型。敌人害怕她们的英勇斗争的精神传染给正在为民族独立而斗争的各国妇女们。因此，她们来是来了，却得不到入境签证，她们和越南代表团一起被拒之于大会门外了。

和平的意志是用不到签证的，它可以飞渡过汹涌的海洋，它可以跨越险峻的高山，纵有千斤的铁锁也锁不住和平的大门，纵有万丈的高墙也挡不住正义的呼声。朝鲜代表团

终于来了！她们来的不是几人、几十人，而是整整的一个民族。听呵：

“朝鲜的姊妹们来和我们一起联欢了！”六号晚上，在哥本哈根皇宫剧院的舞台上，激情的丹麦朋友眼里闪着泪光向大家报告了这个动人的消息，每一个人都陷入了惊愕的静默中，每一颗心都为它而跳跃了。随着一阵雄壮的音乐，我们不约而同地肃然起立。四个服装整齐的丹麦姑娘踏着音乐的节拍，高举着朝鲜的国旗巍然地走进了剧场。我们的心由于真挚的敬爱而跳得更紧，我们的眼睛由于感动的喜悦而湿润了，我们的欢呼和掌声要超过春雷的轰鸣。它冲出了皇宫剧院的屋顶，划破了哥本哈根的夜空。让敌人发抖吧，你愚蠢的阻挠真是不值半文！

我们的心连着心，感情连着感情，爱和平的意志是相通的。看看每一只眼睛里感动的泪水吧，这绝不是无助的哀伤，更不是弱者的怜恤，而是悲愤的抗议！当它汇成一股巨流的时候，那力量是可以冲垮一切人为的阻碍的。

接着，越南和马来亚的国旗也来到了，我们以同样的热情和敬意欢迎了她们。

第二天下午，是一个盛大的示威游行。先不谈那种空前热烈的情景吧。就在游行后五六千人的游行大会上，就在那鲜花簇绕的主席台上，朝、越、马三面巨幅的国旗，又以同样的姿态出现了。它们是那样庄严静穆，仿佛带着胜利自豪与感激向欢迎的群众含笑答礼。七十个国家的代表，哥本哈根爱和平的男女，都为这激动人心的情景面流下了眼泪。

它们的到来，给大会增添了无限的光辉、鼓舞和支持。

六月的太阳温暖着和平战士的斗志，我们充满着胜利的信心，要在蔚蓝的天空下建设人类最美丽的乐园。朝鲜姊妹的不懈斗争，正是全世界妇女——特别是殖民地妇女的斗争榜样。我们要听她们的声音。

然而，那是可能的吗？回答是肯定的！

假如敌人承认二十世纪科学文明的话，他就不该做出那样蠢才的行动。朝鲜、越南、马来亚代表团虽然被阻于哥本哈根的门外，而她们战斗的声音竟居然到了世界妇女大会的会场。当主席台宣布这个喜讯时，整个会场都沸腾了，泪光模糊了每一双渴望的眼睛，许多代表在低低啜泣了。

召回儿子的英国侵朝士兵的母亲和一个战俘的妻子流露着极其诚挚的敬爱和歉意，高擎着朝鲜战斗的旗帜步上了庄严的主席台。随后，朝鲜代表的声音便从广播器中送出来了：

“在金日成将军领导下，我们时刻把武器握在手里，给敌人以严重打击……祖国用一切教养了我，祖国就是我的生命，我要为她付出一切牺牲……”

这就是朝鲜妇女不可征服的意志，它更坚定了每一个代表的斗争决心。

当广播器放送越南代表团发言的时候，是两位法国代表擎着越南的国旗，而台下的全体法国代表都肃然起敬地一直站到马来亚国旗出现在主席台上的时候。英法妇女的这一感人的行动，生动地说明了人民与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这就

是不可摧毁的和平的基石。

我曾经五次踏上朝鲜受难的土地，我们在战斗中已经结成了生死的友情。我国人民更派遣了他们的优秀儿女，正在保卫祖国一样，用鲜血和头颅保卫着朝鲜民族，保卫着全世界的和平。中朝人民的血肉联系，使我在大会期间，时刻都感到朝鲜代表就在我的身边；而在朝鲜妇女动人的声音里，在那面伟大的旗帜上，我仿佛又看到那些燃烧着废墟的城市和乡村，那些血肉模糊的朝鲜儿童的小尸体。仇恨的火焰正在有增无已。朝鲜妇女的劳动、勇敢、忍耐、镇定的品质，曾经给了我深刻的感染。现在，更感染了全世界的妇女，因为大会听到了她们的声音。她们虽然没能身临盛会，但，大会的声音，也必定会让她们听到的。

大会圆满地闭幕了。中国代表团在归返祖国的途中，路经民主柏林——就在那块和平建设的美丽土地上，很荣幸地和朝鲜、越南两代表团胜利地会师了。她们正在期待着大会的消息。

十六号那天，国际民主妇联书记处召集了一个隆重的会议，出席竟有二十四个国家的代表。看哪：

热烈的拥抱，亲切的握手，鲜花在笑声里放射着异彩，头巾在泪花中翩翩飞舞。各国代表们把最真挚的友情和最强烈的敬爱都献给了朝鲜和越南的姊妹们。中国代表团更完成了各国姊妹的委托，把那些充满了热情和关怀的慰问，把那些珍贵的礼品，都交给了朝鲜的母亲们。她们以一种光荣与感激的心情接受了各国姊妹们的敬意和献礼，更以兴奋、严

肃的心情倾听了国际民主妇联书记处的传达。她们最感到胜利的是，终于听到了大会的声音。朝鲜代表俞美玉的动人的答词，使所有听众都感动得哭了。

她原是一个普通的农妇。失掉人性的美军杀死了她整整一家人（十六口），就在遭受了这样的惨痛的不幸之后，由于她丰产支前的重大贡献，她荣获了两次国旗勋章，成为有名的劳动模范。

“我以一个丧失了所有亲人的妇女的名义向你们呼吁，”她激动地说，“和平是不会自己到来的，只有加强你们的斗争，这样的不幸才不致降落到你们的头上！”

各国代表在互道珍重声中结束了这个有意义的会见。不久，当朝鲜代表团回到祖国后，朝鲜全体妇女都将听到大会的声音。

亲爱的朝鲜英雄姊妹们，和平队伍是如此壮大，更勇敢地战斗吧，有着全世界千千万万妇女在做你们的后盾。

1953年6月20日于莫斯科

和平的音讯

六月初，当全世界妇女聚集在哥本哈根共商和平大计的时候，和平的曙光正在突破乌云，透出了可喜的微明，东方的天空，已是黎明时分了。那时候，正在为世界的和平与自己的权利而勇敢奋斗的各国妇女，唯一渴盼的就是来自板门店的消息——停战签字的喜讯。大家的眼睛注视着板门店的谈判会场，大家的耳朵倾听着板门店的声音。是的，板门店的谈判可以决定大半个世界的命运，人们的心，又怎能不为它紧紧吸引呢。

六月九日的早晨，大会已经进行到第五天了。当会议刚要开始的时候，突然，不知从哪送来了一个蒙胧的声音，似乎在说：“朝鲜停战签字了！”这只不过是一个蒙胧的声音而已，谁想，一块虚投的石子竟激起了大海的涟漪，一个涟漪紧接着一个涟漪，只一眨眼的工夫，便汇成了翻江的巨浪；狂欢的浪花，充溢了会场的一角，欢呼和掌声真象山洪爆发一样呵！而主席台上那一双双惊奇的眼睛，竟仿佛谁都没有看见。

怎么不打听打听消息的来源呢？怎么不问一问是真是假

呢？当时，谁也没有考虑到这一点，都认为：时势所趋，似乎已经不需要怀疑了。直到主席团的古久里夫人用全力制止这场无谓的欢腾，告诉大家这消息并不可靠之后，会场才安静下来。是一阵稀有的安静呵，多少人的心被失望的情绪占有了，从一些轻轻的吁叹声中，可以感觉到人们激动后的空虚。

当然，这喜讯并不是毫无来由的。当天下午就证明了：原来拖延了一年多的遣俘问题，六月八日在板门店达成了协议。能说这不是朝鲜停战的先声吗？

哥本哈根虽然只不过是世界上一个小小的角落，但在那里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却不仅代表了全世界的妇女，也代表着全世界的人民，大会的情绪，正是全世界人民的情绪呵。在那场过早的狂欢中，可以清楚地看见全世界的人民是如何地渴望着和平，而当和平的希期渺茫时，人们又是如何地失望和焦虑。假如六月十八日世界妇女大会还没闭幕的话，当李承晚用“释放”的名义无耻扣留二万七千名中朝战俘以阻挠停战的消息传到会场时，愤怒和抗议的呼声，怕会和九日的欢欣情绪同样地沸腾呢。

险恶的乌云竟蛮横地遮住了黎明的曙光；但爱光明的和风又把乌云吹散了。如今，在中朝人民努力之下，朝鲜停战终于实现了。东方西方和平的种子，在和平的阳光哺育中，已经冒出了青春的嫩芽，虽然，我们仍然不能放松丝毫的警惕，——这嫩芽还有被摧残的危险。可是呵，已经走到末路穷途的刽子手，确是大势已去，如果他还敢轻举妄动，必将

被和平的巨掌推下深渊的。

亲爱的各国姊妹们，你们翘首渴望的和平，你们奋力争取的和平，终于有了可喜的开端。我可以想象得出你们无比喜悦的心情，我仿佛看见了你们那由于激动而湿润的眼睛。歌唱吧，舞蹈吧，欢呼我们的胜利吧。假如我们此刻仍然聚集在哥本哈根，那将会有一场多么热烈的狂欢——比我们的大会闭幕式更为热烈的狂欢呵！

就在七月二十七日的早晨，就在朝鲜停战签字仪式的静静进行中，引起了我这并不遥远的回忆，我记起了世界妇女大会的热烈情景，那些善良而热情的笑脸，那些充满了勇敢与希望的眼睛，那些激昂慷慨的和平誓言……可敬的和平使者们，这次的和平奠基典礼，你们每个人不都起过一滴海水的作用吗？

告别了可爱的和平战友，我又踏上了征途。我真感到荣幸呵，刚刚出席了哥本哈根的伟大集会，竟又赶上了朝鲜停战签字的隆重仪式。现在，就让我向全世界爱和平的姊妹们报告一下签字时的情况吧。

板门店，不过是开城近郊一个小小的、连地图上都找不到的村庄，它在战争初期就被敌人摧毁了。如今，就在那块灾难的土地上，巍然屹立着一座崭新的大厅。这是开城人民在四天中创造的历史奇迹，这是开城人民智慧与血汗的结晶。几天来，人们围绕在它的周围，瞻仰着、歌颂着，用期待的眼光向它致敬。因为，谈判的双方，将在这座大厅里最后决定朝鲜的和平。

一个不平常的日子终于来到了。

庄严和肃静笼罩着板门店蔚蓝色的天空。中朝代表们展露着神圣不可侵犯的笑容。

敌方的记者们、工作人员们，仿佛为这崇高的气氛吓住了，他们今天竟是例外地安静，据说这是两年来在谈判历史上所没有过的安静。也许是三八线^①限制了他们的行动吧？在这个非凡的日子里，他们也只好遵守着划定的界限，没有敢子越轨一步。有几次，敌机也曾在会场的上空盘旋，似乎要有所行动，但终于没有敢于行动。

大厅里，更是稀有地严肃。参加仪式的双方人员，分坐在大厅的两侧，整齐安静地注视着正厅中签字的长桌。摄影记者们都集中在正厅对面的十二盏明亮的水银灯光下，调整着摄影机，在紧张地准备摄影工作。只有两个美国女记者，挎着两个相机，总是不肯安静，一会儿扭到东，一会儿扭到西，显得是那样轻薄，她们仿佛不是来拍照，而是来卖弄风情。只有当哈利逊垂首走进大厅时，她们才装腔作势地暂时地停止了扭动。

朝鲜时间十点整，隆重的仪式，便在庄严静默中开始了。

这是战争与和平的分水岭。这是行将载入史册的时刻呵。签字的仪式既隆重而又单纯。在这一刻里，签字的双方并没有进行任何交谈，只用笔在文件上写下了和平的保证。可

^① 签字那天，双方商定，以签字厅正中为界，厅右为敌方人员，厅左为我方人员，互不侵犯。

是，看看哈利逊的脸吧，是多么迫不得已而缺乏诚意呵。就在他的笔尖落到第一个文件的同时，敌人阵地不甘寂寞的野炮，竟突然地发出几声轰鸣，不知他们是在庆祝和平呢，还是用炮声代替侵略者失败的丧钟。也许，他们还企图在最后挣扎的时刻里捞回一点罪恶的血本吧？但这已经是来不及了，签字的仪式在十分钟后就宣告完成。南日将军完成了这个历史的使命，昂然地退出了大厅。哈利逊垂头丧气地悄然告退了。

从这一刻起，全世界注目已久的板门店，将成为东方的圣地，而这座胜利的签字大厅，也必然成为世界历史上的名迹。现在，它正载着满身荣誉，在骄傲地向全世界报告着和平的音讯——这是中朝人民用鲜血写下的和平音讯呵！

两年来，作为停战谈判的开城中立区，并不是人们所想象中的世外桃源，无耻的敌机，一直在日夜不断地威胁着这里的和平居民。黄昏以后，当敌机掠空而过时，整个开城，都不得不熄灭灯火以防御侵略的疯狂，因为两年来，背信弃义的敌人，就在这块以中立的名义保证安全的土地上，曾经制造了多少不可饶恕的罪恶，曾经流了多少中朝人民的鲜血。嗜杀成性的空中强盗，在一分钟之内就会造下万世不赎的罪恶的。因此，停战虽已在上午签字，而开城人民却连一秒钟也没敢疏忽大意，直到停火时间过后（下午十点以后）才基本解除了防空。

从此，开城才大放光明，从此，开城人民才享受到真正的和平。室内的灯光映着窗外的明月，小溪的流水伴奏着和平

的歌声，完全是一片升平气象呵，开城的人民又怎能不为这渴盼已久的幸福时刻而欢腾？

在签字的前两天，开城人民就已经嗅到和平的气息了，家家户户的妇女在赶制着新国旗。她们一边哼着愉快的歌曲，一边摇着缝纫机，在那温柔的微笑里，充满着胜利的矜持，好象在为英勇的人民军缝制着凯旋的征衣。我们的一位女房东更连夜为我们赶熨了七八套军装，为的是让我们整齐庄重地去参加签字仪式。当我们从板门店归来的时候，迎接我们的是无言的感激和热情的笑脸，好象我们就是胜利与和平的使者似的。一位老大娘抓住我的手，眼睛闪着欢喜的泪花，不住地吐露着感谢的词句：“高麻丝米达，高麻丝米达！”^①

大街上、桥头上以及通往板门店的公路上，到处是松枝扎成的牌楼，到处是庆祝和平的彩色标语。中文标语写的是：“在反侵略战争中的中朝人民亲密的团结友好万岁！”

“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万岁！”“向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致敬！”同时，一面面胜利的标语也在每家的门口飘扬起来了。

二十八日一大早，每个家庭，每个村庄的男女老少，都穿了节日的新装，手里拿着小旗，抱着鲜花，欢天喜地地冒着火一样的太阳，集合到开城近郊的广场。目前仅仅有着四万七千人口的城市，参加群众大会的人，看来并不少于这个

^① 朝鲜话“谢谢”的意思。

数字。雪白的人群，远看去就象是一片沸腾的海。人们象海潮一样不断地涌来。海面上，蓝天下，飘展着无数面鲜艳的红旗和标语，镶在那些镜框里的是各人民民主国家领袖的肖像；而最触目的是苏、中、朝并肩的三幅巨大的国旗以及在旗帜下面高高举着的饰以鲜花的列宁、斯大林、马林科夫、毛泽东和金日成五位人民领袖的画像，这说明了苏、中、朝兄弟般的团结和友情，也表示着朝鲜人民热爱苏联和中国的心意。

这边是儿童们鲜花一样的行列，那边是老农民白鸽似的队形；这边是儿童们天真的欢唱，那边是老农民雄壮的歌声；这边是儿童们轻盈的舞蹈，那边的老农民也绝不示弱，他们戴着各式各样的写着“和平万岁”的纸制花帽，敲着锣鼓，围成一个圆场，跳呵、唱呵、舞呵，汗水在那风吹日晒的皮肤上发着油光，胡须在他们的颊下迎风飘荡，和平的幸福使得这些老人家变得年轻了，不，他们简直是回到了可爱的童年。多少双感动的目光都向他们射过来了。

当保卫开城的烈士姚庆祥的碑碣模型被抬着走进会场时，沸腾的人群立刻安静下来，人们以极崇高的敬意向着碑碣注目为礼。整个北朝鲜的男男女女，连小孩子在内，谁都知道姚庆祥是为了什么而牺牲了他青春的生命。今天，和平已经取得了胜利，朝鲜人民将永远悼念着他，象悼念所有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烈士一样。他们的血，在朝鲜神圣的土地上，正放射着宝石一样的光芒。

这几天，开城人民呼吸着和平的空气，变得那样愉快而

新鲜。如今，经过了多少次游行、庆祝，大小集会之后，正精神百倍地在欢欣鼓舞中开始重建他们的家园。开城的市容，正在迅速地恢复战争的创伤，走向繁荣中。

不过，开城毕竟还是战后朝鲜最典型的城市，它还有着比较完整的房屋和家庭，不管战争给它带来了多少灾难，开城人民总还算是**不幸中的幸运的人民**。这时，我想起了新义州、平壤；我想起了山登、沙里院；我想起了顺州、安州和界州……我想起了那些受害最严重的地方，那些变成废墟的城市和乡村，那些长期在死亡威胁下的战斗的人民。当和平的曙光在他们面前出现时，那种欢欣鼓舞的情景，正和他们的苦难一样，没有亲眼看见的人，怕是很难想象的。

三年来，英雄的朝鲜人民和毛泽东优秀的儿女，为和平曾经付出了多大的牺牲！他们用青春和头颅铺平的路，他们用勇敢和鲜血灌溉着一座美丽的园林。如今，和平虽已降临，但，和平的道路上还有着无数的荆棘，美丽的园林里还有着豺狼盘踞。为了保护这和平的新芽，为了铲除和平的荆棘，中朝人民和全世界善良的男女，要怎样爱惜这血肉换来的胜利呵。加倍我们的奋斗吧，使和平的花朵欣欣向荣，使和平的阳光普照大地。

1953年7月末于开城

保卫我们的孩子

哥本哈根的世界妇女大会已经过去整整十周了，到现在我才有机会用我的笔来抒发我沉重的感情。我不敢偷懒，我的良心更不允许我怠工，从那遥远的海岛归来之后，我的感情正象我的生活一样，时刻都在起伏动荡中。我不能忘怀世界妇女大会的热烈情景，更不能淡漠那些血泪交织的控诉。母性的情操是最真挚而圣洁的，当不幸的母亲们一字一泪地为无辜的孩子们而呼吁时，谁听了能不感到心痛呢？我是一个幸福的母亲，我有着一对幸福的儿女；在我的亲爱的祖国里，有着亿万更幸福的母亲和儿女。当我一想到孩子们的幸福生活时，我不敢以他们引为骄傲，因为全人类的孩子并没有完全得到那种幸福，相反地，还有着无数的可爱的生命喘息在战争的恐怖和凄风苦雨中。

地球本是一个浑圆的整体，而世界却被划分为两个。两个世界，两种生活，一部分人正在积极地为人类建设天堂，而另一部分人却疯狂地在人间掘造地狱。不同的环境给孩子们安排了不同的命运，战争带给孩子们更多的恐怖和死亡。

近年来，我亲自感受了朝鲜儿童的深重灾难，我看见了

他们的血，也尝到了他们的泪，接触最多的是他们那闪烁着复仇之光的眼睛。

孩子们的不幸激发了我母性的感情，唤起了我做母亲的责任。我的泪多少次和孩子的泪流在一起，我的心多少次和孩子们的心合奏一个节拍，我的感情呵，为仇恨的火焰烧伤了。每当我告别了那块神圣的土地之后，我就禁不住要怀念他们，常常茫然若失地想着他们。我认为，在目前这个世界上，我唯一应该关怀的就是受难最深的朝鲜儿童。消灭这个可诅咒的战争吧，天下做父母的，每个人对朝鲜儿童都负有巨大的责任。

当然，这一切都是没有错的。可是，我的目光是如此地短浅，我只看见了眼前战争中被摧残的千百万美丽的小生命，却很少想到那些由于备战而正在牺牲的为数更多的儿童。因此，当丹麦的孩子们蜂拥在体育大厦门前要求代表们签名的时候，我还不能一下子就理解孩子们渴望和平的感情。开始，我总是急于冲出重围，想避开他们的纠缠，但是呵，多少次我都失败了。孩子们组成一条顽强的战线，采取了层层包围的阵式，小手里拿着简单的武器——小本子和铅笔，仰着希望的小脸，要和平的母亲们给他们留下和平的语言。孩子们当中有小到五岁六岁的，他们穿着菲薄的单衣，在哥本哈根阴雨早晨，正象一群雨淋的小麻雀，在你的身边蹦来跃去。他们尽量伸长稚嫩的手臂，把小本子举到你的胸前，你不签上几个字呵，就绝不放你走开。我确实被孩子们感动了。但最初，我的感动却不是由于孩子们要求和平的

纯真行动，而是因为他们那鲜花一样美丽的面容。因为呵，这毕竟不是在战火弥漫的朝鲜，我还不曾理解西方世界儿童们痛苦的灵魂呵。只有在大会进行中，我的眼界才逐渐阔大，我的体会才逐渐深刻了。在丹麦京城，我仿佛漫游了整个地球——从远东，到极南；从北非，到大西洋彼岸……在那些黑暗的角落，在魔鬼统治的国度里，到处响着孩子们要求生存的呼声。一群稚弱的小鸟，在羽毛未丰之前，生命已经枯竭，鲜血已被吸干，千万可怜的小生命，在豺狼盘踞的土地上，正面临着饥饿、恐怖、愚昧与死亡的深渊。看着各国姊妹们念忧的泪眼，听着她那悲愤的语言，我的心阵阵疾痛了。

备战政策和军备的扩张，严重地影响到儿童的幸福与家庭的安全，母性的尊严受到了直接的伤害。母亲们已经享受不到生儿育女的快乐了。看着战争贩子们的罪孽帐单吧：

美国全部预算的百分之七十三用于军事目的；英国、法国、意大利、希腊、土耳其、日本、西班牙等国的军事费用占全部预算的百分之三十八到百分之八十。母亲们给孩子的每一片面包都加上了准备战争的捐税。贫困和不幸把一些母亲驱向绝望和自杀的道路。在日本，自杀人数中有百分之五十五是母亲带着孩子同归于尽的。美国的垄断资本家经常把大量剩余物资抛下海去，而阴沟僻巷中却有无数饥寒致死的儿童。在整个非洲、拉丁美洲、在亚洲的大部地区——这些有着无尽天然富源的国家里，千百万儿童没饭吃，得不到任何照顾，一半以上的儿童，在他们还不懂得生活是怎么回事以前便死去了。在出产棉花最多的印度和埃及，孩子们

竟没衣穿。希腊的母亲们用橡子和草喂养孩子。一个地方的小学生们在上着课都发晕了，原来他们已经三天得不到饭吃了。十一二岁的孩子因饥饿不得不出卖鲜血，孩子们悲愤地说：“只要能吃两顿饱饭，死也不管了！”自然，结果他们是卖完了最后一滴血而死去了。某村十五个孩子因为饥饿同时失去了视觉。希腊的母亲悲愤地说道：

“他们将永远不再看到阳光和游戏了，战争贩子用饥饿使孩子们变成瞎子。在我们国家里是饥馑的凶年，人民的一切都让美国人（指的是美国统治者）和他的走狗掠夺尽了，这使我们回忆起希特勒占领的年代……”

外约旦的一个教员发现他的学生们啃吮石子，当他加以斥责时，孩子们激动地叫道：“我们饿呵！”一个母亲，在上午脱下脚上的鞋子替儿子买了一本书，但是，下午学校就关门了。原来学生们由于饥饿什么也看不见了。西班牙、印度、伊朗……成群的儿童用树皮和草根苟延生命，树皮剥光了，草根挖尽了，孩子们就只有悲惨地死去。

当寒风逼人时，母亲们只能用狗的体温温暖她自己和冻得发抖的儿女，但，却不是每个母亲都能找到一只野狗呵。

不幸的母亲们痛苦着她们竟没有养育儿女的能力，为了不忍心眼看可怜的孩子饿死，甚至把他们出卖，人贩子就从人民的贫困与母亲眼泪中榨取超额利润。美国商人用低价收买了加拿大的儿童到美国就可以赚到十倍的金元。日本一个儿童的身价只值四十斤到七十五斤大米。伊朗南部买卖奴隶继续进行着，罪恶的人贩子鞭打着儿童强迫他们整天晒在暴

日之下，以便使孩子皮肤变黑可以更容易出卖。在北部，人贩子竟把五岁到十岁的女孩子卖到妓院中。葡萄牙十三岁的幼女就不得不出卖肉体来维持生命，而政府就从血泪生涯中征取可耻的税收。

在许多国家里，儿童们从来不知什么叫黄金的童年，他们从懂事起就担负着沉重的劳动，为生存而自食其力。他们那稚嫩瘦弱的小身体在精疲力竭之后，得到的却是饿肚子的工资。委内瑞拉的儿童一到六岁便成为被剥削的对象。法属几内亚七岁到十岁的儿童已经做了码头上的捐夫。伊朗的孩子有时只有三岁就被母亲含泪送去工作了；那些为全世界富人们所据有的华贵的伊朗地毯，就是由饥饿的儿童小手织成的。他们往往被工头几小时地吊打着。这样的非人生活对比着百分之八十五的儿童死亡率，是一点也不值得惊奇的呵。德里兰饥饿的母亲由于没有奶养活自己的骨肉，只好把初生的婴儿弃置荒野，任乌鸦啄食他们的眼睛，任野狗分食他们的肢体。希腊一千个新生的婴儿在第一个月中就死去百分之三十八。比来地方有一个罐头工厂，假如在放工时去观察一下，你将会以为是一个小学校放了学呢。剥削者们雇用大批的童工为的是以低廉的工资换取高额的利润，而成年的劳动者却普遍闹着失业的恐慌。意大利的一位七个孩子的母亲曾向《我们妇女》杂志呼吁，她写道：“我的丈夫已经失业二十九个月了……我是怀着怎样的恐惧想到我的孩子，我能到什么地方找食物给他们吃呢？”

母亲生孩子是为了建设生活、繁荣人类、传递生命的火

花。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正以巨大的热情在奖励妇女的辛劳，给多子女的母亲以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关怀。匈牙利的一位十二个孩子的母亲英雄就在这样的爱护下成了工厂的劳动模范。当她向各国姊妹们生动地叙述她的孩子们的幸福生活时，她是多么地为她的祖国而自豪呵。台上台下的听众是以怎样的钦慕的眼光向她致敬呵。

可是，在另一个世界里，多子女的母亲却遭受着残酷的冷眼与绝望的贫穷。妇女的神圣天职被凌辱了。统治者们企图为自己的罪恶辩解，硬说人民的贫困是生育过多的结果。某地的节育委员会竟无耻地宣讲：饥荒应由节制生育来解决。孩子们的贫困应由他们的父母负责。

战争贩子们到处在建设军事基地，成千上万的儿童却住在地洞中，住在牲口圈里。在荷兰，在塞浦路斯……竟因此有大批儿童成为肺病患者。学龄儿童由于校舍被美军占驻而不能上课了，填补这空白的，是和美军一道输入的暴力电影，色情和犯罪文化在毒害腐蚀着孩子们幼小的心灵。土耳其、芬兰和其他许多国家里，儿童犯罪的悲剧在到处发生着。

够了，我不忍再叙述下去了，孩子们的苦难是数不尽说不完的，当我回忆起在另一个世界里的孩子们可怕的童年时，我的心都在战栗。我仿佛又碰到了忧虑的母亲们那恐怖而悲痛的眼睛。如今，虽然朝鲜的战火已经停止，而战争贩子们却仍在准备新的挑衅，一心想把全世界的儿童都斩尽杀绝。希腊的母亲告诉大会，她说：“希腊的统治者仇视孩子

们美好生活，他们竭力想把在人民民主国家教养着的希腊儿童拖回到饥饿与文盲的本国……”但是孩子们是不会上当的，他们懂得谁是生命的敌人，谁是儿童的保护者。中国代表团曾收到一封希腊儿童集体写来的信，他们告诉中国的幸福的小朋友们，他们在人民民主国家里，过的是怎样幸福的生活，受的是多么良好的教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希腊遗留下三十八万战争孤儿，这封信就是一部分孤儿写来的。他们在慈母的爱抚之下早已被医好了战争的创痛，饱经忧患的孩子们又怎肯回去挨饿呢？

作为创造生命、抚育人类的母亲，是不能容忍这种残杀儿童的悲剧串演下去的。她们已经从各个黑暗的角落里站起来了，走出来了，奔向寻找光明的大道，用她们空前无比的热情，为维护人类的尊严而英勇斗争着，用全生命保卫着人类的幼苗。

在世界妇女大会里，人人都深感到，由于各国妇女的勇敢，和平已经有了保证，生命已经有了希望，特别是在国际民主妇联的坚强领导之下，保卫儿童的事业，是会发出巨大光芒的。这就是为什么当国际妇联主席戈登夫人发言之后，丹麦的年轻母亲把她六个月的婴儿寄托在这位高龄的和平战士保护之下。孩子被传遍了主席台，甜蜜地接受着各国母亲的抚爱。他那被吻了又吻的小脸蛋，泛起了幸福的红润。年轻的母亲望着他，流露着无比安慰与信任的笑容。小小的婴儿，自然还不懂得和平将带给他什么样的幸福，更不会体会到和平的母亲们为他们付出了怎样的牺牲；但是，我却想起

了那些要求签名的儿童，那些不断赶到会场来献花的儿童，那些在我归国途中遇到的、坐着舒适的列车、在和煦的阳光下奔往各兄弟国家的朝鲜儿童，他们是懂得的。特别是在丹麦群众大会的主席台上，那三个穿着黄色短裙的小女孩，她们更是懂得的。不然，她们为什么一直依偎在苏联代表团长波波娃温暖的膝前。孩子们懂得，这位大半生致力于和平事业的苏联母亲，是代表着千千万万仁慈而英勇的苏联妇女，她们正在领导着全世界的妇女为下一代创造着和平，建筑着幸福的花园。她们过去所开辟的英雄道路，已经有无数热爱生命的母亲勇敢地踏向前进了。

罪恶的战争，给孩子们带来了各种各样的不幸，恐怖和灾难促使孩子们象夜莺一样的清醒，孩子们是越走越聪明了。连在蒙蔽教育下的美国儿童，也深知伟大中国对和平的无比贡献，因此他们特别热爱中国的小朋友；不然，为什么美国的八岁男孩巴比都·佛来希泰特地写了一首小诗献给和他年龄相仿的中国儿童。现在，就让我把他的天真的小诗抄在下面作为结束吧：

春天到了，
春天是快乐的，
花儿开，
树叶绿了，
小鸟高兴地飞跃着。
我们希望呵——

没有战争，
只有和平，
我们就快乐了。

保卫我们的孩子吧，让我们祝福他们在和平的阳光下平安地长大吧。

1953年8月末

三 年

三年的时光，留给我们一大部辉煌的胜利史诗。

假如我不是亲自处在这个不平凡的环境中，我简直就很难想象，仅只短短的三年，而在我们年轻的祖国里，在美丽的朝鲜半岛上，竟会发生了如此巨大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竟会产生了无法计算的，惊心动魄的事件。

丰富多采的现实，给人以充分的滋养，它的每一分钟都象春花一样的鲜艳。三年来，它丰富了我的人生经历，锻炼了我的感情和意志。在这伟大时代的血液的哺育中，我感到，我的生命正在开始茁壮，我的心情已经回返了青春。虽然我的头上也在不断地增添着白发，但那绝不是衰老的象征，而是时间的烙印，是这三年来不平常的生活所给予我的幸福的标记。只要稍稍回顾一下我们年轻祖国的不朽业绩，——特别是对世界和平的巨大贡献，我们就不能不感到精力充沛，我们就不能不以无比的兴奋热烈欢呼：我们伟大的祖国是在多么惊人的飞跃中前进着呢！

那仿佛已经是很遥远的往事了。可是，精确地计算一下，只不过才短短的三年。三年前的今天，我们新生的祖

国，还是一个才满周岁的婴儿，——一个在饱经忧患的母体孕育中诞生的婴儿，一切都需要恢复，一切都刚在开始。可是恰恰在这个时候，在朝鲜半岛上大肆杀掠的美国强盗，不但想毁灭整个朝鲜民族，竟还在狂妄地叫嚣着要跨过鸭绿江进攻中国大陆，梦想夺去我们用艰苦的斗争换来的独立和自由。那时候，已经挺起胸膛做了主人的中国人民，既不能忍受那种凌辱和恐吓，更不能无视朝鲜民族的无尽灾难，虽然是在百废待兴的紧要关头，而我们却毅然地、满怀信心地把这个援助朝鲜、保卫祖国、争取世界和平的任务担当了起来。当我们的人民志愿军——毛泽东的优秀儿女，踏着薄薄的冰层跨过鸭绿江的时候，有多少人担心得睡不着觉呵！因为我们对付的不是一个普通的敌手，而是一个比日本法西斯更疯狂更强大的美帝国主义。纵然我们必然会获得最后的胜利，但国内的恢复和建设工作的势必要暂时停止，我们的人民将还要熬过多少艰难困苦的岁月呵，还有什么余力去帮助别人呢？

那时候的朝鲜情况又是怎样呢？

当我1951年初踏上朝鲜的土地时，那正是抗美援朝开始的第一个严冬，也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那么酷寒彻骨的严冬。在北朝鲜的荒凉土地上，在那蜿蜒如画的山岗上，除了闪闪发光的白雪而外，只剩下断瓦残垣和顽强不凋的寒松了。要是没有那些巍然屹立的大大小的烟囱，简直就使人无法相信那儿还曾有过美丽繁荣的城市和自由幸福的人民，那分明是一片废墟呵。美国强盗的疯狂烧杀，不但使朝

鲜的人力大大削减，而物力也已相当空虚了。在极度悲愤之余，我便很自然地意识到了在抗美援朝的战争中祖国担负的沉重。前线频传的捷报并不能抵消物质供应的极度艰难，我们的忘我牺牲的指战员，一口炒面一口雪的生活又怎能够保持住战斗的体力呢？当我看到我们光荣负伤的英雄们由于严寒和饥饿而变成了残肢断臂时，前方的艰苦情况就更不难想象了。那时候，我常常焦虑地想：要转变这种处境是短期的努力可以生效的吗？虽然无数杨根思型的战斗英雄时刻都在坚定我们的胜利信心，虽然无数胜利的奇迹早已成为鼓舞人心的力量，但有着象我同样焦虑的人却何止成百上千？

然而，这一切，都不过是杞人之忧而已。我们虽然热爱我们的祖国，却还没有真正认识到它的伟大，更没有真正看到它那无限丰富的、取之不尽的力的源泉。

不久，在春风还没有完全吹融积雪的时候，我仍然带着同样的焦虑又一次到了战火纷飞的朝鲜。可是，那意想不到的突变真不禁使我大为吃惊呵。在整个北朝鲜的前线阵地上，不单是一口炒面一口雪的日子已经随着严冬的消逝一去不返，而一切争取胜利的战斗设施，也都基本齐备了。

当我向英雄们报告祖国的宏大建设计划和日益上升的人民生活时，他们也同样地大为吃惊。他们张着一双双满含兴奋的眼睛，欢跃着说：“一方面供应抗美援朝的需要，一方面恢复了国内战争的创伤，这难道不是奇迹？”

是的，连每天都在创造奇迹的英雄都把这看作了奇迹，那还能有谁来加以否认呢？

可是，三年中的奇迹实在是太多了，如今的奇迹，差不多已经变成了普通的事物，不足为奇了。

前方的胜利推动着后方的生产，后方的生产鼓舞着前方的士气，保卫和平的烈士的鲜血永远灌溉着中华民族生命的红花。和顽强不屈的朝鲜人民并肩战斗的正是勤劳勇敢的毛泽东的儿女，这就是我们最后胜利的保证，创造一切奇迹的不竭的源泉。

三年来，我曾多次地往返于祖国和朝鲜，而每一次的往返，在祖国、在朝鲜，都使我强烈地感染到一种崭新的、上升的气象，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朝日的光辉，一次比一次更加明亮。尽管敌人在不停地吹嘘着“空中优势”或“雄师百万”，我们祖国的锦绣河山却在磐石一样地巩固中增加了多少高楼和工厂。而我们的百战百胜的中朝勇士，也终于粉碎了敌人的迷梦，使它遭到了溃不成军的惨败。就在我们抗美援朝将近三十三个月的时候，和平的曙光也终于冲破了云层照亮了胜利的东方。

七月二十七日上午十点钟，我坐在板门店那座伟大的和平签字大厅的代表席位上，望着垂头丧气的哈利逊和他的仆从们的窘相，我不禁为我们亲爱的祖国、我们敬爱的毛主席和他的优秀的儿女感到了无比的自豪。

在毛泽东光辉煌耀下，我们有力量赢来和平，也更有力量保卫和平。现在朝鲜的重建已经开始，我们要帮助英雄的朝鲜把那个绮丽的半岛建设得象我们祖国一样的美好。

1953年10月25日

英雄的时代

我既没有一副铁打的心肠，意志也不敢说十分坚强，但却很少流眼泪，——不单是在人前不流，在人背后也不流，不单是遇到困难的时候不流，悲痛、愁苦，甚至受了委屈的时候也不流。这倒不是生来如此，确实是斗争锻炼了我，革命哺育了我，它给了我一种克制的力量，它使我永远保有一种乐观情绪。可是，近几年来，却有些不大一样，我的眼泪好象忽然生了根、发了芽，也不管人前人后，它竟在我猝不及防中汹涌而来，想制止都来不及了。是谁撒下了这奇异的种子？是谁掘开了我眼泪的深泉？

我说呵，就是这个英雄的时代，就是这个灿烂多彩的今天呵。

这样说，人们一定会觉得很奇怪：伟大的时代怎么会反而把人变得伤感了呢？难道一个革命者还会越锻炼越脆弱吗？

不呵，这完全是个误会。让我且来分析一下我这种眼泪的性质吧。

当你在入党（团）的仪式会上举手宣誓的时候；当你会

见了你久别的亲人的时候；当你第一次和毛主席握手的时候；当全国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时候；特别是国庆节你参加或看到那几十万人的庞大大队在天安门前欢呼游行的时候……你能够无动于衷吗？

还有，当你听到苏联给予我们的那些全面的、无私的援助的时候；当你听到我们的先烈慷慨就义的故事的时候；当你听到我们的卫国英雄牺牲自己因而取得了辉煌胜利的时候；当你听到我们的志愿军奋勇抢救炸弹下、火焰中的朝鲜人民的时候……你能不感情激动吗？假如你亲自看见了那庄严的场面哪，你的眼泪就会流得更奔放一些的。

这是欢喜的泪，这是兴奋的泪，这是感动的泪呵，这里面并不包含任何伤感、消极的因素。我所说的眼泪就是这种性质的。

让这样的泪自由地流、畅快地流吧，你会从这深切的感受中得到非凡的鼓舞和激励。

这几年来，祖国是处在怎样飞跃的变革中？这每一条建设祖国的生产战线上，在每一个保卫和平的英雄阵地上，可歌可泣的事迹，真象天上的星星和海里的鱼，你只能看见那千万缕美丽的光芒，却怎么也没法数清它们的数目。单单在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里，我们祖国优秀的儿女，毛泽东的光荣战士，为世界和平而战的不朽英雄，用鲜血和生命保卫祖国的“最可爱的人们”，单是他们，单是他们呵，就为我们新生的祖国写下了一大部多么辉煌的史诗。当你一页一页读着这部史诗的时候，你能不兴奋得心弦跃动吗？你能不被

感激的泪光模糊了双眼吗？

让这样的泪自由地流、畅快地流吧，你会从这深切的感受中得到无限的鼓舞和激励！

这几年来，我感动的泪就是被它们引出来的。这几年来，我感动的泪，曾经无数次滴落在朝鲜不屈的土地上。但愿它们和英雄烈士的鲜血流在一起吧，我将为此而感到光荣和幸福。

没有到过朝鲜的人，你怎么也没法体会侵略的恶魔带给朝鲜人民的是什么样的灾难；没有参加过朝鲜战争的人，更难以想象我们的指战员们忍受的是什么样的艰辛！一切都是绝对空前的呵。在抗美援朝的最初战斗中，英雄们曾经在零下四十度的严冬里，在北朝鲜银白色的山冈上，面对着刺骨的寒风，吞食着炒面和白雪，日日夜夜地激战着。空中是散布死亡的敌机，耳边是枪林和弹雨，他们的手冻肿了，脚冻僵了，最后全身都失去了知觉，但是为了坚守住阵地，不给敌人以可乘之机，他们仍是一动不动地瞪着红肿的眼睛监视着狂敌。就这样呵，他们曾经成班成排地冻死在凯旋的歌声里。当战友们来打扫胜利的战场时，竟发现他们仍然阵容整齐地摆着雄赳赳的战斗英姿。他们没有死呵，英雄们千秋万代都是永生的。

我体会过北朝鲜的严寒，我生平第一次看到那么多冻残了手脚的人。1951年的1月，我随着抢运伤员的卫生列车第一次踏上朝鲜的国土。有一次，在一个大风雪的夜里，机车为了上水，离去得时间过久，旷野的狂风从四面八方车厢里

袭来，那彻骨的寒冷呵，把脑子也冻僵了。头上的敌机六七次地在列车的顶空扫射、盘旋，有一次炸弹就落在列车附近的小山上。这样我就越发感到冷得难以忍受了。我只好丢下手里的本子和钢笔，瑟缩着两肩，连头也深深地埋在被窝里，禁不住在心里暗暗埋怨：机车呵，你上水掉到河里去了吗？你怎么就不想想车里伤员的死活呢？

这时，忽然随风飘来一阵雄壮的歌声：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

这是隔壁车厢中被伤痛折磨着的伤员们的齐唱。那歌声是那样愉快而激昂，真象正在英勇进军一般，把敌机的吼声也压过去了。

我感到无比的激动，也感到无比的惭愧！我立刻揭被坐起，重新拿起了笔：“亲爱的弟兄，光荣负伤的勇士们哪，你们的手脚已经冻成残废，你们却依然不惧严寒，不畏艰险，你们杀敌的雄心真象一团烈火，你们把人人都温暖了……”

一想到伤员同志们给我讲的那些激动心灵的故事呵，——那些死后还摆着战斗英姿的勇士们呵，我真是惭愧极了！就在那一刻，就在我痛感严寒的那一刻，正不知有多少无畏的勇士战斗在那漫天风雪的高峰上，更不知有多少英雄成为了不朽的烈士。象一脱军靴连脚都一齐脱掉了的事情，

能够不叫人心疼吗？

我惭愧，我怎能不惭愧！但是，惭愧并没有使得我更冷，我的周身都感觉暖和了。是英雄们无畏的烈火把我的热情点燃了。

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我经受着有益的锻炼和考验，我蒙受着英雄们无畏的精神和高贵品质的熏陶与感染，我变得比过去坚强多了。每当我感觉战地生活艰苦的时候，我立刻就会自疚自愧，我立刻就想起那些翻雪山、渡冰河、卧雪爬冰的勇士们；那些长期睡在水里、泥里和不见阳光的阴湿坑道里的指战员们的苦境。他们同样是父母所生，他们同样也是血肉之躯，他们为什么就无视于那种苦境呢？他们不但从不叫苦，而且是那样愉快地挺起胸膛抗击艰苦，正象他们挺起胸膛抗击敌人一样。从前线到后方，在整个北朝鲜战场上，这样的人何止千千万万！环境越艰苦，他们就越坚强，斗争越尖锐，他们就越勇敢。在艰苦的战斗中他们已经百炼成钢。他们有的是真正无私的感情和完全忘我的品质，——他们忘却危险，忘却痛苦，忘却生命，忘却幸福，忘却所有个人的一切呵！

他们为的是什么呢？

为了朝鲜民族的解放，为了祖国的安全，为了全人类的幸福，更为了创造一个和平美好的明天。就是为了实现这些崇高美丽的理想呵，英雄们才毫不顾惜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还有比人的生命更宝贵的东西吗？

有！那就是这种完全忘我的精神和真正无私的感情。

且回忆一下黄继光的行动吧。

在上甘岭最紧张的一次反击战中，通讯员黄继光争取了爆炸敌人地堡的任务后，便立即和另外两个战友冒着敌人的七挺机枪扫射向敌人的地堡冲去了。不幸，另外两个伙伴很快就牺牲了。显然，这个艰巨的任务已落在黄继光一个人的肩上了。黄继光毫不畏缩地带着枪伤继续爬行，他昏倒了又爬起来，当他投出最后一颗手雷之后，敌人的机枪便停止了叫嚣。但当我们的部队刚开始冲锋时，敌人火力点剩下的两挺机枪又在一个地堡眼里扫射起来，攻击的部队立刻又被压在山坡上。

黄继光从昏迷中被枪声震醒，向敌人火力点望了一眼，再摸摸自己的身上，已经没有一件武器了，剩下的只是一个满怀仇恨带着七处枪伤的身体。于是，他挣扎着爬起来，象猛虎一样向敌火力点扑去。他呵，他用自己的胸膛堵住了敌人正喷着火光的机枪口……

这一切动作都被准备冲锋的战友看在眼里了。战友们满怀着感激和悲痛，踏着黄继光爬行的道路，象愤怒的浪潮一样卷上高地……守敌一千二百多人全部被歼灭了。

英雄行动的完成，虽然有时仅是一瞬间的事情，但英雄行动的产生，绝不是偶然的冲动。

当黄继光扑向火力点那一瞬间，假如他想到了他正在青春的生命，假如他想到了他温暖的家庭和慈爱的母亲……假如他想到了这值得留恋的人生呵，他也许会逃开敌人的火

网，尽可能掩蔽自己，直到部队给他打开一条血路……这样，他既可保全住生命，也不会遭到任何的非难；情况是那样严重，让一个手无寸铁、负伤七处的年轻通讯员如何去完成这样巨大的任务呢？

要是情况这样发展的话，歼敌一千二百人的辉煌胜利就很渺茫了，简直是不可能了。因为当黄继光出发的时候，已经是几次爆破失败之后，离天明仅仅剩下四十分钟了（必须在天亮之前拿下阵地的）。而当他投出最后一颗手雷的时候，还能剩下几分钟呢？不压住敌人的火力，部队就无法前进，不前进又如何取得胜利？就在这成败攸关的一瞬，黄继光下定了必死的决心，用肉体代替了千万发枪弹，为祖国、为朝鲜建树了不朽的功勋。那时候，不要说是对生命，只要他有一点点对肉体痛苦的恐惧，也就会临危怯步了。英雄就必须是“忘我”的，“有我”就难成英雄。当陈治国用自己的身体当作机枪射击工事的时候，他曾否想到生命的可贵？当邱少云被烈火燃烧的时候，他为什么忍受着焚身之痛而不去扑灭身上的火苗？

前些天，我翻开报纸，看见罗盛教的父亲和朝鲜少年崔莹相会那一段通讯时，我的泪又一次被引出来了。并不是那篇通讯写得多么出色，实在是罗盛教舍己救人的行动太令人感动了。虽然事隔将近一年，而我的感觉还是那样的新鲜，仿佛看见呼吸艰难的罗盛教用冻紫了的肩膀擎着崔莹时的壮烈情景。当他跃入冰窟之时，难道他就不知道冰寒彻骨吗？而当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营救崔莹不得，已感身僵力竭时，

他会不知道自己的生命已濒于毁灭了吗？假如那时他稍稍想到个人的生死问题，他是完全来得及救活自己的。可是罗盛教所热烈追求的却不是自己的生，而是那个朝鲜少年的生。他终于用尽了最后一丝力气救活了崔莹，牺牲了自己。

我又记起了罗盛教遗留下来的那首短诗：

当我被侵略者的子弹打中之后，
希望你不要在我的
尸体面前停留，
应该继续勇敢地前进，
为千万朝鲜人民和牺牲的同志报仇！

他不是诗人，他的诗也没有华丽的词句，他就用这朴素的语言啊，道出了千万英雄的心意。这诗，正是英雄“舍生取义”的品质的流露，也正由于这种崇高的品质才铸成了英雄的伟大行动。罗盛教的具体行动不就是一首最美丽的诗吗？

最近我收到了一封青年的来信和他的诗稿。这个青年恰恰也是志愿军里的文书。他一心想当诗人，当然就常常“做”诗，并不断地把他的诗稿寄给我修改。他的诗看得出来是用心雕饰过的。那里面充满了伟大、光荣、勇敢、牺牲一类貌似慷慨激昂的词句：

伟大的祖国呵，我愿为你赴汤蹈火；

可爱的人民呵，我愿为你碎骨粉身。

每首诗都喊着这一类响亮的口号。可是，再看看他的信吧：

“……祖国是有着远大前途的，可是我呵，却有着无尽的悲哀。我怎能不悲哀呢？我的身体消瘦了，我的面容苍老了，几年来艰苦的战斗生活把我给搞垮了。别人说身体越锻炼越好，我却受了这话的欺骗……部队文书工作我整整干了三年，现在还在干。对我自己呢？前途呢？将来呢？没有一点寄托与希望。我也有我自己的理想呵，我真想‘摸到天上的月亮’，可是环境证实这只是一个幻梦。我烦闷、我苦恼，我说不尽我内心的悲哀和辛酸哪……”

为什么他不把这也写成一首诗呢？这才是他的真情流露呵。

这位一心梦想成名的青年文书比一比罗盛教烈士的思想品质能不惭愧吗？没有更多的篇幅给我来分析他的思想了，让读者根据他的诗和信去仔细解剖一番吧！好在，象这样的青年不过是极少数，而且在英雄的时代熏陶中，他迟早会跟上来的。三年来，他没有离开过战斗的朝鲜，没有离开过英勇无私的战友们，他怎会看不见呢，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的种子已遍撒在朝鲜美丽的山冈上，在英雄烈士不朽的光芒

照耀下，胜利的鲜花正在和平的阳光下朵朵开放，——这朵是黄继光的；那朵是罗盛教的；这朵是邱少云的；那朵是陈治国的；这朵是吕玉久的；那朵是张明禄的；这朵是史元厚的；那朵是……又何必一个一个数着那些崇高的名字呢？这千万朵宝石一样的红花呵，他怎会看不见呢？

英雄创造着时代，时代哺育着英雄；死去的烈士永远鼓舞着人民前进，活着的英雄还在继续成长，将为保卫和平建设祖国的事业建树更大的功勋。

英雄的时代不容辱没，英雄的集体更不会让一个战友掉队的。

1953年12月18日

母亲——战士

——记波波娃和安德琳夫人

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看到荣获1953年斯大林国际和平奖金的和平战士们的名单，我又被引向那些激动心灵的回忆里去了：那庄严热烈的国际和平集会，那象亲姊妹一样友爱和谐的世界妇女的欢聚。许多集会，它们的目的只是一个：为了和平！在豺狼窜扰的地球上，在战火未熄的今天，还有什么比和平更美丽的名词吗？更有什么比和平战士更值得人们尊敬的呢？“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委员会再一次把和平奖金授予在和平事业中有卓越贡献的伟大战士们，不但加强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对他们的热爱和尊敬，更鼓舞并支持了为和平而斗争的人们的勇气和信心。

为了扑灭人类的灾难，和平战士们是怎样地不遗余力，不避艰险，他们的无私战斗和奔走呼号，曾经唤起了多少人从蒙昧走向觉醒，从忍耐、等待走向积极的行动。是和平的理想，把每一个善良的男女团结起来了，是共同的命运与斗争使许多素不相识的人建立了深厚的友情。

三年来，我参加了几次国际性的和平会议，也会见了许

许多多世界知名的和平战士们。在那许许多多可敬的名字当中，这次光荣获奖的尼娜·瓦西里耶夫娜·波波娃、安德烈·安德琳和伊沙贝丽·布伦姆三位女战士，我是比较熟悉的。苏联的妇女领袖波波娃，该是我印象最深的一个。记得在哥本哈根，世界妇女大会成功地开了六天两夜的会之后，闭幕时已经是黎明时分，代表们拖着因狂欢而疲倦的腿，都渴望着早些回到住处，但大会预备的车子很少，只能分批地接送。当会场中的两千多人快要散尽的时候，我还看见波波娃站在黎明的微风里和各国代表们含笑道别。

每一次车子到来时，人们都请她先走，她却为了让别人早些得到休息，一直在诚恳地谦让，最后竟悄然地远远躲开了。就在这即将和她分别的时刻，我竟控制不住激动的情，和她做了长时间的拥抱。这种看来是孩子气的举动引得同志们都笑了，而我却是出于真诚的。

在我参加的几次会议中，波波娃不但全出席了，而且每一次她都是大会的领导核心。她坐在主席台上，眼睛里充满了对和平的确信，使渴望和平的人们对她产生了无限的信任。如今，在斯大林国际和平奖金得奖人的荣誉行列中，我仿佛又一次看见她了，仿佛看见她胸前挂着闪亮的金质奖章，领导着全世界热爱生活的妇女走向争取持久和平的道路；我仿佛又看见她那高高的、健美的身材，她那坚定的嘴角，她稳重沉着的步子和那身朴素的青色长衣。特别是那双满含智慧、刚毅而深沉的眼睛呵，蕴藏着非常的毅力和气魄，永远是那么庄严而热情地给人以无形的激励，在它们的

呢视之下，会在不知不觉中唤起你潜在的热情。

她是一个严肃认真的人，有时也许有人认为她太严峻了些，她不轻易嬉笑，似乎时刻都在思考着问题。在每次会议中，她都端庄沉静地坐在主席台上，以高度的责任感专注地倾听每一个代表的发言。我真想不出她曾经有哪一次缺席或迟到早退过。在小组会上，她从不轻易发言，而当某项协商问题发生了不能取得一致的争执时，她只要几句话便把双方的意见统一了。她的领导的魄力是永远令人信服的。在世界妇女大会上，她号召各国妇女越过所有的国界，彼此伸出友谊的手，以阻止引向战争、压迫和贫困的道路。在和平第一的原则下，她认为某种生活方式的好坏又何必争论呢，最有生命力的社会制度，是会在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中证明它自己的优越性。

她热爱人类，更热爱儿童。在哥本哈根的六天的时间里，她曾经多少次流露了她含蓄深沉的热情。流露了慈母的热爱和温存。当一个丹麦的年轻妇女把她六个月的婴儿送到主席团的怀抱中时，波波娃眼里闪着欢喜的泪光，脸上满布着母性的温柔，她和年高望重的戈登夫人把那个纯洁的小生命高高擎起，让台下所有的人都把视线集中，凝视着孩子可爱的小脸。她的眼睛分明在向大家说：“亲爱的母亲们，为了孩子，你们不可丝毫放弃你们的责任；我一个苏联母亲的名义号召你们：为创造下一代幸福生存的条件，更勇敢地战斗吧！”

同一天的下午，在哥本哈根的群众大会上，我的心一直

被依偎在波波娃膝前的三个丹麦小女孩所紧紧吸引。波波娃对孩子们亲切慈祥地笑着，不住地抚摩着她们的头发、脸蛋和小手，孩子们陶醉在她的抚爱里，似乎再也不想离开。孩子们懂得，这位把全副精力都贡献给和平事业的苏联母亲，正在引导着全世界的妇女为她们创造着美好的未来。她和千千万万的仁慈而勇敢的苏联母亲所开辟的英雄道路，已经有无数热爱生命的母亲英勇地跟踪前进了。

波波娃，这位斯大林的好女儿，苏联孩子们伟大的母亲，今年该是四十六岁了，但乐观主义的精神使她永远保有着春天的丰采。忘我的英雄是不容易显得衰老的，为别人，正是她最大的愉快。当她荣膺了与伟大斯大林的不朽英名相连的荣誉时，她将会更加愉快、更加年轻的。因为这最最崇高的荣誉，正说明她为和平所撒下的斗争种子已经结下了丰硕的果实。还有什么比这更值得欢庆的呢？

我想在这里再记下关于安德烈·安德琳的回忆。

安德琳夫人是瑞典的医学博士，她曾经到过中国，去过朝鲜，她是调查美国细菌战罪行的国际科学委员会的委员之一。只要看看她头上那银白色的短发，就可以知道她年已高迈了。但她一点都不服老，经常表现出年轻人一样的精力和勇气。在朝鲜艰险的旅程中，她曾经负过轻伤，但她不肯养息，仍然若无其事地奔走和工作。任务完成回到西方以后，她本着科学家的良心，本着憎恨仇杀的善良意志，把在中国和朝鲜调查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的结果，向芬兰、挪威、丹麦以及她本国的人民做了忠实而客观的报告，使人们深信

美国军队确实灭绝人性地使用了细菌武器残杀中朝人民。这自然引起了反动集团的恐慌和仇视，他们想方设法对她进行极卑鄙的诽谤和诬蔑。勇敢的安德琳夫人却无视这些无耻迫害，绝不因纷纷而来的攻击而退却，她用不懈的斗争回答了反对她的人们。正义的事业终于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安德琳夫人受到了各国人民的敬爱。

在哥本哈根的世界妇女大会上，安德琳夫人做了第一项目的的总报告，她总括地介绍了各国妇女的生活和她们的英勇的斗争。她的报告是精采动人的，她精力充沛地讲了将近两个小时，时而兴奋，时而激动，在那瘦削和善的脸上，流露着难以控制的感情。在报告中，她宣扬妇女的权利，赞美了崇高的母性，她说：

“对于一切妇女，再没有比母性的权利更神圣的了。古今各国的诗人、作家、画家、雕刻家都赞美和褒扬伟大的母性。母亲赋予生命和养育新的一代，因而完成了她的国家。那些想把妇女排除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之外的人，是剥夺了母性高贵的感情。……有种种思想家试图给这种不公平以一个理论基础，他们以自然命定她们生孩子和从事体力劳动的借口，想证明妇女唯一的位置就是她们的家。但是她们并不谈那些辛苦地把孩子养大后，眼看从她们身边被夺走去杀别人的孩子的千百万母亲的感情。……”她的话激动了每个妇女的心灵。

许多年来，安德琳夫人对医学及和平事业都做了巨大的贡献。在这次世界妇女大会上，她光荣地当选为国际民主妇

联的副主席之一。

在哥本哈根，国际妇女调查美李军暴行代表团的各国代表，为了纪念战斗的友谊，就在赴朝两周年的晚上，在卡特（丹麦代表）家里做了一次小小的欢聚。我们也邀请了去过朝鲜的安德琳夫人。在这次聚会中，这位白发苍苍的瑞典老太太，一直亲切热情地和大家谈着，仿佛她也曾经是我们这个代表团中的一个。当谈到细菌战时，她说：

“细菌战是一个无形的、隐蔽的罪行，我说真话是有困难的，但我必须坚持斗争！我的良心是不允许我违背真理的。只是，我总感到在科学方面我还远不如人，这常常使我觉得惭愧！这是心里话。”

“你的成就和荣誉正是从谦虚中赢得的。”这是苏联代表奥夫桑尼柯娃对她的赞美。是的，安德琳夫人从不以她的成就为骄傲，她也将会始终以谦虚的态度对待她的荣誉。

和平的曙光正在预示着人类的春天的到来，和平战士们的不懈斗争将缩短严冬的途程。今天，我以一个中国妇女的名义，在这遥远的东方，谨向荣获和平奖金的可敬的女战士们致以亲切的敬礼和热烈的祝贺！

1954年1月26日午夜

我怀念着远方的朋友

我怀念着远方的朋友。

在这阳春三月，各国姊妹们正在用英勇的斗争、含笑迎接自己的节日的时候，又怎能不引起我漫长的回忆——那难忘的并肩战斗的日子，那宝石一样的友情呵。……假如我有余暇的话，真可以写一本厚厚的书呢。现在，就让我写下那些记忆中的片断吧。

1951年，正当杜鹃花映红了北朝鲜美丽山冈的季节，正当人类的公敌在几度惨败之后，更加疯狂地用兽性的屠杀妄图毁灭整个朝鲜民族的时节，国际民主妇联派遣了由欧、亚、美、非十七个国家的妇女代表组成的调查团，到遍体鳞伤的北朝鲜，调查美李匪军的滔天罪行。我既庆幸我参加了这一庄严的工作，也欣喜结识了这么多的国际友人。可是，在完成这个庄重的政治任务之后，我曾经想过：我们这种友谊将怎样维持下去呢？不要说是高山和海洋会阻碍我们亲密交往，更主要的是大部分朋友回国之后，将遭受怎样的虐待，这是令人最为忧虑的事情，因为许多代表，是来自被和平的敌人统治着的国家。

在我们分别的前夜，罗德夫人——这位有着银丝一样白发的加拿大老太太，我们调查团团长，紧紧地搂着我的脖子流着惜别的眼泪说：

“我们这次分别，就不知什么时候再见了！亲爱的中国朋友，我太爱伟大的中国了，我真羡慕你们的幸福呵。你们保卫和平，有着国家的全力支持，我们保卫和平却避不开镣铐和牢房！我回到加拿大，可以预知，是不会有自由的。”她控制住眼泪，又激动而果决地接着说，“但是任何形式上的束缚也只能更加强我对和平的信念，我的勇气绝不会象我的年纪一样衰老的。我要坚决地斗争下去！”

她的话正说出了很多人的精神准备和决心。其实，这种精神准备和决心，人们在未去朝鲜之前就已经有了的。

自从那次分手之后，我便常常地怀念着她们，我虽然十分信任她们的决心和勇气，却不能不为她们的自由而担心。幸而，两年来，我们并没有象我所担心的那样失掉了一切联系，我不但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得到她们勇敢奋斗的消息，而且和有些人还不止一次地在和平会议上见过面。和平民主的力量帮助她挣脱了镣铐，冲出了铁的栏栅。斗争在继续着，斗争把我们联结得象铁环一样。尽管我们的政治信仰不同，尽管我们的生活方式有着很大的差异，然而，在和平这个问题上，我们始终都是一致的。我们每次见面时那种欣喜若狂的情绪，使我深深感到：就在那英雄的朝鲜土地上，就在我们共同战斗的短短日子里，我们就已建立了根深蒂固的友情，战斗的友谊不但是最宝贵的友谊，而且它将是永恒的。哥本哈

根的会见，使我这种感觉和信念更加巩固了。

这次的世界妇女大会，有调查团中的八个代表出席了（按国家来说，将及调查团的半数）。这原是每个人意想中的事情，可是一见面却又是那样的惊喜，好象又是一次意外的相逢似的。那种亲热狂喜的情形，真象失散了多年，突然聚首了的亲姊妹一样，竟引得会场里千百双钦羡的眼光，都向我们投射过来。

在作为大会会场的体育大厦中，第一个找到我的是坎德拉瑞亚。她一经发现了我，便老远地张开两臂，一面尖声叫着，一面就向我勇猛地扑来。于是，我竟象她的猎获物似的，一下子就被紧攥在她的臂中了，足有半分钟的时间，我被攥得透不过气来。她一边吻着摇着，一边亲热地唤着我的名字，随着就流下了眼泪。当她的激动稍微缓和了下来之后，才带着一种胜利的骄傲告诉我：她已经被选为古巴妇联的副主席了。她说：

“人民是不会错待我的，好战分子的迫害有什么用呢？”

为了庆祝她斗争的胜利，我们又一次热烈地抱在一起了。我的两腮印了不少鲜红的唇印。

这位年轻的古巴女律师，有着火一样的热情。她喜欢穿大红的外套，有时把长发披在肩上，有时又梳成个古老的发髻。她不惯于小声说话，但她的声音却非常富于音韵，谈天也好，开会也好，她总是抑扬顿挫，朗朗高声，仿佛在诵读一首美丽的诗，面部的表情也在随时变化着。不管在什么场合，她常常是闻歌起舞，见景生情，那种过分豪放和易于冲

动的狂热劲儿，好象没有什么力量可以制止似的。她偶尔也表现沉静，但看起来总有点不适合她的身分。老实讲，在朝鲜共同工作时，我是不怎么喜欢她的，我觉得她未免太任性了。

然而，现在我对她的印象却有所改变，我感到在我面前的并不是那种缺少深刻思想的妇女，而是梅里美笔下的一个非常生动的人物——卡尔曼^①的形象竟活现在我的眼前了。但她的可爱倒并不在这里。

美帝国主义者对朝鲜的惨无人道，激起了坎德拉瑞亚的深沉仇恨，朝鲜妇孺的无辜受难，给她的悲痛更深。在朝鲜的时候，她是最容易动感情的一个。有一次，朝鲜主人为我们放映了一部联合国空军轰炸朝鲜平民的影片，当一个负伤的婴儿抓着被炸死的母亲的乳房惨叫时，坎德拉瑞亚把脸一蒙就放声大哭起来，引得在场的人都泣不成声。就这样，她从朝鲜归来之后，便在柏林国际民主妇联的大厦中，用三天三夜的时间，把长达三四万字的调查团报告书《我们控诉》译成了西班牙文并打字付印了。

不久她回到古巴，便到处召集群众开会，把她亲眼所看的美军暴行和朝鲜人民的英勇不屈如实地讲给被蒙蔽的人民。她宣传的影响遍及拉丁美洲二十几个殖民地国家。根据她的勇敢和热情，她的煽动力之大，是完全可以想象的。这之

① 梅里美是法国十九世纪的浪漫派作家。卡尔曼是他的名著短篇小说《卡尔曼》里的女主人公——这是一个泼辣、风骚、绝不妥协、视死如归的波希米女性的典型。

间，她曾经被捕过，而且不是一次。在被审讯的法庭上，她以律师的身分为自己做辩护。她理直气壮、侃侃而谈，她那锋利的口才和尖刻的讽刺，竟使狡黠多端的美军审判官也奈何她不得，在正气面前，他们手足失措了。有一次，开庭的第一句话是：“亲爱的坎德拉瑞亚小姐，今天你少说两句行不行？”审判官的态度虽是恼怒的，却分明是乞求的语气。自然，坎德拉瑞亚是连半句也不肯少说的，因为她热爱正义和真理。她说：

“我的眼睛激励着我的良心，我的良心必须遵从我的眼睛，因为它是最公正的。你们不要企图说服我，除非我死了，绝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我说真话！我信任的只有我自己的眼睛。”

就这样，审讯的结果，她被处以罚金。但她不气馁，她设法交足了罚金，于是，她又到处讲演了。被捕、审讯，辩护和罚金，就这样地周而复始。当我们这次在哥本哈根见面时，她已经被捕过四次了。

这段斗争故事是摩尼·费尔顿在第二次来中国时讲给我的。早在那时候我就渴望着和坎德拉瑞亚再次见面了。一想起她，我就仿佛看见在那森严的法庭上，旁若无人地侃侃辩论的英雄姿态和那又潇洒又泼辣的风度。因此，当她狂热地向我表示友谊时，我也以衷心的热情回答了她，我觉得她是多么可爱呵。我们的友谊突然不知增进了多少倍。

就在这一天，所有到会的曾经同去过朝鲜的朋友，全都见面了。我们相互交流了那么多不平常的友情，我的心一整天都在友爱的温暖中激动。我的两臂发酸，连鼻子尖也印上

红色的唇膏了，同志们和我开玩笑：

“喂，我们的女作家的鼻子被谁咬破了呵？”

会场里，不可能有畅谈的机会，而这样的匆匆一叙，是没有人感到满足的，这是多么不容易的相逢呵。于是，为了纪念我们战斗的友谊，为了纪念调查团赴朝归来两周年，就在第二天晚上，我们向大会请了假，在丹麦朋友卡特家里，开了一个虽是小小的、但却是意义重大的谈心会。不巧的是，坎德拉瑞亚和阿巴西亚（阿尔及利亚代表）临时得到大会通知，她们的大会发言就排在当天晚上。因此，她们只来了一会儿便匆匆赶到会场去了。我们的小会少了一个热闹人物，真是减色不少呢。

主人卡特是一个美丽而文静的中年妇人，一个编辑工作者。为尽地主之谊，她竟准备了那么丰盛的美酒佳肴招待她的嘉宾。据说她的经济是并不充裕；摩尼卡告诉我，从朝鲜一回来，她便失业了，——虽然她在调查团里仅仅是一个观察员。

她是勇敢的。在朝鲜调查期间，她和我们一道奔走，一道工作，她的感情、行动的脉搏都是和我们一起在跳动的。回国后的事实也证明了，在控诉帝国主义的暴行上，在歌颂朝鲜人民的顽强不屈上，她是尽到了她所能尽到的一切努力，同时也收到了所能收到的一切效果，虽然她是“客观”的。

如今，她却再不“客观”了，她是以主人的身分把每个人的杯子都斟满了酒，随后便先把自己的杯子高高举起说：

“今天，世界上我最好的朋友都在我家里了。我衷心欢

迎最亲爱的朋友们。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去朝鲜的体会，忘不了我们战斗的友谊……”说着，满怀真情的眼泪就流下来了。她用这第一杯酒咽下了哽咽，接着又斟满第二杯着重地说：“我更忘不了伟大的中国，没有中国的宝贵支援，我们的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那样好的。亲爱的白朗，让我为伟大的中国干一杯吧。”

所有的杯子都举起来了，所有的视线都集中到我的脸上，那里面蕴含着多少对我们祖国的热爱与钦敬！特别是那些纷纷而来的赞颂，我纵然接受了中华民族的谦虚传统——不惯于表现自己，也禁不住要为我亲爱的祖国而感到自豪了。

这时候，爱讲故事的摩尼卡又讲了一个我们中间的故事：六十五岁的日尔曼·韩尼瓦回到比利时之后，每次讲演的时候，都要把中国送给她的那套蓝斜纹布制服穿起来，模仿着中国女同志的习惯，把小帽戴在后脑上，而后雄赳赳地往台上一站，首先是赞美一番中国的伟大可爱，接着得意地指着那身稀罕的衣服说：“这就是中国人民送给我的呵。”她不但把那套制服当作她光荣的标志，同时也作为她号召群众的武器之一了。

“你知道，她到中国之前，对中国是抱着怀疑态度的。”摩尼卡对我解释说。

听了这个故事，我的眼前立刻出现了一个细高个子、笔挺的胸膛、有着一双严厉而固执的大眼睛的比利时老太太。在朝鲜的时候，她总是瞪着眼睛，不喜欢说话，流露着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神气。她的眼球是灰黄色的，因之，当她生起

气来，就特别显得可怕。可是，半年以前，在维也纳我们再见时，她对我却是那样地天真和热情，她的眼睛变得是多么亲切而慈祥。可惜这次她没有来。

在我们中间，还有一个老太太，那就是丹麦代表爱德·巴赫曼，我们调查团的第二副团长。现在她不但是以主人的身分欢迎着我们，同时也以主人的身分为招待所有出席大会的各国姊妹而忙碌着。因为她是丹麦妇联的负责人之一。她告诉大家她回国时的心情：

“当我从朝鲜回来走下飞机的时候，突然发现大地一片青葱，就象小孩抱着的碧绿色的球一样，真是美丽极了，我就想：是保护这个球呢，还是让它粉碎？就在那瞬间，我就对自己发下了誓言：我要为保护它进行一切必要的斗争！正因为有人在企图毁灭它！”说着，随即举起杯来，用深情的眼睛望着苏联朋友奥夫桑尼柯娃（《苏联妇女》杂志主编）说：

“我们顺利完成调查任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谁对谁都毫不了解。可是我们中间有一个了不起的人，她一下子就把我们二十个人捏在一起了。”

“是的，她正是我们调查团中的一个点……”西德的黎莉·瓦赫特还没有把她的意见说完，奥夫桑尼柯娃就接过话头纠正说：

“不对！我们是二十个点合成一个点。相信真理，就会战胜一切；勇敢地说真话，正是战胜一切的力量。还是让我们先为大家的勇敢干一杯吧。”

从“勇敢”的话题开始，我们的回忆就象一条滚滚东流的长河，无止境地流向两年以前去了。

在那血和火交织着的土地上，我们遭到过机枪的扫射，碰到过炸弹和舰炮的轰击，但顽强无畏的朝鲜人民，给了我们巨大的鼓舞与感染，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表现过丝毫的畏缩和恐惧。那种镇定的品质，已经预示大家回国后的行动了——她们每个人为和平都做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如今，和平的力量把普天下善良的男女都团结起来了，我们这些一道战斗过的朋友又欢聚在一起。回想我们共同工作期间，并不是那么风平浪静的，也不是一开头就是融洽无间的。我们是来自天南地北的素不相识的一群，由于信仰不同，意见也就难于一致，因此，我们有和平的相处，也有尖锐的斗争。我们就是在那不断的斗争中逐渐趋于团结一致的。摩尼卡第二次访问中国时，几次和我走过沈阳交际处会议厅的门前，她总要想起调查团出发前那一场长达五小时的辩论，她总是嘻嘻地笑着说：

“亲爱的，还记得吗？我们的友谊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从斗争开始的。那一天，你气得活象一个胖菩萨。说也奇怪，就在你驳斥我的观点时，我就喜欢上你了。”

那时候，我刚去过朝鲜回来，一谈到朝鲜人民的灾难，我便禁不住悲愤得浑身发抖，自然，当有人对美军暴行还抱着怀疑态度时，我就更不能不激动了。那时候，我是第一次参加国际活动，没有经验，动不动就想发火，常常是企图用简单的方式解决极复杂的问题。但，就在调查团短短的工作

期间，我却在这方面接受了不少宝贵的教益。苏联朋友奥夫桑尼柯娃（就是黎莉讲作“一个点”的）就是我最好的老师。她说：“别性急。事实胜于雄辩，真理是永远不会驳倒的。让大家先去看看朝鲜的真实吧，等看了之后，一切一切实际的论调都会不驳自倒的。”

奥夫桑柯娃不是调查团的首脑，但她的智慧和魄力，她的勇敢和无私，使每个人都对她产生了不可动摇的尊敬和信赖，大家都喜欢围绕在她的周围。她在调查团中的威信，是超过任何人的。

当我们分组调查时，她曾带头跑到当时最危险的重点轰炸区，勇敢地完成了任务。她说在苏联卫国战争时，她曾在前线活动四年，法西斯的一切暴行她都司空见惯了。正因为如此，对朝鲜人民的灾难，她也就寄予了比别人更多的同情。有一次，她流着眼泪严肃地对大家说：

“朝鲜人民的苦难，超过了当年苏联人民所遭受的。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可曾知道，我们现在所享受的优厚的招待，都是朝鲜人民勒紧了裤带供给的。因此，我们多在朝鲜耽搁一天，就要多一些朝鲜人民挨饿。虽然他们是双手欢迎我们的，而我们却不能不想一想他们的巨大负担！”

很多人被她那充满了同情的话感动得哭了。从那以后，调查团的活动便更加紧张起来，差不多是日以继夜地奔走、工作着。每当精疲力竭的时候，一想起奥夫桑尼柯娃的话，立刻就振作起来了。因此，我们的任务竟按预计的时间提前完成了。

从此，美帝国主义者侵朝的罪证，就象长了翅膀一样到

处飞传，传遍了地球上每一个角落（因为我们是赴朝调查团的第一个国际组织）。自然，疯狂的迫害也就跟踪而来了。迫害，迫害，多少朋友遭受了无耻的迫害呵。首先是作为英国工党党员的摩尼卡·费尔顿夫人，反动派一发现她去了朝鲜，叛国的罪状就在等待着她了。她从朝鲜回到伦敦，立刻就被撤销她在政府的职位，接着就宣布要处她以绞刑。可是全世界人民的抗议和她不屈的斗争，把反动派的气焰吓退了，终于没敢那样执行。当她荣获了斯大林国际和平奖金之后，曾再一次去朝鲜访问了英美战俘。在维也纳世界和平大会上，她曾把战俘对和平的呼吁客观地报告给全世界人民。她以顽强的战斗在西方树立了一面光辉的旗帜，被爱和平的西方人民深深爱戴着，使反动派再也不敢对她妄施淫威。因为他们已经领教过“越是迫害越使真理传开去”的惨痛教训。不过，反动派的阴谋伎俩是无穷无尽的，对整个的和平事业，他们还是用尽了阴谋在破坏着。去年三八节全英妇女大会召开之前，摩尼卡曾经电邀中国妇女代表去出席英国妇女第一次盛大的集会。而英国政府竟露骨地以“英国政府的政策是不允许在英国领土上召开有关和平的会议”为理由，拒绝给予中国代表入境签证，因此，我们便没有去成。下面就是摩尼卡在愤怒和失望中写来的一封信：

亲爱的白朗：

由于你的不能来英国，我相信你可以想象到我是多么的愤怒和失望。不仅仅是我一个人如此，而且很多盼

望见到你的人也一样。你一定已经听到了我们的抗议，自然啦，我们还要继续不停地抗议……

有一天，我和几位朋友谈到我们在朝鲜访问慈爱院时，一个小男孩抱住你痛哭的那个故事。你知道，人们不容易看到英国人流眼泪的，但是当我讲完这个故事时，他们都哭了。他们说，仅仅述说我经历的这些故事，比做些正式讲演要感动人得多。事实上，我想我们也正在改变着社会舆论。由于我们更接近胜利，反对我们的力量也更加尖锐和残酷，自然我们的处境也更加困难了。但是，我们满怀信心地斗争着，希望时间许可我们完成所有需要完成的任务……

关于摩尼卡，我和她相处的时间最长，因此我对她的了解也最深。她的斗争故事，这篇短文是没法容纳的。总之，她实在是调查团中最突出的一个聪明人。她从四岁就因骨结核症残废了一只腿，走起路来十分不便，正因为这样，她的脾气也就非常暴躁。可是，当她工作起来的时候，那种精力充沛的劲儿，真象一只不知疲倦的雄狮。从朝鲜回来以后，她虽然不停地奔走呼吁，还抽空写成了一厚本关于朝鲜的书。在上面那封信里，她还告诉我：

五月里，我要到加拿大报告朝鲜的事情。我另外还有其他的计划……象你一样，我感到在这么多的活动中去写作，是困难的。但是虽然如此，我在布拉格还借了

一部打字机，要继续写我那本关于中国的书。……

在哥本哈根一见面我就问她那本书写得怎样了，她说：

“快成了，不过很不好，要想写得深刻，还得再去一次中国。”

她热爱中国。她曾一再地告诉我：她在中国学到了很多宝贵的东西，——譬如批评与自我批评吧。现在脾气已经好多了。

在我们这次谈心会上，当大家为她的荣誉祝贺时，她抚摸着她胸前那颗闪亮的金质奖章又诚恳又严肃地说：

“这荣誉不是我个人的斗争所能赢得的，这里面有着每个朋友的功绩，我应得的不过是它的二十分之一罢了。”这是她的心里话，看得出来，那完全不是虚伪的谦逊。

在我们中间，还坐着笑容可掬、沉默寡言的黎莉，她也是被大家赞誉的对象。谈到了她，我又记起了1951年10月间，参加过调查团的三个中国代表，突然收到的一封急信。信是从斯图加特保障人权自由同盟发来的，说是西德代表黎莉·瓦赫特在一个群众大会上，被美军军事当局指使下的德国警察逮捕了。她将在美军军事法庭受审，她的自由处在危险中。信上说：“特请你们援助我们，也就是援助黎莉·瓦赫特去打破那些禁止她说真话，并禁止她为伟大和平事业服务的美军计划。你们如果同意列为保卫黎莉·瓦赫特委员会的委员，即请把信寄到……”

自然，我们立刻就起而支援并发出了严厉的抗议书，还特别去信向黎莉进行了慰问。终于黎莉重获自由了。在维也纳的和平大会上，以及在哥本哈根的妇女大会上，她又以英雄的姿态出现了。摩尼卡告诉我们，在黎莉受审时，她特地赶去出席，为的是给黎莉以某种支持。她赞叹不止地说：

“黎莉在严重的审讯而前是那样的若无其事，她的幽默的讽刺简直把美军气坏了。”

黎莉用谦逊的微笑答谢着朋友们对她的敬爱。她那安详的态度，浑厚丰满的面容，会使人联想到一个温柔善良的慈母，——她平常是那样的憨厚慈祥、与人无争，而当孩子们和平生活受到侵害时，她就要毫不让步地为保卫和平而奋不顾身了。

在这次难得的聚会中，我们的谈话越来越兴奋。我们时刻都要想起那一半以上没有到会的朋友们。一谈到她们的时候，空气就更显得活泼了。我们不时地用面前的刀叉敲着盘子，拖长每个音阶叫着：“雷——黛——斯”^①这正是我们怀念罗德夫人的表示。因为在朝鲜的时候，罗德夫人常常在大家的喧哗声中，用这种方法使大家在一阵大笑之后，立刻鸦雀无声，静听她布置工作的通知。

我们也想起了法国朋友格莱兹。她原是巴黎《今晚报》的编辑，在调查团中，她和我都是编辑委员，因此，我们就有较多的机会接触。她非常文静，也非常精明，在某种争论中，她一向都是站在正确的一面，她那优雅大方的风度，是

^① 即英文 Ladies 的译音，“女士们”的意思。

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尊重的。

她回国以后，《今晚报》停刊，她失业了。但她并没有因生活的困难而消沉，她不但在法国坚持活动，还到国外去讲述朝鲜的事情。可是，这是有困难的。比如当她要去瑞士的时候，法国政府就拒绝给她签证，他们的理由是：

“我们知道你去瑞士的目的——你讲演就不发给你签证！”

“我不讲演！”格莱兹非常认真地说。

“保证？”

“当然保证！”她肯定郑重的语气，使反动派没法不信以为真。他们无可奈何地威吓着说：

“假如你破坏了你的诺言，我们就要重重地制裁你！”

“好吧，只要有人看见我在瑞士群众会上张一张嘴，我就甘领一切惩罚。”

就这样，签证终于被她弄到手了。她真的没有破坏她的诺言——在瑞士她没有讲演，但是呵，瑞士人民却听到了她的声音。原来她把她的讲演悄悄地录好音带去了。在瑞士群众大会上，她站在广播机旁，一句话也没有讲，可是瑞士人民都知道那声音是发自格莱兹热情而激愤的心灵的。

反动派被她的智慧愚弄了！

在哥本哈根，我欣喜地收到格莱兹一封充满了友爱的信。她告诉我：去年在巴黎成立了法中友好协会，她正为这个协会的工作而忙碌着。信内还附来一张她最近的工作照片。在那瘦削的漂亮的脸上，闪烁着一双深思的秀丽的眼

睛，贯注在她面前的原稿纸和笔尖上。

我们的回忆是无边无际的，夜太深了，我们只好在互相致敬与祝贺声中结束了这次有意义的聚会。临别时，我和奥夫桑尼柯娃特别向在非人民民主国家中为和平而工作的和被迫害的朋友致以崇高的敬意，她们在那样艰难的环境中坚持斗争，是要非凡的智慧和勇气的。奥夫桑尼柯娃高举她有力的手臂说：

“朋友们，更勇敢的战斗吧，我们在支持你们！”

我怀念着远方的朋友，在这三八节的前夕，她们一定在布置着一个新的斗争来迎接自己的节日。我渴望着知道她们的消息。

1954年三八节前夕

友谊的花

一到满洲里，就可以遥望到苏联的国境。只要几分钟的时间，火车便把你载到奥得堡。从此，你便将陶醉在友情的温暖之中了。是凡到过苏联的同志，都会有着这样深刻的体会：只要一踏上那块神圣的土地，就象到了自己的家里一样。离开了亲爱的祖国，既不会感到异国的生疏，漫长的旅途，更不会觉得寂寞和无聊。苏联朋友火一样的热情把这一切全熔解了。每一次都是这样：从奥得堡车站开始，我们就一变而为久别归来的亲人，享受着每一个苏联朋友的热情和友谊——虽然我们原本是互不相识的。假如你是一个苏联人民所熟知的人物，一经被发现，就会立刻被团团围住。上次我们中国妇女代表团在去哥本哈根的途中，扮演“白毛女”的田华同志，在奥得堡车站上，就突然被一大群苏联男女青年包围了。车站书店里的“白毛女画册”一转眼就卖光了，大家就要田华在那些画册上签名、题字。虽然明知语言不通，而那些热情的苏联青年还是不住地问长问短，围着她不肯离去。有的献给她一束鲜花，有的在她的胸前挂上一枚纪念章，有一个老太太捧着一盒化妆品冲进人群往田华怀里一

塞，也不提名报姓便匆匆赶车去了（那一天，我相信一定有些人错过了火车）。另一个带着个小男孩的中年母亲买了一大瓶最名贵的香水，命令她的孩子送给田华，可是孩子太兴奋了，跑着跑着便跌了一交，香水瓶打碎了，孩子急得想哭，母亲却并不责怪，马上又跑到车站商店里重新买了一瓶，孩子终于完成了这个光荣的任务，高高兴兴地投到母亲的怀里去了。

奥得堡距离莫斯科，有着将近一个星期的路程。一上火车，舒适的车厢便做了我们临时的家。这座流动的房子载着我们漫游着苏联自由辽阔的土地，穿越过茂密的森林和巨大的江河。纵使在西伯利亚白雪茫茫的原野中，也会饱尝到友情的芬芳。在七八千公里漫长的旅途中，中国人的服装面貌对每一个苏联朋友早已不是生疏的了，一路上，有着多少苏联的劳动人民向我们伸出欢迎的手臂呵。只要他们发现车厢里有着中国朋友，他们便不惜暂时停下工作，一直招手欢呼到火车去远了的时候。不同的语言一点都阻碍不了我们的情感相通，畅叙友情的有着美丽的鲜花和歌曲；那些洋溢着甜香的鲜花呵，那些满含着友情的歌子呵，使整个车站沸腾着一片欢欣的情绪，使老年人都忘记了自己的年龄，愉快活泼地投入到年轻人的行列，高唱起友谊之歌：

中苏人民是永久弟兄，
两大民族的友谊团结紧；
淳朴的人民并肩站起来，

淳朴的人民欢唱向前进。

.....

歌声唱出了中苏人民的友谊，歌声唱出了我们的力量和相互的敬爱。

在车厢里，在我们这个虽是临时的家里，我们时刻享受着无微不至的照顾。餐车上的同志生怕影响我们旅途中的健康，总是体贴入微地使得饮食尽量合乎中国人民的口味，她们每个人都闪烁着一双充满了爱、充满了关怀的眼睛，假如她们发现谁吃得少了，就一定要找出原因来。因此，我们便不得不竭力吃完个人应有的一份菜食，晕车的同志也不敢声张，他的一份只好偷偷地由大家分吃了。

在这六七天的日子里，火车上的苏联同志都成了我们最亲密的朋友。虽然是短短的相处，却产生了深厚而永久的友情。每当我们快要下车的时候，列车上的工作同志都要向我们做一番情深意挚的欢送。特别是那些女同志们，她们总是流着激动的眼泪接受着我们的临别馈赠，还流着惜别的眼泪和我们互道珍重，那种恋恋不舍的情绪，真象多年的知己一样呵！

这一切只不过是中苏友谊汪洋中的一滴海水，是毫不新鲜的普通事物。然而，最普通的事物不正是最典型的事物吗？

友谊的种子已经遍撒在中苏人民的心里，友谊的鲜花正在到处开放。让我们欢呼中苏友好万岁吧。这就是和平最可靠的保证。

1954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纪念日前夜

在斗争中成长

高高的身材，健美的体态，在谦虚诚恳中蕴含着一种刚毅的个性——她那又淳朴又大方的风度，充分说明了她是一个富有智慧和才能的农村青年女干部。

她就是出席哥本哈根世界妇女大会的中国代表之一、山西省平顺县西沟村李顺达农林畜牧生产合作社的副社长、青年团员申纪兰，一个出色的劳动模范。

纪兰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家，重男轻女的父母对她是一贯厌恶的。她从小就喜欢劳动，想用不懈的劳动争取和哥哥弟弟们同等的待遇，但一点也没有用，封建的父母是那样的不公平，不但不赞扬她爱劳动的美德，反而束缚她的劳动热情，认为女孩子到田野里去是一件伤体面的事情。

村妇联主任是顶公平的。当她发现纪兰是个好劳动的女孩子的时候，便找纪兰谈话，鼓励她，教育她，提高她的觉悟。纪兰便不顾家庭的反对，响应了政府的号召，积极地发动村里的妇女纺织，并被选担任了小组长。不久，她便被送到县里的纺织工厂去学习织布，回来后训练了更多的织布女工。这时她才十七岁。

十二岁上，纪兰就订了婚。不久，未婚夫便参加了解放军，纪兰虽然不好意思表示高兴，却暗暗感到光荣。

可是，落后的公婆却舍不得让儿子去为祖国效命，想用儿女柔情把他留在家里，同时也不喜欢纪兰出头露面。因此，当纪兰参加工作不久，公婆便设法想把儿子从部队上叫了回来，强迫纪兰和他结婚。

公婆的自私行动，使纪兰感到十分气愤。她毅然地拒绝了结婚的命令。她说：

“我坚决不和一个落后分子结婚！”

“他是一个光荣的解放军，怎能说他落后呢？”媒人说。

“打仗重要呢，还是结婚重要？为了结婚就做了逃兵，他哪一点进步呵？”

“他是请假回来的。”确实有假条作证。

但，不管怎么说，纪兰还是坚决不肯。公公没法，只好去找村妇联主任。结果，还是丈夫当面接受了她“婚后立刻归队”的条件，纪兰才答应结婚。

小夫妻的感情象蜜一样甜，自然不舍得远远地分开。但纪兰却没有忘记保家卫国的责任，她克制着火一样的爱情，耐心地等待丈夫实践诺言。年轻的丈夫确实被她的温存留恋住了。纪兰看他没有归队的决心，便三番两次地动员：“咱们结婚以前你是怎样答应我的呵？”

丈夫被她质问得好不脸红，只好说：

“要是你真心情愿，我就回去。”

就这样，他们结婚不过十天，丈夫就离开了她重返前线，如今算来六年多了，一次也没回来过，现在正在抗美援朝的最前方英勇地战斗着呢。

丈夫走后，纪兰算丢下了一件心事。可是，责难和冷眼竟纷纷地来了。公婆整天抱怨她不怀好意赶走了他们的儿子；父母一见面就骂她不知好歹、不尽人情；在公婆家既遭受冰一样的冷待，回到娘家也得不到丝毫温暖。同时，照老规矩，做了媳妇就得侍奉公婆，再也不能出去工作了。日子是这样的难过，纪兰有点心灰意冷了。幸好，村妇女部长——李顺达的母亲知道了她的处境，便鼓励她说：

“好孩子，你的前途远大呵，别灰心，地位是要自己去争取的。咱山西是老根据地，有共产党领导，什么也不怕，好好学习，好好劳动，我可以给你一切帮助……”

慈母般的关怀和教育，使纪兰得到了从未享受过的温暖，增加了她的无限勇气和信心，她不管公婆同不同意，在不妨碍家事的原則下，又重新参加了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到1949年，她便入了青年团。在群众中，纪兰的威信越来越高，因为她生产积极，深入群众，喜欢动脑筋，工作能力也强，在劳动英雄李顺达（共产党支部书记，合作社长）直接培养之下，1951年纪兰便当了合作社的副社长。不久，李顺达就出国学习去了，整个社务便落到纪兰的肩上。她真发愁呵。

1952年春天，李顺达农林畜牧生产合作社的生产范围扩大了，加上区里发动妇女生产竞赛，因此，进一步发动妇女

就成了申纪兰的主要任务。在区干会上，她订了个“妇女小组五天锄完三十五亩麦地”的计划，心里可是没有底，她一路走一路想：要是合作社落在互助组后边可丢人啦。

果然，一开头就遇到了困难。有些男社员认为女人定计划是瞎胡闹，一定完不成；妇女认为按“老五分”记工制度不公平：“为什么男人做多做少总是十分？”纪兰了解了问题的根源所在，便一面巩固妇女的生产情绪，一面在社务委员会上提出了同工同酬的原则。这自然遭到了部分社员的反对。

发动妇女竞赛时问题更多：有的说家里活计多；有的说孩子没人管；更有人认为技术不行，赶不上男人。纪兰便向上级反映，请求帮助。结果，上级就派了两个男社员到两个妇女小组教技术，党支部宋金山也亲自出马了。

当纪兰动员李二姐的时候，女社员都说：

“你算了吧，那个懒婆娘，要能把她动员出来才见鬼呢。再说，她那么大年纪了能顶什么用。”

但纪兰却认为，妇女解放要大家解放才行，积极分子起带头，就要把落后的首先带动起来。她去了，果然，把纪兰说了个舌焦唇燥，李二姐一点也不开窍，竟恶言恶语地把纪兰给斥出来了。她说：

“没地位就没地位吧，吃不好穿不上我认命，你穿好的去吧。”可是，纪兰走后，她回味了纪兰的苦口婆心的劝告，联系了大半世的苦生活，慢慢就想通了，第二天，她竟偷偷拖着锄头下了地，当天，就在纪兰的鼓励和帮助下，做

出了很好的成绩。大家公认纪兰发动群众成绩大，要选她当模范，纪兰却说这是大家的功劳。同时提议把模范的光荣给了李二姐，还在广播筒里广播了。听说二姐当了模范，村里好多男女不服气，都说：

“哼，李二姐也配上广播，哪个不比她强？”

“都下地都是模范。”纪兰乘机鼓动了一番。

这样一影响，第二天，不下地的都下地了。纪兰那一组三天就完成了五天的计划。三十五亩麦地锄得一根杂草也不留。一贯看不起妇女的张治修老汉晃着脑袋说：

“以后可不敢乱说话了，妇女真行呵。”

可是，同劳同酬，好多男人还是不能接受。妇女们的意见越来越多，好多人不想下地了。纪兰怕顺着她们喊不平，引起反效果，只好再三解释：“咱的成绩还赶不上男人，咱要比过去，看现在，闹将来。”其实，纪兰早已在社务委员会上尽量争取了。

有一天，女社员张雪花和男社员马玉兴去耙地，马玉兴站耙得十分工，张雪花牵牲口只四分工。张雪花不服气，要和马玉兴换工。马玉兴奚落她：

“你站耙不怕跌下来？”

“少废话吧。你来赚这个牵牲口的女人工，我站耙可得给我男人工。”

“行！”

结果，张雪花和她的女伴们一天就耙完了七十亩地。这一天，她们算第一次评了男人的工分，生产热情立刻就提高

了。以后，无论是担粪、间苗、修河滩，女人从来也没落在男人后面，在比赛中，女人竟赶到男人的前头。这样一来，男社员个个心服了，还编了快板赞美妇女：

“西沟妇女真是行，赛过宋朝穆桂英，阵阵不离场场到，每次战斗逞英豪！”

从此，取消了老五分的评工办法，实现了同劳同酬。纪兰并及时纠正了一部分技术差的女社员平均主义的错误思想，还建立了农忙托儿组，请了三个老太太当保姆，使八个母亲也下地劳动了。为了照顾妇女的体力和特长，纪兰又建议把男女分组劳动改为男女混合劳动，并按妇女身体的强弱和技术的高低实行了科学的分工。从此，合作社土地产量大大提高，还抽出了不少剩余劳动进行了副业生产，不但改善了社员的生活，更为全社置下了好大一份家业。别的不算，单是1952年就增加了五百多只羊。

社内出现了团结友爱的新气象，男社员非常关心女社员，有什么困难他们都给解决。去年全社六十六个劳动模范中，妇女就占了二十八人。

和睦民主的家庭，也在妇女积极参加生产中出现了。妇女在家庭的地位普遍提高了。纪兰的婆婆对媳妇比对儿子都关心。

“我儿不在家，你还不跟我儿一样，咱一家生活全靠你了。”

“可别让纪兰做家活了，她又要生产又要工作，把孩子都累坏啦！”公公也说。从前谁管纪兰死活呀。从前是纪兰

做好饭，公公不回来不敢吃，现在是婆婆把饭做好等纪兰，有时，纪兰换下来的衣服来不及洗，婆婆就悄悄地给洗了。

总之，纪兰在家庭里的地位简直翻了个过。

从前受丈夫气的张雪花，比丈夫挣的工分都多，她的腰也直起来了。丈夫说：

“从前把你当个吃闲饭的，现在你可变成家中宝了。”

“咱们两宝秤一宝，共同把社办好。”张雪花心满意足了。

纪兰常说：“只有依靠党和毛主席，走群众路线，才能把工作做好。大家都解放了，我自己也解放了。”她还总结出一条经验，劳动就是光荣，斗争才有地位。

这次来到苏联，她的感想很多，可惜这篇文章已经容纳不下了。纪兰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这次真是千里取宝呵！”

1953年6月末在莫斯科

祖国在昂进中

近年来，到中国来访问的外国朋友——特别是西方各国的朋友——一天天地多起来了。他们来的时候往往是带着某种善意的疑惑：新中国的人民果真从贫困中挣脱出来了吗？

我们绝不该责怪这些朋友对新中国的无知；恶毒的谎言充塞了西方的宣传市场，被蒙蔽的人们是不会相信真实的反映的。

然而，当这些怀疑的朋友来到中国之后，活生生的事实，就禁不住要使他们惊叫：“新中国真是一座奇迹的花园呵！”当他们离开中国的时候，结论往往是不约而同的：谎言与欺骗只能蒙蔽那些白痴和盲人；幻想家的梦想无非使自己徒增烦恼而已。

是的，我们试做一番并不遥远的回忆吧。

三年前，当美国战争贩子发动侵朝战争的时候，他们是做着怎样狂妄的美梦，他们不但妄图毁灭英雄的朝鲜民族，而且想把刚刚掌握了政权的中国人民拖回到灾难与贫困的深渊。为了不重遭法西斯的奴役，英勇顽强的中国人民才一致奋起，进入了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刚及一年，一切都正在开始呵。一个初生的婴儿，是禁不起风吹雨打的，更何况他是在长期的灾难和贫困的孕育中诞生的呢？

可是中国人民是久经锻炼和考验的。尽管有着侵略者的威胁，他们从未丝毫放弃他们美丽的理想，他们以无比的智慧和顽强的劳动决心把祖国建设成为一个幸福自由的乐园。他们是这样做了，他们是在毛主席的感召和领导下这样做了。每当我暂别祖国、再重返它的怀抱时，那种崭新的气象，就不能不使我这个中国人也大为惊奇了：到处在建设呵，多少亩荒地变成了肥美的良田，多少片旷野竖起了高楼和工厂，只要你离开它一个月，它的变化就仿佛是过了几年。

“人民的生活不会因为支援战争和建设的双重负担而受到威胁吗？”

不但是外国朋友常常这样发问，就是某些对新制度不够了解的中国人，也曾有过同样的怀疑和担心。

可是旧的眼光早已不适用于今天的新社会了。就让我举出眼前的一二小例，来看一看中国人民生活的一般面貌吧。

三年多了，我一直住在我的故乡沈阳。它是在新中国诞生一个月以后才从蒋匪帮统治下解放出来的。那时候，我回来了，我回到我阔别了二十多年的故乡来了。可是，它的残破面貌已经引不起我童年的记忆。工厂破坏了，桥梁、铁路被炸断了，到处是法西斯蹂躏的创伤，到处是善良人民的悲剧……那时候，我真不知我故乡的同胞什么时候才能免于贫

困和失业，因为，法西斯遗留下来的残破局面确实是一时难以收拾的呵。

我的焦虑不过是杞人之忧而已。我们有着能够克服一切困难的党和英明的领袖，我们有着无数创造世界的英雄，我们还有着大公无私的苏联朋友。这一切就构成了不可摧毁的力量，也正是创造奇迹的不竭源泉。当“联合国军”兵临鸭绿江边的时候，我的故乡不但已经是一个规模不小的工业城市，人民的生活也日趋安定了。而三年后的今天呢？

每当我走到街上时，我总不免要暗自发问：“哪来这样多的人呢？”虽然马路是那样宽，却总是放不开步子，倘不小心，就会踩到别人的脚尖。前一年，每逢星期天，最好不要出去买东西，因为那真有被人潮吞没的危险。而近年来，各个工厂调整了休假日（这仅是原因之一），大街上，店铺里，电影院门前……那种臃肿的情景，竟变成天天如此了。尽管百货公司和合作社不断增加，却总赶不上不断上升的购买力，不要说一般季节性用品，就是手表、脚踏车……也常感供不应求。人就象潮水似的，一走进百货公司的门，再冷静的人，也不能不感到眼花缭乱，每个柜台都是拨不开的人群，单是那种“挤”呀，就是一番很辛苦的劳动。但纵然如此，却谁也不肯空手走出来，因为谁也不是毫无目的跑来观光的。

这些人当然大部分是市民和工人。其中也有不少是四乡来的农民。农民买东西跟一般人更是不同，他们往往象办年货似的，东一个包，西一个捆，什么毛线、棉花、蚊帐、卫

生衣、热水瓶，以及床单、被面……提着的，抱着的。这些东西乡下合作社不是没有，可是他们却总觉得赶不上城里的好，宁肯舍近求远。

有一次在百货公司里，我看见一个农村老太太在爱不忍释地摸弄着一床绣花被面自言自语“贵倒是贵点，可是孩子从小吃土咽糠……”我好奇地走过去：“老大娘，办喜事吗？”老大娘展开眉头微笑了，好象要我给她拿个主意似的说：“这位同志，你说就是新事新办吧，新人们也不能不盖床花被呵，咱又不是置不起。”还没等我发表意见，老大娘就把崭新的一叠人民币从怀里掏出来了。

前几天《东北日报》发表了一篇通讯。说是抚松百货商店有一批滞销货——毯子和女用高腰袜（又名舞袜），百货组的葛谭久决心把货带到乡下试试看，可是区上合作社的采购员都打趣地说：“这毯子四十万元一床，多贵呀，农村谁能铺得起？女舞袜！你让大伙听听这个名吧，咱这是山沟呵，哪来的跳舞厅？……”谁知，葛谭久在东岗区稍稍一推销，当天就销了二十八床毯子。至于女舞袜，穿裙子的女学生早就想念它了，只一会儿，就销了六七打。没有穿裙子的女学生，一见有了高腰袜，便急忙买了几尺花布，准备也做裙子穿。

近年来，一直没有机会去农村，农民生活究竟是一副怎样的新气象，不便妄作猜测。可是象前面那些零星小事，却是经常接触的，从这里，也可以窥见农村的一般面貌了。前些日子，由于一个偶然的的机会，我第一次到了铁西的工厂

区，因为过去对这里的事物没有接触，自然看不出它的今昔变化。我的朋友却指着南面的工人新村告诉我说：

“去年这个时节，那里还是无边的荒草，可是就在上冻以前，就有七十八幢大楼齐刷刷地站起来了。今年，你再看哪……”

我看见了，在那边的蓝天下，排列整齐地矗立着一百多幢新式的楼房，许多新起的房架和望不到边际的旷场告诉我：这工程在无休止地继续。近午的阳光照耀着劳动者愉快的脸，他们正是这些建筑物的缔造者。过去，他们不知建筑了多少这样的高楼和更华美的大厅，却从来也不敢梦想走进去稍作停留，而现在，却直接享受到劳动的成果了。我带着无边的喜悦随便走进第八十九幢楼的一家住户，女主人关佩修的丈夫和儿子都参加了工人新村的建筑。当我走进第八十二幢楼房的时候，年轻而健美的刘惠清把我迎进她的房去，她那满脸的喜悦正象那间窗明几净的房子一样。当和她谈起来的时候，才知道她原是在磨难中长大的旧社会的女工，只有当沈阳解放以后，她才懂得什么叫快乐和温饱。现在她已经做母亲了，她说等到孩子稍大，她将要参加祖国的建设，同时也尝尝新社会女工的幸福生活呢。看着她那双闪着希望之光的眼睛，使我记起一小时以前派出所长那一段生动的描写，他说：

“你来的不是时候呵，要是赶上工友上下班，那才好看呢。脚踏车拉成长蛇大阵，简直就象个赛车场。最能代表新生活的是年轻的夫妻工人，你看吧，男的骑辆飞利浦，女的

骑辆捷克式，车靠着车，象散步似的，说说笑笑就到了。尽管厂子有大汽车接送，电车通到家门口，可怎赶得上骑车惬意呢？”我暗想，刘惠清的希望并不是一个遥远的梦，在她的眼前，已经有无数幸福的先例了。

我觉得我仿佛不是坐在一个普通工人的家中，而是走进了一个小有产者的卧室，单是那床边的四只大衣箱和床上的五床崭新的被褥，你就很难想象，在沈阳解放以前，她的丈夫刘少清还是一个一贫如洗的失业车工呢。刘惠清笑着说：

“一提起早先那些苦呵，人家（指刘少清）可会掉眼泪呢！”

桌上新式座钟的时针指到十二点，我才恋恋不舍地离开这间精致洁净的小房和它的幸福的女主人，又到别家去了。

我一连访问了五个家庭，他们的生活情况都是那样可喜的富裕。当我告别了工人新村的时候，工地上的喇叭筒正在放送新闻。

朝鲜战争持续了不算短的三年，新中国人民不但在保卫和平、建设祖国的事业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人民的生活，也正在走向日益美好的明天。饥饿和贫困早已成为历史的名词了。和平的劳动将会带来更多的幸福，在不远的将来，在我国辽阔的土地上，无数个工人新村、农民新村会不断地出现。

新中国的一切，有如初升的旭日，正沿着它自己的轨道在无休止地昂进着。

1953年9月9日

变 化

有一个星期日的下午，我家里来了八个珍贵的小客人。他们都是初中一年级的学生，中国少年先锋队的队员，最大的不过十四岁，小的只有十一岁。是怎样一群可爱的孩子呵！他们的小脸蛋上都是泛着健康的红润，眼睛里闪着幸福的光辉，蓝色的制服都穿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特别是垂在孩子们胸前的鲜艳的红领巾呵，简直把我的房间都映得耀眼明光了。

孩子们是为了求知而来的。孩子们牺牲了假日的休息，怀着火热的求知欲，要我给他们讲一些欧洲的见闻和朝鲜的事情。

这题目是出得再好也没有了。看见这幸福的一群，很自然地便使我想起了挣扎在饥饿与死亡线上的那些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殖民地国家的孩子们；那些惨遭战争残酷摧残的朝鲜、越南和马来亚的孩子们；还有那些备受国家关怀爱护与培养的苏联以及东欧各民主国家的幸福的孩子们。

用不着准备，只凭着我那些记忆犹新的见闻，我便为孩子们讲了很多很多。孩子们张大着眼睛静静地听着，象大人

似地板着严肃的面孔，并且不时地发出吁叹。是同情那些可怜的孩子们的悲惨遭遇呢？还是引起了自己的苦难记忆？我想，在这八个孩子当中，两种情感都会存在的。只有当我谈到苏联儿童的美好生活时，孩子们才恢复了天真的表情——他们互相交换着欣喜的眼色和神秘的微笑——那种向往更幸福的未来的微笑呵，真是多么美丽呢。孩子们仿佛已经窥见到灿烂的明天了。

我的话很想在这种愉快的气氛中结束，但孩子们还舍不得离去，他们希望知道更多的事情。

“讲吧，再讲一些吧。”

我还能讲些什么呢？我要他们再出个新题目给我。于是孩子们开始考虑了，有的低头沉思，有的就用眼睛在我的房间里搜索起来，仿佛要从某一件什物上得到一些启示似的。

突然，一个孩子清脆地叫了一声：“呵，毛主席！”就奔向正面的墙壁，接着大家都跳了起来，一窝蜂地向他涌去。

原来孩子看到我墙上挂的那张照片了——那是1942年《延安文艺界座谈会》的留影，他第一眼就看见了正中坐着的毛主席；随即，朱总司令也很快就被孩子们发现了。他们兴奋地争看着，辨认着，并且议论着：

“毛主席比现在瘦多了。”

“朱总司令也不胖呵。”

“你们看见过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吗？”我随便地问了一句。

“怎么没见过？”孩子们同时骄傲地回答。好象我这个问题使他们受到屈辱似的——堂堂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还能没见过毛主席吗？

“就在国庆节那天，天安门上。”孩子们争着告诉我，“毛主席可健康啦！他对我们招手呵，笑呵，……”

多象一群小麻雀呵，他们再也不肯安静了。一提到毛主席，孩子们眼睛明亮亮的就象水晶石一般地发光了，好象亲爱的毛主席就在他们面前一样。

聪明的小队长一下子就把题目想好了。他说：

“就给我们讲讲延安的生活吧？”

“延安的生活吗？那已经是很遥远的故事了。我好象感到过了整整一个世纪。”我不假思索地随口说。但语音刚落，我自己就感到我的夸张也太过火。仔细想来，离开延安只不过是八年前的事，怎么可以在孩子面前这样夸大其词呢！

有着很强理解力的孩子却一点都没觉得我在过甚其词，反面很深刻地替我做了恰当的注解。聪明的小队长说：

“那可能是因为生活的变化太大太快了吧？”

“对呀，对呀，”我连连点头，“这几年的生活，确实赶得上过去一个世纪的变化，这是翻天覆地的大时代呵。你们的生活不也有很大很大的变化吗？”

孩子们都爽朗地应着。

似乎为了证实这个“变化”的理论，孩子们一边用赞赏的眼光在观察我这所精致而舒适的新屋，一面若有所感地问

道：

“在‘陕北风光’里我们看到延安全是土窑洞。那时候毛主席是不是也住在土窑里？作家也在那里写文章吗？”

就从窑洞开始，我向孩子们描述了一番我们延安时代的衣食住、工作和学习——我讲到开荒、讲到纺线、讲到修机场；讲到开窑洞、盖房子；讲到烧木炭、做肥皂；讲到延河的水和边区勤劳朴素的人民；也讲到发芽的麦子、洋山芋和孩子们的维他命——西红柿……

孩子们的问题，引起了我无边的回忆，开始觉得那么遥远的故事，一谈起来，却又仿佛象昨天才发生的一样。

“靠着共产党智慧的头脑和万能的手，领导着延安的农民，把那些不长草的荒山都变成了良田。就是你们在电影里看见的那些山哪，不单是生产着足够的粮食、棉花，也同时做了我们的天然防御工事——那时候，狂妄的日寇欺侮我们缺乏防空设备，竟大模大样地来轰炸延安，飞机就擦着山头投炸弹；可是山既炸不倒，窑洞也炸不塌，人们就站在窑洞口怒视着空中大盗的横行……”

听到这，孩子们哈哈笑了，那天真的笑声，充满了对敌人的讥讽。

凡是孩子们能够理解的，我全讲给他们听了。孩子们对每一件延安事物都深感兴趣。在他们的眼睛里、嘴角边，时时起着各种各样的反应。当我讲到了蒋介石三次反共高潮和对边区的残酷封锁时，我看出了孩子们眼睛里的愤怒。可是一听到那些自力更生的故事，那些虽然艰苦却极愉快的斗争

生活，孩子们的脸蛋上立即涂上了一层欢喜的光彩。显然的，他们幻想已被我的故事引向美丽的延河之滨去了。

“1945年，日寇被打垮了，我们胜利地走出了延安，算起来，只不过八个年头，可是就在这短短的日子里，发生了多少不平常的大事呵。蒋介石的统治从根被挖掉，人民的新中国成立了，三年来的抗美援朝打败了一个强大的美帝国主义……老实讲，我是从来也没有想过胜利会来得这样快的。”

回忆过去斗争的艰苦，看看今天成就的辉煌，想想将来工业化的美丽远景，我已经控制不住内心的兴奋。要是讲，我真能讲到明日的黎明。可是，天已不早，孩子们必须各自归家了，我只好把话结束。

孩子们临走时，我向他们说：

“今年，我们祖国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你们五年计划的任务是什么呢？”

“我们的任务是好好学习，将来参加祖国的建设！”

孩子们的回答是肯定而明确的；随即又向我提出了一个肯切的要求：“多为我们写一些作品吧，好让我们得到更多的教育。”

这不但是孩子们的要求，不也正是广大青年的呼声吗？我告诉孩子们：

“多写作品，就是在五年计划中我的主要任务，也是终身的任务，正象学习是你们的任务一样，我要是不好好完成这个任务，你们就来指责我吧。顺便告诉你们，祖国所有的

作家都在为很好地完成自己的任务而努力不息呢。”

孩子们欣然而去了。我望着他们的活泼而矫健的背影，望着在黄昏中一闪一闪的红领巾，忽然想起了当年背着书包随着父母走出延安的孩子们，那成百上千的和这些孩子们一般大小的中学生们，他们不是已经站在建设祖国的光荣岗位上、为祖国的工业化而勤勉的工作着吗？更有的，已经送往苏联学习去了。

时代在飞跃地前进，孩子们也在飞跃地成长着。在祖国和煦的阳光下欣欣向荣的新一代，今天，还不过是一些稚幼的少年，可是，当第二个、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这些稚幼的少年，都将成为建设祖国的栋梁了。千千万万的后备力量，不正是祖国最可靠、最宝贵的财富吗？那时候，我们再也不会感到人才缺乏了。

对祖国最宝贵的财富，对这些正在成长中的新一代，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更多地肩负起责任。

孩子们的要求，我是不能忽视的。

1953年12月

春天的消息

春天意味着温暖，意味着新鲜，意味着生命的开始。光秃秃的树枝，一夜之间，便冒出了青青的嫩芽；肥沃的原野，也蒙上了淡绿色的轻纱。有一股春天所特有的迷人的幽香，给人一种崭新的感觉，使人产生一种非凡的力量。

就在这朝气蓬勃的日子里，保卫和平的勇敢战士，借着春风，把胜利的喜讯不断地送到鸭绿江北的祖国后方。外强中干的敌人，在连遭痛击之后，不得不考虑中朝代表团恢复停战谈判的提议。几天来，在开城的板门店谈判会场区，双方正在交换着伤病战俘。英美战俘在朝中方面的热烈欢送中感激地说：“我们将终身不能忘记你们的亲切关怀和友好的款待。”随后，便含泪告别了。他们个个红光满面，愉快而健康。但是，在另一方面，备受折磨的中朝子弟，却直到下了遣送的卡车，才脱离了非人的酷刑。他们带着无数的伤痕和血海般的深仇，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他们眼里闪烁着感动的泪光，享受了开城人民热烈的欢迎和亲切的慰问。只有在这个时候，那离开了他们很久的温暖，才又回到了他们的身边。在他们那菜色的脸上，春天一样的笑容，慢慢地出现

了。现在，他们正焕然一新地躺在洁白舒适的病床上，满含着新生的喜悦，接受着细心的治疗。中朝英勇的战士，被他们兄弟们的苦难和凌辱激动着，将更会为保卫和平而奋不顾身。

这就是和平的力量，这就是和平的保证。愚蠢的敌人，在他们一息尚存的时候，是不会懂得这个道理的。

由于有着保卫祖国的勇士们抵住了敌人的进犯，我们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幸福生活。在胜利的春天里，新中国的妇女，正在和平的首都，举行着千人以上的盛大集会。与会者除了各个岗位上的先进工作者，更多是工、农业中的劳动英雄和模范。从前线赶回祖国开会的志愿军女战士中，有着立过十七次功的医务工作者。中国第一批女航空员的英姿，也在大会上出现了。这些建设繁荣的祖国、保卫世界和平的女先锋，在大会上汇报着她们的的工作，交流着宝贵的经验，那数不尽的惊人业绩，把矗立在春天里的北京，装饰得更为堂皇美丽。

这正是祖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个春天。国家工业化灿烂的远景，吸引着每一颗热爱祖国、热爱劳动、热爱生活的心；苏联的无私援助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美丽现实，坚定着每一个劳动人民的信念。有着苏联光辉榜样的昭示，有着苏联先进经验的指导，年轻的中国，正在大踏步前进。西南一个全部苏联最新自动化设备的最大电力厂，已经在苏联专家帮助下正式开工了。东北一座大型水电站的建筑，也正在积极筹备中。在鞍钢展开了机械自动化的伟大运动的同时，四

川都江堰维修工程已经胜利完工，大量的江水，在开始灌溉着川西三百多万亩沃土良田……

全国各地的农民，在这温暖的季节里，都欢天喜地地进入了紧张的春耕，马拉农具已被普遍地使用着，很多新式的拖拉机，以战斗的雄姿，奔驰在祖国的原野上。翻松的泥土，散发着新鲜的香气，透过拖拉机的齿轮，闪耀着走向农业集体化的曙光。祖国的勤劳儿女，就在这朝气蓬勃的日子里，正以忘我的劳动，活跃在每一条生产战线上，用以答谢前方的胜利，为和平奠定着巩固的业基。并准备欢迎随着春天而来的红色的“五一”——全世界劳动人民自己的节日。

生产竞赛的消息，仿佛怒涨的春潮，从祖国的每一个角落里汹涌地传来，每一座工厂和矿山，每一片建设的工地，每一片肥美的良田，都呈现着崭新的气象。爱国主义竞赛的挑战、应战书，有如千万只勇敢的白鸽飞翔在和平的晴空里。

春天带来了愉快，劳动带来了幸福生活，随着生活的改善，上海第一座工人住宅城市在四月初建筑起来了。过去用血汗的劳动供别人享受的工人阶级，也尝到了劳动的成果。许多人在迁居的日子举行了婚礼。

红色的五月，是个欣欣向荣的季节，年年的五月，都在欢腾里度过。人们一提起五月，仿佛立刻就看到了北京的天安门广场，看到了莫斯科的红场圣地，那浩浩荡荡的队伍，那庄严而美丽的彩旗……而最能激动人心的，还是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红场检阅台上的世界人民敬爱的导师斯大

林同志。这神圣的城市、伟大的领袖和敬爱的导师，给人的力量是那样地不可思议。自从新中国诞生以来，在这种力量鼓舞之下，劳动勇敢的祖国人民，一直生活在春天的怀抱，永无休止地创造着春天一样的奇迹。

今年的五月又快到了，谁都知道，这个不平凡的五月，是含蕴着更深刻、更严重的意义。因为这不仅是祖国第一个计划的第一个五月，也是第七次全国劳动大会开幕的佳期。可以预见到，这次群英大会里，将会有更多的劳动英雄和光辉的奇迹出现。斯大林同志虽已逝去，但在年轻的中国建设的道路上，他那金石般的遗训，却比往日更加宏亮地响在中国人民的心里；他那不朽的光辉，将永远照耀着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

1953年4月末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随感

1. “我们一定要到社会主义！”

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那一刻起，我的心便无时不在兴奋的浪潮里激荡。我想吟一首美丽的诗，但苦于没有诗的语言；我想写一篇热情的文章，却又找不出充裕的时间。会开得是这样紧，我的心和脑、耳朵和眼睛，全不能有一刻的空闲呵。

作为出席大会的一员，原来本该把整个身心交给那庄严的会场，在大会期间，我明知是不可能分出精力写什么文章的。可是，有时候竟也难以控制感情的冲动，更无法抗拒编辑同志督促的热情，于是，我又不能不匆忙地拿起为人民服务的笔，涂写着不能令人满意的文章了。

今年九月，确是不比寻常，我觉得我实在享受了从未享受过的光荣。不说整个大会，单只在我们辽宁省小组里，就聚集了不是两位三位，而是十几位全国知名的劳动英雄。他们之中，大多数是我从没见过面的，可是乍一见面，我的心

头便自然涌起了一股比见了老朋友还亲切、敬爱的感情。从月初，小组会便天天在进行，我们很少有机会个别交谈，然而，英雄们的事迹，却早就激动了我的心，引起了我无限的钦敬。如今能够和他们坐在一起开会，我就觉得我是这样的光荣，这样地幸运，使我感到有一种督促和鼓舞的力量时刻激励我前进，号召我学习英雄们效忠祖国的伟大精神。

在会上，他们都不大喜欢发表意见，但只要他们有什么感触，却又似乎有说不尽的万语千言。他们的每一句话，每一分情感，都能真正代表着亿万劳动人民的心情，因而，也就最能感染别人。

大会开幕那天，人人的感情都非常激动，而最最激动的，还是那些曾经世代受苦受难的英雄模范们。他们今天居然能够以管理国家大事的主人翁的身分，和我们最敬爱的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们坐在一起商讨国事，他们的那种感激、幸福的心情，真不是任何语言可以形容的。尤其是听了开幕词以后，他们怎能不想得很多，看得更远呢？想想过去的苦，自然要特别感到今天的甜，而那无限光明的远景，就更加照亮了英雄们的眼睛，他们有着同样的感觉：“毛主席的开幕词，虽只短短几百字，可是每个字都象红宝石一样，颗颗闪耀着真理的光芒，它照亮我们智慧的宝库，它把我们的光照得更红更亮。不说别的，只要见一见毛主席呵，就好象凭空长出三头六臂，突然涌起了无穷无尽的力量！”

这也正是出席大会的每个人的感觉呵，看见毛主席，该是多么巨大的幸福呢！

年轻的王崇伦在小组会上讲完他的感想后，特意告诉我：

“那一夜呵，乐得我浑身是劲，怎么也睡不着觉。昨天晚上我怕再睡不着，特意找医生要了一片安眠药……”他闪烁着那双深沉、然而还带着孩子气的眼睛，两手在胸前抚来抚去，不知如何才能表达出他的感情，“简直把我感动的呀，我两手紧紧握住毛主席的手真舍不得松开……”开幕那天，王崇伦是大会执行主席之一，他不但有机会和毛主席坐在一起，还和毛主席说过话、握过手。他无限感慨地告诉我，毛主席一看见他，就用充满热爱的声调问他：

“你就是创造万能工具胎的王崇伦吗？”

这真使王崇伦惊奇：“毛主席管理着六万万人民的大事情，连我这样的小小成就竟也注意到了！”

看着王崇伦那副充满荣誉感、更充满了决心的神情，我兴奋地想，毛主席虽只一句简单的问询，就会使这位青年英雄贡献出今后十年的力量。

和王崇伦年龄相仿，矿工出身的谷发明，今天的感触也特别多，他含着眼泪叙述了伪满时期被欺凌的往事，而后大声讲道：“日本人占领时期，不单吃不饱，穿不暖，在敌人的鞭打下，我们工人就没有什么人的尊严。敌人高兴的时候管我们叫‘牛’，不高兴的时候就管我们叫‘猪’；只有共产党、毛主席领导我们翻了身，我才做了真正的人，而且能够和毛主席坐在一起商量国家大事，做了国家真正的主人……”

话一接触到共产党、毛主席，谁能不热情激动？事一引

到今昔之比，哪个没有满腔的悲愤和无限的欢欣呢？

抚顺煤矿的张子富是个热情、豪爽的中年人，谷发明的话激起了他愤怒的回忆，他激昂慷慨地说：

“伪满时候，敌人不许我们讲自己是‘中国人’，他们管我们叫‘臭煤黑子’、‘臭工人’，这几年，我们才算变成理直气壮的中国人！现在又在毛主席领导之下管理国家大事，还能和毛主席握手，在以前，我们握的只是锹杆锄把，只有遭罪受苦的份儿。我翻遍了整个家谱，祖祖辈辈也没有过这样光荣的幸福事儿呵……”

老英雄孟泰，一向是笑容可掬地保持着谦虚的沉默。在大会开幕后的小组会上，他实在难以控制他过度的喜悦，在劳动英雄当中，他是第一个从座位上一跃而起的。看他那天真的神态，简直使人都不相信他已是一位五十多岁的老人。他的笑，他的话，洋溢着多么令人感动的纯真呵！他没有谈他过去那一长串苦难的经历，也没有报告他的模范事迹，他是从见到了毛主席联系到自己的检讨说起的：

“1950年，在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大会上，我头一回见到毛主席，跟毛主席、跟中央首长们握了手，碰了杯，那一回给我的鼓励呵……”他摇着头，挥摆着手，红光焕发地沉思了好一会。显然地，他的感情又回到四年前那激动心灵的幸福里去了。“那一回呵，毛主席给了我多大的力量，提醒了我多严重的责任呵！开完会，我回到鞍钢，日日夜夜地不离我的高炉。我白天操作，晚上守一夜，我一怕特务钻了空子破坏它；二怕没经验的年轻工友不懂怎样照护它，那时候，

我真是没时没刻不操心高炉的安全呵。这样不回家的日子，我整整过了三年。可是，现在呢？我觉得我有点骄傲了！”

说到这里，老英雄的声音显得沉重起来，他清了喉咙接着说：“我为什么说我骄傲了呢？这一年来，我对高炉不那样操心了。我是到上班的时候上班，到下班的时候回家，我认为工友们都掌握了技术，特务坏蛋也彻底根除了，我放松了责任，我忘掉了警惕，今天，我又见到毛主席，才猛地惊醒。毛主席和刘少奇同志不是特别告诉我们千万不要骄傲自满、失去警惕吗？是呵，为了建设我们社会主义祖国，我们怎么可以不记住毛主席的嘱咐，象个主人翁的样子不断地努力呢！”

一谈到毛主席，老英雄的声音和神情又恢复了开头时的愉快：“你看哪，毛主席有多大的信心，多大的决心，‘我们一定要到社会主义，我们一定能到社会主义！’”他完全用孩子似的动作和孩子似的表情表演着毛主席致词时的手势，庄严而又和平地一下一下地把手向前平推着，一次又一次地重复模仿着毛主席的声音：

“‘我们一定要到社会主义，我们一定能到社会主义！’
‘我们一定要到社会主义，我们一定能到社会主义！’”

虽然老英雄把毛主席开幕词中的“达到目的”说成了“社会主义”，但谁也不认为他是记错了，或者是少了“社会”两字，他的话还不完全；正因为他理解得又明确又具体，也正因为他的热情和诚挚，竟引起了极热烈的掌声。老英雄的朴素有力的语言，感动了所有在座的人，鼓舞着每一

颗热爱祖国的心。在毛主席的感召下，我预见到，这位老人，就是再过五十年，也不会衰老下去的。

这一切呵，谁能说不是建设我们伟大祖国的力量的源泉呢？是的，有了这样巨大的力量，我们就一定能达到目的，有了这样不竭的源泉，我们就“一定能到社会主义”！

1954年9月19日

2. 说说心里话

近二十天来，我正象所有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一样，确实是享受了从未享受过的幸福，也体会了从未体会的光荣。那连成一串的喜庆日子，那震撼全国的欢腾，有时候，真会使人兴奋得忘掉了自己的存在，激动得抑压不住浪涛般的感情。我们代表着六万万人民的心愿，刚刚完成了通过宪法和选举国家领导工作人员的神圣使命，欢呼声还在响彻云霄的时候，第五届国庆节又在很多兄弟国家领袖和嘉宾参加之下庄严地降临了。这一切史无前例的伟大事情和激动心灵的壮丽情景，就象海潮一样，奔腾咆哮地向我的脑子涌来，竟使我直到今天都无法平静，更无法整理出一个头绪来。值得向青年朋友们报告的事情实在太多太多了，可惜这样一篇短文既不可能包罗万象，时间也不允许我慢慢地选择。好在全国各报刊都刊载了有关大会和国庆的动人报道，用不着我再来重述了。那么，就让我向青年朋友们汇报一下

我在这期间感受和心情吧。这样，一方面可以作为对我自己的鞭策，另方面也想取得青年朋友们的督促。

自从我得知我被故乡的人民选派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那一天起，我的心情就常常很不平静，在兴奋中掺混着很多复杂的感情。这种感情，到了大会开幕之后，是越来越显著了。

我觉得，我坐在伟大而庄严的席位上，而对着我们最敬爱的毛主席和革命先辈们，我应该感到不安；我觉得，我同功勋卓著的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们坐在一起，我应该感到惭愧！人民给了我这样崇高的荣誉，如果认真地和我的贡献比较起来，该是多么不相称呵！无疑地，我是以“作家”的身分当选为代表的，同志们也常是喜欢“作家，作家”地称呼我，可是，自己悄悄地问问自己：是否当得起这样光荣的称号呢？这一点，自己该是心中有数。下面的一件小小事例，正可以说明我的真实心情。

大会开幕那天，我是怀着一个多么殷切的愿望：能够和毛主席坐得近一些多好啊！我真羡慕那些座位靠近毛主席的代表们，我认为，他们要算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但是一个同志却这样提醒我说：

“假如你的座位真的靠近毛主席的话，你也许会不自然呢！”

“怎么会呢？假如真能那样呵，我将会感到万分的荣幸！”我这样固执己见，是因为我没有理解对方的意思，直到有一天我真正接近了毛主席的时候，回味起那位同志的话，才猛然觉醒。

那一天，总结了我们全部斗争经验的宪法已经光荣地诞生，全国人民也总结了多年的苦难与辛酸，这个光辉无比的日子，带来的是举国空前的欢腾。那一天啊，老人们都变得年轻了，年轻人都变成了天真的孩童。我们歌唱了还想歌唱，我们欢呼了还想欢呼，人人的嘴在嬉笑，人人的心在狂跳，人人都想向毛主席倾吐那无比的欢欣。毛主席，亲爱的毛主席啊，就是您，领导着我们披荆斩棘地进行了翻天覆地的斗争；就是您啊，领导着我们赢得了今天这样幸福的时辰；也正是你啊，更将领导我们向无限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迈进。

“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您的坚定的语言将终生在我们的心中震响；您的伟大的意志将永远鼓舞着我们去为祖国效忠。

“代表着全国人民向毛主席面对着面欢呼致敬吧，和毛主席手握着手感激祝福吧！”谁没有这样的渴望，又哪个不怀抱着这样的追求？

看吧，在那片碧绿的草坪上，毛主席正象是春天的太阳，他的慈祥而庄严的面孔真是又红又发光，一千多双眼睛流露着无比的敬爱投向了同一个方向。当拍照完毕之后，许多代表都欢呼、跳跃地拥向毛主席，拥向这颗红太阳，我被蜂拥的人群拥呀拥呀连一步也没有行动，竟一直被拥到毛主席面前。可是，就在这一瞬啊，我的勇气突然消失，我挤出“重围”远远地躲开了。

当天晚上，丁玲同志很感慨地说：

“今天劳动英雄们抢着和毛主席握手的情景是令人激动的。正因为他们有那么多成就，也才有那么大的勇气；而我，却没有那样的勇气。等到我有了一点成就的时候，我才能够真正无愧地站在毛主席面前……”

她说这话，当然是太过谦虚，但我深信，这确是她的真实心情；同时啊，她也恰恰说中了我当时的心情。

这绝不是什么阴暗心理，而是一种自愧自责的感情。这里面有激励、有鞭策，也有无边的鼓舞。在这个庄严辉煌的会场里，我吸取了力量，也认清了自己。五年来，祖国是在怎样飞跃的速度中前进着，涌现了多少保卫疆土、建设祖国的英雄。我自己呢，既没有跟得上时代的脚步，更没有能满足读者的要求，如果具体的谈到贡献，比起大会中成百上千的代表，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单是在我席位的周围，就坐着那么多来自东北的、对祖国有着杰出贡献的英雄人物。不论是年老的孟泰，不论是年轻的王崇伦，也不论是那年富力强的工农劳动英雄们，看上去，他们都是些平常的人，然而，他们的每一种发明，都给祖国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他们的每一项改进，都给社会主义社会缩短了建设的里程。就连工属代表高凤琴、农业劳动模范佟玉兰那样被旧社会认为“无用”的妇女，在建设祖国事业中都起着非凡的作用。我自己呢，我确实深深感到远不及他们的。

如今，我忝膺了人民代表的一个席位，我知道，我该如何时刻地鞭策自己，站在我的工作岗位上，向英雄模范们学习，勤勤恳恳地做一点足以自慰的成绩来，才算不辜负党与

毛主席的教导和祖国的期待，也才无愧于“作家”的称号和“人民代表”的神圣职责呢！

青年朋友们，你们也鞭策我吧。我将在你们的督促与鼓舞下汲取无穷无尽的力量！

1954年11月初于北京

报告文学集



东北抗日联军巾帼列传

1. 赵 一 曼

赵一曼，这个响亮的名字，曾经响亮地传诵于松花江畔。她那为抗击日寇而英勇战斗和慷慨就义的悲壮动人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松江的流水为她的死而呜咽，珠河两岸的垂柳为了失掉她而低泣！而她的壮烈殉国也使东北人民赢得了无上光荣，使热爱自己的民族、热爱自己的土地的抗日英雄们、热情青年们更加坚强，更加英勇地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前赴后继，就连那群寡廉鲜耻的汉奸走狗们也不能不为她威武不屈的民族气节而惭愧汗颜了！他们哪敢正视她的碑碣呢？

她是四川人，本姓李，因为天资敏慧，又受了较高深的教育，当她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便接受了革命的思想。虽然她是一个知识分子，并带着一点小姐气味，可是当她1922年在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以后，便能遵守党的指示深入下层，接触群众，积极地领导着上海女工运动。后

来被送到莫斯科深造，归国后便同她的丈夫老曹——真名不详，京汉路“二七”大罢工时的工人领袖——同在上海做地下活动。“九·一八”后，被派到哈尔滨满洲总工会工作，已故的戴平万同志当时也在满总工作。赵一曼夫妇到哈后，接受了当时满洲中共中央代表罗登贤同志（注）的指示，领导了哈尔滨电业工人的反日大罢工。

1934年春，东北中共组织遭到敌人巨大摧残破坏，罗登贤同志被捕后不久，老曹便失踪了——“八·一五”后始知老曹早已囚死狱中。

赵一曼虽然非常关心老曹的安危，但她当时也正是敌人想攫获的人物，于是，她顾不得寻找丈夫的下落，便带着一颗沉痛的心，满怀壮志地到珠河工作去了。

到珠河以后，便把珠河（又名乌吉密河）两岸的妇女组织起来，成立了妇女救国会，在珠河铁道北（滨绥线）担任区委书记。

赵一曼同志，无疑是一个伟大的女革命家，她有坚强的性格，富有毅力和魄力，同时她又是一个天才的女演说家，她的讲话充满着极强的号召力，没有一个人听了不感动振奋的。她能把群众讲得振臂高呼，也能使群众痛哭流涕。因此，珠河一带的男女老幼，没有一个不拥护爱戴这位值得尊敬的妇女领袖的。在她领导之下的一批妇女干部，为了不暴露姓氏，使敌人无法捉摸，大家都姓起李来了。她们用大李、小

（注）罗登贤同志是省港罢工的领导者，也是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动者。

1933年回上海被国民党捕杀于雨花台。

李、黑李、白李、红李、高李、矮李、老李、胖李以及小辫李、瘦李等等来区分。赵一曼同志比较瘦削，因而瘦李便成了她的名字。她领导着这些女干部活动于铁道以北。

1935年，敌人在珠河采取了烧杀归大屯政策，在残酷地毁灭着东北人民的生机，见房就烧，见人就杀，火光四起，哭声遍野，惨叫连天。在这种情况下，赵一曼悲愤不能自抑，于是她领导几个干部，用红缨枪组织了几千人的农民自卫军，在珠河东部关门嘴子附近和敌人做了一次英勇的大决斗，虽然敌人有优良的武器，而他们却以原始的装备获得了空前大胜利，给凶残的敌寇以极大的打击！使得汉奸走狗们一听到瘦李的名字便抱头鼠窜了。

后来，这个自卫队加入抗联第三军第一师第二团，而这一团的政治干部很多是姓李的。在王惠同团长英勇机智的领导下活动于黑彪宫、秋皮屯、关门嘴子等地。和敌人做了好几次搏斗，当时的赵一曼同志便是铁二团的政治委员。

铁道北的房舍全烧光了，在遍野荒凉四无遮掩的情况下，这支抗日队伍便不得不奉命撤回铁道南继续活动，坚持抗战，然而，铁道南也不过仅余农民数人，茅舍数间而已！冯仲云同志当时就在这儿担任县委宣传部长，他们在艰苦地和敌人死拚着。

正是秋末的时候，他们又被派到铁道北坚持游击。当时群众领袖周北学曾到反动武装驻地做说服工作，被捕后侥幸逃出，后和他们一起活动。刚过铁道，由于内奸告密被千余优势日军包围，在敌众我寡及敌军重重包围的形势下，全

团三百多优秀的游击队员，誓死以身报国，坚持血战，最后几乎全部牺牲！侥幸突出重围的仅十五六人而已！而王惠同团长也因重伤后被俘，慷慨就义于珠河县的小九站了。

在这次战斗中，赵一曼同志腿部中了一枪，便和幸未负伤的周北学同志隐藏在一个地窖里，不意又被叛徒告密，在一个雪深没胫的寒天里，赵周两同志同时被捕，做了敌人的狱囚！周北学同志则就义于珠河县。

在珠河，赵一曼的名字，早已是遐迩皆知。一些汉奸走狗和土豪劣绅们，为了好奇，当她被解进珠河县城时，都跑来想一睹为抗日而光荣被俘的女英雄——瘦李——的丰采，而我们的女英雄却不领受那些污秽眼睛的无耻瞻顾，她悲愤地痛骂着，教训了那些不肖之徒，他们被骂得羞愧难当夹着尾巴跑掉了。

不久，敌人便把她解送到哈尔滨，押在特务机关里。对她施尽了非刑，直到遍体鳞伤，气息奄奄，而我们的赵一曼同志却始终坚不吐实，忠实于党，忠实于流血奋斗中的同志，使敌人在她身上得不到半点机密。

但敌人仍不甘心，还梦想在她口中获得一些宝贵的线索，怕她因伤重而死，于是便把她送到许公路公园附近的滨江医院疗伤。张伯岩医生对她的英雄事迹非常感动，他细心地为她疗治刑伤，并安慰她受了创伤的心灵，她的伤慢慢地好起来了。

始终尽忠于革命的赵一曼同志，即使在伤重期间，也决不肯放过任何宣传机会，当她的精神稍微恢复了一些的时候，便

面向松花江的流水，用她那婉转动人的声音，向看护她的董护士和敌人派来看守她的警士讲述抗联的悲壮故事，并用种种方式，教育他们，提高他们的民族意识和政治水平，因之他们不久就成了赵一曼两个最可靠最爱护她的群众了。

敌人呢，当然不肯放过他们每一个逼问的机会。当赵一曼同志伤势稍愈之后，他们便不断地来逼供。她为了避免烦恼，便想出一个聪明的办法，在敌人未来之前吃些安眠药，当敌人来审讯时，她已是沉鼾大睡，千呼不应了。

到了1936年秋，她的伤势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于是，经过秘密布置之后，便在一天夜里，她被最可靠的两个群众抬到雇来的小汽车上，开到三棵树，而后换乘火车，三个人一同逃了出来。

不幸得很，这一行动很快便被敌人发觉了。在敌人看来，跑了赵一曼这损失是无法弥补的，便马上全市戒严，到处搜查，很快便把那个送走赵一曼的白俄汽车夫查了出来，他报告了逃走的方向，这样，我们的赵一曼同志逃到离游击队所在地仅二里的地方又重陷虎口。翌日，便在最末一次非刑拷问之后英勇就义了！

在殉难之前，她是愉快的，没有在敌人面前表示一点死的畏惧，她面朝着松花江悠悠的流水，仰望着辽阔的长空，引亢高歌起来：

民众的旗，血红的旗！
收殮着战士们的尸首！

尸首还没有僵硬，
红色已染透了旗帜，
高高举起呀，血红的旗帜，
誓不战胜，总也不放手，
畏缩者呀，滚就滚你的，
唯我们誓死以守此！

……

牢狱和断头台，
来就来你的，

……

这就是我们的告别歌！

歌声亦悲亦壮，弥漫于低暗的苍空，赵一曼同志在亿万可爱的东北群众痛悼下，诀别了白山黑水，诀别了还在敌蹄蹂躏下的东北人民，诀别了还在浴血抗战中的同志们，慷慨就义了！

日寇法西斯是感到胜利了，他们在报纸上大肆宣传这个“胜利”的消息，称她为“赵尚志的宣传部长——红装白马女匪首”，日本的改造杂志还为文追悼了她。

赵一曼同志的血，染红了松花江水，灌溉了东北抗日园地，更安慰了为革命而早死的英灵！

在今天看来，敌人是否真的胜利了呢？

2. 裴 大 姐

从她参加抗联的那一天起，人们便以裴大姐这个尊敬的代名词称呼她。那时她已经是将近三十岁的人了，在女队员当中，她要算是最年长的一个。她的性格明朗，有着孩子一样的天真，热情而坦率。假如以她的性格来估计她的年龄，顶多也不过二十一二，然而，衰老的皱纹已经轻轻地划上她的眼角了。在她参加抗联以前，她曾度过一大段不愉快的生活。

裴大姐小的时候，有着一个比较美好的家庭，当日寇把她的祖国——朝鲜——化为殖民地之后，她的家庭便随着祖国的沦亡而没落了。裴大姐的父亲原是一个革命的工人，在那白色恐怖的殖民地里，他再也无法安居下去，因之，他便不得不远离祖国，携眷逃到中国来，隐居在东北的僻静农村里，租种几垧稻田勉强糊口，企图待机再起，去收复祖国的失地。

他们在东北的农村住久了以后，便感觉和这块肥沃的土地难舍难分了。然而生活却象一条无情的锁链，紧紧地勒住了一家人的脖颈，虽在父子们勤耕细作之下，辛劳终年，换来的却是鞭笞与饥饿。苛重的地租，剥削着他们的收获，使得全家得不到温饱。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为了减轻家庭的负担，便把他们唯一的女儿——裴大姐仓卒地嫁了出去。这时的裴大姐才只有十三岁，体格却象成年的大姑娘了。

幼小无知的裴大姐，脱离了啼饥号寒的家庭，做了新嫁的少妇，丈夫却是一个大她二十七岁和她父亲年龄相仿的佃

农。他的性格粗暴，胆小怕事，体格也不健康，牛马一样的劳动和地主的压迫，逼得他经常愁眉苦脸，对裴大姐虽不打骂，可是那种没有一点欢笑的家庭生活，够使裴大姐苦痛的了。她那爱说笑爱热闹的天性，被压得简直喘不过气来，只有当她偶尔回到娘家的时候，才能享受到一点家庭的温暖和父母的抚爱，也只有当她偶尔回到娘家的时候，才恢复一下她孩子般的天真，但这种日子是不可多得的，她无法摆脱给丈夫烧饭的责任。从嫁过去以后，她很少在娘家留宿，生活虽比在娘家充裕了些，可是精神却是永久苦闷，象被判了无期徒刑的囚犯一样。

然而，她能埋怨父母吗？她能把她们的苦闷向父母诉说吗？她知道倘不是为了生活的逼迫，父母是绝不会忍心使她早嫁的。

早婚的裴大姐，害了不孕之症，十几年当中，她没有生过一个孩子，顽固的丈夫整天埋怨她，唠叨着，为了这，她受了不少委屈。就这样幽囚的日子裴大姐足足过了十六个年头，当她二十九岁的时候，丈夫已经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了。

暮年的丈夫，在耕作之余，更加感到孤寂了，于是他的怨言更多，对裴大姐的态度也更加粗暴起来，他是急切地需要一个孩子接续他的宗嗣的，他常常怨骂着妻子：

“你这个不会下蛋的母鸡，我养着你可有什么用呵，白糟蹋了粮食，干脆杀了吃肉吧！”

“养孩子也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你公鸡不中用，可叫我母鸡怎么下蛋哪？你这个糟老头子，我看要杀应该拿你先开

刀才对！”

这样滑稽的争吵，是经常发生的。裴大姐感到生活乏味，自己也常以不能生育为莫大憾事。她想：假如有个孩子，生活便光辉多了，丈夫也不会蹙眉叹气，牢骚满腹，这样不痛快的日子，实在不如结束了好呢！

当日本鬼子侵略东北之后，裴大姐的精神找到了寄托和安慰。她和父亲、兄嫂以及两个弟弟一道参加了日益壮大的抗日联军。从此，她再不盼望孩子了，为解放民族的热望，占据了她的整个心。尤其当她的父兄相继牺牲了之后，在那个解放民族的热望之外，更增添了为父兄复仇的决心。开始，她为了不忍心抛弃老迈的丈夫，她没有随着父兄们参加到队伍中去，只是偷偷地背着丈夫为军队缝洗些衣服，可是有一次这工作被丈夫察觉了，竟遭到强烈的反对，甚至还给了她难堪的侮辱，老头子骂她：

“你给哪个野汉子缝衣服呀？难道你叫我做王八不成吗？拿走，赶快拿走！再缝我就剁了你的手指头！”说着，就夺过裴大姐手中的衬衫撕成碎布条条丢在地上了。

裴大姐气得抱着衣服痛哭起来，她恨透了这个顽固的老头子，她边哭边骂着：

“你这个老而不死的废物，想约束我的自由吗？那就休怪我心狠了！”

突然她站起来，抓起那件被撕破的衬衣，飞也似地跑到驻在村西头的游击队里，死也不肯回去了。

老头子追了半天，自然追不上她，只得叹气而回，去过

他那残喘的生活。

从此，裴大姐便踏上了革命的大道，开始了崭新的生活，她再也没有苦闷了，完全恢复了本来的性格，成为一个极端乐观的人。除了当她听到弟弟牺牲了而大哭一场之外，她是从不流泪的，不过那也只是暂时的悲痛，这些亲属的牺牲她都认为是朝鲜民族的光荣和骄傲。由于这种牺牲，更坚定了她为中朝两民族奋斗的意志，她认为中朝两民族是唇齿相依的，打倒了两民族共同的敌人，中朝两国便会同时获得解放，那时，她便有返回祖国的希望了。

一到游击队，她便积极地练习战术，她射击的技术是很准确的，因为小时候曾经跟父亲学习过。当游击队每天与敌交锋时，都可以看见她高大的身影在最前面冲杀，还常常带着女游击队员们单独作战，她的勇敢可与所有勇敢的男同志们并比的。

三天没有战斗，她便会感到无聊了。她喜爱热闹，整天满面春风地和大家谈谈笑笑，队伍里有了她，便特别显得生气勃勃，当她有了特殊的任务暂且离队时，大家就都象丢掉了什么似的，骤然空虚寂寞起来。全队的同志都尊敬她，亲热地称她为大姐，从到抗联的第一天，她便失掉了原名，成为所有同志们的大姐了。

她具有浓厚的阶级感情，对所有同志都一样地关心爱护，正象对待自己的弟弟妹妹一样。在同志们生病或负伤的时候，她常常是牺牲自己睡眠来照顾着他们，饮食冷暖，她都十分关心，因此，她在游击队里建立了崇高的威信。

有一个时期，因为身体不好，特委任她担任抗六军被服厂厂长，为的是使她留在后方可以得到一次休养的机会，可是，她却过不了那种没有战斗的生活，终于，在完成了第一个阶段的任务之后，便积极地要求调到前方来了。

在抗六军她曾一度结婚，丈夫是一个新参加工作的知识分子，在抗六军中担任政治工作。她本没有结婚的要求，可是由于对方的热烈追求，她便只好答应了。但对于丈夫的一切她是没有很深了解的。

新婚不久，有一次，与敌作战归来，检点人数的时候，裴大姐找不到她的丈夫了，正在焦急，一个同志突然跑来告诉她，说他已经中弹身死了！

裴大姐象听到她弟弟牺牲时的消息一样，她痛哭失声了，她立刻要去搜索战场，寻找丈夫的尸体，可是那个同志接着告诉她：

“大姐，你冷静一下吧，他是被咱们自己的同志打死的，因为他是一个企图叛变的家伙。”

“真的吗？有什么证据？”裴大姐立刻收敛起眼泪，吃惊的问着。

“当战斗最紧张的时候，他动摇了，他想跑到敌阵去，便被一个机警的战士一枪打倒，这还不是充分的证据吗？”好几个同志同声描述着当时的情景。

裴大姐不哭了，她咬牙切齿地骂着，并埋怨她自己：

“这样吗？那就活该打死，恨我警惕性太差了，竟和他结了婚，要是早知道他是一个动摇分子，早把他亲手杀掉了，

免得遭此屈辱！”

受了这一次打击之后，她发誓不再结婚，她是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与敌人作战上了。

1938年的冬天，她与政治部主任徐光海同志带着十几个女队员在行军中遭遇了敌人，那些女队员多半是参加不久的新同志，战斗力较差，而敌人兵力又是两倍于他们，因之，交锋半小时之后，便有些不支了，眼看着大家都有被俘的危险，她便和徐光海同志奋不顾身地掩护着女队员们，命令她们留下剩余的子弹迅速撤退。

女队员们不忍丢掉她们敬爱的裴大姐，哭求着一道撤走，但那是不可可能的，如果没有有力的阻击，大家都会遭到不测的。裴大姐看着大家不肯撤退，便又下了一道紧急命令：

“妹妹们，快走吧，多留下一人便多留下一份杀敌的力量，即使我真的牺牲了，能够保全住十多个人不也是值得吗？快快撤走，谁违抗我的命令便是反动！”

十几个女队员只得含泪和她匆匆告别了。

裴大姐站在山头上和徐光海同志东冲西杀地把敌人挡住了，当所有的女队员们都已撤走，她完成了掩护的任务之后，她的子弹也快完了。长时间的激战，她已经精疲力竭，眼看就要做敌人的俘虏了，于是她用最后的一颗子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壮烈地殉难了。

这时的裴大姐，不过三十六岁！

3. 王勤夫人

王勤在小兴安岭的山沟里差不多度过了十几年的时光，虽然是依伴着绿水青山，茂密的松桦，却是永远的穷苦，一直过着原始的简单生活。这一带的居民大部是靠伐木为生的，王勤也不例外地做了伐木工人。他凭借超人的臂力，用极强的劳动赚取衣食，可是就这样也还不能换得一家的温饱。他住的是自己用树杆架起的小屋，穿的是仅能遮体的破衣，经年累月吃着粗糙的高粱、小米，夏天还可以挖些野草野菜，一到冬天，便只有就着清淡的盐水下饭了。

王勤的老婆是一个精明强悍的女人，象她丈夫一样，有着过人的力气，她不但烧茶做饭，抚老育幼，管理着一切家务，还能把剩余的精力，去帮助丈夫做一些重体力劳动，譬如伐木、劈柴、背东西。她的劳动效率并不下于一般男人，她能背一百多斤的东西走二三里路，中途并不休息。她积极地劳动着，帮助丈夫奉养年迈的父母，她不忍心使丈夫过分的劳累，不到精疲力竭的时候，她是很少休息的。然而，过度的辛劳使得她早衰了，还不到四十岁便已驼背，头上也出现了不少白发。几次生产，都由于孕中过度的劳累，影响胎儿的正常发育，孩子生下来不久便死了。夫妇俩常为此叹息，尤其是两位年迈的老人，更感到暮年的孤寂。因此，当王勤夫人怀了最后一个孩子时，王勤便决心不让她再多劳作，竭力地保护胎儿；十个月当中，王勤夫人只在家里做些轻微的

劳动，不再到森林伐木去了。

果然，这最后一个胎儿生下来的时候，比前几个壮实多了。于是，这个男孩就在一家人珍惜之下勉强的活下来。当这一双父母劳作之余，无限疲惫的时候，这孩子便成了这个穷困劳苦家庭中唯一的慰藉了。

孩子刚满五岁的时候，日本鬼子就侵占了东三省。不久，这个森林地带也竟变成了敌人的势力范围。从此，居民的生活更加贫苦起来，他们整天在鞭笞之下为敌人伐木，吃不饱穿不暖，失掉了一切自由，挨打受骂成了家常便饭，他们蒙受着这样的凌辱与迫害，真有度日如年的感觉。王勤的父母就在这饥寒交迫的威逼下相继去世了。王勤夫妇忆念着因饥寒而死的老人，看着那在苦难中偷生的孩子，常常相对流泪。由此，对于异族的侵略，便生长了强烈的仇恨。他们总在想着报复的办法，然而，森林里的居民太少了，即使全体组织起来，仍然是势单力薄，不足以对付强敌。

抗六军，这一支人民军队，为了解脱民族的灾难，驱逐民族的大敌，他们已经建立了不少功勋，现在开始在这森林地带游击了。当他们活动到这山沟里的村落时，王勤夫妇便把复仇的希望寄托在这支队伍的身上了。王勤和老婆经过商量便主动参加了抗六军，担任了后勤工作。夫妇俩抱着为民族复仇的意志和牺牲的决心，积极愉快的工作着，从此，除了孩子之外，他们的生活中又增添了一层安慰，他们感到活得更充实更有意义了。

遥望着那光辉的前途，王勤夫妇寄托着无限的希望于这

支人民军队身上。他们看着抗六军那种艰苦奋斗的精神和铁一样的纪律，更相信了他们会有无穷的威力，他们确信这支人民的军队是会把这地狱里的居民解救出来的。遗憾的是他们的儿子太小了，整天地盼着儿子快快长大，好接续他们的工作，因为他们也知道消灭强敌并非一日之功，需要做长期的准备的，何况失地收复之后，革命还未必成功呢？可是夫妇俩都已到了衰老之年，王勤已经是五十岁的老人了，王勤夫人虽然小于丈夫十岁，然而由于饥寒和劳碌，体力也是一天天地衰弱下去，于是，他们的儿子便成了他们唯一的寄托者，他们希望着当他们老迈不能工作的时候，儿子能把这艰巨的任务担当起来。因之，从儿子懂事的那天起，便灌输给他如何仇视敌人，热爱祖国和穷人的思想，并经常地嘱咐儿子说：

“这些事只能听在耳里记在心上，可不能随便乱讲呵！倘如鬼子问你什么，你就说一概不知，要是说一个字，咱一家的性命就保不住了。”

孩子是聪明听话的，他答应着，把父母的话牢牢记在脑子里，从不泄露一句。他的智慧也随着年龄的增长在飞快地增长着，对任何不熟悉的人都抱着怀疑和警惕的态度，当抗联同志来到他家的时候，他也采取同样的态度，抗联同志常常故意问他：

“你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吗？”

“不知道。”

“你是哪国人呢？你爱中国吗？”

“不知道。”

经过了无数次的考验，这孩子只是装痴做傻，不吐露一句实话，“不知道”成了他唯一的回答了。

王勤夫妇放心了，他们确定儿子一定会不负他们的期待的。于是就更加耐心地教育着他们这唯一的儿子。

敌人为了保护木业，对付抗日联军的袭击，成立了山林警察队，驻在王勤附近的村子里，日夜地出来骚扰，巡哨。就在这时候，王勤得病死了，留下了孤儿寡妇，度着凄凉的岁月。这时的王勤夫人已经四十多了，儿子也已十岁，为了抚养孩子并进行工作，她克制着自己的悲哀，照常的工作，照常的劳动着。抗联的队伍每次到这里来时，都是食住在她家里。她不怕任何危险和劳累，为了掩护同志们而不眠不休，她的机警细心，使抗联同志的生命得到了安全和保障。可是有一次她竟被敌人发现了破绽而被捕了。

敌人用严刑拷打着她，逼问游击队的去向，她宁使头破血流，刑伤遍体，也不肯吐露一字，她是决心和敌人拚了。最后敌人欺骗她说：

“你的儿子什么全说了，现在只要你也照本实说，便马上放你回去，你的儿子快哭死了！看在你儿子的而上，我看你还是说了吧，免得受皮肉之苦，闹得母子分离呵！”

一提到儿子，她的确难过极了，想到她被捕时儿子的惊哭，想到这几天儿子无依的恐怖的生活，她的心快痛裂开了，可是，她却坚决相信她的儿子绝不会吐露秘密的；几年来的训练和考验，她有这样的确信。于是她坚定地说：

“一个十来岁的孩子，你们又何必去为难他？我的事是

瞒不过我的儿子的，那么，好吧，你就把我的儿子也抓来，他如果当我的面供出一点什么，我都承认，就是杀了我们母子也没有含怨，现在就请你们把他抓来叮堂吧！”

王勤夫人企图把儿子抓来和她一道坐牢，免得母子分离，没人照顾，因此，她再三要求着。

可是敌人却没有那样做，他们曾到她家里去搜查过，一点证据也没找到，尤其那孩子，竟是一问三不知，憨头憨脑就象一个小傻瓜。敌人绝望了，押了十天只好放她回去。王勤夫人带着很重的刑伤回到家里，她的儿子却在邻舍的照顾中生活得很好，只是消瘦了些。孩子哭着向她要求：

“妈妈，以后你到哪去我都跟着，就是你死我也和你一道，妈妈，这几天我好怕呀！”

“好孩子，以后妈妈永不离开你就是了。”

真的，从此母子俩就再没有离开。

敌人的烧杀和搜捕一天比一天厉害起来，以至王勤夫人不能在村里住下去了，于是她便抛弃了破败的家，带着她唯一的儿子随着抗六军到处活动，她把抗联当做了自己永远的家，把整个生命也交给这个家了。她希望她的儿子在抗联的培养教育下，将来成为一个勇敢忠贞的革命战士。

1940年的冬天，敌人发来大兵，进剿小兴安岭的抗联根据地。因为在这山林里他们吃亏太大了，为了消灭顽强的抗日联军，补偿过重的损失，他们集中了兵力日夜追剿，敌伪军所过之处，便进行疯狂的屠杀，正象一匹垂死的野兽，他们挣扎得眼睛都红了。

抗六军的队伍，象钢铁一样，丝毫不为这重兵所惧，他们在冰天雪地里发挥他们奇特的战斗力，王勤夫人也不示弱地跟着队伍行军，她永远牵着儿子，时刻都不脱离。

不幸的是，在一天大雪之后，她和儿子掉队了，山里的雪深及腰部，积雪埋没了路，她迷失了方向，正在摸索前进中，一队敌人追了上来，就这样母子俩束手就擒了。

被擒以后，敌人拷问她：

“你们的队伍朝哪个方向跑了？”

“不知道！”王勤夫人咬着嘴唇忍耐着鞭打的痛楚回答。

“说了就放了你。”

“没有什么可说的，我是老百姓，什么也不知道。”

“胡说，上次错放了你，你当我不认识你吗？”一个敌兵怒冲冲地说，又打了一个嘴巴。

“我可不认识你呢，我是个好老百姓阿。”

“不承认吗？来，拷打她的儿子！”

王勤夫人眼看着她的儿子被按倒地上，受着无情的拷问，她的泪象泉水似地涌流出来。这时敌人又给了她一个嘴巴，打得她的脸热辣辣的发烧，头一阵昏眩，便栽倒了。当她醒过来的时候，只听见儿子凄惨的呻吟，她的泪又掉下来了。她心疼得想抱儿子痛哭一场，却又怕软化了儿子的坚强意志，于是，她把心一横，擦干了眼泪，怒视着如狼似虎的敌人，再也不哭了。

“还不说吗？不说就打死你的儿子！”

“随你的便，欺侮弱小，算得什么英雄，你们这群狼心

狗肺的东西！下得手就把我们母子一起杀死吧。”

敌人冷笑一声，又把那遍体鳞伤的孩子暴打一顿，并追问着：

“快说，你这个小抗日军，你们的队伍朝哪走啦？”

“不知道，不知道呵！”孩子嚎叫着。

“不说可要打死你了！”

“打死我也不知道啊，要杀就快点吧。”

王勤夫人的神经已被仇恨燃烧得麻木了，她看着儿子被暴打的惨象，听着儿子凄厉的叫声，一点眼泪也没有，“打死我也不知道呀！”是多么可爱多么英雄的表现呵，王勤夫人对儿子的坚强感到了无尚的光荣和骄傲。

敌人束手无策了，他们对视很久，终于下了最后的命令：

“杀死这个小抗日军，看她还说不说？”

一把明亮夺目的刺刀向孩子的咽喉刺去，孩子鲜红的热血立刻染红了地上的白雪，这个勇敢的小生命从此停止了呼吸。王勤夫人立刻扑到孩子的尸体上痛哭起来。

敌人举着刺刀向她威吓道：

“快说，不说就让你跟你儿子死在一道。”

“我什么也不知道，杀就杀吧，难道你姑奶奶还怕死吗？你杀死我们一个两个，会有成千成万的人给我们报仇的，你们等着报应吧。”

在王勤夫人的怒斥声中，鬼子的刺刀结束了她的生命，她的血和儿子的血交流了，地上的积雪也被沸腾的热血融化了，王勤夫人母子二人舒展地躺在血泊中。

一个被抓来的伪军，被这一群杀人的凶手激怒了，他看着自己的同胞死的如此壮烈而悲惨，他几乎痛哭失声。于是，在敌人正杀人杀得疯狂的时候，他隐藏在大树后面，待敌人走远了，他才偷偷出来，用自己的手捧着洁白的雪掩埋了两具可敬的烈士尸体，然后他便投奔抗日联军去了。

4. 民族女英雄李秋岳

在通河的一片茂密的杨草甸子上，新建起一片矮矮的草棚，它隐蔽在高可三四尺的茂草叶中，假如不站在高地瞭望，是很难发现这个神秘的所在的。

在这个神秘的草棚里，住着神秘的人物李秋岳，在做着神秘的工作。

从她到通河的那一天起，敌人的特务便布下了密网，以公开和秘密的两种方式在猎寻着李秋岳的行踪，搜查、悬赏、贴布告：“捉到李秋岳的重赏！”“隐藏李秋岳的杀头！”

在这种情况下，李秋岳——这个朝鲜的女革命者，为了迅速开展工作，为了不连累可爱的群众，她不得不把她的工作机关设在绝少人烟的草原上，她和另外两个共同工作的伙伴，用自己的手拔下青青的茂草，再用自己的手建筑起这所临时的草棚，而后才安心地积极工作起来。

在炎热的夏天，虽然处在毫无遮掩的旷野里，空气却很窒闷，因为她们的草棚是埋在茂草之中的，同时，为了不让敌人嗅到这个神秘的机关，她们很少出来换一口新鲜的空

气。尤其当酷热的中午时分，那低低的草棚里，闷热而窒息，她们不断地流汗喘息着。火一样的太阳烤着她们的棚顶，那刚刚脱离了土地的青草散着清香然而却是热烘烘的潮湿的气息。没有风，没有流畅的空气，更难得到一点解渴纳凉的清凉饮料，虽然附近有清清的溪流，可是她们却不敢轻易去汲取。她们埋头于这原野的草棚里，正象囚徒幽禁在监牢中一样，虽然外面有的是自由，有的是空气，然而这自由与空气是不属于她们的。

为了工作，为了理想，为了东北和朝鲜的受难同胞，她们忍受这一切，毫无怨尤的忍受着这一切。

1937年，东北沦陷在日寇的铁蹄下足足六个年头了，东北人民已经度过了漫长而苦难的日子。这苦难究竟还要挨受多久呢？李秋岳也不敢做肯定的回答，她只抱着一个信念：“民族革命成功的日子，便是东北人民解脱苦难的时候，而苦难时期的长短，是要以工作的努力程度为转移的，我们这些抗日的革命队伍，掌握着东北人民的忧患与幸福，同时也掌握着朝鲜人民的忧患与幸福，被奴役的东北人民解放之日，也就是朝鲜民族解放之时，我们要不惜任何牺牲，不怕任何艰苦，把我们的生命交给伟大的革命，交给这块可爱的土地，交给这块土地上可爱的人民，用鲜血和头颅去换取未来的自由与解放！”

她用这信念经常在鞭策着自己，同时也用这信念经常督促着和她一道工作的同志们。

她是一个个子不高，肤色很黑，富于健康美的朝鲜女

孩子。她具有刚毅而倔强的个性，同时也具有母亲一样慈爱心肠的人。她爱护别人甚于爱护自己，把别人的苦难当做自己的苦难。在学校里，同学们都紧紧地团结在她的周围，她常是把自己的午餐费节省下来给贫苦的同学购买文具，因之，一般贫苦的女孩子更加倍地尊敬她。

她是全班同学的大姐姐，又是全校同学的小先生。她用她那生动流畅的讲词教育着大家，每次讲演竞赛的时候，她总是全校之冠。而当她接受了革命思想之后，她的演说就更加生动，更加深刻，更富于号召力了。每当她讲到祖国的命运时，便悲愤得泪流满面，听者是用低低的啜泣拥护着她的，而当她讲到光明的未来时，人们的感情立刻又会被她拉向美丽的春天了。因此，在学校里，她是一个被学校当局注意的人物，在社会上，也是被日本人视为危险分子。

引导李秋岳走上革命道路的是杨林同志，他是她一条战线的朋友，是革命同志，同时也是她的导师，而后来便成为一对志同道合的爱人了。他们的爱情建筑在革命的事业上，基础是稳固的，除非某一方叛变了革命，他们这有机的联系是不会中断的。从和杨林恋爱之后，李秋岳便感到她的理想找到了归宿，她的工作找到凭依了，她爱他，更尊敬着他，她感到在杨林同志正确的领导之下工作，永不会疲倦，更不必担心发生什么严重错误，而在他的爱的灌溉中，她将永远愉快积极，永远年轻。

可是，在他们恋爱不久，当杨林同志的活动威胁到了日寇在朝鲜统治的时候，他便不能再容身于自己的祖国了，于

是在通令逮捕他的紧急情况下，他机警的逃脱了，临行时留给李秋岳一个条子，告诉了他去的去向，并且叮咛着：“假如你站不住脚的时候，就去找我，不过，但能坚持，还要尽可能地坚持，一切听命于组织，万不可为了私人的留恋而放松了祖国解放的责任，祖国是需要人的啊！”

李秋岳收到这个条子之后没有哭，无限的愤慨烧着她为祖国自由而奋斗的热情，从此，她更加积极地，也更加警惕地工作起来。

没有多久，她也竟象她的爱人一样，被登上了黑名册，在奴才主——日本人正准备逮捕她的时候，她得到了组织的通知，不得不离开温暖的家，抛弃了被奴役的同胞，踏上航向中国的轮船。当她航行在鸭绿江上的时候，她的感情是激动的，她依恋地望着祖国的峰峦，望着鸭绿江的波涛流下了惜别的泪，她凄楚地低声唱着：

别了，风光绮丽的祖国！

别了，碧波荡漾的鸭绿江！

别了，母亲和朋友！

别了，祖国被压迫着的人群！

你们同我一样，

是一群失去了祖国受着双重压迫的奴隶，

你们同我一样，

是一群无辜的可怜虫。

长期的奴役唤起了我们的觉醒，

我们要光复故国，
我们要摆脱这无尽期的苦刑。
我们要求翻身，
我们要求解放，
我们要挣断这无情的锁链。
起来，祖国被压迫的奴隶们，
我们的热情如海潮，
我们的力量似钢铁，
我们要团结一致，
握紧铁拳，
打倒万恶的日本侵略者。
如今，我怀抱着满腔的热血，
投奔到他乡、异国。
他们一样是被双重压迫的民族，
他们一样是被帝国主义侵略的国度。
那里有正义和真理，
那里有为民族解放而战斗着的朋友。
我将和他们一道，
去战斗、去流血，
为争得被压迫民族的独立，
为换取祖国的光复，
为劳苦大众的翻身，
情愿拚掉头颅，
流尽最后一滴血。

她凄楚地唱着悲壮的歌子，抱着凌云的壮志，伴随鸭绿江碧澄的波涛，到达了**中国**，在**云南讲武堂**找到了**杨林同志**，这年她刚到十七岁。

在**中国大革命时期**，**杨林同志**和**李秋岳**深知**朝鲜的解放**是与**中国的革命成功**不可分离的，只有**中朝两国人民**紧密团结起来，才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因此他们夫妻就一起到了**广州**，参加了**中国革命**，**杨林同志**在**黄埔军校**担任教官，他竭诚效力来教育着该校的学生，而他们同时又领导着当地**朝鲜革命青年**，从事**祖国光复**的艰苦工作。他们在这个时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北伐时**杨林同志**率军北进，英勇战斗，而**李秋岳**也随军进行宣传工作，以**朝鲜亡国的痛苦**来唤起**中国人民**，为自己国家的进步而奋斗。大革命失败后，在**黄埔军校**学习了一个时期，便又同**杨林同志**一道去**莫斯科**学习。1932年，回到**中国**，秘密活动于白色恐怖的**哈尔滨**。**杨林同志**曾担任**中央满洲军委书记**。当时，**秋岳同志**对**东北妇女工作**曾提出许多很好的意见，自己决心从事**妇女解放运动**。后来**杨林同志**被调到**中央苏区**任**补充师师长**，而**李秋岳同志**则被派至**珠河反日游击区**担任**中共区委书记**，开辟**妇女工作**。于是，这一对夫妇又别离了，对于这样的别离，他们并不感到难过。他们想，为了革命，为了被压迫民族的自由解放，暂短的别离又算得了什么呢？不久，就又会重相聚首的。

然而，真的重相聚首了吗？没有啊！非但没有重相聚首，而且永远也没有聚首的机会了！我们的**杨林同志**，竟在

雪山草地的长征时，牺牲在中国的土地上，牺牲在“同是被压迫民族”的“围剿”中。

李秋岳呢？她勉强地抑止了这个惨痛的永别，增加了一种新的仇恨，继承先烈的遗志，更加努力地工作起来。她认为这才是对于杨林同志的最大安慰与纪念。她经常的自慰着：“要求得祖国解放就要有牺牲，没有热血和头颅换不来全民族的幸福，死了一个杨林，将有无数的杨林再起，革命者是剿不尽杀不绝的，在祖国未解放，无产阶级革命没有成功以前，休想享受个人的幸福，个人又算得什么哟！”

和赵一曼同志一样，李秋岳同志不久便成为珠河反日游击区的妇女领袖。调到通河的时候，是1937年的夏天，就在那用自己双手建筑起来的草棚里，开始了她艰苦的工作。

突然，意外的事件发生了，她们的草棚竟被一个韩国叛徒发现后向敌告了密。于是，在一天的黎明时刻敌人来逮捕她们，李秋岳同志在这样的生死关头，仍没有忘记保存干部，保存文件，当她发现了来逮捕的敌人时，她机警而迅速的掩蔽那个和她一道工作的同志先行逃脱了，她自己却为了埋藏党的文件仅仅晚走了一分钟，便不幸被捕了。

被捕以后，她被解到敌人的特务机关，敌人开始了对她的审讯：

“你就是小黑李吗？”

“是！”

“你是韩国人吗？会说中国话？”

“是！会！”李秋岳毫无惧色地怒视着敌人回答。

“你为什么跑到满洲来进行破坏活动呢？”

“共产党是不分国界的，全世界无产阶级都是我们的朋友，满洲人民更是和我们同一命运的。”

“你是共产党员吗？”

“是的，一个光荣的布尔什维克！”

她理直气壮地回答，傲然地怒视着敌人，敌人战栗了，他不安的站起来自语着：

“啊，原来也是赵一曼一流人物啊！”

敌人感到用硬的手段是难以使她屈服的，于是，变更了另一个方式，谄媚地说：

“我们非常敬佩你的英勇，你是韩国的女英雄，现在请求你，只要你能答复我们关于抗日联军的几个重要问题，我们是决不加害于你的。”

“我什么也不知道！”

“一个英雄是应该宽宏大度、坦率直爽的，使用欺骗是英雄的耻辱！”

“对待敌人使用欺骗，正是我们革命者的光荣，我将一直欺骗到底！”

“到底吗？”敌人的眼睛红了。

“到底！到底！”她坚决地说。

“好，看你能不能坚持！”

于是，灌凉水，上大挂，种种难忍的非刑立刻施于李秋岳同志身上，她一声不响地忍受着这一切难忍的痛楚，曾经几次的昏厥过去，但始终没有吐出抗联的一个字机密。敌人

对她一筹莫展。终于，经过了十几次刑讯之后，被解赴刑场，在就义之前，敌人最后一次地要求她：

“还是请你做最后的一次考虑！”

“没有任何考虑的，要杀就杀，废话少说吧！”

敌人还在无耻地哀求着，最后，李秋岳同志连听也不屑听了，她悲愤地喊起口号：

——全世界劳苦大众，团结起来，坚持下去，流尽最后一滴血，也不向敌人低头！

——英勇战斗，为我们的民族争取解放，为死难先烈复仇！

——打倒日本侵略者，消灭侵略者的走狗，争取做世界的主人！

——中韩两国人民团结起来，争取自己的解放！

——共产党万岁！斯大林同志万岁！毛泽东同志万岁！

——抗日联军万岁！万岁！万万岁！

一颗子弹击中了李秋岳同志的咽喉，从此，这位韩国女英雄便带着三种仇恨，永诀了她舍不得离开的劳苦大众，终于和杨林同志一道去了！

5. 张宗兰和她的嫂嫂

被伪县府一般人誉为年少英俊的伪特务科长田川清，在张宗兰看来，简直就是一块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她认为“英俊”二字安在他的头上，未免沾辱那高贵的字眼了。

她从未看见过那样爱打扮的男人，脸上的雪花膏总是泛着一层浮白，短发上的头油照例使苍蝇无法停留，也许那种过度强烈的油香熏得它们远避了吧？最讨厌的是他总爱用手去摸那本不凌乱的短发，以至弄得两手油污，常把很干净的公文摸得到处油渍，因为不好向上呈递只得重抄，于是，这浪费精力的差事就又落到张宗兰的头上了。

田川清的西装革履倒不足非议，奇怪的是他的办公桌上那面玻璃砖圆镜，仿佛比他的文具更为重要和有用，他经常面向镜子端详着自己，并用那沾满发油的手去捻他的一字小胡，于是他的胡子也竟揩了油，变成贼光油亮了。

这一切举动都被一般溜须拍马的人美其名为潇洒行为。因为田川清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又是大地主田福的后代。据说学习成绩“很不错”，又善于钻营，到县政府不久，就把妹妹嫁给日副县长小川清一做姨太太了，因此，他便成为小川清一的唯一心腹：他曾煞费苦心地把原名“梦成”改为“川清”，为的是表明愿做小川清一的心腹之意。

象这样一个红人有谁敢不敬而畏之呢？只有倔强的张宗兰却讨厌死了，她常在心里骂他：“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可是她又觉得这两句古诗并不足以形容田川清的毫无心肝，把他比做商女未免还抬举了他，不如说他是恬颜待敌、认贼做父的汉奸奴才较为恰当些呢！

田川清一贯摇头摆尾，趾高气扬，他从不曾想到会有人以鄙视唾弃的眼光来看他，张宗兰对他的冷漠，他认为只不过是一个未见过世面的少女的矜持面已，只是略施追逐小

技，不愁她不服服贴贴上钩的。

张宗兰的健康美，早使许多职员垂涎三尺了，可是由于她那凛然不可侵犯的态度，谁也不敢去触犯她。她经常沉默寡言，不苟谈笑，那双深沉的眼睛确有引人的魔力，可是野心家的妄想一遇到她那刚愎的目光，就象春天的污雪遇到太阳一样，马上就化为泥浆了。因此，伪县政府的青年职员，谁也不敢去惹这棵有刺的玫瑰，最多不过从旁欣赏欣赏而已。

田川清自恃品貌不凡，学识广，地位高，更依仗日本人的权势，在张宗兰到伪县政府未滿三个月，他就下了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于是，他的镜子便照得更频繁了，除了雪花膏和发油之外，有时还洒些香水。为了取悦对方，逐渐减轻了张宗兰的工作。有一天他把张宗兰叫到他的办公室，用极其谄媚的声调笑着说：

“张小姐，你真算咱们县政府女同事当中最出色的一个了……”说着竖起大拇指，对方的脸马上绯红了，他看得出来，那神态不是为了娇羞，而是由于激动，于是立刻转换了语气：“真的，张小姐，不是当面恭维，你的工作太好了，字写的如同印的一般，我向来主张赏罚分明。张小姐，象你这样的职员应该受到褒奖，我决定从下月起给你增薪二十元。”

他企图用这惊人的恩惠去打动张宗兰的心，当他说到增薪二十元的时候，连他自己的心都紧张地跳动起来了。可是，他决没料到张宗兰竟毫不为动，出乎他意外的，她对他注视

了一会之后，竟一言未发，安静地走出去了。

这第一个软钉子，田川清只好挺过去，他自慰着：“女孩子都是这样，自尊心强，爱装腔作势，慢慢地她就矜持不住了。”于是，他便积极地储蓄勇气，准备再一次进攻。

第二天，张宗兰来交写好的公文时，他发现她戴了一个白色口罩，他禁不住问：

“怎么，你伤风了吗？……唔，我这有药，一熏就好了。”一面说着，一面开抽屉找药，张宗兰却摇头阻止着他：

“我没有伤风。”

“那为什么在屋里还戴口罩呢？”

“你这屋有股怪味，闻了我要呕吐！”张宗兰郑重地回答这么一句之后便退出去了。

这分明是恶意讽刺，假如是另外一个职员，田川清是不会甘休的，但对于张宗兰，他也只得忍受了。

田川清被张宗兰碰的软钉子连他自己都记不清次数了。他虽然用尽了一切手段追逐，可张宗兰的固执顽强竟逐渐地使他害怕起来，他同时也感到这女孩子的冷酷太使人愤恨了。

为了保持男子汉的尊严，又不好过于露骨的向她追求，为了不丧失在县政府的威望，更不使用胁迫的手段，同时他也知道，象张宗兰这样一个倔强自尊的女孩子，绝不会被威胁所屈服的，假如她不顾一切地吵嚷开去，自己的威信将会扫地的。想来想去，最后决定还是找个媒人好，于是，他想

到了小川清一。

这一天，小川清一以媒人的身分找张宗兰谈话了。他首先对张宗兰的工作赞美了一番，还夸奖了一番田川清的学识和品貌，接着就谈到了本题。小川清一的话说得十分委婉动听，可是却引起张宗兰极大不快，为了彻底消除田川清的幻想，她干脆撒了个谎：

“不敢高攀，我已经订婚了，而且最近就要结婚。”

“和谁呀？”

“这个没有必要告诉你！”张宗兰含怒地说。

“不告诉我也没有关系，订了婚也没有关系，婚约是可以解除的呀！假如你愿意，我可以帮忙。”小川清一抑压着不快，企图缓和这僵持的局面。张宗兰却冷笑了：

“解除婚约吗？笑话！”

“田先生大大地爱你呀。你的明白？”

“我可不爱他呢！对不起，请不要再谈这事了，这没有可能！”

谈话到此为止，结果是不欢而散。

小川清一碰了钉子非常恼怒；田川清在绝望之余也恼羞成怒，于是，两个人商量商量就把张宗兰撤了职，理由是政府不雇用结婚的女职员。

张宗兰的介绍人李科员曾大胆地质问过田川清：

“什么理由撤她的职呢？即使政府真有不雇用结婚女职员这条规定，可是，她并没有结婚哪！”

“订婚就是结婚的序幕，二者是没有什么区别的。”田

川清不能自圆其说地回答了李科员。

李科员怀着满腔不平，想要争辩，但明知那是无济于事的，说不定会为此和张宗兰遭受同一命运，失业事小，影响了工作的进行倒是值得注意的，于是只得含怒而退。

张宗兰被撤职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县政府，而且也很快就知道了她被撤职的原因，大家有的惋惜，有的不平，更有的认为张宗兰命薄福浅，不识抬举：

“象这样乘龙佳婿，打一百个灯笼也难找到呵！别人巴结都巴结不上，她却上赶着还不肯，真是坐轿嚎丧，不识抬举，现在好呵，连饭碗也摔碎了，想锅都锅不上啦！”

“我看她是鬼迷心窍，无福享受呵！”

议论尽管纷纭，却没有一个能猜到张宗兰的心理的，她认为这“惩罚”非但没有给她以打击，相反的，正是她的胜利和光荣，虽然，没有能够很好地去完成党给予的任务，不能不算是一个遗憾和损失。但这毕竟是不得已的事呵。

张宗兰今年已经二十二岁了，但还没有跟谁恋爱过，她一直是朴素严谨地生活着、工作着。“九·一八”的第二年，当她十八岁的时候，就同兄嫂一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佳木斯支部。去年在桦川中学毕业以后，便付出了全部精力为党工作着，她以无比的忠诚与热情去完成党所给予的任务，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中，不知经历了多少艰难险阻。然而她却光荣地坚持下来了，猎犬的嗅觉虽敏，却被她的机警智谋战败了。

这次，她又带着党给她的发现进步职员、了解敌情的任务，打进了桦川县政府，帮助她开展工作的人，便是介绍她

来的李科员。但由于田川清的无耻追逐，她竟成了被注意的目标，致使工作不能很顺利的进行，这虽是一个遗憾，但是她想：假如不很快结束这段近乎滑稽的生活，怕迟早会暴露秘密的，那时，对党的损失将会更大。因此，她被撤职以后，并不懊恼，她准备以更多的精力去迎接新的任务。

新的任务下来了，象每次一样，她以非常愉快和无比热情来欢迎，而最使她愉快的是得到了一个素日为她最崇敬的同志和她联系。

这个同志是依兰县委书记高禹明，一个爱好文学而又擅长创作的青年，是张宗兰的哥哥张耕野最得意的门生，他不但和张宗兰年龄相仿，而且两个人的性格和作风也大同小异。他性格沉静，爱深思，不大好说话，有时羞答答得象一个乡下姑娘，然而，当他工作起来的时候，却是勇敢而又机智的。

这一切都使张宗兰对他发生了好感，过去高禹明为了工作经常到张家来，他们虽有接触，但因为没有工作上的联系，两个人很少讲话，总是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因而相互并不了解，仅从哥哥的夸奖中知道他一些工作情况和历史而已。

接受了这新的任务之后，两个人接触的机会多了，于是慢慢地他们在工作中建立了信仰，产生了友情。他们是在互相尊敬，默默相爱着，可是谁也没有向谁表示或追求过，竟象保守党的秘密似的，保守着各自的心声，一直是十分谨慎的，除了工作关系而外，决无不必要的接触。他们都认为在秘密工作中革命者的恋爱方式应该如此，公开的恋爱不仅足以妨碍工作，而稍一不慎，就会造成于革命不利的影响，同

时，他们正是以全部精力贡献给整个民族和革命的时候，尤其当民族多难之秋，他们也没有恋爱或结婚的迫切要求。

就是这样默默相爱着吧，这的确也是一种不平凡的慰藉，对工作情绪是起着鼓舞作用的。虽然两个人都在有意的矜持着，可是，就在那默默无言中，那秘密的心声，却在不断地传递着，而张宗兰感觉的特别深切。

每当两个人见面的时候，张宗兰就不禁地回忆起田川清的一切来，两相对照，就越发感到高禹明的崇高和可敬了，而田川清在张宗兰的脑里便一天天增加着憎恶与鄙视，他简直就是一匹狞狰的野兽！她觉得这正是革命与反革命两个典型的人物。

就是这样的恋爱形式持续了将近一年了。当高禹明将要远行的时候，这一对默默相爱的青年却抑制不住惜别之情，只有在这个情况下，他们才感到了难言的隐痛。当高禹明把这别离的消息告诉张宗兰的时候，她自己也奇怪，为什么脸会突然发烧了呢？心跳得是那样厉害呵！假如不是匆匆分手，她会在高禹明而前出丑的，因为当她刚一掉转头说了声“再见”之后，她的泪便滴在地上了。

张宗兰的惜别，高禹明是深深感到了的，因为他自己也有着同样的情绪，他想，这一别就不知何年何月才能重聚。如果能够顺利完成任务还好，假若遇到了险阻，说不定就没有再见的可能了，而这一段感情并没有交待清楚，不能不是人生中的一件憾事。但是如何交待呢？在一切动身准备都做好之后，他便躺在那张光板床上沉思起来。然而，他的思维

被不平静的情绪搅乱了，正象一团被揉乱的丝，怎么也找不出头绪，过去，现在和未来，简直把他的脑子搅昏了。

他焦躁地一会卧倒，一会爬起，过去，一切艰难险阻都没有难倒过他，那些满布荆棘的路，都象走平道似的大胆地踏过来了，以他的勇敢顽强曾经为党完成了不少艰巨的任务，而如今，遇到了个人的一点小事，竟会这样畏缩踌躇起来，是什么道理呢？他自己也不能解释。

时间是不能等待的，他看了看手表，正十二点，离开船的时间只有两个小时了。怎么办呢？这一段感情还没有个适当的交待，难道带着它离开此地使它成为不可弥补的遗憾吗？

“不，不应该！”他自语着。

于是他果决地提起笔来，神经是这样的紧张，竟不知从何说起！最后，他用颤抖的笔写下了潦草的字迹：

宗兰同志：

在我们一年的共同工作中，你给了我不可泯灭的印象，你的品质和作风给予我极大的鼓励和影响，现在，为了工作我们暂时分手了，我冒昧地向你表白我久梗于心的愿望——我希望我们能成为一对永远在革命道路上共同奋斗的伙伴，你同意吗？盼立刻得到你的答复。

即将远行的禹明登船前

很快地，这个字条就送到张宗兰的手里，也很快地回信便来了：

禹明：

假如组织通过，我完全同意。望你珍重，并祝工作顺利！

宗兰即刻

虽是那么简单地一个短笺，在高禹明看来，却比万语千言还宝贵，他珍惜地把它放在衣袋里，便一无留恋地奔赴码头去了，仿佛放下了一个沉重的担子，有形容不出来的轻松。

张宗兰的哥哥张耕野在桦川中学教数学，他团结一部分进步青年，进行着阶级教育。嫂嫂金凤年过去在小学教书，现在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为了便于工作，把大孩子送到双城的母家抚养，可是第二个孩子接着又出世了，以后她又失了业，只得留在家里一面抚养孩子，一面进行工作，很少到外面活动，同志们都称她为新型的贤妻良母。

这个革命小家庭，同时也是省委的秘密机关，它担负掩护同志的任务，省委的领导同志来时总是住在他的家。

张宗兰和金凤年的机警谨慎能使到他家来的同志安心，更能得到很好的照顾，象自己的家一样的温暖。而在他们影响与教育之下，一些学生和进步青年，由于对他们的崇敬和对革命真理的热切追求，也常到他们家来领教学习，因此，在这个革命小家庭里，曾经培养出不少忠诚革命的青年，成了光荣的共产党员，李科员和高禹明不过是其中的两个而已。

高禹明走时是在1936年的秋天。他顺利地完成了任务之后，在第二年春暖花开的时候便回来了，他和张宗兰久别重

聚，却反而觉得不自然起来，见面更少讲话，有时甚至避免交往了。这情形一直持续了一个多月，才慢慢地恢复正常。

当高禹明鼓足了最大勇气向张宗兰提起临别之约时，她有些踌躇了，她并不是想自食诺言，而是怕订婚之后，对方有结婚的要求，因而，她极其诚恳地说：

“订婚我是同意的，但是我却不愿意很快结婚，因为我还要为党做更多的工作，结了婚势必受到妨碍，我嫂嫂就是一个例子；而且，当民族遭受如此大难的时候，个人的事应该放在极渺小的位置才对。假如你不同意，那么，这件事就先放放也无妨，但，你可以放心，我的初衷是至死不变的。”

高禹明被她的话深深地感动了，因此就更增加了对她的敬爱，他毫不犹豫地紧握对方的双手答道：

“我完全同意，并坚决执行你的决定，宗兰，你该会相信我吧！”

“相信的，不过，你不感觉勉强吗？”

“不，一点也不，我可以向党发誓。”

于是，就这样约定了。之后，经过组织批准，两个人便正式订婚了。然而，他们的约言却没有向任何人宣布，知道他们订婚的同志们还都在静候着他们的佳期呢。

抗战的消息传到东北之后，他们的工作随着这期待已久的曙光，更加紧张起来，而敌人对革命者的残害手段，也越发毒辣了，逮捕、屠杀，是日有所闻。张耕野也成了猎犬注意的目标，不得不作离去的准备了。

一天，田川清竟在张家出现。

自从撤了张宗兰之后，他曾绝望过，但最近当他得知张宗兰确未结婚的情报时，那已死的欲念又复萌芽，于是，他便假借调查之名亲自跑来看个究竟，一见张宗兰，便惊问道：

“呵，张小姐，你好？还没结婚吗？”

张宗兰正在给哥哥缝制粮袋，这个不速之客的突然闯入，她以为有什么不幸的事要发生了，她的心急跳着，但表面还很镇静。田川清的发问却使她没有考虑的余地，她仓促回答了一句：

“没有。”

“那你去年为什么撒谎呢？”田川清做出既惋惜又埋怨的神情，“张小姐，我看你还是官复原职吧，那个位置还给你留着呢。哈哈……”

田川清的谄笑使张宗兰转惧为怒了，她很想辱骂他一顿，可是理智马上告诉她这将会于她全家不利。于是，她只得强作笑容说：

“谢谢你的关心，让我考虑考虑。”

“后天是十月一号，你就上班好了，我想是没有什么值得考虑的。”

“也好！”张宗兰略加思索，就答应下来，因为她估计哥哥就要回来了，倘如被他碰见，说不定要败坏大事的。

嫂嫂金凤年把哭着的孩子交到张宗兰的手里，便去烧火做饭，她故意弄得满屋是烟，便把田川清熏走了。

当天晚上，张耕野便离开佳木斯投奔抗联三军去了。

高禹明因为担任中共下江特委书记必须坚持，张宗兰和

金凤年为了完成任务也没有走。但为了逃避田川清的追逐，她们另迁了一个住处。

在佳木斯又坚持了三个多月，在1938年的春天，敌人开始对松江下游大肆烧杀，下江特委遭到了破坏，高禹明慌忙地冒着特务密布的网，来不及向张宗兰辞别便离开佳木斯，奔上了逃亡之路。

这时，张耕野在抗三军四师的一次战役中光荣牺牲了。消息传来，姑嫂二人已经顾不得悲痛，因为得到这噩耗的同时，李科员秘密通知她们赶快逃走，据说在她们不备中张宗兰又被田川清发现了。

张宗兰想，在这风声紧急的时候，假如再被田川清找到，势难逃脱了，因此和金凤年计议了一下，姑嫂二人便带着未满三岁的孩子登上开往哈尔滨的火车，准备去找组织关系。

在极端严重的情况下，她们没有眼泪，也没有交谈，一路上两个人的神经都是相当紧张的，直到完成了这段秘密的旅行之后，神经才松弛下来，然而，这连续而来的生离死别，逃亡流浪，并没有使她们感到如何沉痛。因为她们早已有了精神准备，她们认为在残酷的斗争中，这本是一种意料中的平凡的遭遇，现在，她们唯一迫切的要求，就是如何设法和组织取得联系了。

不幸的是，她们到哈尔滨第二天，竟被困在道外旅馆里，田川清主使的特务，把她们下宿的天泰栈整个包围了，连电话线都被割断。

那一天一夜恐怖焦躁的日子，不知她们是怎样熬过来的。第二天，七八个“老剥代”在警察的监视下从天泰棧的后便门拖出两具女尸和一个孩尸，这便是张宗兰、金凤年和那个未满三岁的孩子。她们的脸色铁青，嘴角浮着鲜红的血沫，据说是在被捕之前服毒自杀的。

这光荣而又壮烈的殉难，留给活着的同志们以痛切的悼念，敌人却忘形地狞笑了，他们以大字标题在报纸上宣传着：“又消灭两女匪。”

在1942年甘南战役中，高禹明也流完了最后一滴血，在战场上殉国了。

6. 小 妹 妹

小妹妹被俘的消息传到五军后，全军同志都黯然了！这消息带来了惊愕与不安，更带来无限的悲痛。一开始，每个人都瞪起眼睛，惊慌地互视着，除了一声惊叫之外，谁也不说一句话，仿佛说破了会更加于小妹妹不利似的。逐渐地，很多人都把头垂下去了，长吁短叹配合着跺足捶胸。有的人在低首漫步着，性格暴躁的则咬牙切齿，握紧了铁拳声言要和鬼子去拚命，把小妹妹抢救回来。尤其是几个女同志，失掉了小妹妹，象失掉了他们的灵魂一样，他们在惊慌之余，便互相埋怨起来：

“我说我去，你偏答应了小妹妹的要求，这下子，可一去不返了！”

“不让她去行吗？你看她急得那样子。”

“就是因为她太勇敢了，才出了这事情，畏缩的人是决不肯冒险的。”

“总之，我们对她的爱护不够，照顾不周……”

“……”

你一言我一语地吵成了一团，感情比较脆弱的没有心思参加这争论，早已躺在铺上泣不成声了。

秋风扫着落叶，夜寒逐渐侵袭上来。但是，今夜谁也没有心思去点燃篝火，大家忍耐着秋夜的峭寒，偎在一起很早便睡下去了。夜显得这样凄凉！

凄凉的夜，漫长的夜呵！今夜，已经失却了往日的宁静，细琐的声音不间断地从失眠者的睡处发出。互相影响着，竟很少有人能够安然酣睡。

在敌寇疯狂残酷的追剿中，尤其在每年秋冬两个季节，抗联同志的牺牲或被捕，是经常发生的，本来值不得这样大惊小怪、惋惜和不安。可是，小妹妹却例外，她是大家的精神慰藉，全军的爱的寄托者，象一个大家庭里独生的孩子一样，有了小妹妹，全军的生活便显得充实和愉快，当她离开了队伍的时候，大家的情绪便显得沉闷与空虚。小妹妹虽然不是军权在握，不能发号施令，可是她的一声号召，却可使全军振奋。因之，她的被俘使得每个同志都感到深深的惋惜和不安。

从小妹妹参加抗联的那一天起，就给整个队伍增添了不少光辉和生气。她的勇敢，她的机智，曾经直接间接地教育

了影响了好多落后的新队员。使畏缩者变成了勇敢，勇敢的更加无畏地去冲锋陷阵，大家爱护小妹妹象爱护自己的武器一样，有谁敢欺负小妹妹，大家就会群起而攻之。

小妹妹姓甚名谁，没有谁能叫得出。刚来的时候，她是报了名的，不但名和姓，就连家乡住处，也说得清清楚楚，可是谁也没去注意它。“小妹妹”这个亲昵的绰号一提起来，整个五军便普遍地传开了，而且很自然地成了永久的名字，她原有的姓名，反而被人们忘得一干二净，仿佛她生来就没有姓名似的。日子久了，连小妹妹自己，也几乎把原名忘掉了。

小妹妹刚来的时候，不过十一岁，她那双长睫毛的大眼睛，流露着无限的智慧，她聪明而且勇敢，娇小而且健康。尤其她那悲惨的身世，是引起全军同志爱怜的因子。小妹妹的爸爸是一个伐木工人，妈妈是一个病弱的农妇，除了小妹妹自己，还有两个勉强活下来的弟弟和妹妹，一家五口过着穷苦的日子。忽然，日本鬼子来了，无缘无故地给她爸爸加了一个“通匪”的罪名，当爸爸和来逮捕的鬼子挣扎争辩的时候，鬼子一刺刀，爸爸便血流满地地被刺死在院心。紧接着，鬼子们轮奸死了病弱的妈妈，摔死了七个月的小弟弟，六岁的妹妹也给吓死了！房子也被烧掉这出人间惨剧，小妹妹都一幕幕亲眼看见。因而在她那幼小的心灵上，刻上了不可泯灭的创伤，同时更燃起了无比的仇恨，这血海深仇，是永远也不能在她心上泯灭的。

家破人亡之后，小妹妹整天疯了一样地哭嚎着。手握着

火堆中扒出来的爸爸伐木的板斧，到处乱窜，发誓要为父母弟妹复仇！

三天以后，她便被一个邻舍带到抗联来。从此，她再也不哭了，立刻就成为了全军的小妹妹。而不久，小妹妹就变为一个最勇敢、最机警的小侦察员了。慢慢地，她便懂得了很多革命道理。就这样，她在同志们热情的抚爱下度过了五年极有意义的愉快生活。她感到这群哥哥姐姐们给予她的热爱温存比爸爸妈妈给她的不知要多多少倍；然而她却从来不撒娇撒痴，一个复仇的热望占据她整个稚弱的心，她经常天真地要求着：

“队长哥哥，你给我一杆大枪吧，让我去捣毁敌人的狗窝！”

“看你那么一丁点，背得动吗？”

“若不然，就发我一颗手榴弹也行，崩死几个鬼子也好报报仇呵！”

“仇，大家天天在替你报呵，急什么？”

“不，一定要用我自己的手弄死几个鬼子才解恨呢！”

就在这复仇热望的支使下，小妹妹完成了不少艰巨任务。

最后这一次，不幸小妹妹终于被敌人发觉而被俘了。

然而，当被俘的时候，她一点也不惊慌，她认为复仇的机会到了。

“你家在哪里？叫什么名字？”

“我是一个野孩子，从来没有过家，我的名字就叫野孩

子。”她镇定地回答敌人。

“胡说，没有家怎会长得大？”

“野草野果把我养大的，树林子就是我的家。”

“说实话饶你命，扯谎就砍掉你的头！”敌人的翻译声色俱厉地吓唬小妹妹，而小妹妹却声色不动地冷笑了：

“我正饿得不想活了，砍头？随便吧！”

“我们不忍心无缘无故地杀你，你长得大大的好看！”

鬼子指导官和翻译同时眉飞色舞地对小妹妹调笑。小妹妹两只美丽的大眼睛充满了愤怒。

“喂，我问你，你跑到我们的防地鬼鬼祟祟地干什么？刺探军情吗？”

“看你们昨夜汽车送来那么多好吃的，我想捡点洋捞，长这么大也没吃过那样好东西呀！”

“撒谎砍了你的头，快说吧，是谁派你来的？”敌人的大巴掌向小妹妹飞来了，小妹妹一面躲闪，一面回答：

“是我的肚子派我来的，饿得实在难过呵。一到秋天，我就该挨饿了！”

一连五天，不管敌人怎样逼问，小妹妹始终没有变换口供。而五天之中，她却已和伪军们处得很熟了。并且把她家破人亡的经过告诉了看守的王连长，在和他的相处中她了解了王连长是一个勇敢热情的青年，她用她那感人的声态，声泪俱下地叙述了她悲惨的童年，王连长竟被感动得落泪了！

然而，她却把参加抗联的一段秘密，巧妙地掩盖起来了，她一口咬定她是一个野孩子，一直过着流浪生活。

经过十几次的审问，小妹妹已是皮开肉绽了。然而她什么也不承认，她装作一个地道的野孩子，痴憨地避开关于“抗联”的一切逼问，她说：

“我是个野孩子，土匪我也见过，一见他们的影子我便猫起来了，他们是捉不着我的。”

十几次刑讯的结果，敌人一无所得，到最后，敌人的指挥官淫猥地笑着：

“你想吃好的吗？”

“想！”

“那么，做我的太太你愿意吗？”

“做太太？行。”小妹妹装作迷惘而含羞地说，“只怕我太小了，才十六岁呢！”

“不要紧，吃好的就会快地长大的。”

“你不嫌我小就行，可是得先治好我的伤，伤好了才能做你的太太，不然就把我打死吧！”这个不怕死的野孩子严肃而坚决地提出了这个最后条件。

敌指挥官无可奈何地接受了，吩咐医生用一切方法使小妹妹的伤痕赶快地平复，他焦急地然而又不得不忍耐地等待着洞房之夜。

从此，人人怜爱的小妹妹便做了敌人的上宾。慢慢地她从和王连长的闲谈中了解了他的部下大部分对敌不满，于是，她开始了对伪军的宣教工作，使伪军反日的情绪日益高涨，逐渐地和敌人离心离德了。

这一切都在秘密地进行着，敌指挥官象蒙在鼓里一样。

十天过去，小妹妹的伤势逐渐好了起来，她已经能很自如地行动了，敌指挥官再也不能等待下去。于是，就在一个清明的月夜，置备下丰盛的酒席，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小妹妹装扮得花一样地美，在热烈地庆祝中和敌指挥官成亲了，小妹妹是那样天真烂漫地和新郎挽着臂走进了布置一新的卧室。

王连长用惋惜的目光一直把她送了进去，然后，奉命把步哨放得很远很远。

× × × ×

小妹妹失踪已经半个月了，五军同志们的悬念与日俱增。每当和敌人血战之后，他们便会怀念起小妹妹来，小妹妹那双智慧的大眼睛，那坚决而天真的话语，那小英雄的勇敢敏捷姿态以及那嘹亮而愉快的歌声……

这一切景象都成过去，这一切都变成了痛苦的回忆，小妹妹是一去不返了。大家都断定：小妹妹早已气化清风肉化泥了，想找到她的尸骨都成为不可能的事了，因为他们已经竭尽了他们搜寻的努力。

东方现出黎明之光，是一个晴好的秋晨，五军的同志们正在做早操的时候，突然听到了远远的一声呼唤：

“小妹妹回来了，小妹妹报了仇回来了！”

分明是小妹妹的声音呵，分明是小妹妹愉快得发颤的呼唤呵！大家停止了操练，惊愕地耸起耳朵，把视线集中到呼唤的方向，在两箭多远的草地上，正有一个花一样的女孩子飞奔而来，那不正是小妹妹吗？不正是失踪已久的小妹妹

吗？有些同志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然而那愉快的声音多么熟悉呀！“小妹妹胜利回来了，小妹妹报仇回来了！”

小妹妹燕也似地飞来了，燕也似地扑来了。头上的大红绸结在乌黑的短发上招展，象一面红旗。

大家乐花了眼睛，乐昏了头，乐出了眼泪，他们简直无法表示对小妹妹的欢迎了，他们把她举在头顶，掷在空中，甚至抱在臂里。当热情稍微冷静下来的时候，才忽然想起问小妹妹：

“小妹妹，你怎么打扮成这个样子呵？”

当大家的热情稍微冷静下来的时候，才忽然发现，从小妹妹来的方向，正有一大队武装伪军向五军的防地跑步而来。这时大家才丢开了花一样的小妹妹，操起各自的武器准备迎击，他们肯定而惊慌地说：

“敌人来追捕小妹妹了，赶快把她保护好！”

“不是的，”小妹妹脆快地笑了，“他们是反正的伪军，和我一道来的一个连。”

“怎么？”大家都用怀疑的眼光看了小妹妹一眼，随后，都准备好武器迎了上去，并严密地警戒起来，面花一样的小妹妹已被哥哥姐姐们监视住了。

“我用刺刀杀死了鬼子指挥官，发动了全连哗变，这就是我半个月的成绩。看，他们不是把几个鬼子全绑着送来了吗？”

王连长命令全连在距五军防地一米远的地方停下了，

把枪举在头顶，他自己先把几个活捉的日本军曹带了上来。事实证明了，小妹妹没有说谎，这行动也没有任何阴谋，她是始终忠实于祖国，始终忠实于抗联的。于是小妹妹又被举在头顶，掷在空中了，小妹妹头上的大红绸结脱落了，小妹妹把它执在手中迎风摇曳，好象一面红旗在向着反正的伪军召唤。

然而，不幸的是，半年以后，小妹妹终于在镜泊湖的一次战役中牺牲了！直到现在，勇敢机智的小妹妹，还活在抗联同志的心中。

7. 八女投江

冷云接受了政委的指示，记下了同志们恳切的叮咛，带着她的七个女队员，天将放亮便出发了。

象每次一样，当她肩负起这个神圣的使命之后，她是无比愉快的，因为她具有完成任务的充分信心。几年来，比这更艰巨的任务，她已经完成了不计其数了。

每个人带了些干粮和小米，带着防身的武器和热切的希望，愉快轻松地告别了×军的同志们。

“抄小路，别走大道，小心不要走进敌人的伏击圈呵！”

“更要防备的是汉奸走狗，近来他们的活动更加猖狂了。”

这是同志们的殷殷叮嘱，冷云都郑重地接受了。

“不成功便成仁，无论如何不能做敌人的俘虏！”政委特别着重地告诫着。

“头可破，血可流，身不可辱，即使不能为党增光，也决不贻害民族玷污革命的，政委同志，你的告诫我们牢记了。”

冷云严肃而坚决的誓词，使得政委满意地微笑了。他一直用赞叹的目光望着这八位女英雄消逝的背影。

“希望你们凯旋归来！”微风中送来同志们的欢呼。

八个人异口同声地回答。那声音是坚定的：

“不能凯旋归来，必光荣死去！再见吧。”然后便顺着小径前进了。

冷云是佳木斯的一个小学教员，“九·一八”第二年，她便丢下了粉笔，动员了五个优秀学生，随着她的丈夫参加了游击队。她虽然是知识分子出身，却不似一般柔弱女性，她具有着北方人壮健的体格和刚毅好强的个性，她坚决果断，在游击队的战斗生活中，更表现出了她的英勇机智，而对革命更是无限忠诚。每当情况紧急的时候，她总是挺身而出，虽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她常以具体的行动教育她的学生，影响着全军的同志们。因此，她不但受到她的学生们的尊敬，也赢得了全军同志们的爱戴。平常时候，她不苟言谈，经常保持着严肃的沉默，可是一到了宣传的时候，就充分地表现出她的演讲才能了。在全军中，她是一个出色的宣传家，在学校里，更是一个最受进步学生尊敬的教师，一直在和她出生入死的七个女游击队员，就是因为受了她的影

响教诲而先后参加了游击队的。

近来，敌人残酷的扫荡竟是一天比一天频繁起来。假如长此下去，×军必须转移驻地，扩大后方，因此决定先派人渡过牡丹江，到××一带动员群众，建立抗日的根据地。于是，这个任务便落到这位出色的宣传家身上了。当她接到这个命令时，内心感到无比荣幸，立刻召集了她的七个队员传达了政委的指示。她们每个人都有着冷云同样的信心：“一定能够很好地完成任务！”

离开了×军驻地之后，她们时刻记着同志们的叮咛，除非实在没有小径可走的时候，是决不走大路的。

八个人全是农家打扮，有的提着篮子，有的背着米袋，而在各人的裤带上却掖着各自的武器。她们迎着初夏的微风敏捷地前进着。一路上，关于战斗和工作的事一字不提，只随便扯些农家的闲话，一方面用来掩护自己的面目，也借以减轻旅途的疲劳。

她们当中最小的胡荣和小鱼，是一对天真活泼的女孩子，才不过十四五岁，是去年春天才参加的，虽然在游击队中锻炼了一年多了，但毕竟年纪还小，还不失孩子的天真，爱玩爱闹，她们是单纯、勇敢、聪明而可爱的。当走到没有人迹的旷野时，她们踏着那葱绿色软绵绵的草原，仰望着辽阔的晴空，便愉快得禁不住手舞足蹈起来，两个人同声唱着——

我们是革命的新女性，

我们是抗日卫国的急先锋，

冲、冲、冲，
挣脱封建的枷锁，
冲出家庭的牢笼，
飞、飞、飞，
壮志鹏程，
誓死做个民族的女英雄！
……

开始还低声唱唱，渐渐地，便唱得得意忘形起来，把声音逐渐提高了，冷云忙走过去制止地说：

“嘘，轻声些，这是你们唱歌的时候吗？难道你们竟忘了你们的任务；忘了敌人监视的耳目吗？”

两个人受到冷云的斥责，马上警觉地把下半段更雄壮的歌词咽回去了，随着伸了伸舌头。胡荣还辩白道：

“怎么能忘呢？只是喉咙痒起来了……”

“况且这野地里空旷旷地，连个鬼也不见，唱唱歌又怕什么？”小鱼撒娇地抢着说。

“别胡说了吧，你看不见‘鬼’，‘鬼’可看见你了呢！况且那样的歌子也不是可以随便到处去唱的！”

胡荣和小鱼承认了自己的冒失，于是沉默起来。

冷云怕过分压制了孩子们热情，便讲了几个笑话，笑声在原野中荡漾。鸿雁掠过晴空，她们已经忘了旅途的漫长，脚步更加轻快起来了。

约摸下午三点钟左右，她们已经走了五十多里了。中途

上，她们没有休息，除了吃一点干粮之外，也没有正式打尖，而胡荣和小鱼因为入伍不久，还不太习惯于长途行军，脚步看来是有些沉重了。

“歇歇再走吧。”冷云看了看太阳，还早得很，便领头坐了下来。她认为这里是有七分安全把握的，过去大队行军时，常常在这里搭锅做饭，只有三个多月没有过来了，情况有无变化，是无法估计的，因此，还不得不抱着三分的怀疑和警惕。

冷云一休息下来，大家便都随着席地坐下，她们倚着绿叶成荫的杨柳闭起了眼睛。

于是，胡荣和小鱼又来了玩的兴致。她们便牵着手跑到江边，一边玩着那清澈的江水，一边洗掉了满脸的尘土和汗渍。

冷云没有睡觉，在这特务网密布的情势下，她是不敢有一刻松懈的。

远远地一个赶牛的老头从田垄里向着村中走去了。

又一个放羊的青年农民穿过草原向北方消逝了。

冷云想：“这都是耕作归家的农民，不会是坏人的。”

这时，胡荣和小鱼跳着笑着跑回来了：

“那水真清得厉害，浅的地方连江底的石子都看见了，咱们用脸盆烧点开水喝不好吗？”胡荣用探问的口气对冷云说。小鱼忙又抢话说：

“煮点饭吃可更美啦！”

冷云一直微笑地看着两个孩子洗得红扑扑的脸，没有即

刻回答。她计算着：再走十来里，才能到三道河子，再搭船过江，再找下宿处，怕天就完全黑了，老乡们一定都已睡下，又怎好烧火做饭去惊扰人家呢？同时大家一天没有吃饭，的确是又饥又渴了。于是，她同意了小鱼的提议：

“就煮点稀饭吃也好。”

冷云的一声应诺，全体响应，连睡觉的五个人全自动地起来了，于是淘米的淘米，架锅的架锅，拾柴的拾柴，一会的工夫，一个三根粗柳条筑起的行军灶便筑了起来，再把带来的一个脸盆放上，接着金黄色的小米便下了锅。很快地米粒在沸滚的水中翻腾起来，饭香在开始向外飘散着。

大家注视着蒸汽腾腾的脸盆，等待着一个痛快的晚餐。

突然，冷云发现西面大路上有一团蠕动的黑影，而且渐渐地近了，不过两箭多远的样子，于是她迅速地发出警报：

“那边有敌人来了，赶快把火熄灭！”

大家陡然一惊，连忙把一盆小米稀饭扣到火上，火立刻熄灭了。

“老师，你看，南边也上来了！”小鱼惊叫起来。

“东面还有一股呢！咱们往北跑吧！”胡荣提议着，但立刻忆起了：“哦，北面是大江呵！”

“不要慌，赶快预备好各自的武器，隐蔽起来，准备迎击！”冷云镇静地发下了命令。

每个人都抽出了怀里的手榴弹，紧紧地握在手中，每人找着一根树干作隐蔽。小鱼此刻已经镇静下来，她注视着逐渐逼近的黑影，握着手榴弹，狠狠地骂着：

“狗养的，你走近来就是这一下子，炸你个片甲不回！”

“静静地，不要作声！”冷云嘱咐着，“我们的武器不多，听我的命令，瞄准再扔，不要浪费啊！”

三面的黑影很快地围拢上来，多半是荷枪的伪军，也掺杂些鬼子，每一股都有二十个人的样子。显然地，分明是专为她们而来的，但是他们只是端着枪向前冲来，并不发射。冷云第一个投出了一颗手榴弹，立刻，正面的敌人有三个倒下去了。冷云又把第二个手榴弹投向东面，并指挥着：

“小鱼，向南投！”

炸弹爆处，三面的敌人都三三两两地倒下了，敌人暂时停止前进。两分钟后，敌人看看这边没有了动静，便零星地放了几枪助威，一面冲一边喊：

“不要放枪，捉活的呀！”

在冷云的指挥下，她们的手榴弹又扔出了三颗，敌人又有了十多个伤亡。当敌人第二次停止前进时，冷云这边的手榴弹只剩下三颗了，这三颗手榴弹用完时，势必失去了抵抗能力，要想冲出这三面包围，是不可能的了。敌人的兵力还有三四十呢。

敌人虽然继续前进，而阵势已经大乱，口里尽管嚷着要捉活的，在慌乱之中也开枪乱射起来。这时的冷云和小鱼都负了伤。

小鱼伤在腿部，她没有呻吟，在胡荣扶持之下仍在刚强地站着。冷云呢？她自己没有感到负伤，她心里只在想着政委的话。大家看到她被血染红了的左臂，都离开了树干的掩

体，把她围了起来。

胡荣悲哀的自语道：

“今天我们大家怕要同归于尽了！”

“同志们，”冷云突然现出了凛然的神色，悲壮地叫了一声，“我们决不做敌人的俘虏！”

“我们誓死不做俘虏，就让他们用乱枪打死吧。”是谁说了一句。

“不，我们的武器用完，便将无力抵抗，倘如打不死呢？”

“那怎么办哪？”小鱼焦急地叫了。

敌人第三次向前冲来了，冷云急忙命令着：

“把剩下的三颗手榴弹向着三个方向扔出去，瞄准……”炸弹爆处，又有十几个敌人倒下了。暂时又停止了前进。

“不成功，便成仁，我们不能凯旋归去，只有光荣地赴死……”冷云大声说着，她的脸上现出一种不可侵犯的威严，声音坚决而镇定，“来，大家挽起手来，随我跳下去，与江水永生！”

八个人毫不犹豫地紧紧挽起了手臂，随着冷云迅速地向着泛滥的江水跑去。

敌人迅速地冲上来了。然而，当他们冲到江边的时候，这八位视死如归的女英雄已经挽着手臂跳下江去，她们的尸体，很快地便随着清澈的牡丹江水向东流去了。

1946年夏

国境线上的伏击手

扎拉的童年

扎拉——这个云南拉祜族贫农的儿子，七岁就死了父亲。父亲给母亲留下来的除了艰难的日子，还有着四个不懂事的儿女——扎拉和他的哥哥、弟弟、妹妹们。他们在母亲苦煞苦曳地抚养下，总算活下来了，可是穷苦和劳累不久就把母亲熬煎死了。母亲的死，给孩子们带来了生的危机，酿成了骨肉离散的悲剧。孩子们用母亲仅有的遗产——一口铁锅，和本村（澜沧县富邦区富永村）地主罗伪昌换了一具薄棺把母亲埋葬之后，便各奔东西了！九岁的扎拉也跟那口锅一样归依了地主，做了罗伪昌的牧童。然而他的命运真还不及那口铁锅呢！

又瘦又小的扎拉，个儿还赶不上马腿高，可是经他喂养的就有三匹马和三头牛。别的不说，单是放牧和割草，已经远远超过他小小的体力负担了，而他在沉重的劳动之后，还常挨地主恶毒的打骂；吃，吃不饱，穿，穿不暖，有时候，他真不能不羡慕他的伙伴们——牛马的生活了。

那一带的山高、野兽多。一天扎拉放的马有一匹被突然

袭来的豹子咬死了，这本是不可避免的常事。可是，比野兽还凶狠的罗伪昌是没有人性的，他给扎拉怎样一顿毒打呵！扎拉是不甘心死在地主手里的，他带着仇恨和鞭伤偷跑出来，去投奔拉枯村一位打猎的老人。老人虽然家境穷苦，而且有一大堆孩子，竟把无家可归的扎拉收养下了。从此扎拉不但有了个临时的家，还学会了射击的本领。老人爱扎拉的勇敢和聪明，在扎拉十三岁那年，便交给他一支打兽的铜炮枪，代替原来打鸟的弓箭。扎拉真高兴呵，他成了个小猎手啦！他当真没有辜负老人的培养和期待，竟用那支枪先后打死了一只豹子和三只大熊。

谁想，这样的好日子并没有维持多久，在扎拉十四岁那年，老人就故去了。这以后，扎拉又变成无家可归的孤儿，为了生活，不得不给人家放牛牵马，于是，饥寒和虐待又重新落到了扎拉的头上！

扎拉回到了家

当新中国诞生的喜讯使每一个边远的角落也欢声沸腾的时候，扎拉已经告别了童年时代，长成为一个很英俊的少年了。就在那年冬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来到了边区。扎拉对压迫他剥削他的人们有着切肤的仇恨，可是，一年又一年的小囚徒般的生活，使他没有机会接近能够启发他觉悟的人。因此，他在欢呼解放的同时，也不能不感到迷惘：游击队是从哪儿来的呢？自己被救出牢笼后又到哪儿去呢？

然而，扎拉不是没有他自己的理想的。他是多么羡慕游击队里扛枪的小战士呵！扎拉从小就爱枪，如今，已经好几年摸不到枪了；假如自己也能象那些小战士一样背上一支枪……不，这是梦想！呵！呵，那个小号兵多好玩哪，你看他一本正经地微仰起小脸，一声号响，队伍便集合了——吃饭，开会，操练，锄草，还能学文化呢。假如自己也能……不，这是梦想！扎拉根本就不敢抱任何希望。

游击队的大队长李小春早就爱上了扎拉，扎拉的满脸聪明和天真，一看就知道是个精明能干的孩子。有一天，他便来和扎拉聊天。他们聊了很多很多。最后李小春向扎拉提出了一个问题：

“扎拉，你愿意参加游击队吗？”

这还用问吗？扎拉太愿意了，太愿意了。扎拉真没想到部队还会收留他。把他乐得心花都开了，长这么大他真记不得什么时候这样高兴过呵！就从那时起（1950年1月），扎拉——这个劳动人民的儿子，真正回到了自己的家，那时他是十七岁。当年六月间，游击队整编扩大，扎拉便正式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名光荣的战斗员。连首长和他商议着，查清了他的汉字姓氏，就把扎拉这个乳名改成了袁应忠。

部队的生活，对袁应忠说来，什么都是新鲜的。过去，他受了好多苦难，却不知道苦难的根源；过去，他只知道拿枪射击凶猛的野兽，现在的枪却是指向比野兽更凶的敌人。聪明的袁应忠接受能力是强的，新的生活每天都给他新的体会和感染，在党和上级的教育培养下，他很快就懂得了那么

多从来不懂得的事情。当他有了阶级的明确觉悟之后，他的心真敞亮呵，就象冲出泥土的幼苗见了太阳一样。他的班长赵云德和他的战友们也正象培植一棵幼苗一样培植着他，时刻向他的脑里灌输着新鲜、健康的血液。董存瑞、杨根思、黄继光……在袁应忠的心灵里留下的印象是那么深、那么牢，他们的英雄事迹鼓舞他年轻的心，又是多么使他向往呵！

那时候，国民党残匪出没无常，祸害兄弟民族。袁应忠总是要求给他搜山任务，每次出发以前，他都把津贴费全部交给指导员，要求党和上级在战斗中考验他。他说：

“如果我牺牲了，请吸收我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团员，津贴费就是我的团费。”

袁应忠接受任务时，是那样坚决，他不但争取立功，还争取入团呢。

捉 俘 虏

1951年6月，国民党残匪叫嚣着“反攻大陆”，我军诱敌深入后，把窜进来的残匪消灭了一部分，也有一部分逃掉了。当时袁应忠所在的二连，驻在靠近拉祜族的地区。连部接到搜山任务后，袁应忠的一个组便奉命连夜出发了，袁应忠带队，很机警地走在最前面。天快亮时，到了东寨。

忽然，在目力将能达到的地方，隐隐地出现了一个人影，袁应忠立刻紧紧盯住了他。过一会儿就看清些了：那人

披着蓑衣，背着挎包，完全是拉伧族老百姓的打扮；可是，他东瞧瞧，西望望，神色多么张惶，步子又是多么匆忙。袁应忠判定，这家伙绝不是个老百姓。他告诉他的战友们隐蔽好，不要过早地惊动他，随后，他自己也隐蔽起来。

近了，更近了，再过几秒钟，那个鬼鬼祟祟的家伙就要走到袁应忠的跟前了。袁应忠两眼射出仇恨的火花，激动地握紧上了刺刀的枪，一个箭步就冲了上去：

“别动！”

那家伙一见闪光的刺刀，早吓软了腿，把两手一举，动也不敢动了。

“快说，干什么的？”袁应忠的刺刀紧抵住那家伙的胸膛。那家伙口吃地说：

“送……送信……的……”

一搜挎包，果然有两封信，原来是匪十三中队给匪大队长的密件。袁应忠向俘虏问明了匪大队部的住处，立刻报告了连长。连长下令全连出动追击。四里地，一跑便到了，十多分钟以后，他们便把一个寨子悄悄围住。当做前哨的袁应忠领着一排人冲进寨子的时候，匪军正在吃饭。匪大队长一看形势不妙，撂下饭碗就想逃跑。袁应忠大喝一声：

“缴枪不杀！哪个跑打死哪个！”这时，狙击手们也围上来，敌人再也不敢动了。

就这样，匪军二十多人被一网打尽，还缴了六匹马、二十多头牛、枪支子弹、金银首饰以及标着国民党徽的匪旗。

发动群众

云南的黑山，是一百多里的森林地带，也是各兄弟民族杂居的山区。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藏匿着凶顽无比的土匪，黑山的土匪，在历史上就是出名的。1952年，当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黑山剿匪的时候，人民受到土匪的谣言蒙蔽，谁也不敢和解放军接近。可是，要想肃清为害已久的匪帮，不依靠群众怎么着手呢？而要想把群众发动起来，首先就必须懂得兄弟民族的语言才成。谁懂得呢？想来想去，拉祜族战士袁应忠就入了选。就这样，袁应忠便把这个艰巨的任务担当起来，成了发动群众的骨干。

袁应忠参加部队以后，显然越来越聪明了。在党的教育下，他多方面的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在战斗中，他有着鹰一样的机警，虎一样的神勇，而在他和群众相处中，他知情达理，却温和亲切得象一只可爱的小羊。平常，他跟一个姑娘似的安详沉静，可是，当他向群众做宣传时，他的话又是那样富于说服力和吸引力。早在1951年解放佤山的大货猛寨的时候，就突出地表现了他这种才能。

那时候，大货猛寨的居民，由于受了国民党残匪的控制，当解放军兵临寨外时，他们竟准备用武力对抗。解放军只有用说服的办法劝群众放下武器。于是这任务便落到唯一会说佤语的袁应忠头上。他勇敢地、满怀激情地站在对面的山头上，把两手做个喇叭筒，用他那宏亮的声音，向寨内

的群众喊道：

“亲爱的乡亲们，‘解放’、拉祜、佤、汉族本来就是
一家人，解放军是来解放自己的骨肉同胞的呵！”

“可别听国民党匪帮的欺骗宣传，他们把你们祸害的还
不够苦吗？你们可得过他们半点好处吗？……亲爱的乡
亲们，你们为什么还要打自家人，给土匪卖命呢？”

寨子里的群众都静静地听着。当袁应忠把解放军的三大
纪律八项注意讲了一遍后，群众为他诚恳的声音和热情话语
感动极了，因而对解放军产生了信任。不一会儿，佤的头
人便点起三堆火，把解放军迎进寨去。

这次到黑山，部队刚进老河滩时，一点也不摸底，老百
姓也怕解放军，有的跑掉，有的当土匪去了。袁应忠奉了排
长的命令到群众中去了解情况。他实在感到没有把握，但完
成任务的决心还是很大的。怎样去完成呢？他首先在心里琢
磨着接近群众的办法。他不会抽烟，但他出去却带了一盒纸
烟。

他走进姓何的一户人家，那家有个瘫老头子和一个老太
婆，六七个孩子唧唧喳喳的。户主是这家的大儿子，三十多
岁。袁应忠一进去，他吓得掉头就走。袁应忠和颜悦色地把
他叫住说：

“老乡，麻烦你们啦，来，抽支烟吧！”

那人露着满脸的疑惑把烟接了过去。袁应忠又说：

“别怕，老乡，解放军不象蒋匪帮，不偷不抢，不动老
百姓的一针一线。不信，你看好啦！”

那人只呆呆地看着袁应忠，一言未发。

第二天，袁应忠又去了。他悄悄地问袁应忠：

“你是拉枯族的孩子为什么要当‘解放’？‘解放’会杀人的。”

“哪里话，”袁应忠亲切地笑了，“‘解放’、拉枯是一家，‘解放’也是老百姓出身，你放心，绝不杀人的。”

袁应忠的话虽然亲切诚恳，那人还是半信半疑、摇摇头自语似地说：“我就是怕！”

袁应忠觉得他很老实。便把他和他接触的经过汇报了排长。排长估计这个人可以培养，要袁应忠耐心地去启发教育。果然，排长的估计没有错，当袁应忠第三次去的时候，那人便自然些了。他主动地问道：

“‘解放’，你叫什么名字？”

“扎拉。”袁应忠回答。那人又试探着问：

“扎拉，你怕‘解放’不？”

“不怕。怕，就不参加了。‘解放’多仁义呵！老何，你看‘解放’打过人吗？”

“没有。”本来没有嘛，他只看见“解放”帮老百姓做各种各样的活。他沉思了一会儿才吞吐地说：

“扎拉，我有话跟你说呵！”

袁应忠听他的口气，看他的神色，就猜准他有什么不敢告人的事，便很亲热地说：

“老何，有什么话都跟扎拉说吧，‘解放’、拉枯是一家人喏！”

“我有一杆铜炮枪，送给‘解放’吧？要不？”

“不要，不要，”袁应忠果断地摇头说，“‘解放’枪多的是。你留着打鸟吧。”随后便把带去的咸盐、毛巾和针线放在老何面前，说是大军送他的礼物。

老何稀罕地摸着那些礼物，感动得嘴唇都发抖了，终于带着激动说出憋了好久的话：

“扎拉，你可别说，我两个兄弟都到外国去了！”

袁应忠的心突然一动，但他控制着，不动声色地说：

“不要紧，他们以后回来还是一家人。”

“他俩是叫国民党拉去当土匪的。扎拉，叫回来才好呵，你可有什么办法吗？”

“是呵，叫回来才好，让我想想看。”袁应忠隐藏着高兴，安抚了老何，便回到部队汇报并要求任务去了。

上级党委批准了他的计划。袁应忠立刻动员老何陪着他的母亲去动员他的兄弟们回来。三天以后，老太太真的把她的两个儿子动员回来了。还捎带着领回来另外五个被拉走的青年和五支步枪。

老人家真是高兴呵！她感动得竟把准备给瘫老头办丧事的小猪杀掉，硬逼着袁应忠和他的伙伴们吃了一顿新米饭。

通过这类实例的教育，老河滩的群众就发动起来了。解放军在群众中树立了很高的威信，军民结下了不可分离的友谊。当部队移防的时候，男女老幼哭着送他们，有二百多人抢着给他们背背包，一直送了一百多里路。以后，老河滩群众知道部队缺青菜，常常赶着牲畜远远地把青菜给他们送

来。还送过两面大红旗呢。

两次战斗

正当大雪纷飞的时节，解放军到了西盟区，在一个寨里驻扎下来。部队一到，便搜山、打埋伏、清剿残匪。可是敌人是非常狡猾的，他们的戒备极严。部队埋伏了几次都落空了。战士们真不服气呵：难道我们就真治不了敌人吗？战士们消灭敌人的心更迫切了。大家纷纷要求任务，连炊事员、司号员也不甘心落后。

是二月二日（1952年）那天晚上，袁应忠的班长赵云德领着他们全班去国境线上的南溪河畔打埋伏。天冷，路滑，夜是漆黑的，但杀敌的雄心鼓舞着他们，谁也没感到冷，走过来一个拉着一个，虽说艰苦，也并不感到怎么吃力。半夜，就在小山上的树林里埋伏下来。

天刚亮，班长忽然发现对面山坳处走过来十几个人，相距二百多公尺，班长眼花，看不清楚，他把袁应忠叫过来说：“你仔细看看，那边走过来的是敌人还是老乡？”

袁应忠是善于辨别敌友的。他一看走路的样子就断定准是敌人。于是他和班长迅速地滑下山坡冲到大路边，把子弹推上了膛。还没埋伏好，敌人的脚步声就响过来了。袁应忠和班长敏捷地伏在乱草丛中，动也不动；一动乱草就要发出很大的沙沙声，会打草惊蛇的。不一会儿，一个敌人缩头缩脑地走过来，袁应忠一伸手就能够抓到他。但是班长不让他

动，说这是尖兵，别惊动他，后面一定还有多的。袁应忠只好按捺住激动，拧开手榴弹盖等着。这时候，有两个拉枯村的姑娘迎着敌人走来了，她们一眼就看见伏在草里的袁应忠。姑娘们对他笑了，他连忙使了个眼色，姑娘们马上会意地收起笑容，小声哼着“东方红”若无其事地走向前去。

“马哑（姑娘），‘解放’有没有？”这是对面走来的敌人凶恶的声音。

“马住（没有的意思）！”姑娘一边从容地回答，一边和敌人擦肩走过去。

敌人狠狠地咒骂着姑娘，骂着骂着，就到了袁应忠的跟前。可是真糟糕呵，七个狡猾的敌人竟捆绑着四个老百姓，一打，不是把老百姓也伤害了吗？只好又放过了。

最后，班长重新布置了任务：把全班分成两组，准备前后夹击。第一组尾随敌后，第二组绕到敌人的前面去。袁应忠分到第一组，做尖兵。他走出不远，就看见一个藏在草里的敌人。袁应忠跳过去大喊一声：“缴枪不杀！”喊声未落，一梭子弹就从他的肩头嗖嗖穿过去，他敏捷地还击了两枪，那家伙就象死狗似地倒下了。一搜查，原来是个匪军的中队长。

前后的八、九个敌人一听枪声，全乱了阵，他们把抓来的老乡逼着翻下山坡，正想逃走狙击手们便赶到了。一阵猛烈的射击，敌人死的死，伤的伤，有的连滚带爬地逃走了。这次伏击，也算是个胜利，可是他们还嫌不够，马上开了检讨会。袁应忠懊恼地说：“只八、九个敌人，应该全部报销

才对呵！”经过研究，他们估计敌人一定要来收尸。果然，第二天便又出动了，可是怕死的敌人这天没敢来。第三天，七班长钱文才接受了连首长的指示，带着三个组分三面到小路埋伏下来，准备三面夹击。袁应忠带着他的两个战友——董文武等埋伏在最前面。到下半夜两点钟，就有四个敌人分两批来了，袁应忠第一个发现了他们，他在黑影里冲着前面的一个就是一枪；当另外两个敌人被他的两个战友打死了以后，袁应忠又连发两枪，打倒了企图逃跑的最后一个敌人。他本不想打死他，捉到活的不是还可以探探敌情吗？谁知，当他打开救急包刚想给他包扎，那家伙便断了气。

“还少一个呢？”班长问。

一找，在小沟边找到了尸首。这就是袁应忠在黑影里第一枪打的那个敌人。

这次战斗总共不到三分钟，把四个敌人全部消灭，还缴了四支卡宾枪，而袁应忠和他的两个战友一根毫毛也没碰倒，他们付出的代价只不过是九颗子弹。

侏偌山的老乡们，纷纷来看敌人的尸首，还问是谁打死的？从此，“解放军是神兵”的传说，神话似地流传开来，而袁应忠的机智和勇敢也博得了各族人民的赞颂，都管他叫国境线上的伏击手。

敌人受了几次严重的打击，再也不敢来骚扰了。残匪的谣言攻势彻底被粉碎，各民族的大小头人也逐渐消除了顾虑向我党我军靠拢了。

五年来，袁应忠在党、团培养教育下，在无数次的战斗中，

已经成长为一个优秀的战斗员，1953年就被接受入团。他在去年和今年连续立了两次功。他能说流利的普通话，写很生动的小文章。但他一点也不骄傲，谦虚的人是不会忘本的，他能够正确地估计个人在集体中所占的位置。每当请他谈谈他的模范事迹时，他的第一句话总是说：

“首先得感谢我们的党和毛主席……”

不平凡的劳动

黄昏已过，夜来临了。

刚刚还是晴好的天气，忽然起了狂风，真是飞沙走石呵！只刮得天昏地暗，星月无光，路灯也禁不住风沙的袭击，相继地闭起了眼睛；电线变成了跑调的大琴弦，小房顶上的洋铁瓦轰隆隆地就象春雷一样。路上的行人和车辆全躲起来了，家家户户都急忙紧闭了门……罗淑珍的小小车灯早被吹灭了！

她紧缩着心脏，挣扎在令人恐惧的黑暗里，拼命地抓牢车把，踏着脚蹬，但车子总是东歪歪西扭扭，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很大的力气，她的两条辫子飘来飘去，比树枝摇得更紧呢。这个一向不敢走夜路的姑娘怀着极端的恐惧，记起了当她报考投递员时，许多亲友那些好心的警告：“一个女孩子整天骑个车子满街跑，风里来，雨里去，那样苦能吃得消吗？”

的确有点儿吃不消呢。当时她只不过是一度动摇，今夜却是深刻地体会到了。但是她不是吃不消这个苦，只是受不了这恐怖的包围呵！回家去吧，回到母亲的身边，就不会再

感到这样的孤单和恐怖了。不，不能！她摸了摸装满邮件的口袋，另一个并不遥远的回忆，立刻驳斥了这个退却的思想。那是在考试的时候，刚从高小毕业的罗淑珍，参加了一千七八百人的测验，她各门都考得很好，只剩下口试一项了。考试委员问她：

“投递员的工作是比较艰苦的，不管风寒雨雪都得跑出去，你不怕吗？”

“不怕！”罗淑珍果决地回答。

“工作中会碰到困难，你能克服吗？”

“能！”虽然当时她完全不知道会遇到些什么困难，但她对自己是有信心的：男人能克服得了的困难，我就能克服。她被录用了，在考取的一百多人当中只有八个女孩子。

她立过保证，下定决心，在任何情况下，也绝不把人民的信件延误，寄信人在期待着回信，收信人在盼望着亲人的佳音呵。一封信的迟到可能会误了大事的。

说也奇怪，一想到自己的保证和决心，紧缩着的心脏立刻松开了，她勇气十足地奋力前进，在和狂风搏斗中把一封封信件交到收信人手里。

可是，天气真是无常呵，狂风还未停息，昏沉的空间又挂下了黑色的网，不一会儿，暴雨就落下来了。这时的天阴得更沉，路也更难辨清了。但经过一阵考验的罗淑珍已经是无所畏惧，她仍旧镇静地冒着疾风骤雨勇猛地前进。她只是竭力地保卫着邮件袋不被大雨淋湿，至于她自身，她是顾不得维护的。她赶到一家门口，大声喊了几声收件人的名字，

一个老太太就打着伞出来了。她一见从头到脚都淋得透湿的罗淑珍便心疼地叫道：

“哎哟！我的好姑娘，快到屋里避避吧，你会伤风的！”

“不啦，谢谢您，我信还没送完呢。”罗淑珍把一封完好的信交给老太太，又急急忙忙地跨上脚踏车，她连人带车都象刚由河里捞上来的一样。老太太摸摸信，却连一滴雨点都没沾，她感动得直劲儿咂舌：“只有新社会，才有你们这样的工作人员哪，真是个多么好的姑娘！”

罗淑珍也被老太太的感动声音感动了，她心里暖洋洋地，连全身湿冷的感觉都忘了。

五年前，罗淑珍考入北京市邮局的时候，还不过是个十六岁的小姑娘，如今，已经成长为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和投递作业组长了。她在党的培养之下，在不断钻研和克服困难的过程中，不但自己做出了不平常的成绩（她已连续三十二个月、在投递的七十四万六千二百七十七件邮件中没有发生过任何差错），而且在团结互助中推动了全组一齐前进，那种“吃烧饼还能不掉芝麻”的落后观点，早在上级领导和她的具体帮助下彻底铲除了。下面就是1955年的数字：

她的小组从1955年1月到现在已经完全消灭了特种邮件误投的差错，一般差错也在业务率提高了百分之十七的情况下，从1954年的二〇一件降低到十七件。全组十个人中在1955年已经出现了三个劳动模范，有五个团员入了党，还有两个青年入了团，因此，她的小组被评为北京市的“先进集体”。

体”。

数目字读起来总是枯燥无味的，但在这个枯燥的数字中是包含着多少具体而生动的内容呵。

不管是风里雨里，也不管是酷热和严寒，人们都可以看见这个身材高高的，又能干又洒脱的姑娘骑着车子，拖着几十斤重的邮件，奔驰在南、北池子和东交民巷一带的大街小巷里，每天当各机关开始办公的时候，她已经送完一千四百多份报纸，又回局排第二次出班的信了。她排信排得多么仔细，不但收信人的住址和名字，连销邮票的戳记和信封的背面也要细心地检查一遍，这样，她就避免了不少误投的差错，出色地消灭了无数地址不明的瞎信。但是由于她的精神集中和工作熟练，她不仅不会因为细致的检查而延长工作时间，还常常能够提前完成任务去帮助别人呢。就在帮助别人的工作过程里，她获得了多少欣慰呵！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她在帮助赵洪珠整理信件时，突然出现了一个她那么渴望着的名字，她为寻找这个名字早已是寝食不安了。她兴奋得象个获得珍玩的孩子似的，马上抓起电话耳机……接着骑上车子就跑了。外面正落着雨，差十分就是下班的时候了。当她赶到市工会联合会的时候，幸好还没有下班。要是下了班，就要等到下星期一再来了。她的脸上滴着水珠，也分不清是汗还是雨，她顾不得擦干它，便气喘地对收发同志说：

“请你快打电话找翟福来同志出来签收一封信。”

收发同志看她那又兴奋又焦急的神情，正在摸不着头

脑，可是罗淑珍接着又问一句更使人摸不着头脑的话：

“这个翟同志有多大岁数？”

“你送信就送信，还管得这么全面干什么？”收发同志笑了。罗淑珍也为自己突如其来的发问而不好意思起来。她对收发同志解释道：

“要是个岁数大的，就不对头了，我找的翟福来七年前还是个学生呢……”她为了不使对方发生误会，正要把始末原由讲上个大概，而匆匆赶来的翟福来已经带着满脸惊疑跑到她的面前了。

罗淑珍一看，他果然还很年轻，这该不会错了。便把一封积压了两三个月的信交到翟福来手里。

“呵呀，同志，你怎么会找到我的？”翟福来拆开信只看了一半，便惊喜地大叫起来：“我和我的同学已经七年不通消息，我找他找的好苦呵！”

“我找你也找得好苦呵……”罗淑珍这时的激动也是难以控制的。

是1955年夏天，在那许许多多写给罗淑珍的表扬信里，有一封是一位海防战士寄来的，信里面附来一封托她代转的信：海防战士张从义和他的同学翟福来早在七年前就失掉了联系，但是张从义却充满了信心地写着：“罗淑珍同志，我相信你一定会找到。我热切地期待着。”

罗淑珍默默地接受了这位陌生同志的委托。她在以前接到的许多战士信中，已经深深地体会到，保卫着祖国的边防战士多么需要和亲友联系，更多么向往着祖国的首都呵！发

自首都的每一个消息都会成为鼓舞他们更勇敢战斗的动力。于是，她下定决心，一定要找到翟福来，让这两位多年不通音信的知己恢复联系，这对他们双方都会产生积极作用的。

每天休息的时候，她根据张从义写来的不具体的地址：“朝阳门外东城根”，冒着炎热的太阳跑到朝阳门外去投递这封珍贵的信，一次又一次……可是，她问遍东城根的居民，也到派出所查过户口簿，竟连一点线索也难找到。她犯难了，偌大的北京市，可到哪里去寻找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呢？

但是，热烈的信任激励着她，她不灰心，不气馁，在每次排信中，都注意去寻找“翟福来”三个字，今天，终于被她发现了。她觉得她又为人民做了一件有益的事，这真比她当选模范还要感到幸福。她叮嘱翟福来：

“赶快和你的同学取得联系吧，他早等急了！”随后，她便怀着一颗欢畅的心和收信人告别了。

不久，两封感谢的信一齐寄到罗淑珍手里……“你在平凡的工作中又做了一件不平凡的事……希望你永远做劳动模范……”

锻 炼

刚从高小毕业的郑清明，忽然接到校长的一封信，他读着那喜气盈盈的字句，反而呆住了。开始他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继而又怀疑这封信是不是写给自己的。他翻来覆去地研究着，看了上款又看信末的署名，字是清清楚楚的，内容是明明白白的……，一切都没有错呵！但，这会是事实吗？这是梦！不，连这样的梦也没敢溜进自己的睡乡呢——一个讨饭、做短工出身的穷孩子，一个正式进过学校仅仅一年多的苦学生，怎么敢做这样的非非之想呢！

校长对他亲切关怀使他从心里感激，但校长对他的前途的安排，却又使他觉得突然和意外，他的一颗纯朴的心，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扰乱了。他饭吃不下，觉睡不着，变得坐立不安起来；那种又惶惑又兴奋的滋味，真是难忍难熬呵，去，还是不去？这可得和校长认真商量商量，他想：校长也许忘记了我的经历吧？其实校长并没有忘记。

郑清明出生在贫农的家庭，只有七岁就死了父亲，他跟着母亲沿门乞讨的苦楚，是一言难尽的。可是他却偏偏如饥似渴地想要念书，他看着村里有钱人家的孩子出入学校的

门，又羡慕又觉得不平，多少次，他哭着央求母亲：

“妈妈，把我也送去念书吧，将来我把书念成了，好养活你，咱们就再也不讨饭吃了。”

他哭，母亲也哭。终于，母亲为了满足儿子的愿望，千辛万苦地积下几个小钱，把儿子送进了学校，母子俩的心都象开了花一样。然而，那只不过是昙花一现罢了，郑清明仅仅入学三个月，他的讨饭的母亲，就再也供不起这个心比天高的儿子了。郑清明哭哭啼啼离开了学校，随后就去做了地主的短工。

天津还没解放以前，八路军就到了庆云县的农村。郑清明耕种着自己的土地，第一次感到劳动的欢欣（但痛心的是受苦一生的母亲，竟没有亲一亲自己的土地，就死去了），当村里招募民兵的时候，他报了名。那时候他只有十五岁，农会不让他参加民兵，而郑清明却是无比的坚决，不让去是不行的，他说：

“土地是革命给我的，我理当为革命出一份力，要是不打跑蒋匪帮，怎能保卫住土地呢？”

不管在战斗的日子里，也不管在修河坝的紧张劳动中，郑清明从没放松过自修文化，他看见生字就记下来，逢人就问，有一分钟也要练习，早起晚睡地一个字一个字积累，中间只进了半年学校，就在1950年冬天，他偷偷跑到柳家村小学，上了六年级。后来村里人知道了都纳闷：“这小子认不了几个字，怎么一步登天就上了高小？不是混着玩吗？”也有人说：“放着地不种，家又不富裕，连个三亲六故也没

有，不种地吃什么？简直是胡折腾！”但是，郑清明的地并没有撂荒，夏、秋两次农假和星期日，他就把它侍弄得差不多了。一年过去，现在他从高小毕业了，学习成绩还是优等呢。郑清明不爱炫耀自己，因此，村里人都以为他认不了几个字……

他家住在官塘村，离柳家村还有十几里地，他两脚如飞地走呵，走呵，一口气就赶到了。这是培养过他的母校；当他不久前和它告别的时候，他是多么恋恋不舍呵！现在他越发感到在这里学习的日子太短促了。

他来不及和同学们打招呼，便怀着激动的心情去找校长。校长笑容满面地开口问道：

“收到了我的信了吗？你可满意这个工作？”

郑清明一时不知怎么回答校长的话了，这不是满意不满意的问题呵。他从衣袋里掏出那封已经翻弄得发皱了的信，一行最触目的字句又映进他的眼帘：“分配你到李孝忠村初级小学去当教师……”他把纷乱如麻的思想整理了一下，之后，才啜囁着说：

“我高兴得连饭也不想吃了！可是那哪行呢！校长，我怕得慌……”

校长完全体会得到，正是这两种互相矛盾的心情，使这个青年如此地不安。他注视了一下郑清明满含疑虑的眼睛，又笑问道：

“怕什么呀？”

“怕的是担负不起来哩！校长你是知道我的水平的，不

要说教学经验，就是学校生活也过得那么少，我学了点文化，大半是靠自修的，可怎么能教学生呢！我看是不行……”

“能行！”校长肯定地说。“正因为了解你的奋斗过程，我才认为你能行，你只要把过去勤学苦练的劲头儿发挥出来，就可以锻炼成一个很好的人民教师……”

校长给了他一番鼓励，又讲了些农村缺乏教师的情况，并且告诉他：“李孝忠村原先没有小学，村里的学龄儿童，只有七八名在外村上学的，余下的都变成满村打闹的野孩子了！”

郑清明一听这工作这么重要，立刻产生了一种责任感；孩子们的失学，更深深地打动了他的心。他不再矛盾了，带着校长的“边学边教”的指示，愉快地离开了柳家村。回到家，把小行李卷一扛，便去“上任”了。

李孝忠村早先是个有名的穷堡子，人们都管它叫“李窟窿”，居民五六十户，只有三百来亩土地，过去不要说建立小学，全村连一副耙都没有，耙地的时候得跑到邻村去借，可是，有时借回来刚扛到半道，却又被耙主追着要回去了，因为人家等着使呢。这类伤心的故事，村里人如今是当笑话讲了。解放以后，自然是转变了那种赤贫的处境，可是人多地少，总还不能算富裕。

郑清明一走进学校，心神就又无主了。这个新成立的学校，原来只是四间快要倒塌的破草房。除了二十二名学生而外，真是要啥没啥，连必要的教具都不周全，一块二尺见方

的小黑板，几个大字就写满了……整个学校，只他这一个管事的，校长：郑清明，教员：郑清明，校役兼炊事员，也是郑清明……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只有他一个郑清明。不过，这一切都算不了什么，穷日子，他是过惯了的，讲劳动，更是他的拿手本领。愁得他睡不着觉的还是那个根本问题——一点教学经验也没有，可从哪儿入手呢？更使他头痛的，是这个单级复式班，每一堂里都要教四个年级的课。郑清明既不懂得如何备课，又不知怎么布置课堂作业，他把四个年级的教材翻来翻去，弄得蒙头转向，脑子里嗡嗡直响，学生的纪律又是惊人的坏，第一天上课，就有五六名缺席的，来了的没到放学又溜走了三分之一。课堂外，不是打架就是叫骂，哭喊连天，简直是混乱一团。上课的时候也是唧唧喳喳，象个麻雀窝样，很少有听课的。有些专心学习的学生，也常被笑闹声转移了注意力。你批评吧，他们不是装聋作哑，就是做鬼脸，和风细雨地说服教育吧，换来的却是挤眉弄眼笑嘻嘻，真是一帮软硬不吃的小顽皮呵！郑清明知道这不能完全怪孩子，还是怪自己缺乏办法。比如，给一个班讲课，另外三个班的学生就没事做了，真叫“一教三瞪眼”。天性好动，又是玩野了的孩子，怎么可能强迫他们听老师的话呢！郑清明真不知道怎样才能在学生当中建立起自己的威信。

这还不算，更可怕的是学生家长对这位青年教师的轻视，也直接使学生受了影响。一般农民还保留着旧的观点，认为只有老先生才有资格当教师，十九岁的郑清明，虽说尽

量使自己老成持重，但他那天真的脸上还流露着稚气。他个儿长得又不高，群众都怀疑：一个小孩子，也能当老师？在集市上，石官塘村的人碰到他们也加油加醋地说：

“俺村那个郑清明跑到你们村去教书了吗？嘿！”

“可不是嘛，是个真正的孩子头，能教什么书！……”

“大概连巴掌大的字也认不了二斗吧！还当老师呢，不跟闹着玩一样！”

这样一宣传，一般学生的家长更不把郑清明放在眼里了，他们不但对学校漠不关心，就是他们的孩子逃学旷课也不闻不问。他们认为：上不上学还不是一个样儿。

郑清明在这样的处境中，真有说不出的苦恼，他灰心极了。到了实不可解的时候，他就跑到区委会去找教育组的孙辅导员，把自己的困难一古脑儿抖露完了，便请求道：

“我实在干不了，让我辞职回家种地吧！”

“刚上阵就想退却了吗？”孙辅导员虽然同情他的处境，却不能同意他的请求。对他说了不少安慰、鼓励的话。随后问道：“你不是也和敌人打过仗吗？只要把打仗那样的勇气拿出来，对付困难就象对付敌人一样顽强，你就能得到胜利。”郑清明在当民兵那些日子里，和国民党的还乡团有过无数次的遭遇，那时候他确是勇敢顽强的。现在辅导员讲起打仗，他不由得在心里说：讲打仗干什么！打仗，那是干革命，怎么着都行，这呵……

“干革命是没有平坦大道的，郑清明同志。”

孙辅导员的一句话打断了郑清明的思路，他惊疑地问：

“怎么？教书也是革命吗？”

“那当然，教育下一代就是培养革命的接班人哪！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任何工作都是革命的组成部分。你是怎样想的呢？”

“我呀，我还以为只有扛枪打敌人才是革命呢！”郑清明羞愧地笑了，但作为共产党员的孙辅导员，却不为郑清明的幼稚感到可笑，对一个文化不高的青年农民，怎能做过高的要求呢？要紧的是必须提高他的认识，才能建立他的信念和决心。纵然他的水平确实很低，但他那可靠的毅力，不正是做好教学工作最可信赖的保证吗？于是，他把为什么教书也是革命的道理，又解释分析一遍。果然，郑清明的情绪转变了，他一下子就振奋起来，宣誓般说：

“既然教书也是革命，我就一定能够克服困难，坚决把学生教好！”

孙辅导员的启示，仿佛是一把开心的钥匙，把郑清明锁着的心灵打开了，他带着“革命”的庄严意志，重又回到了他那庄严的岗位。他下决心钻研业务，加强备课用行动扭转群众的认识。

郑清明想跟外村的教师学习，但他每天忙得头昏脑胀，觉都睡得很少，哪有时间跑个十里八里去向人求教呢？只有当各村教师在中心小学开会的时候，大家才能碰碰头，学得点滴经验，也不能马上用得上。开头，他订了八个备课本子——四个年级的语文和算术，课前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预备得好好的，可是上课的时候，一翻又糊涂了。

最后，还是《小学教师》月刊帮助了他。他认真钻研了复式教学的材料，学会了做单级复式班的教案，从此，才逐渐摸到了门路，克服了“一班讲课，三班枯坐”的现象。

然而，他的教学任务不单是语文和算术呵，做个农村的小学教师是要门门都通的。在音乐课上，不易克服的困难又找到了他。他只上了那么几天学，根本就不懂得乐谱，纵有教材也唱不成调儿。也只有把自己读高小的几个象《歌唱祖国》那类长歌子，翻腾出来教学生，可是，孩子们连歌词内容都不理解，学起来自然十分吃力。一个歌得教两三个月不说，孩子们也不喜欢，一唱就把小嘴咧多长，低年级的学生叫嚷得更欢：

“老师呵，咱们唱的气都喘不上来了！”

郑清明心里真难过：这哪是唱歌，简直是让孩子们受罪呵！他只有到同行中去求援了。

有一回开会，他抽空学了个短歌，回来一教，孩子们别提多高兴了，他们手舞足蹈地唱起来：“小蜜蜂，嗡嗡嗡，一天忙不停……”一点不费劲就学会了。

“老师，多教些这样的小歌吧，真有意思！”

“好吧，往后再不教长的了。”

从那开始，郑清明便努力向人学短歌。然而，这样的机会是不多的，孩子们学得可快，“现发现卖”，慢慢地就供不应求了，孩子们又提出要求：

“老师，为什么老唱这个歌呀？再教个新的吧！”

“把这个歌多练练，下星期再教新的。”郑清明答应得

很慷慨，心里却想：哼，新歌我还没学来呢。而对学生又是万万不能说谎的，于是他又紧张地学起来。

很显然，这样应急的办法是难以持久的，要想长期打算，首先还得把简谱学会。于是郑清明跑到书店买了本《音乐讲解》，但音阶掌握不了，唱起来怪声怪调；连自己听听也要发笑。后来中心校校长告诉他，得先练好“拔音”，然后才能学节拍。这就要下一番功夫了。

每天，当黎明还没冲破黑暗的时候，郑清明就爬起来，特意跑到二里以外的旷野里。偶尔碰到赶早出来砍柴的村里人，人家就要问他：“老师，这么早，你跑到这来干什么呀？”

“吸新空气来了。”

“大半是想家了吧？哈哈！”

人们当然不相信他会跑这么远来吸新空气的，但他也绝不是想家，他是跑出来练习拔音来了。“多来米法梭拉梯——梯拉梭法米来多……”他总是放开喉咙高声唱着，假如在村子里，人家不会说他疯了吗？郑清明就是这样一天又一天地练习，不多日子，便掌握了音阶，简谱也会唱了。音乐课的困难局面打开以后，原来显得沉闷的学校空气，也随着活泼起来了。

教学工作对郑清明说来，就象爬山一样，而那山又是陡峭的。他遇到了多少拦路的石头和荆棘呵！真可说是步步艰难。但，他既未停止过前进的脚步，也没有气馁，他用革命的毅力和辛勤的劳动，把乱石一块块地搬掉了，把荆棘一根

根地铲除了，当他积累了一些经验之后，他不但有了更大的勇气和信心，人也变得聪明而有办法了。

他热爱孩子，因此也就热爱培育孩子的工作。自己过去不能念书的痛苦，已经变成他教好学生的动力，他对孩子们的关怀是无微不至的。为了不使贫苦的儿童失学，他经常用自己的生活费给孩子买书、买文具，虽说他的工薪是很低的。为了给缺课的学生及时补课，他甘愿牺牲睡眠和假日。对学生的品德教育，他尤其重视，除了随时随地注意自己的言行，为孩子们树立楷模而外，他更密切地联系群众，经常访问学生的家庭。天长日久，顽皮的孩子改造了，迟到早退和旷课的现象不再发生了。只举一个例子——

张云德，是一个打遍全村的“小打手”，村里人一提张云德，就会把眉头一皱，手一挥：“那孩子，还有说头！”郑清明一来到李孝忠村，就有人对他说：“你要能把张云德教育好，别的孩子就用不着教育了。”

郑清明不相信有不能教育的孩子，但怎么教育，那时候他也心中无数，当他一接触张云德时，就感到棘手了。

这孩子果然顽皮得出奇，打人骂人是家常便饭，同学们都躲他远远的。逢墙上墙，遇树爬树，隔壁院子里有棵果树，他爬上去摘下果子就吃。郑清明给他讲不该偷吃人家东西的道理，他却把小眼珠一瞪：“好吃嘛！为什么不吃？”上课时他从不好好听课，你讲你的，他玩他的，当然这就扰乱了大家的学习。有一回，他口袋里揣了个喜鹊，上课时掏出来就玩，喜鹊一叫，惹得全堂哄笑，再也无法听课了，郑

清明批评他，他却大模大样地说：“你讲你的吧，我听得见！”有一堂上习字，郑清明叫学生每人把自己的石板写满，交卷时，张云德却只写了一个占满石板的“大”字，郑清明问他为什么只写了一个字，他却不耐烦了：“你叫把石板写满，我这不是给你写满了吗？”

批评、教育，对他一点不起作用。郑清明感到片面的“教育”是不会有成效的，必须找出他所以坏的根源，才好对症下药。首先他到群众中去了解。

原来，这孩子是处处得不到温暖的。在家里，他是个不吃香的儿子，父母对他一向是举手就打，张口就骂，村里的大人小孩都躲着他，在学校也总是孤伶伶的。郑清明检查自己，对张云德的教育方法也失于片面，批评多，表扬少，没有在同学中给他扭转孤独的处境。难道张云德没有值得表扬的优点吗？有的，而且很突出。尽管他常常打骂同学，而当同学缺笔少纸的时候，他总是慷慨地把自己的东西送给别人，虽然他自己并不富余。有一回一个同学跌破了鼻子，他赶快端着一盆冷水，跑去帮助止血；他爱劳动，学校有什么事，他都抢先报名，干起来俨然象个大人。可是这些优点谁也没去注意，都被他的严重缺点湮没了。

孩子是聪明的，有时也显得非常可爱，是环境使他的缺点一天天发展起来的呵。

郑清明开始有计划地进行工作了。第一步他访问了张云德的父母，向他们说明了以打骂代替教育的害处，请求他们和学校配合共同担负起改造张云德的任务。做父母的谁不希

望自己的孩子被人称道呢？他们被郑清明苦口婆心的规劝感动了，慢慢地，张云德不再挨打受骂，享受到从未享受过的母爱了。郑清明也纠正了过去的教育方法，每当指出张云德的缺点的同时，对他的优点也给以适当的表扬，为的是使他心服，并引起同学们对他优点的重视。张云德在家庭和学校都得到了温暖，就开始转变了。他的缺点不断地在克服，优点也在不断地发扬着。当郑清明给他讲“坏孩子转变后入队”的故事（他常常给他讲有教育意义的故事）时，他的小眼睛竟闪动出又惭愧又感动的泪光。以后，这个原来学习成绩不及格的学生，门门都是八九十分，入队之后，还当了小队长。

张云德变成了好孩子，他的父母对郑老师的感激就不用说了；原先说不能教育好张云德的人，也不能不佩服郑清明的“妙手回春”了，他们见到他就竖大拇指：“郑老师，你算真有办法！”

郑清明是用自己的行动和成绩在学生中建立了威信、博得了群众的爱戴和信赖。学校办好了，人们也改变过去对这位年轻教师的轻视，都自愿把孩子送进了这所学校，特别当孩子毕业后都考上了高小的时候，郑清明的威信更高了。在这个旧社会没有识字人的小村子里，如今竟有了那么多高小的学生，可不是一件平常的事，人们象庆祝一件大喜事一样庆祝这个全村的荣耀！郑清明在这个村子里，人人都把他看成自己人，他们对学校也产生了无比的热爱。就在前年，群众主动出钱、出劳动力，把快要倒塌的校舍改建成一座崭新

的校舍了。

1952年光荣入团的郑清明，第二年又被接受入党，在党的教养之下，他的阶级觉悟更有了显著提高，他发誓要把整个的生命献给党，献给他热爱的孩子和工作。

1953年年末的一天，郑清明正在班上讲课，突然听见外面传来一阵狂呼救人的声音。他急忙跑出去，正碰到向学校跑来的一个学生家长，她嘶声地叫道：

“老师，快救救孩子吧！……”

原来学校附近有个大水湾子，早就冻严了，因此孩子们经常在冰上溜冰。这一天，太阳格外好，有一处冰面开始融化了，当五个孩子玩得正高兴的时候，一不留神，竟有两个掉到冰窟中去了。这两个孩子并不是那妇人自己的，都是校外儿童。那个妇人来找郑清明，正是代表群众对他的信赖。人命关天，郑清明毫不犹豫，飞快地跑到出事地点，只见水湾周围挤满了焦急喊叫的老人、妇女和儿童。掉到冰窟里的两个孩子都只四五岁，一个叫烦物，一个叫小四；这时，小四已经没影儿了，上半身卡在冰上的烦物也早哭得声嘶力竭，耷拉着小脑袋没有声息了。郑清明知道这大水湾子是深可没顶的，到冰窟中去抢救孩子，完全有牺牲的可能，可是一个共产党员，又是人民教师，难道能看着这两个孩子淹死吗？这时候，罗盛教牺牲自己抢救落水的朝鲜儿童的壮烈情景，出现在他的意识中。他来不及脱掉棉衣便向烦物奔去。走不到两步自己也掉下去了。刺骨的冰水很快就浸透了他的棉衣，但他没有冷的感觉，拼命地用拳头砸破冰层，一步步

地开路前进……烦物高举在他的臂中了，而水已经没到他的脖颈，再前进就要没顶了。他又俯下身摸到了小四。他想，幸亏这孩子抓牢了烦物的衣襟，否则早就沉底了。他的两只胳膊举着两个孩子，两条腿却再也不能动弹了！他挣扎，没有用，心里可还明白，他感到他救上来的不过是两个没救了的孩子罢了；小四似乎已经死去多时，烦物也停止了呼吸，他失望极了！

岸上的人从冰厚的地方踏过去，接过了两个孩子，又七手八脚地把郑清明拉出了冰窟的时候，这才发现，郑清明的脸色惨白，嘴唇变紫了，已经失去了知觉。他直挺挺地被抬回了学校。

在热炕上暖了好一会儿，他才慢慢地苏醒过来，一睁开眼睛，就想起了两个孩子。

“孩子有救没救？”

“咳，老师，先顾你个人吧！……”

“我只不过让水冰了一下，孩子要紧哪！快告诉我，孩子们怎么样了？”

直到两个孩子被救活了的的消息传来之后，他才一块石头落了地，就象自己获得新生一样，感觉到无比的欣慰。孩子的家长对他的感念之情和无微不至的看护反而使他深感不安。第二天，他便爬起来带病上课了，按都按不住。

这件事轰动了整个河北省，群众管他叫“救命的人”，省、县赠给他的奖旗上写着“罗盛教精神的发扬者”、“活的施新民”（为抢救落水学生而牺牲的人民教师）。

1955年，由于他教学成绩优良，被评为庆云县的优秀教师，并当选为河北省优秀教师代表会议的代表。今年四月底，他又出席了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

一贯勤勤恳恳对待工作和学习的郑清明，是无愧于这一切荣誉的。他永远记着“天才就是勤奋”、“聪明就是积累”这两句格言。去年他调到沧州师范学校教师训练班学习以后，在不断克服困难中，他的成绩也是优等的。如果有人问他：

“将来轮训班毕业以后，你到哪儿去阿？”

他就会反复地说：

“来学习以前，我早就打好谱了。毕业以后，哪里最困难就到哪里去，偏僻的山村也好，遥远的边疆也好，那些地方是更需要人的；越困难的地方，也越能够锻炼人。我已经把整个生命交给了党，因为我的生命原就是党给我的阿！毕业后，我一定申请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1956年5月10日

理 想

小孩子也有自己的理想。虽然孩子们的理想往往是从兴趣出发，不一定有什么崇高的目的。

曹俊杰的理想是当火车司机。

也许有人会觉得奇怪，一个生长在农村的孩子，一个银匠兼农民的儿子，怎么会幻想当火车司机呢？一般的乡下孩子连火车是什么样儿都没见过哩。不，曹俊杰可不一样，他不仅见过火车，同火车还是最亲密的朋友呢。那时候，祖国的东北正在日寇的铁蹄蹂躏之下，他的家乡——长春饮马河莲花泡村——没有给穷孩子们预备求学的地方，曹俊杰的爸爸又不甘心叫儿子做睁眼瞎子，只好把他送到几十里以外小学去念书。路太远，曹俊杰每天只有坐着火车来去，天长日久，他便同火车发生了感情。没有火车，他的书根本就念不成呵！他感激每天送他上学的司机，更羡慕他的本事，觉得开火车多有趣，一会儿就把无数的人和大批大批的货从这个地方送到另一个地方，它可以越过草原，跨过江河，游遍辽阔美丽的大地……曹俊杰经常幻想着：长大一定做一名火车司机。

这理想是天真的，也是非常顽强的。曹俊杰从小就是一个个性突出的孩子，他聪明而有毅力。他为他的理想吃过苦、受过气，也遭过失败的打击，但是他还是一直不放松地追求它……

从高小毕业后，曹俊杰就为着实现他的理想而开始奋斗了。

最初，他跑到长春铁路车辆修理厂去当洋铁工，满打算学点修机车的本领，可是，哪里有机会学手艺呵！他成了个挨打受骂的小打杂的。在父母跟前他没有受过那样的打骂，要是能够实现理想的希望，再苦点也能忍耐下去，然而，就算在这里苦一辈子也苦不上个火车司机呵！曹俊杰带着一颗沮丧的心偷偷跑掉了。

随后，他又托人介绍进了长春的铁路学校，一线希望的光在眼前闪耀了，美丽的幻想又出现在他的酣梦中。然而他再也没有想到那原来还是一颗月夜的流星，只那么一划便消灭了！

吃冷饭、睡凉炕……一切生活上的艰苦，曹俊杰都能熬得过去，人格的尊严可是不容侮辱的。父母曾经悄悄告诉过他：“孩子，记住，咱们是中国人！”是的，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哪！但中国人为什么要被逼着用日语说话呢？中国人为什么还要帮着日本鬼凌辱中国人呢？那个甘心为奴的舍监，每天清早一站队，就找茬，便开始对同学们的鞭笞，打起来就没个完，有时还要罚同学们跪在院当心；有一些有钱的大班同学也欺侮新来的穷孩子，他们被教坏了……于是，新生

们计议着要向舍监复仇，大个的预备了木棍，小个的预备了铁铲，然而，事机不密，被破坏了。曹俊杰和他的同学们一赌气，卷起小行李卷便回家了。直到舍监接受了不再虐待的条件，孩子们才回校复课。这次斗争的胜利，使少年时代的曹俊杰认识了斗争的意义。

过个半年多点，日本鬼子投降了，国民党匪帮掠夺了胜利果实，接收了长春市。那以后的日子，只是伪满的翻版，但曹俊杰是不肯向暴力屈服的。他因为不肯给蒋匪帮的运转主任送礼，就被赶出了才工作一周的长铁机务段，从此，便是长期的失业。他的理想变成了空中楼阁，他的希望又是多么渺茫啊！

直到1948年长春解放，他才做了真正的中国人，找到了慈爱的母亲！他回到机务段，被派到机车上学烧火，第二年年初，考试合格，就当上了正式司炉。

新社会的一切使曹俊杰这样的惊奇和感动，单说上下级的关系吧，领导同志都是多么艰苦朴素、和蔼可亲，他们不但和工人们吃穿一样，平起平坐，连工人们给他们提意见也竟那么诚恳谦虚地接受……曹俊杰第一次发现人与人之间还有真正的平等和友谊。那数不清的新鲜事物，使他纯真的心灵激动了，在他的灵魂里升起了青春的火焰，他热爱他的工作，确定了人生观后，奋斗目标更明确了，他入了团又在追求着党，1949年党公开后，他便成了一名共产党员。

党是在怎样培养他的呢？他进过人事训练班，当过人事干事；在学校学了两个月政治后，又被送到大连技术学校司

机科深造——那时候，他已经被提升为副司机了。

曹俊杰感到他太幸福了！除了党，谁这样爱护培养过他呢；除了党，谁能使他的理想变为现实呢？一想到伪满时期学习的痛苦，学习的热情更高了。他决心不辜负党的期待，刻苦努力。夏天发困，就一根根地拔头发。不但自己学得好，还牺牲了不少睡眠时间，帮助一个没文化的同志完成了学习任务。八个月毕业出来，真是满载而归呵，他比以前大大地提高了。

1954年4月，当他拿到司机证书的时候，他激动得差点掉下眼泪，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这理想的实现增添了多么不可思议的光辉，他可以为祖国贡献更多的力量了。这一天，他乐得饭没吃好，觉没睡着，首先来到脑子里的是如何和伙伴们团结合作的问题。他回想自己当司炉、当副司机的时候，有时受到司机的冷漠，就感到非常难过；今天自己当了司机，可不能反过来去冷漠别人，让别人难过呵！他深深体会到，只有和伙伴们团结合作得好，才能够更好地发挥力量，他的奋斗目标就是：打破牵引定数，争取超轴！

曹俊杰“超轴”的冲动并不是拿到司机证才有的，早在一年前就开始了。在做副司机那些日子里，他就常常梦见自己驾驶着潜力无穷的机车，牵引着超轴的车辆奔驰在祖国辽阔的原野里……每当他看到别人有轴不超，心里就发急：机车的潜力还大着哩，虽说它的牵引能力是固定的，但是发挥它的最大潜力，主要还在于掌握它的人！刚解放那阵，牵引定数才一千七百吨，现在却达到了二千二百五十吨。要是再

努一把力，难道不同样能够突破这二千二百五十吨吗？

不过，事情做起来，可不象想的那么容易了。当他第一次驾驶机车，往返陶赖昭——长春区间的时候，他可是太紧张了。这段路线不好，坡道太多，他不但不敢眨眨眼睛，连气也喘不均匀了。他突然感到一实践起来，竟没有了方向。他觉得自己年纪太轻、技术也差，本就顾虑别人心里不服，要是再出点事故，不是更难使人心服吗？顾虑越多，就越不敢放手，开始一个阶段，不但没有超轴，还常常晚点哩！但是他超轴的热情并没有减低。他去请教司机长。

司机长王岐山帮他找出晚点的关键，并且在技术上给了他指导。以后他改变了操纵方法，晚点的现象便消灭了。可是，实现超轴的愿望又是多么不容易。每当发车前，曹俊杰总是看见车站上停着大批的满载货车，但是，急人的是车站说什么也不准挂上。一次，他忍不住地问值班站长刘恩全：

“刘站长，每趟车我都想超轴，你们为什么不同意挂呢？”

“列车已经按照牵引定数编好了，再挂，列车晚点出发，我们的责任就大了！”

曹俊杰了解了这情况，便和车站订了口头合同：轮到自己的乘务便提前通知车站，请他们编好超轴列车；机车也提前开出来，绝不影响列车正点发出。这样，曹俊杰班就可以常常超轴，经常拉到二千五百多吨了，并且取得了调度室的协助和信任。

曹俊杰和他的两个伙伴——副司机董士禄、司炉赵宪志

——超轴的热情在不断上升着，有一次从陶赖昭竟拉了二千八百吨回到长春。他们正在高兴，却想不到淋了一头冷水。

曹俊杰一走进运转值班室，乘务主任迎头就是一声：“曹大车，又创造新纪录了吗？”听那声调、看那态度，都明显地含着若干讽刺。再定神一听，满屋子乱嚷嚷，三三两两在一起议论的也是“曹俊杰”，有的说他是个冒险家，有的说他是想拿超轴奖金买口花棺材……这时候，运转助理段长马云升也正在等着和曹俊杰谈话呢。他一见面就训诫道：

“曹俊杰，你以后可不能这么干了，出了事故咱们的模范段不就砸了吗？”

一转身，他的好朋友王绍庚也对他说：

“你这个虎旦（冒失鬼），拉那么多干什么！难道不超轴还能给你降职不成？”

曹俊杰心里真难受。他暗自思量：我想的是在祖国的建设道路上多贡献一点力量，而换来的却是嘲讽和压制——一个人的打算怎么会这样多呢？他的两个伙伴超轴的热情和他同样高，现在仍然不灰心，都说：

“别听他们那一套，咱们该怎么干就怎么干！”

不错，该怎么干就怎么干！一瓢冷水怎能泼得灭热情的火焰？曹俊杰组紧接着又创造了更高的超轴纪录。

那一天，从陶赖昭发车前，曹俊杰发现站上还有十七辆货车停在那里，问站长，说还得再挂一趟车。曹俊杰一想，这可是个超轴的好机会，他和伙伴们商量了一下，马上和调

度室联系，要求那十七辆车全由他们拉走，调度室信任地同意了。

但是曹俊杰不能不有点担心。这趟车整整三千一百吨，段上从来也没人拉过这么多呵。赵宪志却笑着说：

“没问题，这回比上回只不过多了三百吨，算不了啥！”

曹俊杰看他满不在乎，怕他思想松懈，连忙提醒他：

“这三千一百吨，可得大大加把劲，闯过坡咱们再高兴吧。”

于是他们三个人互相表示了决心。赵宪志说：“我和老董保证你有足够的汽使用。”曹俊杰说：“我保证列车不运缓，胜利闯过坡道。”结果，真的顺利完成了任务，正点到达，创造了空前的超轴纪录。

但是站长很为他担心，劝他稳一些。说起来也真叫巧，偏偏在这议论纷纷的阶段，曹俊杰组竟意外出了一次事故。

那趟车从四平出发的时候，站上编了二千八百吨，按照当时的机车能力和路线情况，二千六百吨足够负担了（规定一千七百万吨），想甩车又怕晚点。结果拉走了，就在中途造成了停车事故。

这次事故，曹俊杰虽然没有受到批评和处分，却给一些落后分子造成了讽刺的借口，他们说：“这小子，尽想拔尖逞能，不行嘛，小孩芽子还能成得大器！”

曹俊杰觉得这影响多不好，心里又难过又后悔，感到自己的技术差，单凭热情是经不起考验的。他瘦瘦的脸上罩上

了一层暗影，那双聪明的眼睛也减弱了光芒。党总支的负责人了解了这种情况，便及时地鼓励他：“事故是不能白出的，应该从中吸取教训，不能因为偶然的失败就消极灰心，革命也是失败过呀！曹俊杰同志，希望你找出失败原因，以后继续超轴……”随后，党便把他送到哈尔滨铁路管理局所属的学校，学习先进技术。半个月的时间他学习了郑锡坤超轴、李绍强省煤以及机车保养等等先进经验。当他再回到工作岗位的时候，感到浑身都充满了力量。他常常想着党的话，想着运行周工程师的话：“目前我国工业还没发展到最高潮，运输的产品原料还不多，而铁路上列车密度却已经达到了饱和点。假如不多拉快跑，怎么能够满足更多的物资交流的需要呢？”曹俊杰把这些指示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对超轴的重大意义体会得更深了。他不去介意那些冷嘲热讽，全心全意为争取更多的超轴而努力。

1955年春天，曹俊杰和他的两个伙伴在突出地完成了几次“绿街”运行（就是在大区间不上水、不上油、不停车）任务后便分手了。原因是口巧1952号机车三个乘务组的工作成绩很不平衡，另外的两个组比较弱，曹俊杰为了扭转这个不平衡局面，发挥更大的机车效能，便主动向领导上建议：把他的两个伙伴分到那两个组去。为了整体的利益，曹俊杰是没有任何本位和私心的；虽然和他的伙伴们分散，单从感情上来讲，也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那两个组的骨干的确加强了，而曹俊杰组也并没因人员的变动受到什么影响。曹俊杰是善于团结同志的，他能够从

日常生活中掌握伙伴们的思想情绪，以友爱的态度帮助他们纠正错误的言行，利用各种方式鼓舞他们超额完成任务的热情，并在技术上给予及时的指导……因此，新来的两个伙伴和他合作得也非常好。到1955年下半年，“绿街”便和“超轴”结合了，经常能在“绿街”运行中牵引三千多吨。

有那么一次：

长春站已经给曹俊杰组编好了超轴列车。调度员忽然用电话下了命令：“赶快减轴！”因为这趟车到四平站后仅有四十分钟折返时间，一晚点就要影响高级列车（专车）的运行。但是曹俊杰超轴心切，非常自信地回答道：

“不必减轴，我保证正点到达！”

“不行，这趟车关系重大，绝对不允许超轴。”调度员也很坚决，“万一晚点，我是负不了这个责任的！”

曹俊杰的伙伴们一听要甩车也很着急，他们一齐向曹俊杰鼓动：“你跑多快我们都保证供得上汽。”曹俊杰得到伙伴们的支持，信心更足了。他又向调度员提出保证：提前二十四分钟到达四平。可是调度员还不答应。

曹俊杰看到对方不信任他，有点冒火了。他冲着送话器大声叫道：“你要是甩车我反而拉不快，只能做到不晚点；不甩车我就早点二十四分钟到达！”调度员奇怪了：“那是为什么呢？”

“思想问题。有什么办法！”站长在旁边听着也禁不住笑了。

争到最后，调度员只好屈服，他没好气地说：“拉走

吧！”根据他的看法，他只能相信曹俊杰不至于晚点，而早点是没有可能的。

想不到曹俊杰把车开到四平的时候，竟比他保证的时间还提前了一分钟——早点二十五分钟就进站了。曹俊杰兴奋地在电话里问调度员：“怎么样？”

“哎呀，我的老曹，我哪里想到你会跑得这么快，好家伙，三千零三十四吨哪！”

曹俊杰在和他的伙伴们密切合作中，经常带头牵引快速超轴列车奔驰在陶赖昭——长春——四平区间多坡的线路上，在满载、超轴、五百公里运动中获得了显著的成绩。根据1955年的总结，曹俊杰乘务组全年共超轴136次，共三万八千八百零四吨。“绿街”运行共完成186次，省煤七万三千三百八十三公斤。

但是中国的青年是永远向前的，他们从来不满足于既得的成绩。在农业合作化和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高潮中，曹俊杰感到铁路运输事业必须急起直追，向更高更远的理想突进。于是他又和李绍强等四个包车组共同提出了提高牵引定数的倡议。

三月间，在铁路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上，曹俊杰当选为出席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的代表。

1956年4月16日

开路的人

一

1952年的冬天，在出席一次国际会议的代表里，我荣幸的认识了十几位工业和农业生产战线上的英雄模范。他们之中，有朝气蓬勃的小伙子，有象白雪一样纯洁的姑娘，也有饱尝风霜、经历了好几个时代的中年人。不管他们年龄大小，也不管他们的经历有着怎样的差异，在我们崭新的祖国里，他们全是崭新的人物。在那负有和平使命的代表团里，他们也是受到普遍爱戴的同志。是他们对人民的贡献和优美的品质博得了这种爱戴的。

李凤恩，就是那些崭新人物当中的一个，也是在代表团里受大家敬爱的同志之一。

代表团的成员，是从四面八方各个不同的工作岗位上汇集到一起的，绝大部分同志原本素不相识，更谈不上相互了解。其中不免有个别的人思想上有些毛病。

一天，列车到达苏联境内的一个车站。那正是天寒地冻、大雪纷飞的时节，但是，站台上却出现了冒着严寒风雪

列队欢迎的苏联友人。在那挥舞着鲜花、欢唱友谊的歌声中，大家都兴奋地冲下车去，以最真挚的感激接受那最珍贵的友情。差不多每个人的怀里都有一把把花儿了。一个中年的农民代表兴冲冲地回到车厢里，指着自己的胸前告诉和他相遇的每一个同志：“看哪，花！这里还有个牌牌……”他的眼里闪着激动的泪花，他的脸由于兴奋闪着红润的光，也许这正是他有生以来少有的幸福时刻吧？但是，一位代表——领导工农代表小组的一个同志，竟声色俱厉地喝道：

“你，你，看你那个怪样儿！难道你就不觉得害羞吗？……”

西伯利亚的风雪虽大，但在友情的温暖中，谁也不感严冬逼人，这几声呵斥真是形同烈火，却使我们的农民同志浑身寒栗了！他的脸色变白了，美丽的鲜花从他的臂里滑落了，这个善良的人象个被先生责罚的小学生似地垂下了头，默默地走向他的房间……

这不能不令人奇怪，这位农民出身、曾经长期领导农民斗争的老同志，竟会这样地看不起农民！他在工农代表之间，不但没有负起帮助和教育他们的责任，而类似上面那样的事，还不止发生过一次呢。

当时，第一个起来抗议这种令人气愤事情的就是李凤恩。

这位来自祖国钢都的工人代表，从形象上看，完全象个老实的东北农民。但，他对自己要求严格，对不良倾向也敢于坚持原则进行斗争。他是不允许任何人侮辱、藐视他的

农民弟兄的。他对那种奇怪的现象感到愤怒，感到耻辱，更感到痛心，他终于义正辞严地向那个傲慢的人提出了批评（对方开始还不愿接受，而他也未妥协），并且把这个问题向组织汇报了。

李凤恩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这样鲜明，就在那次旅途中，我请他讲了他的半生经历。

二

他低低的额头上，虽然红光焕发，但已经出现了好几道很显眼的皱纹，看来他似乎并不年轻了。听着他那丰富的经历，他也该是个半老头儿了，然而那一年他只不过才满三十五岁。是过去沉重的劳动和苦难的日月，在他的额头上刻下了残酷的烙印，是今天的幸福和荣誉又在那烙印上涂上了美丽的春光。如今，回述过去那些多灾多难的日子，他已经没有眼泪，没有叹息，偶尔流露一点控制不住的激动，一会儿也就恢复了平静。讲到后来，他简直是谈笑风生了。原来他还是一个很有风趣的人呢。

李凤恩没有黄金的童年，他生来就是凄苦的。八岁上，他就给奴役着祖父和父亲的那个地主放牛。那个狼一样的奴隶主并不因为他们祖孙三代都做了他的牛马而对他们略施“仁慈”。他仅仅为了图谋李家在山顶上开垦的一片荒地就动了杀机。因为那片地正连着他的苹果园子，要是也种上苹果，他就可以有更多的收入了。他使了多少敲诈、威胁的手

段呵，但李凤恩的祖父却不屈服。于是，就在一个阴云密布的雨夜，老头儿竟被地主的爪牙秘密的勒死了！

人命关天，怎么能够善罢甘休！李凤恩的父亲到处求援，好不容易借到钱写了张呈子，谁知呈子递到海城县衙门，原告却变成了被告。李凤恩苦笑着说：

“讲起来，谁会相信呢？我父亲反倒落了个‘诬告’的罪名，和我的老祖母一齐被关进了牢房！”

那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呵，是金钱和权势统治的时代呵！乡邻亲友们谁不明白，就是拼掉全家性命，也不会打赢这场官司的。咽下这口气，把呈子撤回吧，但是，法官可不答应。

“不成！”他吼道，“老头子明明是你们自家害死的，你们竟敢诬赖好人！枉告不实，意图敲诈，这个罪是绝不能赦免的！”

“好吧！”李凤恩的父亲无可奈何地说，“就算自家害死的吧！”

母子俩忍气吞声地认了罪，画了押。法官宣判了：

“立刻交出你的房子地，赔偿人家的名誉损失！嘿嘿，真是太便宜了你。”

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法律呵！

人身的自由是赎回来了，却失掉了祖孙三代辛勤开垦的、赖以生土地，失掉了全家躲避风雨的两间房子。把眼泪吞到肚里，把仇恨记在心里。为了求生，一家人各奔西东吧！就这样，九岁的李凤恩便离开了生他的海城农村，随着父母流浪到鞍山。

李凤恩十五岁那年，才算在粮栈找到个打杂的工作，他每天给买主送米送面，虽说仅仅混碗饭吃，总算减轻了父亲的一点负担。不料想，正当生活多少有了点转机的时候，突然爆发的“九·一八”事变，又给他带来了失业的厄运——粮栈由于敌人的粮食统治而倒闭了。

殖民地奴隶的生活就从此开始！

那一年，伪满昭和制钢所（即鞍钢前身）招收工人，李凤恩虚报了一岁，勉强报上了名。录取后被分到高炉去做炉前工。

一个十七岁的孩子在半饥半饱的状态下，每天担负着十二小时以上的重劳动，已经足够使他精疲力竭了，何况还受着鞭笞和辱骂的非人虐待呢？他的健康被严重地损坏了，他的体力一天不如一天了。日本鬼的工头完全象传说里的恶魔，劳动得稍差一点，立刻就是棍棒交加，接着，他的爪牙也一拥而上，就跟一群疯狗一样。

“算了吧，那些痛苦事儿不去细说了吧，在敌人奴役下做牛做马的人，谁还没受过那些冤枉气呢？……”李凤恩刚讲了点被虐待的情况，又觉得那太平常了，可是代表团里没有受过敌人统治的年轻人，却在蹙着眉心，大张着愤怒惊愕的眼睛听着李凤恩认为平常的故事。他们催促他讲下去。

“单说解放前三年那一回吧。”李凤恩又继续讲起来了。

那时候，李凤恩象快熬干了油的灯一样，只剩下喘息的力气了，要是再干下去，一定会被高炉的铁渣埋葬。谁管他呢？工厂里有的是不管工人死活的日本鬼子，有的是不给奴

隶治病的狠心医生，连请几天病假都不可能，李凤恩只得扔掉那个饭碗，不再去卖命了。

他的病给四壁皆空的_的家庭带来了更多的苦痛，工资自然是没有了，连他的配给粮食也被取消，一家人勒紧裤带的日子好不凄惨！李凤恩将息了半年的病体刚刚有了点起色，意外的磨难竟又跟踪而来。

有一天，他家的门被人一脚踢开了，他母亲一个“谁”字还没问出声，冷冰的枪口便抵住了她的胸口：

“不许动！”

接着，五六个横眉竖目的人便一拥而进，个个都拿着手枪，那凶相，真象一群强盗呵！不，他们还赶不上强盗呢，他们是两腿站起来的野兽呵！李凤恩认识他们，那是劳工协会的，劳务兴国会的……是汉奸、走狗和日本小鬼。李凤恩什么都明白了，但也不能不问问来由。他挣扎着从破炕席上爬起来，还没开口，一副重重的铁铐就把他那麻杆般的两只手腕扣在一起了。

“走，八路的间谍！”

这真是晴天霹雳，李凤恩还是第一次听见八路这名词呢。李老太太被吓昏了，她堵住房门疯狂地哭着，叫着，哀求着：“我李家只有这一条根哪！……”

邻居们焦急地替李凤恩辩解、求饶，但是野兽们睬也不睬，畜类是不懂人语的。最后，众人只好撕下窗户纸，按上每个人的手印，用大家的生命为李凤恩担保，而野兽仍然嗥叫着：“间谍，间谍，带起走！”他们要那张破纸有什么用处呢？

幸而，老实厚道的李凤恩人缘还好，居民班长赶来平息了这场灾祸——这个好心的人，杀鸡沽酒，用自己的积蓄，买下了李凤恩的生命和自由。但是，做奴隶的人哪会有真正的自由，他仍然被威逼着，第二天，就拄着拐杖上工了。

那以后的日子还用问吗？

三

1945年8月15日，日本殖民者在苏联红军强大的攻势之下狼狈地逃窜了。这是个举国欢腾的日子。当三千万苦难的人民重新投入祖国怀抱的时候，谁不是欢欣鼓舞，感激涕零呢？李凤恩的高兴也同样是难以形容的。他虽然暂时失了业，到底不再忍受帝国主义者的凌辱了。

那时候的李凤恩，在政治上几乎是完全无知的。既不懂什么叫作阶级，对进驻鞍山市的八路军更毫无认识。他只知道他们不打骂，公买公卖，一口一个老乡的叫着，对人又亲热又和蔼。

转过年，八路军撤出鞍山，老百姓被命令着去欢迎“国军”，李凤恩也杂在群众队伍里。

看那洋里洋气的装备，倒是满神气，哪曾想，刚一转眼，狗肉包子就露了馅。那些美式“国军”挎起妖冶的娘们满街闲逛，在大马路上丑态百出：他们东家溜溜，西家串串，什么好吃吃什么，什么值钱拿什么，打骂成了家常便饭，老百姓简直是哭叫连天呵！做个小买卖，今天要捐，明

天要税。这也违禁，那也犯法，不行贿就给你个连窝端，话不投机还得蹲监狱。

这时候，李凤恩正做小贩生意。有一次，他抖落了全部家当，从一个小贩手里买了两辆自行车，车子又新又好，推上市上，博得不少喝彩声。不一会儿，三个穿便衣的人恶虎扑食地冲过来，一下子就抓牢了车把，还没讲价钱，竟先把手伸过来：“证明！”李凤恩摇摇头：旧货还有什么证明？

“哼，妈的，是个小偷。”他们一口咬定李凤恩的车子是偷来的。“实跟你说吧，我们是司令部的稽查，开个证明，再到司令部来领车吧……”说着，骑上车就没影儿了。

天哪！这不是白昼抢劫吗？诬人小偷的人原来就是强盗！李凤恩跑遍了鞍山市，只累得肝肠气断，凡是“司令部”都问到，挨了多少打骂，结果，只落得两手空空，接着就病倒了，贫病交迫的日子又降临到李凤恩的头上了。

李凤恩多么怀念纪律严明的八路军呵！八路军那样仁义，那样爱护穷人……盼哪，盼哪，盼到1948年，正当青草发芽的时候，八路军终于回来了。春风吹散了满天乌云，鞍山市的人民又重见了太阳。李凤恩又高高兴兴地捡起了小商贩的旧营生。

直到1949年，他才回到炼铁厂。

四

“要说一开头我就认清了党，那是撒谎！”李凤恩坦率

地说，“解放那当儿，我不但没有去护厂，直到高炉快修复了，厂工会找我四次我都没有回去。”

要问为什么吗？理由很简单：一想起伪满时候在工厂受的那份罪，李凤恩的汗毛都会竖起来。他认定当工人又苦又下贱，好日子是没有工人的份的，那可怕的高炉不正是他们的火葬场吗？就算侥幸不死，也会弄得皮焦肉枯的。现在他的小买卖做得多自由，小日子眼看就热腾起来了，他真想做一辈子小商人呢。同时，他也不相信炼铁厂真会复工，国民党那时候，一座二号高炉修了一年多没修好，结果三四个月不发工资，连高粱米面都吃不上，那样的罪还没受够吗？……

他是打定主意不回工厂的。

谁知，厂工会的同志比他还要有主意，四次请不回去，再来个第五次。一个老工人整整给他打通了一夜思想。

李凤恩这才勉强走进了鞍钢炼铁厂的大门。他临去那天早晨，还赶到早市备办了一批旧货，人进了工厂，心可还在小市上。

工厂里那番崭新的气象使他吃惊了，在工友们的忘我劳动中高炉真的点起了火。然而，高炉的烈火并没有立刻燃起李凤恩的劳动热情，他本来是打算回来“应付差事”的。

他再也没有想到，工作分配下来，领导上却叫他到机器室当信号员。这工作责任重大，可不是应付的事儿呵。他心里的鼓槌直敲，脑袋不住地摇：

“不会，不会！”

“真的不会？”领导同志眯着眼睛，露着神秘的笑容看着他。

“咱一个文盲工人，怎么懂得那玩艺儿？那是个技术活呵，又是表，又是英文号码，什么华氏、摄氏、立方米的……咱不懂，咱干不了！”

“那么，从前给敌人干你怎么干得了呢？”领导同志还是微笑着，但听语气，显然有点激动了。

一句话把个李凤恩质问得满脸通红。领导上真是心明眼亮呵，原来他们早就掌握了情况。

还是鬼子掀起太平洋战争那年，两个日本信号员被抽去当兵了，敌班长派李凤恩去接替他们的工作。那才叫拿鸭子上架呢，李凤恩对那工作是一窍不通，更不要说一个人得做两个人的工作了。可是他一想，能有个学技术的机会，也算是意外的幸运，便想尽一切办法苦苦钻研……忽然有一天，小鬼子主任看见李凤恩在机器室操作，马上发火了，那是个禁地呵！班长挨了一顿训，李凤恩当时就被赶出机器室。一个叫高根的日本人悄悄对李凤恩说：

“这家伙大大地心坏，就怕中国人学技术……”

他是个日本小职员，李凤恩估计这人一定有点来历，因为他总是反对小鬼子，维护中国工友。这回，高根又想出了主意。他对班长说：

“我看值夜班真够呛，你不困吗？”

“怎么不困？没人替，有什么法子！”班长哭丧着脸说。

“你应该聪明点呵，叫李凤恩替你做夜班，你不就可以睡大觉了吗？反正主任夜班也不来厂。”

这主意真妙，只几句话，好吃懒做的日本班长就狡猾地瞒过主任，偷偷让李凤恩替他熬夜做信号员，直到“八·一五”光复。如今李凤恩却硬说不会，谁相信呢？领导上既然把他的谎言揭穿，他感到再也无言答辩了。今昔一对比，更觉得愧对良心。于是，他带着羞惭的心情接受了信号员的工作。

一个真正的工人，怎么会不热爱自己的工厂呢？李凤恩在炼铁厂劳动了十几年，哪能不喜欢他的高炉？他怕它，那是因为他过去为它受了太多的苦，他落后，那是因为他过去没有机会接受先进的思想。他的意识，他的情感，都被一层凄惶的暗影蒙蔽了。可是，在那阴霾的迷雾后面，难道不正潜伏着闪亮的金光吗？它一旦获得有力的启示，很快就会发出光和热的。

党是了解李凤恩他们这类工人的，因此就有信心把他们培养成一名先进的战士。

五

在党的启发教育下，在集体的熔炉锻炼中，李凤恩认识了工人阶级应该走的方向。刚刚萌芽的小商人思想很快就从他的脑子里隐退了，他卖掉了家里的存货，踏踏实实地站到自己的岗位上了。

脑子一开窍，人也象年轻了好几年，李凤恩连性格也变

了，他不再愁眉苦脸，而是愉快得有时候真像个活泼的孩子。在工作中他体会领导上对他的信任，当家做主的责任感一天天明确起来了。不多久，他就被接受入党。他宣誓：“坚决依靠党，服从组织分配……”但，考验一个党员，不是听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动。

有一天，支部书记找他谈话：

“老李，党决定把你派到关里去当信号员，你同意吗？”

“坚决服从组织分配！”李凤恩考虑也不考虑，连去什么地方都没有问，便回家做准备了，因为时间紧迫，支部书记告诉他当晚就要出发。

两个钟头以后，他又站到支部书记的面前。

“一切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没有什么顾虑吗？家庭没有什么困难吗？”支部书记郑重其事地问。又看了看表说，“如果有意见，还是来得及提出的。”

“没有，什么也没有。”李凤恩也郑重其事地回答。

“很好。那么，就回去休息，等着出发吧。”

李凤恩刚刚走到门边，支部书记却笑着把他叫住了：

“老李，党不是调你出去工作，是派你去学习呵。你不是总为没有文化发愁吗？……把你准备好的行装搬到学校去吧。”

李凤恩对这位秉性幽默的支部书记望了半天，看着那副

严肃认真的神气，他的心兴奋地跳起来了。

开头说调出去工作，李凤恩完全是服从组织，说没有顾虑和困难，并不完全是真的。首先家里就不怎么愿意，一听叫他学习，他可是从心里高兴。没有文化的苦，他算尝够了，不但感到跟不上生产的发展，在日常生活中也不断地发生问题。比如：他上工从来是早到晚走，可是月终考勤簿上总还有他迟到的记录，这不是件怪事吗？其实说穿了一点也不稀奇，原来他不认识自己的名字，上工时摘名牌，常常摘别人的，而他自己的又被迟到的工友摘走了。

1951年春天，李凤恩跟别的同志一起，进了工厂的技工学校。一起学习的同志们最起码也有两年文化，李凤恩却是个纯粹的文盲——小时候学了一星半点，早都忘光了。第一次算术测验时，他勉强得了二十分。他心里又难过又感到羞耻，他拿着试卷两手发抖，热血往脸上直涌。想想过去吧

十四岁，父母节衣缩食地供他念了一年多书，后来因为做不起童子军服，竟被赶出了校门。父亲央求校长收留他，得到的回答却是无情的辱骂。更不能容忍的是，一个教员一拳就把父亲打了个脸朝天！这是多么痛心的回忆啊！如今，党这样苦心培养自己，要是学不好，对得起谁呢？

支部书记看见李凤恩垂头丧气，便来安慰他，问他是否还没摸着学习的门路，最后叫他自己找一找学习的缺点。这又难住了李凤恩：是我的脑子特别笨吗？是我不肯用功吗？想来想去都不是。那么关键在哪里呢？他在操场上转游了好

几个钟头，从太阳偏午转到月亮升起，终于兴奋地回到支部书记面前：不会不问，不懂装懂，原来是因为爱面子，才恰好害得自己反而丢了面子呵！

支部书记针对“面子”问题帮助他做了分析。从那以后，他不会就问，哪怕两堂课中间十分钟的空，他也要找老师，问同学，不搞明白绝不罢休。上课时老师讲完一课就问大伙：“懂不懂？”李凤恩不懂就不举手。有时候老师再讲一遍，他却把两只手一齐举起来，惹得哄堂大笑。老师板起面孔问他：

“李凤恩，你是不是耍嘎（顽皮）呵？”

“不，是着急，怎么越听越糊涂呵？”

六个月的学习真够紧张，前半学文化，后半啃理论，遇到过多少困难哪！但多少困难都被李凤恩顽强地克服了。到毕业的时候，还评了个模范学员呢。

回到工厂，党和行政没有叫他回到原岗位工作。

“去到二高炉跟周传典同志学技术吧，学好了提拔你做高炉技术员，你同意吗？”

李凤恩一听，就跟做梦一样。这不是奇闻吗？伪满时候，一个中学毕业的信号员，干上十几年也提拔不上技术员，国民党的技术员都是坐飞机来的，就说周传典吧，他不也是个大学毕业生吗？而自己只不过是个……这一次可不能不请党慎重考虑了。

“象我这样程度的人培养当技术员，连听也没听过，不行呵……”

“行，一定行！”党支部书记的眼睛闪着信任的光，“没听过的事不是太多了吗？共产党做了多少别人所没有做过的事呵！是因为看见你在技工学校里学习的时候挺有毅力，在工厂里工作上也肯积极钻研，党才决定让你学技术的。李凤恩同志，这也正是党给你的光荣任务，你要做一个开路先锋，党培养工人做技术员，你还是第一个。去吧，周传典同志会很好地教你，党也会给你各种帮助的，能不能完成学习任务，就看你自己的决心和努力了……”

他知道，这是党又一次对自己的考验，便再没有二话，拿着人事科的介绍信便到二高炉去了。可是，他该多么惶惑呵，尽管决心很大，但信心不足。首先，周传典会不会真的好好教他呢？早先的技术员不要说带徒弟，跟工人说句话都得先把鼻子嘴捂起来，嫌有味哩！……当然不能拿旧眼光看今天的新事物，可是周传典到底是个大学生——大学生可不是平常人呵！

李凤恩心里象揣着个小兔一样。他越走近二高炉越是惶恐不安，不是踩了人家的脚，就是碰了人家的胳膊，一边走一边给人道歉：

“对不起！我是找周技术员的。”

忽然，一张笑盈盈的年轻的脸儿在李凤恩面前出现了：

“我就是周传典，你是李凤恩同志吗？”

“是我……”李凤恩向后倒退了一步说。

但是，周传典同志的态度却是那么自然，他亲热地握住李凤恩的手，很久都不松开。特别是镜片后边他那双乌黑的

眼睛，那么深沉，那么和悦，又是那么谦虚。李凤恩只觉得有一股暖流涌上全身，乱糟糟的思想一下子就澄清了。他交上介绍信，很有礼貌地说：

“周技术员，我是来拜师傅的，我这个学徒可是文化太低呵……”

“不要紧。我从大学出来的时候，还不知道高炉是什么样儿呢。信心和毅力才是成功的保证，让我们两个共同努力吧！”

六

李凤恩学当技术员的新闻很快就传遍了炼铁厂。有些人不相信他会学得成，冷讽热嘲的话儿象秋风里的败叶一样，到处发着恼人的沙沙声：

“这真叫新鲜事儿，高炉操作除了大学生，咱没见过一个工人。”

“可不是嘛，论文化他才一年多，比工龄二十多年的有的是，怎么也轮不到他，他哪点够条件？”

老工友们都摇头叹气：“看吧，白培养！”

工程师们也说：“领导上确实欠考虑，学不成的！”

听到这些风言风语，李凤恩刚刚建立起来的信心又打了折扣。回到家里，连老婆也说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李凤恩心里憋得慌，便去请教一位熟识的老工友：

“老师傅，你看我到底能行不能行？”

对方不说行，也不说不行，只掂讪了一句：“赶着学

吧！”听口气，似乎还有点希望，可是李凤恩回转身刚走出两三步，讽刺声却从背后送过来：“这小子，行不行自己还不知道？要是兔子能驾辕，谁还花大价钱去买马！”

李凤恩难过的很，但并不完全是为了人家的嘲笑。他寻思：万一完不成这个“开路”的任务，自己丢人事小，不是反而挡住了别人的路吗？他动摇了，又去找党委。党委同志却一点不动摇，仍然鼓励他说：

“不能因为一两句闲言闲语就丧失了信心，一切事都是人干出来的……”党安慰了他，支持了他，又给了他力量。是的，共产党员绝不能向困难让步！一定要替后来者开辟出一条学技术的路来。

李凤恩重新鼓起了勇气，他信赖党。一开始学习劲头就很足，周传典同志走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老周更是耐心地教。他们俩变成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了。

一天，李凤恩正高高兴兴地在炉前看炉况，日本工程师江口从旁边走过，李凤恩顺便问他：

“你看我多少时候能学成？”

“你吗？快快地也得十八年，还是初步的……”

“慢呢？”

江口把两个指头一伸：“二十年！”

李凤恩一听，心又凉了半截。他算了一下：今年我三十四岁，再过二十年，天哪，不是胡子也快白了吗？就算学成了，还能对党工作多久呢？江口的话当然不足为凭，可是他也问过自己人，一个技术员就说过：“必须有物理化学的基

础才能掌握炼铁，我学的物理化学书足有一扎（五六寸）多厚，你才几个月？”

周传典看见李凤恩不爱说话，一问清了原因，就笑起来了，拍着李凤恩的肩头说：

“原来是为了这个！你不是不知道江口的技术保守，怎么又信起鬼话来了？过去他们说中国人不能炼铁，只有毁掉高炉种高粱，今天你再看，咱们不光能炼铁，而且出的又多又好。他们认为冬天不能修炉，难道我们的四号高炉不是在十冬腊月修成的吗？……”

这几句话又说亮了李凤恩的心坎。是啊，伪满多少做不了的事，咱们都做成功了……既然党相信我能够学成功，既然老周认为我两个月的学习成绩非常好，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接着，老周又给李凤恩一番鼓励，并检讨说：

“你的思想波动，我教得不好也是原因之一，让我们再来想想办法吧。”

就这样，谦虚的老周和李凤恩订了保教保学的“兄弟合同”，这合同就成了他俩共同完成任务的保证。

从此，李凤恩的思想真正稳定下来了，学习的信心大大增强了。让我摘要记下他自己的一段话吧——

“虽然我上了几个月的技工学校，究竟文化浅，学起来非常吃力，特别化学成分和炉况变化原理感到不好记，怎么办？难懂我就尽力钻，一遍两遍甚至三遍四遍地念、写、做笔记，不弄明白绝不放松。化学成分记不住，就拿矿石和砂

子比样子，练习判断炉况。怕记不扎实，就自己给自己出题测验，然后再叫老周解释和纠正。同时，每天下班前，老周都给留几道题拿回家练习，如果当天晚上答不完第二天上班去老周可不答应。这样，我有时一宿不睡也要把题答上，多咱憋会多咱拉倒。

“当然，我越学越高兴，到第三个月学得就又多些了，过去是跟在老周后边他讲我听，这时我在炉前看炉子，我讲他听，有讲不对的地方他再给我纠正……订了兄弟合同以后，学习更紧张了，夜里发困，我就掐掐鼻子耳朵，在桌面上跟老周学习，在桌子底下偷偷用大头针扎手指头，一激灵，又精神一个多钟头。

“后来又练习看铁样、铁渣，为了快点熟悉它，便随身带着，不管吃饭走路也要看上几遍。学到用计算器判断炉况的时候更难了，这玩艺儿和铁渣不一样，要用思索去判断。

老周每天给写几条简单材料叫我回来练习，可是回家又得买柴买米，就又打通老婆思想，订了‘家庭合同’……

“这样，学习劲头一天比一天高，白班下班后学到夜深一两点，早晨五点钟就起来，有时连饭也忘记吃了。老周呢，也分外紧张，白班考问，夜班讲课。就这样，学到第五个月，已经学会判断炉况了……赶到1951年3月1日，厂长就叫我这个只学了六个月的工人技术员正式值班，单独掌握炉子了！……”

从这一段简单的自述中，可以体会到李凤恩是在怎样顽强地勤学苦练；周传典又是怎样循循善诱地培养出第一个工

人技术员，树立了劳技结合的榜样。

“提起周传典同志，可跟早先的技术员完全不同。他一进工厂，马上就和群众打成一片，工友们也把他看成自己的弟兄，都亲热的管他叫‘老周’。他和工友可以同盖一床被子睡觉，共一个碗吃饭，我跟他学习的时候，就常常两个人吃一碗菜、一个烧饼……”

李凤恩一讲到老周，就充满了敬爱的感情，他以他的老师为骄傲呢。他深深感到，假如不是老周创造性地、煞费苦心根据地根据他的水平做了切合实际的安排，假如不是老周那样耐心地、不辞劳苦地亲切教导，他也许真就学不成功，纵然学得成，也绝不会那样快。

周传典同志四年前就被提升为炼铁厂的副厂长，并且光荣地入了党。1952年，和李凤恩同时荣获了鞍山市特等劳模的称号，他的模范事迹也是很多的，创造“工人速成培养法”不过是其中之一。李凤恩还告诉我这样一件事：

组织上分配李凤恩担任技术员以后，在第一个月，已经被他消灭了废品的二号高炉，到月末竟因焦炭质量不好，忽然出了一炉号外铁。有些技术员出了废品，一摆手就没事了，可是李凤恩却象摘掉了心似地难过。他捧着铁样子，竟痛心地流下了眼泪。值班主任劝他说：

“别难过，老李，谁都出过号外铁，这本来就是免不了的事。”

“谁出我也不能出。党这样培养我，我应该做得更多更好才行，现在却因为我一个人的疏忽，不但浪费了大家的劳

动，还给国家造成了损失，对得起谁呢？”

多少人的解劝也宽不了他的心。他回到家一夜也没睡安然，尽说梦话，老婆一次两次叫醒他，担忧地说：“别上班了，看窝囊个好歹的！”

“胡说！”他不能接受这种关怀，“高炉就是我的命，有高炉在就有我李凤恩在！”

第二天一大早，饭都没吃，他就跑到工厂去了。

他怎么也没想到，周传典却比他来得更早，而且正在向工人做检讨呢。老周说：

“这炉号外铁是我的责任，我向老李交班时没在本子上写清楚……”

这使李凤恩大受感动。但他并未因为老周把错误担当起来就卸掉了自己的责任，他同样向工友做了自我批评。

经过这次教训，他不但称赞老周勇于负责的精神，也体会到一切工作都必须依靠群众，这次如果是事先由工友检查过，也就不会出差错了。从此他紧紧掌握住发动群众和认真负责的原则，产品的质量和产量都得到了进一步提高。到年终，二号高炉被评为优质炉，他个人也获得了优秀技术员的光荣称号。

我急着问他：

“你当了技术员以后，那个说二十年才能初步掌握高炉操作的江口说什么呢？”

“那家伙呀，他还说什么！他的那点过时的技术早就没用了。”

“那些抱怀疑态度的人们呢？”

“当然被生动的事实说服喽。好多工人对学技术都有了信心，只有二年文化的梅乃勋也学开了英文字母，连老班长张殿福都学起五元素来了。这样的例子可太多了，一时也说不完……总起来一句话，有路就有人走。”

七

去年冬我到鞍山，鞍钢总工会的负责同志一见面就告诉我：李凤恩又得了多少次奖励，在贯彻苏联专家建议方面，他做出了很突出的贡献，他在各方面都在不断发展着。

直到那时候，我才知道，李凤恩在1954年6月就被提升担负着八个高炉炼铁总责的炉前总技师了！

上个月，他来参加重工业先进生产者会议，我怀着无限钦佩的心情拜访了他，倾听了他贯彻苏联专家建议的故事。

1952年9月底，李凤恩生平头一遭离开鞍山，坐火车赶赴北京参加国庆观礼。真是千言万语也难描述他一路上的兴奋呵，他告诉我：

“可惜了那张软席睡铺，白买了，我根本就没有睡，哪一站我不得看个仔细？还忙着往小本上记……”

祖国的河山多么辽阔，多么壮丽！国庆观礼的时候，李凤恩的这种感受更深刻更丰富了。那彩旗，那鲜花，那浩浩荡荡的队伍，……他眼花缭乱，心也长了翅膀、飞出胸腔，随着和平的白鸽，飞向天安门，飞到毛主席的身边；毛主席

呵，你就是人民的舵手，党的化身，昨夜在怀仁堂里第一次见到你，能够这样亲近地和你在一起，该是多么大的光荣和幸福呵！回到鞍钢，我一定更要好好儿发挥力量……

但他没有立刻回到生产岗位，他被派出国了。在莫斯科，他又看到了更伟大更美丽的现实。苏联的土地上的一切，不是都在预示着祖国的明天吗？李凤恩的奋斗目标更明确了：只有向苏联的先进技术学习，才能使我国早日工业化……我一定要做一个积极的实践者！

李凤恩的诺言是从来不落空的，回国以后就实践起来了。

说到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专家的建议提出来，也不是一学就会、一说就通的，它不但会遇到各种阻力，有时候还可能遭到失败。但李凤恩在执行专家建议方面，也同样表现了他的顽强性。他时刻记着党的话，不向困难低头，不做思想懒汉。经验告诉他，每一件新的事物，都会遇到保守思想的抵制。对执行专家建议抱怀疑态度的人，说怪话的人，他都耐心地去说服。他知道，要想消除群众的思想顾虑和落后因素，绝不是一道行政命令就可奏效的，必须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发挥群众的积极性，生动的实例才是最生动最能说服人的。每逢遇到棘手的事，他总是努力寻求解决的途径，自己解决不了的，他更懂得如何去取得党和团的支持，以及工会和行政的协助。几年来，他已经锻炼成一个出色的组织者和宣传员了。

就拿“消灭废铁”这件事为例吧。

高炉每次出铁后，放铁水的沟里都要积存下很多残铁，占全厂每日总产值的百分之二，运到碎铁厂去，一吨只卖十元钱（好铁一五元）。专家建议把每次的残铁放到下次的铁水沟里熔化，就可以不折扣地变成好铁。但工友们嫌费劲，谁也不爱搬。有的说：“这点铁能顶什么用？”李凤恩及时地掌握了这种情况，便到各炉各组去大力宣传消灭残铁的重要性和执行专家建议的意义。他说：

“苏联专家千里迢迢地来帮助我国建设社会主义，人家哪一点不是为咱们着想，而咱们自己对国家财产浪费反而不去重视，作为一个工人阶级，良心能够安然吗？”

就这样，说服了和感动了好多工友。随后他便一方而号召炉友谊互助，一方而用流动红旗的办法进一步鼓动大家，开展了竞赛；他把残铁分成堆，哪个班化得多，就给哪个班挂红旗。谁不爱荣誉呢？运动热火朝天地展开了。单在一个季度里，就有一千多吨残铁变成了好铁，给国家节省了十二万多元的财富。工友们都敬佩地说：

“苏联专家这个建议实在好，咱们费点劲也要执行。”

李凤恩对专家是无限信赖的。他不象有些技术人员，新技术试验失败了就悄悄作罢，不好意思向专家反映，把专家建议看做是一成不变的教条。李凤恩敢于根据具体适当地修改专家的建议，偶然失败了，他便勇敢地检讨自己，把责任担当起来。他还一贯坚持着“不懂就问”的原则，经常去向专家请教。

用粘土和耐火砖筑的砂口大闸（渣铁分离的地方），一

星期得重筑一次，每筑一次，就需要五个工人在六百度的高温下工作两小时，还常常因为烧不干发生事故。专家建议用生铁大闸代替，一个就可以使用两年。这不仅会给工作带来极大的方便，还能节省大量的人力和财富。按理说，这本是一举数得的事，然而，很多工友都象听神话一样，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他们说：“那样高温的铁水，一会儿就得把生铁蚀坏。”但李凤恩还是坚持着执行了。

不巧的是，第一次试用，那新的生铁大闸果然被火红的铁水浸坏了。于是，原来就反对这项建议的工友们就更有借口，他们把那坏闸口放在显眼的地方展览，讽刺道：

“看吧，还说用两年呢，我们不到两个钟头就把它送终了。”

这影响多坏呵！李凤恩连忙去找专家。专家笑笑说：

“你没有糊上粘土泥呀，生铁直接受铁水浸蚀，怎会吃得消！再去试试吧，在苏联一个生铁闸口确是用两年的。”

李凤恩一听，原来是自己粗枝大叶，上次没听明白专家的指示，才出了这个漏子的。于是，他马上用铁水自铸了个大闸，再试用的时候，不但大闸没坏，糊的泥也沾得牢牢的。这一来，工友们都信服了专家的这个建议，兴奋地说：

“以后星期六再不用蹲在那儿换砂口，省老劲了。”

不多久，这个新技术便推广到各个高炉，单是原料，就不知给国家节省了多少财富呢。

另一次，苏联专家提出使用开口机的建议。

过去，打出铁口的工作一直是手工操作，每次出铁前，五六个工人用镗头和钎子打半小时才能打开。

专家提出使用开口机的建议后，李凤恩首先在七、八高炉做试验。但开口机是个新设备，工友们思想有顾虑，怕掌握不好，把开口机搞坏了，常常开口机用到一半，就又不怕费力地用镗头钎子打起来，有时干脆就不用开口机。问他为什么不用，回答的可妙呢：“要叫我用，除非把炉前工具都收走。”李凤恩便去找党和工会商量，决定先指定七号高炉乙班带头试验。乙班炉长是技术员王洪顺，是个青年积极分子，指示一到，他便高高兴兴去布置了。

可是第二天，吴副组长竟突然负疚地站到李凤恩面前：

“老李，扣工资吧！”

“为什么？”

“开口机打到一米八，超过了‘红点’，把钻头烧坏了！”

为了不给落后思想造成借口，为了巩固试用者的信心，李凤恩坚决地回答：

“不，不光不扣工资，你们大胆使用新设备的精神还要奖励呢。继续试验吧，只要正确掌握时间和估计铁口深度，一定会成功的。”

姜组长和吴副组长齐声回答：

“就是扣工资我们也坚决要用开口机！不成功绝不罢休！”他们从失败中取得了经验，李凤恩的支持给了他们信心和力量，从那以后，七炉再没出事故，只要五分钟出铁口

便打开了。

生动的事实，教育了保守、畏缩的人们，开口机的优越性到处在传扬，不多久，便推广到全厂。

李凤恩就是以这样顽强的毅力和工人阶级的智慧战斗在他的新的工作岗位上，而且在不断地前进着。单是1954年，专家就提出了三十一项炉前建议，这些建议的实现，对我国工业化都起着很大的作用。李凤恩在贯彻这些建议上，做出了出色的成绩，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但他仍然是不满足的，他要求在各方面都达到苏联水平。如今，他正在虚心学习中，向着这个目标迈进。

就在三月间召开的重工业先进生产者会议上，他被选为出席四月底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的代表。

在我们结束这次谈话的时候，他特别声明：

“我的这点成绩，首先要归功于党的培养和教育……从工人变成技术人员，我只不过是做了一个开路的人罢了！”

1956年4月10日

老 母 亲

说他象个老工人也好，说他象个庄稼人也好，不管怎样，反正宗传伦不大象个生龙活虎般的战士，要凭那身八路装，倒象个炊事员。这倒不是因为看他上了几岁年纪，没有年轻人的甩头儿，说实在的，单论他那一脸慈祥的纹路，老实巴交的样儿，就不能不叫人有这种感觉。

可是，人不可貌相，你也许不大相信，这个老实巴交的宗传伦，上了战场，那股勇猛劲儿，可真是生龙活虎一般。不单打仗好，他的好处还多着呢。

因为他年纪大，又是二班的班长，战士们早先管他叫老二班长，现在呢，竟叫起“老母亲”来了。他那一班里，都是二十上下岁的年轻小伙子，他呢，四十岁了，管他叫个母亲，可也并不过分，老宗他可是不同意：

“咱们都是一样人，分起了辈数可不带劲，以后再不这样叫了！”

“你岁数大，待咱们象儿女一样，有你，年轻人象有个依靠似的……”

他的反对一点用处也没有，战士们照旧亲热的“老母

亲”地叫，叫得他心里也热烘烘的，就越来越象个母亲了。

不说别的，单拿行军来说吧，他对战士的照顾和帮助，谁也比不了。每天百八十里行军，背着大枪和背包，还有一些零七八碎的，夏天，走起来总是满身大汗，太阳象个火炉似的，在上边烤着；冬天呢，就更不用提了，老北风飕飕的，锥子一样往肉里锥，脚底下一哧一滑，一不小心，就是一个跟头，不要说老宗四十岁的人了，就是年轻的棒小伙子，也累得呼哧呼哧的，要是脚磨坏了，就非掉队不可。

可是老宗这个班，可不大有掉队的，原因在哪里呢？这和老宗的领导大有关系。

譬如去打万金台的时候，正是数九寒天，雪有一尺多深，那天走了六十多里，他就扛了六十多里的机枪，谁抢也不给。从瓦房店到鞍山这段路上，一支冲锋式，三百五十发子弹，外加别人的一支步枪，老是扛在他的肩上，这还不算，看谁的腿抬不灵了，还抢着给人背大衣。鞍山战斗回来，足足走了十三天，他怕有人掉队，早就下决心尽力叫大伙都跟上。十三天的行军，他每天都背着两支大枪，全班十一支大枪，他背遍了，还常常抢着帮助三班背，战士们不给他：“这成什么话，你那大年纪了，还给咱年轻人背枪，可哪能忍心呢？”

他回答的更干脆：

“别看我年纪大，骨头可硬实呢。”一边说一边就把枪抢过去了。战士们感动的说：“老二班长那大年纪老帮别人，

咱们掉队可对起谁呀！”就这样，战士们的腿，象车轱辘上了油似的，就轻快起来了。

老宗天天如是，老也不松劲，战士们问他：“你不累吗？”他摇摇头：“累啥？”这不是真话，凭良心讲，还能不累吗！

一到宿营地，大家都累得东倒西歪，不想吃，不想喝，只想睡觉了。可是老宗可躺不下，他心里有事：大伙走的口干舌燥，脚底板生疼，得先烧点水。于是他撂下东西就去烧水，他悄悄地，谁也不惊动，连气也不喘喘，忙得脚不沾地，挑来水烧好了再一个一个去唤醒，实在累得动不了的，他便把水端着送去：“起来，喝点水，洗洗脚，不洗该裂啦，明儿怎样走呀！”他叫着，劝着，直到大伙都喝了水洗了脚，他才抱捆草安心的睡在地下。

他知道年轻人觉大，怕误了行军，第二天天不亮他起来了。挑水、抱柴禾，动员老乡做好全排的饭，等大伙起来的时候，他连碗筷都预备好了。战士们都觉得过意不去，都想抢着做，可是谁也抢不到他头里。

冬天，老宗带班放哨，常叫战士回屋烤火，自己代站；要是班里有人闹病，他照顾的就更周到，有一回赵国忠夜里得病，他跑到队部找了卫生员又去拿药，回来烧水服侍病人吃了药，直到大半夜他才睡下。

他老人家是山东人，从小就给地主扛大活，十八岁才到关外来，老中华也好，伪满也好，二十年来尽给人做工了，就算对付没有饿死，“八·一五”第二年春天，他才参加八路

军，他想：“跑腿子一个，两肩膀扛着一张嘴，二十年来没有积下一个钱，慌慌乱乱的年头，反正是混吃等死，当兵总比扛活强……”从参军以后，他的脑筋开了点缝，知道八路军是穷人的队伍，中央军是专制独裁坑害老百姓的，可是他还纳闷：穷人遍地都是，为什么八路还打不过中央呢？那时正是解放军撤出长春，这就是他那个想头的根据。

别看老宗年纪大，可不是个顽固脑瓜，干了几个月八路，革命大道理不说全通，可也懂得的不少了。从那，他就决了心：“为穷人得好好的干，为人民服务到底才行！”

四六年秋天，他被补充到七连，连长看他年纪大，就把他派到司务处，老宗做了半辈子工，饭菜却不会做，就叫他烧水烧汤。他工作挺积极，老老实实的埋头苦干，思想又进步，不久就加入了组织。从做了党员以后，脑筋开的更快了，对革命的责任心更强了，他常想：“一个党员更应该为革命多出点力，不行，得下班去参加打仗，好好立点功劳。”于是他三番五次地向上级要求，上级照顾他年纪大，也三番五次的批准；老宗可老不死心，又第五次去请求，指导员说：

“你年纪大了！”他又是那句话：“别看我年纪大，骨头可硬实呢。”指导员问他：“你能冲锋吗？”他坚决的回答：

“你放心，一定冲！”“不怕死吗？”“打反动派死了也光荣。”指导员考虑了一下就答应了他，把他调到一班当战士。

一到班上，他就把全班团结的象一个人一样，不但帮助同志，还能帮助班长，而后就当了三班的班副。

万金台战斗是他第一次上战场，冲锋的时候，他扛着机枪跟上突击队就向前冲，可是这回没有用着他，他正着急，连长叫他了，原来西面有三间房子攻了几次也没有攻下，几个地堡又封锁的厉害，不送包炸药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可巧爆炸员不在，连长只好把这任务交给站在他面前的老宗了。老宗没有学过爆炸，连长教了教他，他等不及机枪掩护抱起炸药就跑，敌人地堡里的枪弹在他头上直飞，他冲到房前，把炸药放在房角上，又怕放的不是地方，回过头去喊道：“报告连长，放这行不行？”连长急的直向他摆手，他还莫名其妙呢。多危险哪，要是敌人发觉了，老宗第一次上战场就会牺牲的，后来大伙常把这件事情当笑话讲，他自己也笑：“不懂得呀。”

炸药响了，这边预备好的突击队就一冲而上，占了那座房子，敌人都钻进地堡去了，老宗算是完成了任务。

送第二包炸药的是一个弹药手，这冒失小伙子也不看看环境，就把炸药放在一个地堡上，离这地堡三四步远，我们一班人正在那里伏着，一看炸药放上，都想：“这下完啦！”躲已经来不及，炸药一响，一班人都给炸塌了的地堡埋住，震的懵里懵懂，再也不能冲了，只好撤回来。这下可把连长急坏了，正是紧急关头，偏偏没有人了，想调一个班来，通讯员又都负了伤，没有人去送信，这时老宗正忙着给排长打的机枪压梭子，于是这个紧急任务就又落到老宗头上了，老宗枪林里滚，弹雨里爬，来回跑了好几趟，可连根汗毛也没碰着，给他的任务，却不折不扣的完成了。那个班一

到，就把几个地堡的敌人全部解决。

第一次上战场，老宗就立了不小的功劳，可是，宣布给他立一大功的时候，他还谦虚的说：“我本心感觉真没立功的条件，没起多大作用，那包炸药象闹着玩似的就送过去了。”

立功以后，老宗又升了班长。

打鞍山以前，老宗勇敢的参加了爆炸班，还担任了班长，这样一来，他班的战士都要参加，为什么呢？他们离不开班长。

老宗一天到晚笑呵呵的，没有跟谁红过脸，还很活跃呢，加上他打仗勇敢，工作精神好，战士们也管他叫老青年。

我问他怎么把那个班领导的那么好，他说：“也不懂得什么领导，凡是个人能做的就尽力做，做不到的就找大家研究；一两天就开个班务会，大家有什么意见也存不了心里……”

老宗在班里的威信一天比一天高。从鞍山回来，他想也想不到，战士们一致提出选他为“模范党员”，上级接受了群众的意见，就批准了。

于是，老宗除了“老二班长”、“老母亲”、“老青年”这些称号之外，又加上了“模范党员”这个更光荣的称号。

1948年6月于前线

小保姆

十三岁就参加了革命

开始，张朝文还有点忸怩，似乎不大好意思讲述自己的功绩，但当讲到紧张的场面时，他自己也入神了，他做着手势，天真而严肃地告诉我好多生动的故事。

他是冀东人，四三年鬼子扫荡得厉害，见了青年就杀，只闹得天昏地暗，鸡狗不宁。有点爱国思想的青壮年都参军了，十三岁的张朝文也眼热起来，他人虽小可有个小志气：

“上战场跟鬼子拼个你死我活，就是拼死了也比白白给鬼子杀掉光荣呵！”于是当他的远房叔叔参军的时候，他也跟了去。那时，他又瘦又小，报名处的同志问他：

“小鬼，你做什么来了？”

“我要参军打鬼子！”

张朝文回答得很干脆，引得那个同志笑了，爱抚的拍着他的头顶，亲切的说：

“你太小了，连个枪也扛不动呵，长大一点再来吧。”

“不行，我决心了，只要能打日本，叫我做什么都行。”

那个同志被他的坚决感动了，便把他留下，派到连部去当卫生员。这个孩子又老实又聪明，受了八个月训练以后，一般的战场治疗他全会了，十五岁那年就当上了看护班长。

和鬼子打仗，他总是跟在冲锋队伍的后面，参加八九次战斗，没有丢过一个伤员。

八·一五后，他随四六团挺进东北，做了中共青年党员，打齐齐哈尔下来，被选为一等工作模范，那时他不过十七岁。

“打上了，不过死我一个”

三下江南时，他是五一团三连的卫生班长，打九台出发前就下决心要保持他“模范”的光荣，他想：“个人牺牲不算什么，为了全连，为了革命，完成任务要紧。”于是，除了一身军装和救护用具外，把自己全部财物都交给了上级，抱着牺牲的决心走上了战场，敌人一开始进攻，他便跟着一梯队上去了，战斗非常激烈，敌人的迫击炮六〇炮山崩地裂的响，炮片到处腾飞，树木全打断了，树枝纷纷落地。张朝文机警的匍在地上进行包扎，他本长得很瘦小，但是决心给了他力量，他很迅速的把所有包扎好的伤员背下，联络炊事班向卫生所抬送。这一切过程都必须抓紧时间，因为那正是严冬，耽误了时间就会使轻伤转重，重伤转为死亡，同时更

要注意的是避免伤员二次负伤。

听说最前边的一排长和一个战士挂了花，张朝文跟连长说：

“报告连长，我去抢救。”

连长考虑了一下：不行，离敌人只一百多米，太冒险了！可是张朝文坚持要去，连长只好答应了他，结果他真的和靳金山把两个伤员平安的背下来了，随后又在距离二百米的炮火中把受重伤的连长抢救了出来，一天的任务才算完成。

我问他：

“你在那样密集的炮火里钻来爬去，真的一点也不害怕吗？”

“真的不害怕，跟鬼子打仗锻炼出来了。我总这样想，打上了，不过死我一个，不死呢，就能完成任务，救下的同志比我一个多的多呀！”

“现在是进攻了”

以后，张朝文就被调到营部，当了卫生班长。去年打四平，他特别高兴，“从前是挨打，现在是进攻”。那天鞋子坏了，他光着脚跟着部队就上了火线，脚心扎破了他不感觉疼，背着八十多个急救包也不嫌重，一步也没有掉队。

这次仗打的真够激烈，主攻的一连，一排人只剩下三个没有负伤，他和一连的卫生员每人背下八个。他看着这么多

的同志负伤，又疼又气说：“绝对参战！”随后就跟刚上去的三连跑上去了。在最前线又背下了三个伤员。这一天他完成了两个主攻连的包扎抢救任务。

口前战斗，营长去看地形，被敌炮打中胸部，那时，敌人的火力相当密集，草石树木在尘土烟雾里纷飞着，张朝文不顾危险跑向前去，一看，伤重的营长脱臼了，一动就会断气的，怎么办呢？只好顶着头上飞舞的弹片给营长连打五针强心剂才进行包扎，营长醒过来了，为减轻伤痛又打一针吗啡，然后才抬了下去。

“饺子不吃了，完成任务要紧”

因为二连没有卫生员，又把张朝文调去，二连是个善战连，他最喜欢打仗，到二连他真高兴，工作也更积极了。行军的时候，他怕生疥的同志疥痒影响睡眠，容易掉队，便带着配好的疥膏，天天替疥员擦疥；到了宿营地，他不进房休息，先到各班去检查：“谁泡脚了？”把泡全用蒸过的针穿了，有病的给吃了药，他这才回到连部。

打辽阳那天，正赶上吃饺子，这是不常有的事。可是他们包的慢了些，饺子刚端上来，便得到二连主攻的命令，张朝文想：“饺子不吃了，完成任务要紧。”背起药包就跟着主攻排跑了。

敌人的炮不断的轰击，完全封锁了很浅的交通沟，他正伏在炮火下包扎，忽然一个炮弹落在他三四步远的土岗上，

他右臂挂了花，手里的剪刀不知飞到哪里去了，受伤的胳膊失掉了知觉，他用力甩了甩又继续包扎，好象受伤的不是他自己，把三个伤员包扎好抬下去后，又急追部队去了。

捉了五个俘虏

打进辽阳城那天，张朝文跟在突击排后面，包扎了三个伤员送到安全地回来，部队已经走远了。他知道前边没有卫生员，敌人又多，他便带了伤员的一支冲锋式和三梭子弹去寻找队伍。走不多远，看见东北面走来五个人，起初还以为是自己人呢，当走近了才看出五个人都是灰衣灰帽，两支步枪三支七星子，他们垂头丧气的走着，到相距一百多米处便向张朝文打了两枪，但没被打着，张朝文敏捷的扫射了一梭子半冲锋式子弹，就把五个敌人迫进房里去了。张朝文不肯放松，一直追到房前，和敌人互打起来，一梭子弹快打完时，敌人就缴了枪。他押着俘虏继续去寻找队伍，路上碰到教导员，把俘虏交给教导员就走了。

带伤完成任务

张朝文向来不爱吱声，有决心总是放在肚子里，鞍山战斗前，一营卫生员向他挑战，他说：“不管什么条件我都应战！”

这不是吹牛，在鞍山，他趁着敌人的炮烟冲到距敌人五

十米处包扎了五个伤员。因包扎和部队失了两次联络都追上了。七班长挂花，他冒着敌人一排机枪救了下来。部队向铁道东发展中，他被敌炮打出一丈多远，头、臂、腿三处负伤，竟昏了过去，醒来后一摸，棉裤被血浸湿了，这时天已全黑，急救包只剩下五个了，他分着把五个急救包给六个伤员包好，自己的伤却还在流血。就这样，他也没有休息，部队还在向前发展，任务还没有完呢。他摸着黑找到卫生队，要了五十个急救包又追上队伍。

就这样，张朝文立了大功，又被选为工作模范。

他讲完了他的故事，还告诉我：

“班上的同志对我可好啦，有什么吃的都给我吃，到哪儿都是亲亲热热的，要是不好好干，怎能对得起阶级弟兄的热情呢？”

1948年5月12日护士节在 frontline

张 景 林

工人出身的张景林同志，今年二十六岁，细高个子，背有点驼，人显得很瘦弱，但他却是一个勇敢顽强的铁汉子。

他军龄虽说不长（四六年夏天在双城参军的），经验虽说不多，可是在两次战役中却立了三次大功，他所以能屡次立功的原因，不单是由于他的勇敢顽强和沉着，更重要的还是当他接受了共产党的培养教育后，有了为人民服务的决心。他说他刚参军的时候，为谁打仗？打的是什么人？一点也搞不清楚，他所以参军的目的，只是为了对付他具体的仇人，他想：“当了兵，有了枪，总能找到一个给屈死的爹娘和受难的妹妹们报仇的机会呵！”

三下江南时，他参加了几次战役，都没有什么突出的表现，可是，他却明白了：蒋介石祸国殃民，必须打垮他，才能解放全国的老百姓。懂得了这个道理后，他便下了决心，一定要为人民好好立功。去年夏季攻势中，他真的立了大功。怎样立的呢？他告诉我：白天，六九部打开了北吉林，七〇部八连一排担任了据守一二八高地的任务，这是一个敌我必争之地，丢掉了它，北吉林便不能守，那时，张景林同

志是九班的机枪射手，他抱着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随着全排的战友们爬上了山头。亲自指挥作战的邢营长嘱咐他们：

“一定要守住这个山头，丢了你们负责！”话刚说完，敌人的一个营便冲上来了，张景林同志机警沉着地瞄射了一梭子弹，打倒了三个，敌人便向后溃退了。

江南的炮不住的向这山头轰击，炮火带来了狂风，卷着尘土，呛得人喘不过气，睁不开眼，三排的同志伤亡的只剩下十四五个人了，而敌人在炮火的掩护下又冲来两个排，张景林同志的两梭机枪又把敌人打回去了，接着一颗炮弹落在机枪近旁，机枪助手李耀武同志被打掉了一只腿，他自己的腿和臂也负了伤，他顾不得痛，也并不发慌，看看战友们伤的伤亡的亡了，就更加坚定了与阵地共存亡和复仇的决心，他打定了主意：“哪怕只剩我一人一枪也决不退却的！”

张景林同志就是这样的沉着应战，顽强抵抗着，敌人终于撤退了，后续部队一到，他便光荣的完成了任务，被架下了火线，立了一次大功，升任了九班的班副，不久，便成为中共的正式党员了。

这一次功给了他很大的鼓舞，尤其做了共产党员之后，他的阶级觉悟更提高了，立场更坚定了，因而，为人民服务的决心也更大了，在去年冬季攻势中，他又立了两次大功，那是在万金台的战役中——

战斗开始于十二月二十八日的黄昏，到二十九日的上午，担任主攻任务的二营，便解决了敌人的一个连部和两个排，接着第二梯队的二营便开进去了，首先拿下了敌人的营部。

到天黑的时候，副指导员下了进攻敌人团部的动员令，于是大家高高兴兴的准备好各自的武器，架好了炮，入夜，便开始行动了，担任突击任务的三排走在最前面。天很冷，飕飕的老北风刮得人脸皮发疼，勇士们踏着冰雪的地，映着月光，冒着敌人交叉的火力网向敌人团部所在地的大院进军。通过一片开阔地，爆炸员首先在西墙根下炸开了个突破口，八班便冲了进去，接着七班也跟踪而入，当九班冲进去的时候，敌人的火力更密了，封锁了整个院子，手榴弹从四面八方飞来，子弹象穿梭一样，这院子地堡林立，四角上都有坚固的炮台，敌人正以全力顽抗着。这时八班的同志已大部伤亡，九班只好躲在墙根下待机攻击，敌人躲在西北角的地堡里不断的向他们投掷手榴弹。张景林同志再也忍不住了，他打了一梭机枪，敌人有两个挂了彩，才停止顽抗，迫击炮，六〇炮，都扔出来了，十来个吓得脸色发灰的敌人乍着胳膊出来投了降。东西两排房子里的敌人还在向外投手榴弹，张景林同志又用机枪掩护着步兵解决了草房敌人，他的心象其他同志一样更亮堂了。

敌人的团部是设在东面的一排瓦房里，必须抓紧时间去解决它，这是一个中心的任务，但当许连副寻找爆炸员去下炸药时，在烟尘弥漫的院子里，爆炸员不见了，怎么办呢？连副环顾了一下，把目光落在张景林同志身上，他想：“九班副也许能完成这个任务吧？”他问张景林同志：

“你能去下炸药吗？”张景林同志一下被问住了，他犹豫的想：“我是摆弄机枪的，没有学过下炸药，能完成爆破

任务吗？可真没有把握！”但是他认为：“一个共产党员，不能拒绝党给予的一切任务，任凭这任务如何艰巨，也必须下决心去完成它！”于是，他慨然的回答：

“能行，副连长，你教我吧。”

副连长欣然的抱起一包炸药，指示他放的位置，和如何拉火，并再三叮咛他：

“拉了线，你便赶快往回跑，可小心不要把自己炸了。”

张景林同志接过炸药，心里一点把握也没有，敌人的火网交织着，能否通过呢？但他终于溜着墙根冲过去了，把炸药放在连副指定的壁角下，敏捷地通过火网跑了回来，然而刚学来的技术终归是不熟练的，当他发现两手空空时，才知道忘记拉线了，他愧悔交加，又向连副要了一包炸药，便不顾一切地冲了过去，他听到瓦房里象受惊的麻雀窝一样，叽叽乱噪，知道人数不少，便在心里不住地嘱咐自己，“这回可别忘拉线呵！”运足力气，便把这包三十多斤重的炸药从窗户扔进去了，他手里拿着拉出的线，还没跑回原地时，便山崩地裂的一声巨响，回头一看，烟尘弥漫，砖瓦腾空，五间瓦房全推平了，只剩下负了伤的三个敌人。

这时张景林同志的耳朵，竟被两包炸药的巨响震聋，可是他心里的一块石头落地了。

南面房子上的敌人还没有解决，他们在不住的打枪，连副又搬了一包炸药递给张景林同志，做手势要他去解决那不肯缴枪的敌人，他明白了，便又顺着墙根溜了过去，机枪的子弹在他脚下乱崩，他却机警地躲了枪弹又一次的完成了任

务，三间草房炸倒了，一百多个敌人缴了枪。最后连副再给了他一包炸药，去炸敌人最后一个据点，他勇敢沉着的完成了最后一次任务，炮台炸毁了，缴获了两支冲锋式，两挺机枪，还有不少步枪。

三排凯旋的收兵了，在这个院子里，炸死和俘虏敌人四百多，二〇七师二六六团的顽敌全部溃灭，没有一个逃脱的。张景林同志因此立了两大功，胸前挂上了灿烂的银质英雄奖章。

1948年4月22日于前线

火 花

1948年。通辽刚刚解放不久，正当风雪漫野、冰霜遍地的十二月天，一个不怕冷的小姑娘杂在投考铁路员工的行列里。她清瘦、矮小，短分头、旧制帽，白里透灰的绑腿扎得笔挺，一条旧皮带紧系着腰。她通身能够遮遮风寒的，也许只有那件分地主的薄棉袄吧？但，她却是迎风而立，昂首挺胸，精神抖擞，小腰板标杆溜直，那神气，活象一棵不畏严霜酷寒的小青松。

谁会注意她吗？——一个瘦小褴褛、在人堆里毫不显眼的穷孩子？主考的工头对小姑娘睬也不睬。几个穿红着绿的俏女子都拿眼角瞟着她，好象在说：“哪来的个假小子，就凭这副穷扮相也配来考铁路，真怪！”

可事情偏就这么怪，主考的工头对那几个，配来考铁路的俏女子睬也不睬，单单把小姑娘选中了。凭着他特有的阶级敏感，他暗自欣喜：这棵来自地底层的矿苗苗，经过

炉火冶炼，还怕不炼成一块好钢？他主张：收。

王领工员却不同意：“录取的名额有限嘛，放弃了能说会写的好姑娘、好人才，单收这么个野丫头，岂不是胡来！”

两位主考各执己见，收谁？难以定夺。

田领工员走访了小姑娘的家。那个家，除了破盆旧罐，只有四壁霜花。伴着一位半瘫痪老人的是他那双目失明的妻——这一对饱受旧社会摧残的苦人儿，不正是依靠小姑娘奉养的双亲吗？……

田领工员向电务段领导同志做了汇报，他得到了支持。

从此，小姑娘告别了捡煤核的苦生涯，走进了革命大家庭。随后，她也学着别人的样，买了个“为人民服务”的小铜牌，悄悄地挂在胸前。

从此，她起早睡晚，没文化，勤学；没技术，苦练，闯过一关又一关，只几个月的工夫，就当了正式电话员。

这小姑娘是谁呢？

她就是当年的“假小子”，她就是今天人们争相传颂的人民的好女儿、雷锋的好姐妹，一个浑身闪烁着火花的共产党员——陈淑仁。

革命、革命，这名词有多新鲜！陈淑仁刚参加工作的时候，连写也不会写哩。她最熟悉的是烙在亲人身上的灾难，是凝在她心里的仇恨。那些措不掉的悲惨记忆，她什么时候讲起来都是声泪俱下！

她长到十七岁，旧社会没让她吃过一顿饱饭，没给她穿

过一件囫圇衣裳。姐姐出嫁那年，爹卖了二斗糠给姐姐买下几尺花布，小淑仁竟眼馋得靠在门上哭呵哭，差点哭闭了气，爹娘只急得伤心流泪，却无力满足小女儿的小小心愿！穷人也是人啊，穷人骨肉心连心啊，可旧社会谁把穷人当过人？谁管你连心不连心？鬼子抓爹去当劳工，爹又怎舍得心尖上的小淑仁，他忍着心疼，却又怕女儿伤心，他只好等呵等，直等到女儿睡熟了才悄悄走掉。……爹受不了折磨，不甘心死呵，他冒死逃出地狱，哪曾想，回到家又落到狗腿子的魔掌中。他们逼着爹要大米、要白面……小淑仁看着爹受人欺凌，连心都疼出了血呀！姐姐产后得病没钱治，竟和她新生的婴儿双双死去！有钱人死后头枕金砖，手攥金条，姐姐死了却买不起一口薄棺！……旧社会是多么狠多么毒啊，哥哥又要挑去当“国兵”，伤心的妈妈日夜流着血泪，生生把一双眼睛泡瞎了！老爹爹给有钱人打更，寒冬长夜单要单，以至落下一身残疾！……想想旧社会的重重苦难，陈淑仁心里怎能没有仇、没有恨！看看今天的幸福和温暖，陈淑仁又怎能不衷心喜悦、不热爱这个没有剥削压迫的新社会呢！

可是，小小的陈淑仁一无所有，她将用什么去爱，怎样去爱呢？有一回，田庆年领工员指着她胸前的小铜牌考问她，她一下子愣住了，想了好一会儿才说：“为人民服务吗？就是……就是干活呗！”陈淑仁回答得不完全，却是多么真诚朴素。从入路那天起，她不正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在服务的吗？童年的痛苦给了她一颗好强的心和一双勤劳的手，干活可不用现学啊，心里高兴那还闲得住，管什么份内与份

外，活儿总得有人干呵。只见她总是不声不响，蹿来跃去，扔下斧子拿笤帚，烧完炕又操起扁担，一刻儿也不消闲。她劳动起来那股冲劲儿，那股愣劲儿，谁不说象只小老虎。人们爱管她叫“假小子”，陈淑仁可不满足那个假字，她立志要象真小子那样干哩。她一有空就跑到工地，抢搬抢抬，抢挑抢扛，连电线杆子她也抢着上，滑下来，爬上去，滑下来，再爬上去……怕挨摔就挂不上电线，怕磕碰又怎能锻炼勇敢？谁在那儿笑啦，你爱笑就笑吧，陈淑仁要练功夫还怕你见笑吗？好心的田领工员，莫为淑仁担心吧，别看她身小力薄，她的骨头却硬着哩！……

陈淑仁就是这样地泼辣顽强，不屈不挠，用不知疲倦的劳动，迈出了她为人民服务的第一步。

一张白纸可以写最好的字，画最美的画。陈淑仁纯洁的心田，可以接受最美好的新事物。在田领工员不断启发诱导下，她的步子越迈越大，越迈越踏实，一个为天下穷苦人谋幸福的崇高理想，在她小小的心灵里萌芽了。

1949年10月，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党送她进铁路职工党训班。党的雨露灌溉，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使这颗革命的种子发了芽、扎了根。只有在这时呵，她才开始警觉：她瘦小的肩头上，也承担了革命的重任；她的一切已经完全交给了党和人民——连同她的青春和生命，不再属于她渺小的个人了。

从此，她更顽强地学习，更刻苦地读书，在毛主席的著作中找到了，为谁服务、怎样服务的最好答案；活着的英

雄，死去的烈士，都成了她心目中最景仰的人物和最光辉的学习榜样。刘胡兰那昂首挺胸走向敌人的铡刀的光辉形象，曾经使陈淑仁感动得流过多少眼泪，写下了多少鞭策自己的誓言。她要学习刘胡兰忠于党忠于革命的精神，毫无保留地贡献自己的一生，做一个人民的好勤务员。她要用党的血液把自己的心染红，染得鲜红鲜红……

二

一粒种子播进肥沃的土地，从抽芽到伸枝，从开花到结实，需要阳光雨露，更离不开园丁的扶植。不整枝、不剪叶、不精心培育，也许可以枝繁叶茂，却难免结不下硕美的果实。

陈淑仁，这个苦根藤结下的黄连果，蒙受着党的阳光雨露，长成了一枝向阳红。她的心里充满了阳光，她的身上迸射着火花，不管走到哪里，她都是个发光的人物。她的光给那些有理想的伙伴照亮了前进的方向，却也往往使某些得过且过的庸人感到锋芒刺眼。

作为一个领班电话员，年轻的陈淑仁领导一班女同志并不是件简单的事。特别是调到阜新电务段以后，业务复杂，人员也多了。同志们来自不同地区，不同阶层，带着各种各样思想。陈淑仁对工作极端负责，对自己极端严格，只是不懂得领导艺术，不会做人的工作。只知道闷头干，别人不干的她干。无论是困倦磨人的深夜，或是睡意正浓的黎明，她

在间休或下班后，常常要进行一番大清扫，她擦了地板擦走廊，刷了便所抹玻璃窗，累得她气喘喘，汗淋淋。不这样，她就感到工作做得太少，对不起人民，有愧于党呵！要求进步的同志看她以身作则，自然会动起来；可是有些人却不理那个茬，身子一离交换台就往被窝一钻：“你爱干，你就干吧！”

交换机是电话员的生命线，要想做好铁路运输的传令兵，就得保养好交换机，陈淑仁爱护交换机就象战士爱护自己的枪一样，不管多忙多累，接班交班，她一向把它擦得明光锃亮。别人不擦她要擦，别人擦过她还擦。喜欢偷懒的人乐得清闲：“你能，你就干吧，有工夫我还歇歇气呢！”爱面子的却认为领班对自己不信任：“你信不着拉倒，我还不干了呢！”其实陈淑仁只不过是要求严格，认为她们擦的不够标准，她哪里想到什么信任不信任。

支援农业，种秋菜，修水库……不论什么重劳动，只要是党号召，工作需要，陈淑仁就阵阵当先。开头，有些男同志藐视她，说：“你看，来啦！骡马上不了阵，来啦也是白扯。”谁想到，陈淑仁竟和男同志干得一样欢、一样好，藐视她的人服了；但娇气的女同志反而暗暗责怪她跑得太远，把自己显得落后了，心里不舒坦，说她好逞能，说她爱表现。

诸如此类的讽言刺语、意见和不满，有的陈淑仁风闻了，有的陈淑仁感到了。她在乎吗？不，为了革命，一不为表扬，二不为荣誉，怕什么闲言杂语、眉高眼低！

“淑仁呵，火车头往前开，得挂上几节车厢，才能发挥作用，‘跑单机’可不行呵！”——田领工员——她的党支

书提示得多么中肯。可不是怎的，陈淑仁多象烧足了汽的火车头，只顾欢叫着奔驰前进，却把待发的列车远远地甩在道上，怎能不受歧视、不遭埋怨？又怎能发挥火车头的应有作用？一花独开不是春呵！

可是，如何使群芳争艳，春色满园呢？陈淑仁茫然无措，没了主张。

还是党给她找出了症结，指出了方向：

“一个共产党员如果只有一片红心，浑身干劲，没有好的工作方法，也不能起到带头作用；用自己的思想和标准要求一切人，衡量一切人，也将会脱离群众的……”

就这样，在党的小组会上，在党委同志的个别谈话中，在毛主席的著作里，陈淑仁一次又一次地受到教育，获得启示。她一天一天地成熟起来了。同志们也一个一个地跟上来了……

单说电话员小沈吧，她来自艺术学校，刚到电话所时，工作不安心，看不起文化低的陈淑仁，对领班不爱搭理。陈淑仁却不介意，你不理我我理你。小沈不爱听批评，陈淑仁就先表扬而后指出缺点。小沈坐台时一听哺乳室的孩子哭，就往门外看，塞子线摔得震心响，回答用户问话粗声粗气……陈淑仁仔细观察，明白了，原来小沈疼孩子，孩子一哭她就走神了。妈妈爱孩子的心情，陈淑仁是能够体会的。只要自己和小沈倒台，她就在休息时间跑到哺乳室，用自己的乳汁哺乳小沈的孩子，好叫做妈妈的听不见孩子的哭声，安心工作。还从家里拿来蚊帐，让孩子们睡得更甜、更安稳。

小沈织的一件毛衣放在休息室，放了一春搭八夏也没完成。天冷了，有一天小沈忽然发现毛衣织好了，怎么回事呢？一问别人，才知道是陈淑仁偷偷拿回家，牺牲睡眠帮她织成的。小沈感动得愧悔交加，孩子似地哭了：“陈领班是这样宽厚待人，对我毫不计较，陈领班是这样诚心诚意地关怀我，无微不至，她为的是什么呢？如果自己再不改变作风，好好工作，对得起谁呢？”

陈淑仁总结自己的经验说：“要想知人心，就得先把自己的心交出来，真诚坦率，以心换心。”她总以此为准则，谦虚诚恳地关心每个同志的进步，和大家一起天天向上，让每一朵蓓蕾都迎春怒放，越开越鲜艳。

三

生活也是斗争。

生活的道路不会步步平坦。人生的大海里哪能没有礁石，不起风浪？

那还是1956年。徐炳生同志要调往广州去了。老徐接受调令回到家，告诉产后不久的淑仁说：“这下子调到天边去了！”淑仁感到老徐似有后顾之忧，便冷静而严肃地说：“咱们俩都在党旗下宣过誓，党需要去哪就去哪。你放心走吧，家里一切有我！”老徐信赖他刚强的妻子，愉快地走了。从此陈淑仁挑起了全家的重担。困难能没有吗？两个幼小的孩子，先后病残的双亲。但她没有让困难压倒，在组织

和同志们的帮助之下，她用顽强的毅力和劳动战胜了它。既安排好了家务，也出色地完成了工作。在困难中，她锻炼得更坚强了。

1959年，在“大跃进”的年代里，陈淑仁家务的担子并没丝毫减轻，但一个真正的战士，从来都不做苟安的懦夫，一向见困难就上的陈淑仁，在那热火朝天的战斗面前，怎能不心情激动，跃跃欲试呢？于是，她乘着电话所人员外调的机会，三番五次地向领导上申请，要求到最需要人、最艰苦的第一线去。组织上了解陈淑仁的“拗性”，她想做的，只要她认为符合党的利益和需要，就很难说服她。最后，只好批准她到修缮工区去当车工。

一到工区，陈淑仁就和男同志一样投入了战斗。她学的好，干的欢，从来不在乎碰破烫伤。师傅们喜欢她那股天不怕地不怕的泼辣劲儿，都喜欢教她。有谁看得出她是家务繁重、两个孩子的妈妈呢？她披星戴月，日夜奋战，一步也不落后。每天回到家，安排好老小的生活，仿佛还有着没用完的精力和控制不住的激情。于是就在锅前灶下，听着工地上的战斗号子，伴着孩子甜蜜的酣睡，先后写下一百多首诗歌，歌唱生活的美好，倾吐心中的欢乐。每当战斗开始，她就随着机器的旋律，情不自禁地唱起来：

“共产党，象太阳，
照得人心亮堂堂，
翻身的妇女日夜忙，

跃进的歌儿高声唱，
永远不忘毛主席，
永远跟着共产党。”

机器一停，她又赶去扛木头、装煤车，支援矿山。师傅们谁不说这个女同志不寻常？

这中间，组织上给假叫陈淑仁去探亲。她到了爱人身边，心里却还记挂着生产。她忽视了祖国江南的绮丽风光，哪儿也不想去玩，单单去瞻仰了广州起义烈士纪念碑，参观了向秀丽展览馆。在烈士的精神感召之下，假期未满，她就赶回阜新，提前五天上了班。

火热的斗争，沸腾的生活，使她完全忘掉了自己，忽略了生理的变化，直到妊娠四个多月了，她才想到到医院检查，原来她怀了双胎。家务的担子已经不轻了，不久又将增加重量，陈淑仁能不忧心忡忡！但她心里有一个不可动摇的信念：担子再重，我也能挑得起来；家务再多，也绝不让它影响工作。她把苦恼埋在心里，封锁了怀孕的消息。胎儿长到七个多月时，她的小腿肿得跟大腿一样粗，她还是瞒着、藏着，左遮右掩，照常劳动。刚强的陈淑仁是多么不愿意在不平常的日子里，脱离火热的生活，脱离战斗的集体呀！

但，她终于不得不离开火线了。1960年1月，一双儿女出世了，困难也明摆出来了。党和同志们的关怀照顾，她不可能完全拒绝，却又深为不安。她想，我一个人休产假已经够了，怎能还影响同志们的工作和休息呢？特别是一想到夜战

的师傅们，她的心就更难平静了。有好几次，她用公家照顾自己的白面，在辗转难眠的深夜，爬起来合面剁馅，把热腾腾的大饺子送到工地慰问师傅们。

满月以后，组织上为了照顾她，又把她调回电话所。现在，陈淑仁是四个孩子的妈妈了，而且，瘫痪的父亲已经不能下炕了。尽管有党的关怀和帮助，有无数双向她伸来的热情支援的手，但刚强的陈淑仁却不愿给组织上增加负担，不愿让同志们分担她的劳累，宁肯一夜只睡三四个小时的觉，也要自力更生地抢先把洗洗缝缝的活儿做好，等同志们来帮忙的时候，她连水缸也在夜里挑满了。当她看到全家老小的十几件棉衣拆洗得干干净净垛在炕梢的时候，连她自己也不禁吃惊：这是怎么做起来的呵！也曾有人暗暗担忧：陈淑仁家务的担子这么重，还能象以前那样毫不逊色地工作吗？陈淑仁用行动回答了那些善意的担忧。她永远信守着一切都要服从工作的准则，时刻在警惕着“有些女同志孩子一多就不知不觉地陷入家庭小圈子难以自拔”的弱点。她披荆斩棘，自强不息，一直用韧性的战斗克服着一般女同志难以克服的困难，保持了优秀工作者的荣誉，经住了生活的考验，同时在几年的困难中，她锻炼得更开朗，更练达了。她不但圆满地完成了日常的工作任务，对同志们的进步也更加关心，比过去更细致耐心地做着思想工作，因而有不少同志在她的帮助下，卸掉了思想包袱轻装前进了。

举个例子说吧：

电话员张凤琴是陈淑仁的徒弟。这姑娘性情温厚，体格

健壮喜欢打球、唱歌。中专毕业后分配到阜新来的时候，就勉强地学起技术来，自然是敷衍，手里捧着号码本，脑子里却在想心事。陈淑仁看她终日愁眉苦脸，一了解，原来她不喜欢小小的阜新，认为做电话员屈人才。她抱着无边的幻想，向往着祖国的心脏，认为只有到那儿，她才有前途，有发展，何况那儿还有她的家呢？

小张的父亲是个穷苦出身的老工人，陈淑仁对打通小张思想抱有信心：懂得剥削就懂得革命！于是找徒弟谈心就成了陈淑仁经常的课题。开头，小张对师傅的耐心启发不表态，把思想包得紧紧的，顶多只说一句：“反正心里不高兴！”架不住师傅真诚感人，小张慢慢也有些过意不去了。

这一天，陈淑仁问她：

“小张，想家了吗？”

“嗯，怎能不想家，北京有多好呵！”小张平日里不说不笑，一提起北京，却满面春风，一口一个北京好，两口一个北京好；总而言之，她只想回北京。

“是呵，北京是好，那儿是咱们的首都，是毛主席住的地方呵。”陈淑仁严肃地笑着说，“依我看呵，不单北京好，天津、上海、沈阳、南京……全中国都好，可要是没有共产党、毛主席解放了全中国，哪儿也不好。象咱们这样穷人家的姑娘，还不得拣煤核去？”

这番话把小张的头说得低下去了。……

此后，小张有了显著的转变，笑容也出现了。当师傅的毫不放松地继续帮助，从工作到生活，处处关心体贴，象对

待自己的妹妹一样。她经常牺牲自己的休班日看小张坐台，边教边考。……小张很快就掌握了技术，规程考试只比师傅少一分——获得了九十九分的优秀成绩。

有这样的好师傅，徒弟哪能不转变，不进步？小张终于加入了自己的组织——共产主义青年团。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了。师傅也有意识地找各种机会锻炼她。小张下决心：一辈子不离开交换台，象师傅那样，争取做一个人民的好勤务员。

四

前年，秋雨传来了雷锋牺牲的噩耗。去年，春风送来了毛主席的庄严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这号召，有如春雷般响亮，声震山河，响彻云霄；这号召，激动了亿万人的心，很快就掀起了学习的热潮。在乡村，在城市，在工厂，在矿山……甚至在烈燃熊熊的火场，在浪涛滚滚的海上……随时随地都可以看见活着的雷锋，雷锋还在活着。有人说：“雷锋在我们的公社。”有人说：“雷锋在我们的坑道里。”是的，雷锋的精神永远也不会死，雷锋式的新人每天都在诞生、在成长。

陈淑仁，正是这千万个新人其中的一个，也是学雷锋学得最好最早的一个。可以说：“雷锋活在陈淑仁的思想里。”更准确地说呢，陈淑仁学雷锋已不是开始，而是继续了。

现在，就先来追溯一下，看看她是怎样开始的吧！

1959年夏天，阜新地区暴雨成灾，河水猛涨，水位不断上升，威胁着铁路住宅的安全。防汛指挥部规定：听到枪声，立即到指定的地点待避。

一天深夜，在霹雷闪电中忽然传来三声枪响，这显然是报警的信号。陈淑仁毫不迟疑地一翻身跳下地来，准备收拾东西分批地护送老小撤退。在身边等着的是一对不能照顾老人的孩子，两位无力照顾孩子的双亲。虽说家里重要的东西早由陈师傅帮着运到大楼去了，但这一家老小哪一个不需要自己搀扶？水火不留情呵！她心里有些焦急。一边给孩子穿衣服一边考虑撤退的步骤。

这时，忽然一阵女同志的哭声透过雷声送到她的耳边。她立刻想起：“高志严刚生孩子十多天，她爱人上车站值班去了，真该死，怎么把她给忘了！在这紧要关头，我能只顾自己吗？”她顾不得惊慌的老小，只把吓哭了的二孩子背起，三脚两步冲进对面屋，豪爽地说：“小高，别害怕，有陈姐在就有你在！”边说边抱起小高的婴儿，扶着小高，冒着霹雷闪电，把小高送到电务段楼上，才回去照顾自己的家。

陈淑仁那开阔的胸膛里，跳动着的是怎样一颗无我的心呵，她的豪言和壮举，不象雷锋吗？

1961年。电话员刘淑珍产后得了脑血栓症，半身不遂了。陈淑仁就想，我能为她做点什么呢？是的，我必须为她分担些困难才行！

有一天，她去看望小刘，正碰上小刘站在地上用一只手

和她六岁的孩子拧衣服，陈淑仁一阵酸楚，心里说：多难哪？这不正是需要帮助的地方吗？她到处一看，便动手揭床单。小刘艰难地按住她的手说：“不、不，你四个孩子多忙呵！”陈淑仁心想：同志有困难，忙死也得帮助。她揭起床单就跑了。以后又把小刘的被子抱回家拆了，洗好缝好送给小刘。

小刘的爱人刘志忠工作忙，有一回趁着星期天把一个月的粮全买了回来，被跑去找活干的陈淑仁发现了，她惊讶地说：“这哪行，这么热的天，苞米面要发霉的，快把粮本给我。”从那以后，陈淑仁就担负起给小刘买粮的任务，不管风风雨雨，总是按时把粮给小刘送到家。刘志忠把粮本取回几次，又都被她强索回来。

那天，陈淑仁给小刘送去三十斤面粉，小刘一看，高兴地叫道：“呀，陈姐，是白的！”陈淑仁看见小刘脸上惊喜的笑容，心里象喝了蜜糖一样甜。原来她想到小刘有病该吃点好的，便把买来的次白面换了自己积攒的好白面给小刘送去了。这个秘密，小刘一直也不知道。

陈淑仁的助人为乐，做了好事不让人知道的高尚风格，不象雷锋吗？

漫长的冬夜是这样冷，陈淑仁下了夜班实在想钻进被窝暖暖和和地睡上一觉。但，当她走进休息室的时候，俱乐部的电灯却在透过玻璃窗向她射着寒冷的白光。她连忙跑到俱乐部去关灯。一看有三个人正躺在长椅上睡觉。原来是电务

段工程队的工人怕误了明天的工作没有回家。陈淑仁看见他们缩着肩、蜷曲着身子的睡相，禁不住打了个冷战。她马上想到：他们明天是要上电线杆子的，休息不好可怎么工作。再说，万一冻病了……想着，她性急地跑回休息室把自己用的行李——铺着、盖的，一古脑儿抱到俱乐部，轻轻地盖在三个同志的身上。

回到休息室，她本来可以挤在两个电话员的床边上躺躺，但唯恐会把她们惊醒，便捧起一本书，一直坐着读到天明。什么寒冷、困倦，早不知跑到哪儿去了。只觉得精神抖擞，浑身暖洋洋的。

陈淑仁对待同志象春天一样温暖的阶级感情，不象雷锋吗？

陈淑仁是电务段的优秀工作者。但每当她拿到生产奖金时，她的心都不能平静：我不该得奖金，我做得太少了。应该把这笔钱花在更有用的地方。于是，她把奖金零存起来，一次、两次……积少成多，知道谁需要，看见谁有困难，不用同志们张口，她就把钱送上门了。丁计划员、林师傅、赵师傅、张嫂、李嫂……多少同志受过她及时的援助，真是举不胜举。

她就是这样，时刻想着别人的需要，时刻想着别人的困难。谁不说陈淑仁的心长在别人身上，别人长在陈淑仁的心上。也有些人对陈淑仁的高尚品德难以理解，说：“陈淑仁真傻！”

傻吗？解决了同志们的困难，她的心正乐得开了花呢，她那蜜一样的幸福感，只知有我的人，是永远也尝不到的。

陈淑仁专门做“傻事儿”的“傻劲儿”，不正象雷锋吗？

五

雷锋事迹的报道发表了，雷锋日记的摘录发表了，雷锋的英雄肖像刊登出来了。陈淑仁贪婪地读着、写着，激动地思索着。泪水不时地模糊了眼睛，一不小心就滴到报纸上，滴到日记本的字迹上。

过去，先烈们忠贞不屈的伟大精神，陶冶了陈淑仁的品质，今后，雷锋忘我的英雄事迹将更具体地指导她的行动。

她象每次一样，细心而又细心地剪下她最敬慕的英雄的照片，好象生怕损伤了英雄的一根头发似的。随后写上“向雷锋同志学习”几个大字，挂在镜旁的墙壁上，心中在默念着英雄的名字：“让你永远指导我的思想、永远监督我的行动吧！你教育了我，你使我更明确了做一件事的目的……”

她在日记上写道：“从此，我要好好地学习雷锋，他是我一生中学习的最好榜样。”她认为，学习毛主席的著作要一点一点地学，学雷锋就要立刻去做，才算听毛主席的话。因为雷锋的行动具体体现了毛泽东思想。

于是，雷锋的精神在陈淑仁的行动中在继续；

于是，陈淑仁用雷锋的精神在指导自己的行动。

一个下雨天，家事繁忙的陈淑仁趁着休班出去给孩子买饼干。她撑着雨伞刚走到商店门口，就遇着一位冒雨赶路的妇女，尽管她左遮右挡地掩护着她怀里的孩子，而孩子象她自己一样，还是淋湿了。陈淑仁用伞遮住那妇女说：“大姐，避避雨吧。”说着她就把她领进商店。陈淑仁买了饼干，雨还不见小。那妇女呆呆地望着门外，看样子十分焦急。这时陈淑仁记起雷锋一次去看病时还帮助工地推砖的事，便问道：“大姐，你上哪儿去？”

“上西荒我娘家去，还有二里地哩。”那妇女说着抱怨起自己来：“都怨我不听话，孩他爹本就不叫来呀……这要把孩子浇着，回去还不落埋怨？”原来她是打高德来的。

“不要紧，大姐，我也上西荒，咱们一块走吧！”

那妇女高兴极了。陈淑仁尽量用伞遮住她们母子，自己的半边身子任雨淋湿。

走到自己家门口了，陈淑仁刚想把饼干送进去再走，可一转念：如果那位大姐知道我已经到了家，还会让我往前送吗？不！不能进去。

等到她把那妇女送到家时，手里的饼干已经淋得透湿。雨越下越大了。

去年，调整工资的名单公布那天，陈淑仁一溜小跑去找薄段长。薄段长看她脸红气喘，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忙问：

“有啥急事儿？”

“段长，为啥给我提工资？按我现在的工作，报酬够多

啦。你快给改过来吧？”

薄段长一听就笑了：“这工资是大伙民主评定的，又不是我给提的……”

“不行，不管是谁，反正我本人不同意！”

薄段长知道，此刻说服陈淑仁不是三言两语的事，只好敷衍说：“好吧！”

事情自然不会遂陈淑仁的心愿。增加的工资补发下来了，她的心怎么也无法平静。她打开日记本写道：“我情愿干活多，挣钱少，这是在和平环境里考验一个人、一个共产党员是不是真正为人民服务。”

晚上，外面下着雨，她在屋地上走来走去，心问口，口问心：我究竟为人民做了多少工作？想想自己还有那么多缺点，怎么对得起国家的酬劳！……一抬头，看见雷锋的照片，雷锋为集体事业公而忘私的高尚品德和行为，象海潮似地迎面涌来，陈淑仁一激灵，心亮了。她随手从日记本上扯下一张纸，匆匆写上几个字：“送给孩子们买玩具。”连钱带纸往信封里一塞，顶着雨送到托儿所，往桌上一扔就跑了。

也是去年。作为五好女工的代表，陈淑仁从锦州开完会回到阜新。她的心正为见到了那么多的模范人物，听到了那么多的先进事迹而愉快、而激动。她将向组织上汇报，向同志们传达——让她们受到鼓舞，获得力量，她也要把那些好人好事讲给她尊敬的田庆年同志……她兴冲冲地走下车厢，走出车站，哪想到，一个不祥的消息象一瓢凉水似地向她泼来。有人告诉她：“田领工员得脑溢血入院了！”

陈淑仁的脑袋嗡地一下，适才兴奋的心情转眼就变成了忧伤。她气喘心跳地跑到医院。只见田领工员仰卧在病床上，他那张厚厚的脸上没有血色，没有光泽，他的眼睛闭得那样紧，已经陷入休克状态。陈淑仁心痛如绞，差一点失声哭出来。她站在床边望着即将永别的好同志，望着正在紧张抢救他的大夫、护士们，心里在默默祷告：让他活下去吧！让我替他病，替他死吧！

夜深了，陈淑仁还在木呆呆地站着。她本想安慰安慰田二嫂，田二嫂却不得不忍住眼泪来安慰她了：“淑仁，别难过，人也许还有救，你快回家看看孩子吧，明天还要上班呵！”

陈淑仁这才想起，是该回家了。她踏着漆黑的路，深一脚，浅一脚，多少往事袭上心头。田庆年同志——淑仁的第一个启蒙老师，是他，把一个蒙昧无知的苦孩子领进了革命队伍，是他，启发了她的觉悟，介绍她加入了自己的组织。他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对党无限忠诚；他艰苦朴素，勤勤恳恳，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早已割掉半个肺，却照样为党操劳，多咱也没见他休过假，也没听他说声累，经常是风里来雨里去，拣重避轻，一个人干两个人的工作。十几年来，他的身教和言教，随时都在鞭策着年轻的淑仁呵……这样的好同志，怎么能够死，怎么可以死！

陈淑仁走到家，老徐已经睡下。陈淑仁把他叫起来：“田领工员命在旦夕，快去照顾一下吧。”老徐急匆匆地走了，陈淑仁辗转难寐，往事如云……直到次晨老徐回来告诉她：病人得救了，她的心才安定了些。她深深感到，革命同

志的友谊，阶级弟兄的感情，有时真要胜过至亲骨肉呢。

领到工资的时候，陈淑仁首先想到田庆年同志。他刚刚爬过死亡线，需要很好地加强营养。她跟老徐商量：“咱们留下这三十几元的零头买米买菜，把这一百元给田领工员好不？”“好，好！”老徐慷慨地同意了。陈淑仁愉快地跑到医院，把钱往田二嫂手里一塞说：“这钱交给你，田领工员想吃啥就给他买啥。”

激动得田二嫂让泪水哽住了喉咙，好不容易才说出句：“这哪行，这么多钱……你们可咋过日子。”

“二嫂，多少钱也买不了一个同志的命呵，为了抢救革命同志，我什么都豁得出来，别说钱，割我身上的肉我也心甘情愿。”

这时，田领工员在床上挣扎着叫了一声“淑仁！”呵，又听到他那刚毅而浑厚的声音了！陈淑仁高兴得眼泪都流了出来。

不久，陈淑仁接到从包头寄来的一封信和一张五十元的汇票，信上说：“……你待我父亲比我这做女儿的都好，我在这遥远的地方感谢你……”

陈淑仁急忙赶到邮局把钱取出来送给田二嫂说：“你女儿给你寄钱来了，你继续给田领工员加强营养吧。”

陈淑仁对别人一贯慷慨大方，对自己却精打细算。有人问她：“陈淑仁，你有四大件吗？”她诙谐而严肃地回答：

“有，我的‘四大件’是活的，我要把他们培养成对祖国有用的建设人才。”她说，她想的何止“四大件”呢？她想的

多啦，“要全世界的穷苦人都能过上幸福生活”，这就是陈淑仁的幸福观，这就是陈淑仁的最崇高的革命理想。

她时时提醒自己：“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工作我应该带头，吃苦我应该当先，安逸享受我可不能走在前边。”

话是很平常，说起来十分容易，如果不经过行动的测验，将永远是几句好听的高调，漂亮的头饰。无数的事实证明了，陈淑仁绝不是“行动的矮子，语言的巨人”，她永远用踏踏实实、泼泼辣辣的行动实践着自己的诺言。

十几年来，陈淑仁在红旗下成长，在困难中磨炼，经历了多少欢乐和艰辛，一步一步接受着党的教育和培养。她投身于革命的熔炉，不畏难，不动摇，一贯顽强乐观，勇往直前。

如今，她还象当年那样消瘦、矮小，不加修饰的短发，一身蓝布旧制服。但她的思想碧空如洗，她的意志炉火纯青，她的全身火花耀眼。她称得起一个新中国的新型妇女，一个红光闪闪的共产党员——一块革命的优质钢！

1964年6月

“管得宽”小传

——金纺老工人张功元二三事

你若是到老工人张功元家去串门，只要在门外喊一声“老张！”老张就会一边答应一边跑，三步两步就来到你跟前。他打心眼里欢迎你哪。可他欢迎你的不是什么寒暄客套，而是迎面扑来的春风。哪怕屋里没有火，外面是漫天风雪，可你身上那些冰呵、雪呵，登时就象化成了点点露珠，只觉得浑身暖洋洋的，一直暖到心里。待到坐定之后，他一不敬烟，二不献茶；既不说，“今天天气好呵！”也不问，“吃了饭没有？”只是笑呵呵地瞅着你，你要不开腔，他也不会没话找话假应酬。假如你是头一次看见他，他那股热乎乎的劲儿，一下子就能把你抓住，你只觉得他是那么热，那么纯，那么朴实和真诚。他那宽大的颧骨，瘦瘦的腮帮，有点上翘的短鼻子和那憨厚的嘴唇，你只要端详一下，就会发觉它们搭配得那么适称，摆得真是地方。就说他额下的大胡茬和脸上的皱纹吧，那本是衰老的记号，不知为什么，长在老张的脸上，倒反给他增添了丰采，越显出浑厚慈祥，假如没有它们的点缀，也许就构不成一副可亲可敬的工人形象了。

根据这第一个印象，你会想，这位和善的老头儿，准是个不爱说，不爱道，性子绵软的“老好人儿”。

就说那天在评功会上吧，他端端正正地坐在光荣席上，半低着脑袋，象是瞅着胸前那朵大红花，其实他是在缩缩着原本很高的身子，努力想叫自己不显眼。这，哪能办得到？人们一口一个张师傅，两口一个张功元，大伙儿个个敬佩地瞅着他、盯着他，啧啧地称道他，他不看也觉出来了。只见他头上冒汗，眼里出水，一副不知如何是好的神态，活象个挨训的小学生，给人的印象比平日里更深。

在几小时评功的过程中，大伙儿给老张摆了几十条好事情，摆了生产的，又摆生活的，……摆得人人心情激动，泪水在眼圈里打转。生产上的先不去说它，单单看他关怀同志的那颗心吧：

刘世英颤着嗓子说：

“冬天车间里暖气足，落物室可是间不生火的‘冰窖子’，我们去倒车肚花，本该送到屋里，可张师傅多咱也不让我们进去，他说，‘你们身上汗渍渍地，一下子感冒了，又遭罪又影响生产，你们把“落物”就放在门外等我往屋里捣腾吧。’想想看，就是自己的爹娘也未必这么关心吧？”

纪万真站起来，还没说话先哭了，鼻涕眼泪的好不伤心。原来那年他的孩子得了不治之症，连医生都摇头了。幸喜得了个拿香油配药的灵方，药抓齐了，可上哪儿去讨换香油呢？把个老纪急得抓心挠肝、直打磨磨——他两口子大半辈就这么一个宝贝疙瘩，还是打哥哥跟前领来的，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不是摘了他们的心？老张看着老纪有心事，问明情由，想了想，把大腿一拍：“这好办！”当天晚上，就叫老伴魏玉香把一滴也舍不得吃的半瓶香油给老纪送去了。

“别觉得就那么一点儿香油罢啦，还值得大惊小怪，可你知道那是什么时候？那是国家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60年，有钱没处买呵！放在我老纪身上，真是一滴香油一碗血，一滴香油一颗心呵！……张大哥这份情义，我全家能不记上一辈子！……”老纪说着说着又哭了。

接着，刘学德也眼泪汪汪地抢着说：“张大哥的阶级感情真没比的。举个例子说吧，我的家住在偏僻的山沟里，离工厂十几里地，张大哥一个月就牺牲了两个星期天跑到我家去。他没有车子，可不是为着闲串门哩。第一回是——我的孩子有病想吃豆腐（那时在屯下豆腐可是稀罕物），张大哥知道以后，领到豆腐就没让孩子们吃，趁着休息挎个筐就给我送去了。那也是豆腐顶粮食的60年，轻易不发一张豆腐票呵！这还不算，第二回是——听说我的房子漏得厉害，总也没空修，那天天刚亮张大哥来到我家，把衣裳一脱就干起来，铲土、和泥、爬房、铺草紧忙活，干得比我还欢。本来计划两天修好的漏房子，吃晌前就完工了。可是他连顿晌饭也没吃就打尿道溜啦！……”

……

……

这些事，老张早就忘到九霄云外。如今大伙摆起来没个完，他倒觉着小题大做了。他想，这又算啥功啥好，这些平

常的小事情，难道不是一个翻了身的工人随时随地应分做的吗？别说我还是个共产党员哩！

评功会开得真是空前热烈，好事儿摆了一大车，怎么就是没人摆摆老张的脾气呢？老张当真是个（如你所想象的）不爱说、不爱道、性子绵软的“老好人儿”吗？不哩。别人没说，老张自个可知道，他的脾气不好，有时候还不小呢。特别是两年以前，他嘴碎、脾气也躁，得罪人实在不少。党支部书记就常提醒他：“老张呵，你还得注意点方式方法，不然效果不好哩！”他自己也懊悔：“这穷脾气是不好，得听党的话改改才行。”那天评功以后，他又认真地心对心说：“这脾气改得还不彻底，非来个革命不可了，要不……”

人说山东人脾气倔，要是拿老张做样板，那就算说对啦——老张的脾气倔着哪！别看他五十多岁的人啦，精神头可年轻得很，高起兴来，粗声大嗓门，真是宏音震耳；发起火来，嗷嗷几声，赛过出膛的子弹儿，不提防，能把你吓个趑趄。在家里，老伴知疼知热，孩子听说听道，引不着他的火；他的火都是为了生产，发在车间里。

梳棉乙班二十多人，讲干活数他最多，讲管事数他积极。该干不该干的，该管不该管的，只要他看不过去，他都要干、要管，管多了，管急了，还免得了发火打叭叭？就为这，人们管他叫“碎嘴张”、“管得宽”。有好几年，他的人缘不好，挨骂不少，有些人恨死了他。连比他性子还火爆的组长董万财都嫌他嘀嘀咕咕，净找麻烦。老董怕影响团

结，偶尔也劝说两句：“你看你，吵吵个啥，小小不然的就……”“你说啥？这，这也是小小不然的？你当组长的怎好这样说话？”几句话，就把老董顶得张口结舌。老董了解这位老大哥，他是不急不上火，一火就罗嗦，在火头上，在理头上，他的舌头赛钢锉，你就休想让他打弯。他大公无私，理直气壮嘛！

说得是，有谁看见老张无缘无故发过火？他发火准有他发火的道理。生产时间，他又哪有工夫管闲事？他管总有他管的因由。比方说吧，国家困难那两年，有几个年轻工友，丰衣足食过惯了，生活乍一下降，就满肚子冤屈，干活提不起精神，一会儿这个躲到墙旮旯去打盹，两会儿那个蹲在门口喘粗气，有回小聂干脆睡上了。老张最恨这种人，不能和国家共甘苦，满脑子个人主义，这哪象个工人阶级的样？他越看越有气，走过去就把小聂拨拉醒：“喂！咋不去干活？”

“歇会儿。”

“噢，生产时间你歇会儿！问问你，咱要是打仗，能不能靠睡大觉把碉堡拿下来？”

“这不不是打仗嘛。”

“谁说的？生产就是战斗，领导上说过一百遍了，难道你的耳朵塞了棉花？”

“你这老杂毛，挣钱不多，管事不少，我歇不歇碍你屁事！”小聂急了。

“你偷懒耍滑，就干俺事，俺也是工厂的主人嘛！你当这是旧社会？”

“属主人！我看你倒象旧社会的二头子！”

就这样，三说两说，就崩了。

按说，老张一个抄针工，干的是抄针，掏洞子，他还额外管个落物室。抄针是项重劳动，小伙子干一班，都免不了腰疼腿软胳膊酸，老张上了岁数，哪还有剩余精力干别的？老张可不，只要能腾出手来，他什么都干。发现这边棉条断了，看机工不在，他马上跑去接上；看见那边筒子满了，没有人管，他连忙给换上一个……他常是左右逢迎，连跑带颠，忙得满头大汗，有一分精力也不带回家去。他却不能容忍不负责任的现象，干完了，准得批评对方几句。他说话不会拐弯抹角，遇着不通情达理的，不接受不说，还骂他“狗抓耗子”、“鸡毛腿”，……三说两说，又崩了。

骂就骂吧，都是阶级弟兄，老张不记恨他们，只要对生产有好处，骂掉脑袋不过碗大个疤。

生产，生产，老张满脑子都是“生产”。

每天，接班前一个多小时他就到了，为的是有充分时间帮着组长做检查，好顺利地接班生产。

有时候，抄针组往外抽人，老张拼了老命也要抢着干两个人的活，谁想拦拦他吗？不行，他不能让抽人影响了生产。

前年冬天，老张脚上生疮动了手术，医生给开了七天的全休诊断书，可他没舍得休；今年一月他生病，二月手腕子动手术，医生又都开了全休的诊断书，他又没舍得休，工长给他减轻工作他也没有服从。那都是因为当时班里人手不够，生产上不去，他不能不管。

去年他在党校学习半个月，有好几次，晚上还赶二班到车间，和大伙一直干到深夜。这也是他听说那几天人手不够，他心里急的慌，不能不管。

这算管得宽吗？不，他管得还要宽哩——都管到兄弟车间去了。

比方说，并条车间的女工往清棉送回花，棉条筒顺地拖得叮咣响。老张一心疼，就管上了：“俺说同志，拖坏一个筒子多少钱，你就不好抱着走？”

“抱着干啥，又不是个娃儿。”

“哼，这要是你自个的，不是娃儿你也准得背起来。”

“老彪子，俺说不过你……”

细纱车间的女工拖着装皮辊花的大包跑得多轻快！可给老张碰上，说什么也不让通过：“快打起来！年轻人那么爱惜力气，拉破了包皮布不是个浪费？”

“你啥都管，破就破，又不是你的！”

“这，你可想拧啦，要是俺的，你烧了它，俺也不能跟你打叽咕……”

“把家虎……”骂是骂，可一寻思，只能接受意见——本情是嘛，老张不是为他自个呀！这是有事实作证的：

老张为了保管好落物室，先先后后打家里拿来两把锁。谁想，不知哪个工友跟他捣蛋，先先后后都给砸坏了。他没吭声，又去拿最后一把。这回老伴说话了：“咱家不锁门了？”

“你说，是咱家重要，是工厂重要？”

“……我是说，眼下，这玩艺儿可是有钱没处买呀！”

“有处买还用不着家来拿了呢……”

魏玉香没奈何笑笑，任他拿走了。

老张常琢磨：集体的家可比不了个人的家。一人浪费一分钱，全厂五千多人是多少分？一人节约一分钱，能养活多少口人？学过“一厘钱精神”，他却觉得自己落后了：一分比一厘不差远啦？还得提高认识跟上去。

他每天掏洞子，只要发现落物里有一丁点儿好花，也把它拣出来。有人认为家大业大，一星半点的棉花又算个啥？可老张永远不能忘记：小鼻子统治那咱，他在这个厂子挨打挨饿十八年，归终连件囫囵棉袄也没混上呵！

在车间里，老张设了个节约箱，什么螺丝帽、螺丝垫、铁钉、齿轮的……零七碎八，什么都有。这都是保全修机时拉下和扔掉的。老张就象个拾破烂的，什么都当宝贝拣起来，精心在意地保存着。天长日久，积少成多，谁需要个什么小零件——特别是夜班没处去领——都向老张要。慢慢地，他的“百宝箱”，就成了救急的“供应站”。

有一天，老张下班回家，一进门，看见两个上小学的儿子正高兴地摆弄着一堆废铜旧铁，看样子足有三十来斤，跟自己收藏的那些一模一样。一问，是孩子们在前边垃圾堆里一点一点拣来的。老张心疼死啦，暗想：有些年轻人太不懂过日子，不管有用没用，什么都随手一扔，日积月累，给国家造成多大损失！这不提个意见还行？

这时，大儿子胸有成竹地说：“咱想把这些卖给收废品

的，行吧，爸爸？”

二儿子得意地接着说：“爸爸，你看，这能换好多钱，买不少本本和铅笔……”

老张斩钉截铁地说：“不行。这是工厂的东西，等爸爸明天上班带回去。”

“这是咱哥俩拣的呀……”

“拣的也不能卖，这不是废品。你们明白不？机器上少个螺丝钉也开不动呵！”

二儿子不吭声了，眨着小眼睛想心事：昨儿跟爸爸要钱买文具，爸爸说要等下星期开饷。……大儿子知道爸爸的意见没法违抗，惋惜地说了一句：“白费劲啦！”

做爸爸的一听就来了火，提高嗓门训开了：“啥叫白费劲？你简直没长心！你忘啦，你去年那场病是谁救活的？不亏党，不亏工厂，还有你小命！可你给工厂干这么点事儿就觉着吃亏了，小小的人儿就这么大的私心……”

大儿子慢慢低下脑袋，眼圈红了：“爸爸，我错了！以后……”

“以后咱哥俩有空儿还去寻摸……”二儿子接着哥哥的话茬说：“拣来了，学你送给厂子，爸爸，好吗？……”

农历除夕，本是我国传统的节日。特别是解放以来，那苦乐不均的日子一去不返了。年年三十晚上，家家户户灯火辉煌，到处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真是举国同庆的好日子呵！在这欢乐的时辰，谁不想跟妻儿老小一块儿送旧迎新，吃

顿团圆饺子？可老张却一连九年是独个儿在车间里度过的。

年年是这样：还没等核计假期值班的名单，老张就抢先报名：“三十晚上俺值班。”看他那性急劲儿，就象这好事儿生怕别人抢去似的。他说：“三百六十天才赶上个年，青年人，父母兄弟、老婆孩儿的，早就盼着过个团圆年啦，再说，还有刚有对象的、家在屯下的，轮上谁值班，他人在厂，心也未必安生……”就这样争着抢着，年年除夕值班的任务，就被老张一个人包下来。他明明知道，自己的老婆孩儿也是多么盼着一家人在那温暖的小窝里过个团圆年哪，但他想的不是自家的欢乐，而是工厂的安生，别人的幸福。有人说他是个“老雷锋”不算过分吧？

值班就值班吧，大过节的，连机器也休息了，可老张还是闲不住，他的心不让他休息呀！春节假期长，梳棉机的大“锡林”老不运动，很容易反潮，“针布”生了锈可不是闹着玩的。一想到国家的财产，产品的质量，老张哪还坐得住？什么困呵累呵，年哩节哩早抛到九霄云外。他从第一台梳棉机开始，不歇气、不停脚，把一百八十个大滚子挨排搬转半个圈。“锡林”在机器上转，人在车间里转……转呵转，转得他头发晕，眼发黑，筋疲力尽，身子一歪就会栽倒；但他坚持着，坚持着，直到全部转完，他才软软地坐下去。汗，象洗了个澡；心，也象洗了个澡——好舒畅呵！

可是老张给自己安排的任务还没完呢。

假期后，头一天生产，班前准备工作是紧张的。单说今年吧，今年头一班轮到甲班开电，可乙班的老张天不亮就赶

进厂，一看组长老董先到了，他还有点抱歉呢。他把大衣一抡，就和老董挂起“大砣”来（一对大砣四十斤呵）。挂完一百四十六对“大砣”（这是准备开动的机器）以后，甲班来上班的，乙班、丙班来协助的，才陆陆续续走进车间，“噢，好家伙，真麻溜呵！”好象谁也没有料到他们来得这么早。过节嘛，领导上又没安排协作任务。其实，这有什么稀奇，不管是哪个年，哪个节，也不管该着谁的班，假期后他们照例是提前两小时来到车间。挂“大砣”、挂大皮带、检查机器。常常老董忙别的，老张干脆一个人包干。直到上班的人来齐，他帮着上好“花卷”，机器正常运转了，他才放心地离去。

老张那颗心，只有党和毛主席，只有国家和工厂。他念念不忘的是过去的苦今日的甜。从爷爷那辈算起，老张家就讨过三辈饭了。“小鼻子”时代，他在这个工厂受的那些饥寒辱骂，挨的那些非刑拷打，什么时候想起来不咬牙切齿？哪一天不想砸死那群恶狼、烧了这座活地狱？那血泪斑斑的日子呵，老张父母兄弟……一家七口七个劳动力还免不了饥寒交迫。可现在老张一个人就养活了七口之家，不缺吃，不少穿，一家人欢天喜地，生活过得挺幸福。他又怎能不感谢党、不爱这个社会 and 工厂！他的生命是党给的，他又怎能不把全生命献给自己的党！如果有谁怪老张“管得宽”，那么老张马上就会说：“我觉得俺管得还不够宽呢，还应该管得更宽些。”

自然，如今怪老张的人是找不到了。

现在人人都说：“老张越老心越红，不愧是个红旗手！”

老张却摇摇头搓搓胡须谦虚地说：“红啥，差远去啦。还得好好念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跟雷锋学习才行哩。再说……”可是话犹未了，这老头儿又冒炮了：“再说，俺这属洋火头的坏脾气，非得彻底革掉不可……”

1964年3月金州

“我最亲最亲的人！”

——一个真实的故事

听说新城子区要发大水，住在大丁泡的宫大嫂说什么也不相信，她摇着脑袋跟动员她搬家的村长讲道理：

“咱堡子地势洼，三年不上水就是造化，可多咱水也没漫过炕沿呵。我就不信，我四十来岁的人赶不上你三十来岁的人经验多？”

村长说：

“大嫂，早先的皇历看不得，今年可比不得往年，今年的雨水大，水势急，山洪一下来，多高的坎也挡不住，别说你的老经验啦。不然，政府怎会动员得这样急，大嫂，你不信现在的政府你信谁？还是赶快躲一躲吧？”

村长说到末了，几乎是用恳求的口气了，可是，怎么也说不动宫大嫂的心，她说：

“故土难离，破家值万贯，我那盆盆罐罐、箱箱柜柜可怎么办？我那猫猫狗狗、鸡鸡鸭鸭可怎么办？你愿意搬你就搬吧，少来跟我磨牙，你八抬大轿也休想把我抬走！”说着，把两条腿往炕上一盘，表示她坚决不走的决心。那神气，好

象村长真会用八抬大轿把她抬走似的。

村长累得满头大汗，急得直搓脚，他已经在村里动员两天了，向宫大嫂这样的人可遇到不少，他还是第一次碰到这样难做的工作。宫大嫂是个有名的“顽固”，性子又别扭又火爆，村长知道再劝也是白搭工，任务紧急，只好先去动员别家再来影响她。

傍黑天的时候，宫大哥顶着大雨从区里回来，说情势紧急，村村都在搬家躲大水。宫大嫂这才有点急，可是她还宁死不肯走，宫大哥气得直瞪眼，跟她吵了半天也没用，末了，她一赌气狠了狠心说：“你怕喂王八，你就带着大小子走，我和两个小崽留下来看家，看大水把咱娘三个漂到哪儿去？”

宫大哥要把三个孩子全带走，宫大嫂死也不放，她说：

“你让我们母子分离可不中！咱娘三个死也要死在一块！”两个小崽是她的心尖，她把他們搂得紧紧的。

宫大哥没办法，只好不放心地带着十二岁的大儿子冒着大雨走了。

雨越下越大，满街乱哄哄的，有的在忙着叠坝，有的人忙着搬东西。一会儿一个传说，都是些不平常的消息：有人说，大河水头好几丈高，要不了两个钟头就要淹到大丁泡；有人说，好些村子已经泡在大水里，连房子都漂走了。村干部满街动员大家躲水灾，嗓子都喊哑了。宫大嫂再也沉不住气了，满处打听丈夫儿子逃没逃出去。突然，又传来个最坏的消息，警锣敲得震天响，说是大坝决开十几丈宽，水已经到了五间房，很快就要漫过来了。宫大嫂一听，马上嚎啕大

哭起来，她算计宫大哥这时候正走到那地方，一定叫大水给漂走了。她在绝望中想到一个七岁、一个五岁的两个小儿子，她想，丈夫和大儿子没了，无论如何也得给老宫家留条后，万一大水淹上来，两个小的可不能再糟蹋在水里。因此，当村干部又来催她逃难的时候，她便一狠心把两个孩子往村干部怀里一推，就抢天呼地地坐在院当心哭了起来。

村干部顾不得自家老婆孩子逃没逃出去，一手牵着一个哭叫着的孩子就奔村北的黄土冈上跑。可是，这时大水竟象一堵城墙般排山倒海地漫过来，白茫茫，雾罩罩，看不见边，望不到岸，滚滚浪涛打着急漩，带着冲杀似的吼声，只一眨眼的工夫，整个大、小丁泡就变成了汪洋一片。人的哭喊，畜的嚎叫，搅混着墙倒屋塌的巨响，把宫大嫂吓得魂都飞了，只怨不听政府的动员、村长的劝告，现在是悔不及了。她挣扎着爬到一棵老槐树上，解下裤带把自己的腰捆在一根粗大的树枝上，随后可着嗓门向着无边无岸的汪洋拚命呼唤丈夫和孩子们的名字。可是，回答她的却是越涨越高的无情洪水。

她的声嘶了，力竭了，水已淹上了老槐树的枝桠，宫大嫂的下半身整个泡在水里。她绝望地昏了过去。

当战士老马和老王划着救生的小船来抢救的时候，才发现了她。他们把她唤醒之后，她却又哭又叫，说什么也不肯上船。她绝望地说：

“孩子他爹和三个孩子全让大水冲跑，我一个人还活着干啥，让我跟他们一道去吧！”说着就往大水里冲。老马、

老王一面掌握着被急浪冲击得摇摆的小船，一面安慰她说：

“你的丈夫和孩子全救上来了，赶快上船吧。”

“真的？”

“真的。他们都上了前面的大船，还是你丈夫告诉我说你这一带，我们才划着船来的。”

宫大嫂虽然半信半疑，到底被老马、老王连劝带拉地架上了船。她在小船的颠簸中还不住地喊着丈夫和孩子。

到岸以后，宫大嫂被安置在一个老乡家里，但她却没有见到一个亲人的影子，主人秦大爷的热诚招待，她一点都不接受，饭也不吃，觉也不睡，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口口声声要她的两个小儿子，对丈夫和大儿子似乎彻底绝望了，不大提起。她有时一个人跑到岸边上转游，拖也拖不回来。秦大爷知道她是因为受了过度的刺激和惊吓，精神失了常态，要想治好她的病，除了把她两个孩子找回来，再没有旁的办法。可是人慌马乱，又上哪里去找呢？再说，这样大的水，人怕是早被水漂走了，想找到尸首多不容易呵！

秦大爷是个热心肠的人，看着宫大嫂疯疯癫癫的样子，实在心酸，便一口气跑到新城子区驻军的团部，他想，神奇英勇的解放军，也许能想出好办法挽救宫大嫂的生命。

解放军某团，三天前才到的新城子，准备进行整训，可是刚刚安好家，就遇到了突如其来的水灾。

那天夜里，雨很大，战士们因为行军疲劳，睡的很甜，团长独自在灯下坐着想问题，报灾的警钟一响，他便立即冒雨跑出来，想亲自赶到区政府探听消息，走在半路，正好碰

上刚由灾区出来到团部求援的区委书记。

“团长呵，老百姓都淹在大水里了……”

“别慌，你赶快想法子找船，我马上集合部队去抢救。”团长二话没说，转身就回了团部，跟政委一商量，马上紧急集合。这时战士们早已闻警起床，整装待命了。

“同志们，我们是毛主席和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我们来自人民，属于人民，为人民服务就是我们神圣的天职。现在山洪暴发，本区各村老乡都淹在洪水里，为挽救无数的生命和财产，我们要发挥高度的阶级友爱，立刻出动，这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会驶船的会浮水的都举起手来，共产党员更要奋勇当先，到洪水里去抢救灾胞……”

团政委的号召还没有说完，全团发出一片响应的回声，战士们的手齐刷刷地举了起来，在昏暗的雨夜里，无数只坚实的胳膊，象整齐的小树林似的，遮住了灰茫茫的天空。阶级友爱和为人民服务的责任感鼓舞着每个勇敢的战士，他们没有一点畏缩，准备和洪水做一番生死的搏斗。

团首长在黑暗中听听响应的声音是那么齐，举起的手臂又是那样多，觉得很奇怪：难道大家都熟悉水性吗？于是政委特别叮问了一句：

“你们都会撑船会浮水吗？”

“会！”

一片整齐干脆的回答。队伍随即向灾区迅速地进军了。他们冒着倾盆大雨，迎着汹涌翻腾的波涛，为了抢救受灾的人民，顾不得自己生命的安危，不会浮水的也下了水，不会

撑船的也上了船，他们在那惊波骇浪里到处搜寻，到处抢救。就这样，他们在街村干部和非灾区群众协助之下，经过两天两夜的积极抢救，终于战胜了水患，大部分灾胞都脱离了险境。战士们有的感冒了，有的犯了疟疾，更有个别的被急流卷走。

秦大爷来到团部的时候，部队已经是两天两夜没有吃饭和休息了，而他们仍在继续着未完的救灾工作。秦大爷见到参谋长，就把宫大嫂的事说一遍，参谋长问明白宫大嫂两个孩子的名字、年龄和遇难的地区后，立即指派最勇敢、最有办法的老马和老王到灾区去寻找。

老马和老王接受了这个艰难的任务去了一头晌，却空着手回来了。参谋长严厉地问：

“孩子没有找到吗？”

“找到了，”老马胆怯地回答，“可是他们不肯上船，我想，必须让他妈妈亲自去接才行！”

接着，老马报告经过说：在一个土冈子上的避难的群众里，找到了他们，可真是两个倔强的孩子，见了生人竟连哭带藏，当强制把他们抱上船的时候，两个一齐喊妈妈，哭得几乎要断气，同时，水流又深又急，孩子们拼命蹦跳，力气满大，万一在船上出个岔子，岂不更糟？

“可是，那妇女疯疯癫癫，怎么能去呢？”参谋长低下头在想主意。

老马也觉得连两个小孩子都应付不了，未免有辱英雄的光荣，于是，把两脚一并，来了个立正姿势，坚决地说：

“报告参谋长，让我们再去，我们保证把两个孩子安全地接来，请你下命令吧！”

参谋长看了看老马严肃的脸，满意地点头微笑了。

这时，通讯员捧了两个大香瓜和两个大馒头走进来。这东西原来是参谋长准备慰劳老马、老王的礼物，他估计他们回来之后，一定是又饥又渴。可是，现在他灵机一动，主意变了。他把香瓜和馒头送到两个人的手里郑重地说：

“再去。把香瓜和馒头送给两个孩子，就说是他们妈妈给他们买的，无论如何想法把孩子接来，我将设法动员他妈妈到岸边等他们。”

随后，他命令通讯员取了两个大窝头和两行军壶的开水交给老马和老王。

香瓜和馒头对又饥又渴又想妈妈的两个孩子果然有不可想象的吸引力。老马和老王到了土冈边只喊了几声，孩子便跑了出来。这次孩子见了他们也不象前回那样怕了，特别是听到给他们买了吃的来，妈妈在对岸等着的时候，四只可爱的大眼睛闪着那么明亮的希望之光。老马和老王哄了他们一会儿，他们竟上了小船。乘着孩子们吃瓜的时候，老马和老王就连忙把船划离了岸，用飞快的速度拨动了桨，向着对岸划去，好不容易才哄住时时准备哭闹的孩子。船行到可以望见对岸的人影时，老马告诉孩子：

“看吧，那不是你们的妈妈？”

孩子们果然看到岸上溜来溜去的宫大嫂了，四只小手象蝴蝶那美丽的翅膀一样，一齐张开来呼喊妈妈。

神志不清的宫大嫂听到孩子的呼声，好象突然受了一惊，连忙俯身向水里搜寻起来，好象她的孩子在水里似的。直到两个孩子抱着她的大腿哭叫时，她才开始清醒，接着孩子又哭又笑，心呀肉呀地拼命地亲嘴，亲得两个孩子的小脸蛋上出现了一个个红印子。

完成了任务的老马和老王，象打了一次胜仗似地感到光荣和兴奋。他们亲昵地看着两个重新见到了母亲的可爱的孩子，心里有说不出的喜悦。周围的群众都用热爱的目光向他们致以感激和尊敬，有的竟被感动得直擦眼泪。陪着宫大嫂来的秦大爷湿着老花的眼睛，颤动着嘴唇抓过老马和老王的手说：

“同志，你们真是太好了，真是太……”他激动得说不下去了。老马和老王怪难为情地说：

“没有什么，我们是人民的军队，这是我们的责任。”

这时，忙乱了半天的宫大嫂在大家没有注意当中，竟忽地向老王笔直地跪了下去，接着连连磕起响头，磕得满头泥土，口里还不住地喊：

“恩人哪，毛主席、共产党，我的恩人哪！”

老马和老王惊慌失措地把满脸泪痕的宫大嫂搀扶起来，刚待要走，宫大嫂怔了一下却又把他们拉住，沉着脸责备道：

“你们救人不救到底，送人到家，我要我的男人和我的大儿呵，天，没有他们我可怎么活？你们说说看……”说着又神志不清地嚎哭起来。

秦大爷把胡子一撇，生气了。

“你这个妇女是怎么回事，真是得寸进尺，你还有个知足的时候吗？难道说人家同志们就为你一个人活着？”

人群里也在嘀咕起来，都觉得宫大嫂太不知好歹，可是老马和老王却没有一点这样的感觉，连忙安慰道：

“大嫂，你别哭，我们一定把你丈夫和大儿子找回来，你放心好啦。”说着两个人便急急向团部走去。

团首长听了老马的报告，立刻打电话向各个救济站询问查找，结果出乎意外地在黄家村站查到了宫大哥父子的下落，原来他们在发水当天就被部队抢救出险了。

老马把宫大哥父子接来的时候，宫大嫂正在岸上溜来溜去。她一手牵着一个孩子，嘴里不知叨咕些什么，突然看见丈夫和儿子，似乎不认识了；她用怀疑的眼睛看了老半天，才大梦初醒似地扑了过去。老马怕她又要磕头，悄悄地躲开老远。

宫大嫂这次没有嚎哭，也没有狂笑，她眼里闪着狂喜和感激的泪光，完全清醒了，自言自语地说：

“我活了四十来岁，腿硬得象根棍，连祖宗也没拜过，这回我可要多多拜拜毛主席……”一边说着，一边庄重地跪了下去：“毛主席、共产党，我的救命恩人，你真是我们最亲最亲的人，最亲最亲的人哪！”

她的声音里带着颤抖，响遍了整个大地，是那样欢欣，激动着每一个人的心，从远远的山谷里、从汪洋的大水中响着明朗的回音：

“毛主席……共产党……我最亲最亲的人……”

1951年8月28日夜

平壤七日

1. 不屈的城

天亮了，十几个钟点的夜行车，不要说开车人，就是坐车的人，也已经是疲惫不堪了。但为了防范空中的袭击，司机同志却不得不挣扎着熬红的眼睛，驾驶着开足马力的嘎斯车象箭一样地飞驰。它飞过草原，飞过山峦，飞过青青的树林……眼前连绵不断的景色真迷人哪！几个初次来到朝鲜的青年同志，迷恋于绿水青山，纵使在漆黑的夜里，也舍不得闭上困倦的眼睛。他们对这美丽的土地，一下子就爱上了。

然而，黑夜是可以遮盖丑恶的。纵然在那高不可测的星空之下，一切景物的模糊轮廓，还能辨认得出，就象那：崎岖的山路、陡峭的岩壁、高大的树身以及那闪亮的溪流……唯有美国侵略军的兽行的痕迹，却隐藏在无尽的美景之中，被夜幕遮盖了。直到黎明之后，才暴露在青天之下：那断瓦秃垣，那血染的废墟，使每个人沉重的眼皮，由于吃惊和惋惜而减轻了分量，再也顾不得瞌睡了。

“多么美的山河，竟被糟蹋到这种地步，要不是亲眼看见，是绝难想象的！”

没有一个人不感到心疼，没有一个人不感到愤怒的。当车子驰进平壤市的时候，人们的倦意已经完全消逝，留在记忆里的是难忘的仇恨！

两年来，我曾荣幸地数次访问了这座屹立在废墟中的英雄城市。它用高贵的情操感召着我，它用美丽的灵魂吸引着我，它使我对它产生了说不出的敬爱，——一次比一次更深、一次比一次更强烈的敬爱。它使我深深确信，虽然它是处在不断地被蹂躏中，而它的情操却是任何暴力也无法破坏，它的灵魂更是任何暴力也无法毁灭的。

春天的平壤，是一个生气勃勃的战时首都。正当大地复苏的时候，我来了，我又带着无限的敬意和热爱来了。那时候，使我感到温暖的不是春天的太阳，而是平壤人民走向新生的伟大气魄，是这城市的繁荣气象。

被摧毁的市场，又重新装饰起来，熙熙攘攘的人群，川流于五光十色的货物丛中；街头的店铺，照常开业了，人们在那创伤累累的石砾堆中，搭起了临时小屋，摊床上摆满了崭新的日用品，在供应着市民的物质需要；影剧院经常挂出客满的牌子，在供给着市民的精神食粮，尽管还有些供不应求，人们却是在尽着最大的努力，不使人民陷于精神的饥荒。十字路口上，站着气宇轩昂的交通警察，他们在聚精会神地指挥着往来不断的车辆；从许多广播机的大喇叭里，放出鼓舞人心的歌曲；到处在修建，到处是紧张的工作和劳

动……一切，都是那样地井然有序。虽然高空经常有敌机的嗡嗡声在威胁着这繁荣的都市，但人们却照样地按照自己的计划安排自己的生活和工作。走路的人照样迈着匀整的步子，安安稳稳地走着自己的路；工厂的烟囱照样是烟柱冲天；机关和学校更从不停止它们的活动。疯狂的敌机，你发疯吧，你撒野吧，我连睬也不屑去睬。我们英勇的神鹰，会让你碎骨粉身的。

果敢、刚毅、顽强不屈的战斗精神，已经成为朝鲜每一个男女老幼的生命支柱。这支柱顶天立地，越来越巩固，我又一次来到平壤的时候，它使我的这种感觉更深刻了。

今天，从面貌上看，平壤是不如春天那样繁荣了。敌人的疯狂轰炸使平壤流遍了人民的鲜血。

我们的车子开进平壤时，刚刚天亮，虽然是创伤满目，街道上却并不冷清。人们从四壁空空的屋架中走出来，从阴湿的地洞中走出来，从路旁的草堆中走出来……在飒飒的秋风里，穿着菲薄的单衣，又开始了一天的生活和工作，女人们顶着碎掉半截的罐子去汲水，老人们拿着烧焦了柄的扫帚在清扫街尘……他们生活上的艰苦用不着来描述吧，那是不难想象的。然而，他们的脸上没有愁容，他们的眼睛，闪着希望的光，那永远向上的光呵，使你意识到他们好象压根不曾遭到任何劫难似的。你从那躺在路边的孩子酣睡的小脸上，从母亲们愉快劳动的姿态里，你怎么也找不到悲观恐怖的表情。

在这座城市里，我们又巡礼了七日。当和它告别的时候

候，我的旅伴费尔顿夫人又感慨又兴奋地说：

“平壤已经改变了。”

“不，平壤没有变，它还是那样坚强不屈地屹立着，你说它哪儿变了呢？”我没有一下子理解她的意思，也忘记了从去年国际妇女调查团来时算起，她离开平壤，已经十五个多月了；而我则是四个月以前又来过的。

“别急，亲爱的，我们的看法基本上是没有分歧的。”她笑了笑，随即郑重其事地说下去，“我所说的变，并不是质的变，而是量的变。你还记得吧？去年我们来到朝鲜的时候，调查团的团员们，看见敌人暴行的遗迹，几乎怀疑起自己的眼睛（当然，你是例外，你看得太多了）；而当我们把报告书公诸于世的时候，世界上善良的男女，简直就不敢置信。那种疯狂的破坏，实在是打破了人类有史以来的纪录了。大家认为不但空前，也必将绝后，谁能想象还会超过这种可怕的程度呢？可是，看看今天的平壤吧，美国侵略者简直是企图毁灭整个朝鲜民族了！这就是我所要说的改变的一方面。”

“但人民并没有屈服呵。他们的生活，不但继续着，而且更有秩序、更富生气了。他们那种非凡的英勇刻苦的精神和对胜利的信念，也越来越鲜明了……”我说。

我的旅伴频频地点头：

“是的。但是今天，这种勇敢已经加上了一种新的品质：镇定的品质。尽管敌机在不断的轰炸，而人民的生活不仅依然存在，而且在向前迈进着，这就是我所要说的第二方

面的改变。我可以肯定地说：美国侵略者是彻底失败了。细菌战的反效果，很足以说明这一切。”她所说的反效果，指的是中朝人民军队和人民为了抵抗细菌战，进行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的有组织的防疫运动，不但消灭了疫病连往年容易发生的一般性的流行病，竟也根绝了。

我完全同意她的见解，如果敌人想知道他的兽行获得什么成绩的话，那么，就让我告诉他一些小事情吧。

2. 劳动带来了希望

夜里，不知敌机又在什么地方大逞淫威，炸弹震得我们的门窗象有人猛敲一样。我们的房子，无疑的是抵抗不了轰炸的；但我们却睡得格外香甜。虽然也偶尔被震醒，但翻身又睡熟了，在朝鲜的土地上，随时都有灾难落在头上的可能性，但我们生活在朝鲜人民中间，在任何时候都感到非常安全。这倒不是由于我们的周围有朝鲜武装同志在监视着敌机，也不是由于房子附近有坚固的防空洞，也不是因为有着百发百中的高射炮和空军的保卫；而是被朝鲜人民无比的果敢和镇静深深感染了，使我们平添了不少的信心和勇气。

敌人欠下朝鲜人民的血债实在太多了，太多了。这个用不着我来详细记载，留给朝鲜人民去跟敌人清算吧。我所要告诉美国侵略者的是：这就是你们撒在朝鲜人民心灵上的仇恨的种子；这就是你们在全世界人民面前造成绝对孤立的根据；这也就是你们纵火焚身的引火线，而英雄的朝鲜人民是

永远也不会屈服的。

再看看下面的事实吧：

在一个上午，我们访问了平壤市战时灾民收容所。那是些凿在地面上的坚固的石洞。一些无家可归的劫后灾黎，就住在这些石洞里。洞里虽然潮湿而黑暗，但是，在晴朗的日子里，他们却可以享受充足的阳光。老大娘在太阳底下翻晒着露着棉絮的被褥和烧掉衣襟的汗衫。孩子们有的晒太阳，有的在投铁环或蒙着眼睛捉迷藏。能够劳动的男人和女人，则在拆除被炸塌的房子，有的挥动锹、凿、斧、锯在积极修建。他们就利用那些碎砖断瓦和残余的木料重盖着新房。老人金平山对我们说：

“我们的小家庭，是毁得一干二净了。可是我们又有了个集体的大家庭。感谢政府和志愿军同志对我们的照顾，现在我们得到温饱了。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大家庭建设得更好。”这老人已经五十八岁了，却有着青年人的雄心。

在这个灾民收容所的附近，我看见一个须发斑白的老大爷正向他新搭的洞子顶上抹着最后一层泥浆。当我访问他的时候，他幽默地说：

“我的家早和庄稼一起毁掉了！可是，你看，我又在敌人造成的炸弹坑里重整起家园，三天就把新洞搭好了。”原来他的洞子是利用弹坑盖的。接着他又告诉我另一件事：

“敌人的炸弹可不知是什么原料做的，简直可以做最好的肥料。”他指着左近一片洼地给我看，“那就是一个月以前遭过难的土地，你看，草长的多快！等这个洞子完工，我

计划在那儿种一大片秋菜呢。我敢保证，完全用不着上粪。”老大爷的话，不但表现了他对前途的无限信心，而且是对敌人的生动的讽刺。

朝鲜文化宣传省的高楼，斜对着绮丽的牡丹峰，我四月间来平壤的时候，曾经几次走进这座曾遭破坏的高楼。我们创作组的同志，曾在这座楼里和朝鲜文艺界的同志们联欢、座谈，交流着创作经验，那种热烈的友谊，是永远令人难忘的。现在，文化宣传省已经搬到另处去了。敌人在这高楼附近，投了大量的炸弹，这座楼被炸塌了半边。

在那一片焦土中，我徘徊着，我回忆着……突然，在我的面前，出现了一棵被炸伤的槐树，它的根已经露出半边，树干也弯下了身子。然而，奇怪的是，它竟没有死，不，也许它曾经一度死去，如今却在那密密的枝桠间，在那焦枯的败叶中，又发出了青青的嫩芽。我默默地想：不但是朝鲜人民，就连朝鲜的树，生命力也竟是这样的强。但愿当我再来的时候，这棵不平凡的槐树，已经恢复往日的繁茂。

在去朝鲜劳动新闻社的途中，我看见一个农家的老大娘在灌溉一个小花园，这个小花园就在她那所倾倒的破草房窗下。这使我想起了朴正爱同志献给我们的那一大把鲜花，那花儿是那样的鲜艳美丽。她曾经告诉我们，这些花是她自己亲自栽种的。后来我们到她家里去赴宴时，果然看见在她那座被炸过十五次的房子的门前，有一大片盛开的鲜花在迎着太阳微笑。朴正爱同志当时笑着说：

“这就是我耕耘的收获。”

我想这位老大娘正有着朴正爱同志同样的精神。

朝鲜劳动新闻社，是建设在一个比较偏僻的山洞里，我们到的时候，离黄昏不远了。但是，这完全没有关系，反正，天然的光亮，对这黑暗的山洞，是从不照顾的。工作在洞子里的人，要用自己的手创造光明。

洞里边，低矮而潮湿，却有着足够的光亮。而我们还没习惯洞居的人，走进去总不免蹑手蹑脚，有时候，腰板也不敢伸直。可是，一看见在忘我劳动中的工友们，立刻就忘掉这种不必要的担心了。

他们之中，可能有一半以上人的家被敌人毁掉了，而他们的生产效率却比战前更高，质量也比战前更好。排字工人敏捷而认真地拣着铅字，印刷工人全神贯注地掌握着机器……所有的工人都忙碌于轧轧的机器声中。他们挥汗如雨，脸上是一道道的油墨，身上的工作服闪着油渍的光。墙壁上贴着“生产竞赛”、“支援前线”的大字标语。洞子很窄，空气自然不很流通。他们就日日夜夜劳动在这个小天地中，为人民创造着幸福。

主笔李文日同志领着我们参观了整个工厂，那种愉快的劳动气氛使我们始终振奋，在这里如果再去想什么个人的事情，真是太可耻了。

李文日同志的办公室和上海的亭子间大小相似，我们五六个人一走进去，就把整个房间塞满了。而他就在这小房里领导着全社会员工，为朝鲜全体劳动人民输送着精神给养。十万份（战前达二十万份），这在战时的朝鲜说来，能

说不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吗？可敬的朝鲜工人阶级，他们正以创造性的劳动，鼓舞着朝鲜人民的意志，使整个朝鲜北部，充满了希望和信心。这种希望和信心，在和工友的茶话会上，更充分地表现出来了。他们个个精神焕发地表示着决心：为了正义和真理，为了祖国的胜利，为了答谢中国人民志愿军及各兄弟国家无私的援助，誓必付出所有的精力，用不懈的劳动争取世界和平。工友代表说：

“希望把我们的决心带回给中英两国的人民，特别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弟兄。我们要向他们看齐。我们要创造一个和新中国一样的新朝鲜。”

我们牢记这恳切的叮嘱，在愉快的“新朝鲜之歌”的歌声中和敬爱的朋友们告别了。现在我就把这庄严的寄语，转达给祖国的工人阶级吧。

应该在这里补述的是，劳动新闻社还出版有农民书报，这是一种套色的定期画刊，它不但色彩鲜明，编排也朴素大方。在“广泛开展农家副业”、“为解决战时衣类问题而奋斗”一类的总标题下，展现了农民的生产热忱和农村的新气象。从这里，可以预见到朝鲜农村即将到来的丰饶收成。这一切吸引着我们，第二天我们便到新兴里去访问农村。

我们一进村口，稻田里就有一个四十多岁的农民老远地向我们跑来。他叫金德龙。他跑到我们面前，便热情地伸出了两手，可是，当他忽然发现了手上的泥土时，竟又不好意思地缩回去了。我们热情地把手递给他，他现出朴素的笑容，把手掌向裤子上抹抹干净才和我们握手。是这样一个可

爱的农民，是这样一副动人的表情，真叫人不能不喜欢他。

这个村庄有三百多户人家，前年敌人来时，村里的牛羊猪狗全被杀光，吃不了的鸡鸭便一齐装车运走。更甚的是打人、拉人、杀人，没有一家能够幸免灾祸的。去年稻田里落过很多次炸弹，损失是不可计算的，入秋，洪水又助桀为虐，庄稼全冲跑了。这一切的天灾人祸使去年新兴里的丰收化为泡影。

“依靠兄弟国家的援助，这口气才算缓了过来。”老农民金戴炫闪动着感动的泪眼说，“今年苏联人民送白面，中国人民送杂粮，算是把地种上了，看起来，今年的丰收有了九成指望了。”

是的，假如秋收前不发生什么灾害的话，新兴里将有一个了不起的丰收。在我们目力所及的地方，那不是一望无垠、苗壮肥美的油绿色的田野吗？

除了个别被炸的土地而外，新兴里没有一片荒地。依靠大家起早贪黑的劳动，男女合理的互助分工，凡是能长庄稼的地全种上了。为了积肥，每家还喂了一口肥猪。

“农村中，妇女是主要劳动力。”新兴里民主女性同盟委员长用昵爱的眼光望着在座的妇女们自豪地说，“为了供应战争的需要，妇女们都尽量地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她们一面抚养孩子，一面耕种土地，另外还做些支援前线的临时工作。但耕地的面积却比战前还大。”

这丝毫都不是夸口。她自己虽然担负着组织妇女的重大责任，抚养着四个孩子，还种了六千坪地。她正是劳动妇女

的典范，其他的例子也就无须再举了。

新兴里农民都很有信心地等待着一个美满的丰收。现在，他们的愿望早已实现了吧？

3. 她们不计较个人忧患

我真感到荣幸，今天出席妇女座谈会的全是些了不起的人物：工业的劳动英雄，农业的生产模范，还有妇女工作者代表……她们正面对着重重苦难，为祖国的自由解放，贡献着全部精力。在旧社会，她们全是些被压得透不出气来的弱者，解放后，她们却成了社会的中坚。特别是民族多难的今天，她们起着几乎和人民军一样的作用。她们的生命力如不竭的源泉，国家需要多少，就付出多少，国家需要她们干什么就干什么。哪怕是刀山火海，她们也毫不畏惧和退却，勇敢无私地冲向前去，哪怕是日以继夜，她们也不辞劳累，只要她们做的对国家对人民有好处，她们是什么都做，什么都甘愿牺牲。（这方面的事实，我在《我要歌颂她们》一文中已经介绍了很多，这里不再重复了。）今天我面对着的，就正是这样妇女的典型人物。

比如出席过国际纺织会议的朝鲜纺织英雄唐云实，这个有着健康美的姑娘，脸上还保留着可爱的孩子气，可是她从1945年参加生产以来，就得过大小奖励32次。战争爆发以后，她的生产纪录提高到百分之四百五十，去年两个月就完成了全年任务的百分之一百四十九。这样惊人的生产能力，仅获得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英雄称号，我总感到还嫌不够。然而，除了这称号，还有什么更能代表荣誉、更崇高的称号呢？

她不但自己生产好，还为国家培养了好几十名技术超人的纺织女工。但，她并不以为骄傲。她非常谦逊地说：

“我不能满足于这一点点成就，今后还要加倍努力，才对得起人民给我的荣誉……”

她那朴素的语言和笑容，不能不使人深为感动。这笑容，四个月以前就留在我的记忆里了。春天，我曾到过她们的纺织厂，听过她的谈话，也参观她的车间。她们厂房被炸的痕迹，还残留在车间的窗外。敌机不时地掠空而过，而这个庞大的工厂，是不可能全部迁入地下的，她们就是整天冒着死亡的威胁，用青春的生命做代价，去换取生产的胜利，争取卫国战争的早日凯旋。没有她们的及时供应，前方的胜利，也难免要推迟一步的。

长镇里的女性同盟委员长高锦顺，是一个聪明精干的美丽少妇，她有着一副令人起敬的清瘦的脸。见了远道而来的外国姊妹，就使她想起了惨痛的去，在感情不能控制之下，她站了起来。她说：

“我是一个三个孩子的母亲，一个被夺去了丈夫的女人。但是，我一点也不悲观，我有着坚强的信心，要用胜利来回答敌人！”

接着她就讲了一个使人落泪的斗争故事：

她的丈夫是东平壤机械制造厂的厂长，前年冬天随厂撤

退，走到半路就被敌人逮捕了。高锦顺知道这消息以后，就到处打听，终于被她打听到了。她跑到监牢去看他。

“要我送饭来吗？”她问她的丈夫。

“好吧，早点送来。”他又叮咛着，“早点，越早越好！”

她没有顾得吟味一下她丈夫的叮咛，也没有顾得谈些要紧的话，就连“再见”也没说一声，便赶回家去取饭，她想，他一定是饿急了。

可是，意外的事却发生了。当她把饭送来的时候，在牢里竟找不到她的亲人了。正在找得眼睛发花的时候，突然听到不远处一声枪鸣。这时，她才意识到：丈夫的叮咛，分明是他死亡的预感，这枪声，不正是向她诀别的信号吗？手中的饭罐一下子就滑到地上了，她不顾一切地跑向枪响的方向。于是，她看见了一具血泊中的尸体，她正要扑过去向他道一声“永别”，可是凶狠的国防军竟把她逮捕了。

她挣扎着，叫骂着，不肯在暴力面前屈服。最后，她愤怒地斥责道：

“我丈夫所做的斗争是为了祖国的解放，并没有侵犯任何人，难道这也有罪吗？你们为什么把他打死？”

一个国防军狂吼着说：

“就为的他参加了劳动党！不用说，你也是个积极的劳动党员，我要叫你和他到地狱里去团圆，来，把她打死得啦！”

这时，高锦顺想到了家里的三个幼小无依的孩子。他们

也许饿坏了，他们也许喊妈妈了，倘如鬼子来欺侮他们呢？可是，眼前摆着这样的深仇重恨，她能够向敌人低头吗？监视她的又是这样凶残的野兽，她能够逃得脱吗？她咽下眼泪，狠了狠心说：

“打死就打死吧！人民会用同样的刑罚来回答你们的！”

想不到从旁边走过来另一个国防军，懒洋洋地说：

“她是个女人，什么劳动党不劳动党的，拉倒吧，留着她有用处。”就是这一番话使她得到了解救，虽然那话并不是善意的。

她回到家里，孩子向她要爸爸，她真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她是多么希望再看丈夫一眼哪！于是，第二天她又带着孩子跑到刑场去。尸首已经不见了！她又跑到美军本部索讨丈夫的尸首，敌人理也不理。只好再去寻找。找了不知有多久，才给她找到一座新坟。她一连挖出了七个人民军的尸体，那可能是掉了队的。

说到人民军，高锦顺突然哭了，哽咽了半天，说了半天说不下去。这种高贵的阶级感情，使所有人的眼睛都湿润起来。

“挖到第八个，才看见我的丈夫。”她止住眼泪继续说，“孩子看见爸爸惨白的脸和血染的胸膛，哇的一声便哭起来。……我连忙把人民军的尸首埋好，末了才埋了我的丈夫。随后，我便被美军捕去，关了十天。”

经过这样不幸以后，高锦顺并没有瘫软下来。她把眼泪

咽到肚里，把仇恨记在心里，组织妇女，开始了积极的增产支前工作。

今年，她领导着全村妇女用镢头刨地，敌人看见她们这样努力更加眼红，便在田里丢下很多炸弹。高锦顺又立刻发动妇女埋炸弹坑。张永彬就在埋坑时被敌机扫射死了。她咬了咬嘴唇说：

“张永彬死的很惨。但我们并没因此悲观失望，为了告慰死者，我们更积极地完成了埋坑任务。现在庄稼长得非常肥壮。”

不久以前，高锦顺被群众选为劳动模范；6月28日，金科奉委员长以三级国旗勋章授予了她。

听完了这故事，我们的感情都很激动。费尔顿夫人说：

“我真不知怎样安慰她好了。不过，血是不会白流的。她丈夫的死，也就是为了和平。英国人民听了这样的事，将对美帝国主义更加仇恨！我一定把她讲的每一个字都带回去。”

我想，她是不需要什么安慰的，她懂得如何处理她的感情。

会开的时间很长，天早黑了，不能每一个人都轮到发言了。但，不说，我们也知道，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唐云实，每一个人都是高锦顺。在北朝鲜广大的国土上，有着成千上万的唐云实和高锦顺型的妇女，她们为祖国赢得了胜利，为妇女获得了光荣。她们的心目中只有祖国和胜利。我还没有看见几个妇女为个人的忧患而垂头丧气呢。眼前的崔宝奎就

是最好的例子。

她是西城一里的劳动党支部书记。能够和外国姊妹们相聚，她感到特别高兴，她是刚刚讲完她的斗争史的。当座谈会结束时，她兴奋地站起来说：

“让我唱个‘和平战士歌’，来欢送我们的朋友吧。”

在掌声中，她就唱了起来。她虽是年近四十的妇女，声音却是那样地年轻，正象她斗争的精神一样。她一家二十口人，有十八口惨遭杀戮了，现在只剩下她和一个十五岁的儿子。她讲的时候没有流眼泪，而她的歌声，又是那样活泼愉快，引得所有的人都跟她唱起来，其中还有个被炸掉右臂的妇女。

整个房间充满了美妙的歌声，随着这歌声，好多人离开了座位，跳起朝鲜的民族舞。更有人从瓶里取出鲜花，边舞边唱，随着舞姿把鲜花插在我和费尔顿夫人的衣襟上。那欢快的气氛，简直就象一个庆祝晚会似的。有谁会想到她们每个人都有着一段不幸的遭遇呢？

费尔顿夫人赞美不止地说：

“朝鲜的妇女，真了不起！在她们面前，我感到自己渺小得多了；我所受的迫害和艰苦，比起她们来，太算不了什么啦！”

4. 血海深仇

是一个阴冷的晚上。我们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在平壤

的文化宫剧场，欣赏朝鲜国家艺术歌舞团为我们演出的民族歌舞。让我趁此机会向朝鲜劳动人民致敬吧。他们曾以顽强的劳动与惊人的智慧建筑了这个辉煌的地下剧场。根据战时朝鲜的人力物力及处境来说，这个伟大的剧场，真可与苏联的地下铁道媲美了。

这个剧场是建筑在一座高楼的地下。这高楼早已被炸成残废，很难修复了；可是，一个新的建筑物却在它的残肢下很快诞生了。正如埋在地下的一粒种子，它先在土中生根，不久就会从地面冒出新芽的。每当我步下那一级级平滑的石阶时，就禁不住要数着它的层数，那步步进入安全的石阶，那一百二十四层石阶呵，在这样被疯狂蹂躏的土地上，我们还能够享受到这样的幸福，是必须首先感谢伟大的朝鲜人民的。每次我坐在这个剧场里，都不禁骄傲地想：当美国飞贼从天空散播恐怖的时候，他可曾想过在这块神圣的土地上，还有着摧不毁的钢铁堡垒吗？这样坚不可破的堡垒，在北朝鲜真是比比皆是。它们正是朝鲜民族意志不可轻侮的化身。嗜杀成性的侵略者，你发疯吧，你横行吧，你曾经派来过千万架飞机，带来了亿万吨钢铁，而这个民族意志的化身，却依旧在高歌翩舞中昂然挺立。刚才你来屠杀大同江岸善良的居民时，你可曾听到从这里发出去的抗议的歌声？

当我们从地下剧场走上来的时候，刚刚落过大雨，地上流满了雨水，天空还弥漫着阴云。司机同志愤怒地说：

“雨也成了美国强盗的帮凶！”随后他便告诉我们：一小时以前，南平壤郊区又被炸了。敌机刚走，大雨便落了

来。司机同志不安地说：

“大雨也许可以浇灭一些烧着了的房子，但那有什么用呢？房子反正已经炸坏了。这大雨对灾民不象火上浇油吗？这样冷的天，他们一定冻坏了！特别是受伤的人！”

听到司机同志的话，我们的心也象他一样地愤怒和不安。但感情上的怜悯和同情都是无济于事的。我们必须用具体的行动去揭露敌人的罪行并向全世界公布。因此，第二天一早我们便去视察灾区。

被炸的地方离我们的住处只有三里多地。这是南平壤近郊一个稠密的村庄。它面临着大同江的支流，风景是很美丽的。可是除了一排排毗连的小草房外，就是一片茁壮的庄稼和葱绿的菜田。在它的十里周围，就连一所较近代化的房子都看不见。

费尔顿夫人聚精会神地数着炸弹坑：

“一、二、三、四、五……呵哟，十三颗！”

在一处仅仅不到半公顷的土地上，敌人就投掷了十三颗杀伤力极强的炸弹。据当地居民的初步统计，昨夜丢下的这种炸弹足有两千多枚。

这里，大同江边，有着一道高高的平直的土坎。它是人行道，又是隔开江水和村庄的长狭的堤坎。我想，那大概是为了防汛而用人工建筑的。在这个土坎上来往的是和平居民，土坎那边，生活着的是勤劳的男女。今天，这土坎有好多地方被破坏了，而那些勤劳的男女，就在昨夜里，竟遭受了突然的侵袭。村庄被毁了，居民死的死，伤的伤。他们用双

手辛勤缔造的家屋和农作物，都变成了一片焦土。有一些倒塌的房子还在冒烟，人们正在挖掘里面的尸体。有一些横在田野里的死者还没被掩埋，因为救护队要先照顾受伤的人。

土坎上往来着忙碌的人群，他们正在把装好的尸体运去掩埋，把伤者护送到医院里去。有一些轻伤的人不愿给政府增加负担，自己挣扎着走向医疗所。我站在高坎上，看见一个妇女的背影，她怀里抱着婴儿，衣上染满血渍，她面向着被炸倒的房子安静地坐着。她一动不动，一声不哼，那种安静的神气，就象在晒太阳。她怎么没走开呢？是留恋这被毁的家吗？是舍不得她的菜地吗？不，人们告诉我，她下肢受了很严重的伤，可是，为了先使别人早些得到救治，她自愿忍耐到最后再走。我想，朝鲜是不乏这样善良的人心的。

前面走过来一个表情疲倦的姑娘，她的面孔虽然显得憔悴，轮廓却非常好看，有着典型的东方美。她的左手用一块破布吊在胸前，白色的衣服上沾满了鲜血和污泥，好象从雨夜后的血泊中爬出来一样。金同志问她伤在哪里，她安详地答道：

“不过是两只胳膊受了点伤。”

可是，看起来，她的伤并不算轻，因为血已把她的衣袖染红了。我问她为什么不早到医院去包扎，她依然安详地答道：

“你想，我怎能够呢？我有很多炸伤的邻居，我必须给他们一些帮助呵。”

这就是她为什么满身泥血和表情疲倦的道理。我仔细端

详着她，她说那话时，显得多么美丽，同时，从她的回答里，我更透视了她那比外貌更美丽的灵魂。

一个将近五十岁的老大娘，坐在高坎的边边上，她挺直着腰板，两手抱着膝盖，眼睛直视着被炸的远方，象跟谁吵过架似的怒气不息。我请翻译同志问她家里的情形，她的两眼依然直视着被炸的远方，全身一动不动地气冲冲地说道：

“家吗？昨晚临睡时还是好好的……”

“现在呢？”

老大娘用下巴指了指堆在地上的草房残骸，苦笑着说：

“还不是跟大家一样！”

“伤了人吗？”

“房子塌了还有不伤人的？”那口气好象在埋怨我多此一问似的。随后她就告诉我们，她十六岁的儿子两腿炸断了，被邻人把他抢救出来，算是保住了命。可是老大娘连看也没多看一眼，现在他可能还悄悄躺在邻居的破房架里呢。

我奇怪老大娘为什么不去照看她的儿子，却远远地躲在这里。她把有点秃了的眉毛一扬说：

“那有什么用呢？反正是残废了，总会有人把他送进医院去的。我应该做的事情比这更重要呵。”她把牙齿咬得连头也震动了，但却没有泪，也没有悲哀的表情，她的悲哀已经变成了深仇重恨，变成了斗争的决心和力量了。

向导同志解释道：

“妇女们常常是这样的：她们的家刚被毁掉，甚至死伤了亲人，而她们却很快地组织起来去抢修被炸断的公路。她

们总是用积极的支前行动来报仇雪恨的。”

我没有更多地问下去。老大娘已经沿着江边走去了。我想她正是这样妇女的代表人物。

再走过去，是一大片枯萎了的菜田；再走过去，又是一片倾倒的禾苗；再走过去，又是血，又是碎了的锅碗瓢盆、小孩的玩具……

这从天上掉下来的灾难，在北朝鲜的土地上，已经成了家常便饭，用不着太多的描述，人们会想象得出来的。但是，想象终归不如亲见。当我们凭吊完这一片灾区之后，费尔顿夫人蹙眉摇头地说：

“这里离有一点军事价值的建筑物也是很远很远的；敌人如果把这儿也说成了军事目标，简直是弥天大谎！”敌机又在灾区的上空盘旋了一周。今天，这已经是第二次了，它们大概是来侦察它们暴行的成绩的吧？

费尔顿夫人仰头看了看又说：

“不过，美国侵略者的无耻宣传，早就在真理面前破产了。经过一些有威望的西方人士实地调查以后，西方各国人民，再不会忍受魔鬼的欺骗。他们会起来制止这种暴行的。”

是的，这样的血海深仇，这样灭绝人性的屠杀，不但是朝鲜人民不会忘记，全世界人民也不会视为与己无关的；倘不起来制止，很快就会变成全人类的灾难，就是英美的人民同样地不能幸免，也绝不能幸免。

不过，敌人这些垂死的挣扎，正是它末路穷途的表现。

他妄想用屠杀平民取得一点点胜利，都是万万不可能的。

看看朝鲜的不可征服的民族气节吧！

5. 重新投入母亲的怀抱

“阿妈尼！阿妈尼！……”

“阿妈尼！阿妈尼！……”

“……”

我们的车子刚在慈幼院的田边停下，就听见一片可爱的童音从远处传来；不一会，便从那绿绒毡似的草地中，跑来一群朝鲜小孩，数不清数目，也看不清面孔。只见他们都是一般的大小，一色的服装，一样的小平头，每个孩子手里都擎着一大把鲜花，笑盈盈地张着小手向我们扑来，就象一群见了觅食回来的妈妈的小麻雀一样。

“阿妈尼！阿妈尼！……”

“阿妈尼！阿妈尼！……”

从那小心坎里发出的亲切的呼唤震动着我们的灵魂，我们的眼睛因激动而模糊了。不等我们跳下车去，孩子们已经纷纷爬上来了。他们用那天真的动作，把鲜花塞在我们的怀里，便紧紧依偎着我们，热烈地抓住我们的手，我们想站都站不起来。挤不上车来的孩子，翘着小脚，拥挤着，跳跃着，把车子团团围住，一边喊着“阿妈尼”，一边投掷着花束。我们被包围住了。我们的眼前布满了人类最美丽的幼苗，我们的身上堆满了香气扑鼻的鲜花，我们的手里填满了

柔嫩可爱的小手，我们的耳边充满了激动心灵的呼唤，那激动心灵的呼唤哪！

忽然，一个孩子用急速的动作把一束花塞在我的怀里，仰着小脸喊了一声“阿妈尼”，便把小脸往我腿上一伏，哇的一声就哭起来了。

“好宝宝，你为什么哭啊？”我吃惊地推掉怀里多得数不过来的鲜花，把孩子抱在怀里。我抚摸着他的头，吻着滚在他腮边的泪珠……这一切都不足以安慰他受了重伤的小心灵，他的哭声更响了。他虽然没说一句话，但我明白，他是有那么多的不幸要向我倾诉，有那么多仇恨埋在心里呵。

我再也忍受不住我心的疼痛了，我的泪象雨一样地流下来，和孩子的泪混在一起了。我揩了揩泪水，看看我的周围，我周围的人也都在用手帕抹着眼睛。在这样的场景之下，就是铁石心肠，也不能不被感动的。

这孩子使我的心头沉重，他为什么老不说话呢？我很久很久地抱着他，吻着他，他依偎在我的怀里，默默地接受着我的爱抚，但我却一直不忍心探问他的遭遇，怕更触痛他的创痕。其实，那本来是不用去问的，他所遇到的不幸，一定比任何一个孤儿都要惨痛，可能他的父母惨死的情景，使他小小的心灵受了过重的刺激，而那刺激不是仅仅七岁的孩子所能担负得了的呵。

他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男孩子，名叫奉石花。长长的睫毛，聪明的大眼睛，眼睛里闪着忧郁的光，但在忧郁之中却

隐藏着一种刚毅的气质。这是一个善用思想、心中有数
的孩子呵。他一直在静静地沉思。我想逗他笑，用手抓他的
腋窝，他刚一咧嘴，眼泪竟又掉了下来。而我的眼泪今天
也竟例外，它是这样不听我的制止，尽往外涌。好吧，就让
它尽情地流吧，这决不是表示脆弱和感伤，这是慈母的泪，
这是怜爱的泪，这是愤怒的泪，这是从心里淌出来的鲜血
呵！天下做父母的人，难道不应该为这些可爱的孤儿同声一
哭吗？

我想起了越南的孩子，想起了马来亚的孩子……那千千
万万和他们同一遭遇的孩子。

他们也使我想起了苏联的孩子，使我想起了各人民民主
国家的孩子，他们是在怎样快乐的天地里自由地成长，愉快
地学习着，他们在接受着最好的教育，享受着最美丽的和平
果实。

一想到这些幸福的孩子，特别是我们祖国的孩子们，就不
能不深深感激祖国英勇的人民志愿军，还有朝鲜勇敢的人民
军，就是依靠他们的流血牺牲，才换得了我们孩子的幸福，
保卫了世界和平。今天，他们仍在贡献着宝贵的生命，为孩
子们铺着走向光明的路。这所慈幼院的孤儿，也正是在他们
的庇护下才获得新生的嘛！

三个月以前，这一百三十个六岁到七岁的孩子，从前线
被收容下来。他们的父母全死在敌人的枪炮之下。他们从流
浪的山间，被带进了这幸福的乐园，算是又有了家，有了温
暖。但是，他们刚来的时候，是和今天完全不一样的，他们

个个是精神颓萎，瘦弱不堪，患着各种各样的疾病。而三个月以后，却已有一百个孩子完全恢复了健康。现在他们正在受着适合年龄的教育和抚养，活泼健壮起来了。

这个慈幼院位在群山环抱中，风景美丽极了，非常有利于孩子们的教育。院长陪着我们参观了一周，最后，到了孩子们的病房。

这里的环境比别处更美，更幽静。病房前面是一排排的松柏，松柏之间有着静静在流的小溪。望过去，是一列碧绿的高山，山上丛生着野果和带刺的栗子。孩子们把栗子采来，用石头砸破，剥去带刺的绿色的厚皮，便热情地请我们剥食。你不吃那是不行的。但我们吃不了那么多，孩子却一定要我们带回去吃。

病房的阳光是充足的，在那朝鲜式的土炕上铺着崭新的席子，彩色的画板把雪白的墙壁装饰得十分好看。孩子有的在唱歌，有的在听留声机。据说，这留声机和唱片都是附近的老乡捐赠的。那些善心的邻居非常爱这些孩子，常送吃的和玩的来。

一个重病的孩子偎在保姆的怀里，声音微弱地喊着阿妈尼，保姆拍着她，摇着她，哼着催眠曲，不一会她就静静地睡去。院长告诉我们：

“保姆们都是些具有慈母之心的好同志，她们日以继夜地照顾着孩子，象照顾自己的儿女一样。她们热爱着这些孩子，认识她们的责任，她们知道，在后方抚养孩子和在前方打仗一样重要。”

这样，就使这些孤儿们重新投入了温暖的怀抱，享受着更多的父母的抚爱。不但身体得到了健康和关怀，精神上的创伤也很快平复了。看他们在游戏场上多高兴呵。他们骑木马、滚铁环、捉迷藏、打秋千，看着那种快活的样儿，真会使你忘掉了战争，忘掉了战争曾给他们带来的那些不幸。

在临别之前，孩子们给我们演出了十几个游艺小节目。那些精彩的表演，太动人，太可爱了。一个胖胖的男孩子用有力的小手有节奏地指挥着合唱团，表情那样认真，拍子打得那样准确；那个斜戴着小帽的，男高音独唱的小歌手，他倒背着小手，挺直着胸脯，展开了铜铃一样歌喉，那神态又庄严又沉着。还有，那群包着花头巾、系着彩色绸裙的小舞蹈家们，那翩翩起舞飞翔、轻歌妙舞的姿态，不象一群美丽的小蝴蝶吗？还有，还有……

是这样一群聪明能干的艺术家，是这样一群天真无邪的孩子呵，他们不正是人类最美丽的花朵吗？他们不正是未来理想社会的建设者和主人吗？他们是未来的科学家、艺术家、工程师和政治家……

然而，我们必须重复一遍：应该承认，假如没有伟大的世界和平堡垒的苏联的积极支持，假如没有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无私援助，假如没有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英雄的捍卫，这些无依的孤儿能够有今天的幸福吗？祝普天下的孩子们在英勇的人民军的保卫与培育之下，快快活活、平平安安地长大吧。

现在，我离开慈幼院已经五十天了。那些可爱的小宝宝

们，将会更活泼、更健壮了；而忧郁的奉石花（很久很久，我都不能忘掉这个孩子），也许早在他们的阿妈尼体贴爱护中变为愉快的了吧。

6. 俘 虏 们

经过一个星期的紧张活动，我们结束了平壤的访问，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这座英雄的城市。

但是，我们并没有离开朝鲜美丽的国土，整整一昼夜，我们享受着绮丽风光的陶冶，穿行于崇山峻岭中。第二天太阳落山以前，我们到了俘虏营。

一只大拖船把我们连人带车运过了江，江边上，管理俘虏营的志愿军领导同志，已经迎候多时了。我的旅伴费尔顿夫人半开玩笑地对我说：

“亲爱的，你又见到自己的人了。”

“其实，在平壤我也感到象在家里一样呵。”这是我心里的话。随后，我便反过来问她：“你呢，你到这里有什么感觉呢？”

“当然，我早就说过，我已经成为中国人民之间的一个了，至于那些英国人，看吧，看他们会不会使我失望。”

正因为急于要得出这个结论，我们虽说经过连续一昼夜的旅行，却没有休息。当天晚上就和英国俘虏举行了小型的座谈会。第二天从早晨开始，又和英美俘虏分别谈了六七点钟点。参加会议的俘虏前后有四十多人。

座谈会布置在一间宽大的会议室里。我们一走进去，就有一群高个子的英国人赶来和我们握手。看见他们，我心里立刻产生了一种不舒服的感情，很自然地就想起了朝鲜人民所遭受的那些不幸。突然，费尔顿夫人一声尖叫，把那种不愉快的空气冲淡了：

“天哪，坎伯尔！你的眼睛多象你的母亲，看见了你真使我高兴！”

坎伯尔是一个细高的二十岁的英国青年，他长着一双深沉的眼睛和沉默的嘴唇，脸上的表情，带着稚气的倔强，他的整个轮廓是很聪明的。费尔顿夫人并没见过他，今天却从他的眼睛上认出了他。我立刻想起了她讲过不止一次的那个故事：

在伦敦，有一个为和平积极斗争的老女人。一年以前，她还是一个纯粹的家庭妇女，她把生活中每一件小事都看成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她不让床单有一点皱折，不允许地板上有一点灰尘……她就是这样地消磨着她的岁月。可是，当她收到了费尔顿夫人从朝鲜带回的一封信后，突然完全清醒过来。从此，生活中的琐事，她得过且过了。她说：“和平工作，才是我唯一该做的事情。”很快地，她便成了和平运动的积极组织者。她每次讲演都很生动，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反动派造谣说：“坎伯尔夫人变成共产党了，她被收买了！”

但她却不认为这是污蔑，她骄傲地说：

“假如共产党是为和平而斗争的，又何必用收买？我为什

么不可以做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呢？”

这女人就是坎伯尔的母亲，她是受了坎伯尔一封信的鼓舞和劝告而参加和平工作的。

在两次座谈会上，坎伯尔都没怎么说话，总在闪着快乐而骄傲的眼睛，静静地坐着，偶尔也用友好的眼光向在座的中国同志扫视一下，那眼光里流露着无言的感激。我心里想：在这里，你是不需要说什么的，留着那些话说给象你母亲一样的人去听吧。

英国俘虏们最关心的是英国的和平运动。费尔顿夫人首先就做了全面的介绍。

“对英国人民来讲，朝鲜战争不单是朝鲜问题，而可以直接影响英国人民生活的问题。目前英国情况越来越苦了，一个星期每人只配给二两半油，物价一日数涨，没有钢，建筑已停止，一间房子每星期要四镑租金……”

“哎呀，那样贵？”俘虏们瞪大着惊异的眼睛，异口同声地说。

“这样的事，使妇女醒过来了。”费尔顿夫人接着说，“英国人民尝过战争滋味，因此，他们反对英国的扩张军备计划……英国占领军在英国有自己的法庭，一点小事也在英国法庭审判。上海朋友说，英国过去在中国有治外法权，如今美国在英国竟也有了！”

听到这里，俘虏们都垂头叹气。费尔顿夫人苦笑着继续说道：

“1949年我应邀去中东，人家问到我美军在英国的情

况，我的回答是：‘拖起女孩子就走！’目前，更进一步在英国重建机场了。美国空军……”

话还没完，一个年轻的俘虏就象怕屋顶塌下来似地双手抱头恳求道：

“亲爱的费尔顿夫人，你别说下去了，我感到恐怖！”

大家都用疑惑的眼睛询问他。他解释道：

“我已经十个月没接到我妻子的来信了，我真担心她会被美国空军拖走！”

他的恐怖的预感传染了很多人，有的在摇头，有的在叹气。

费尔顿夫人带着忧虑的神情说：

“我很同情你这种担心。现在最严重的问题是如何使英国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这就要靠人民的斗争去取得。现在英国和平运动已经成为群众性的运动了，有街道组织，我讲演时都有黑票。妇女们更积极，她们组织请愿要求制止朝鲜战争。”

“我的老婆怎样？参加了和平工作吗？”一个很久没接到家信的俘虏急切地问。

“我很抱歉，我不能普遍知道她们的活动。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俘虏家属都在要求制止战争，因为这与她们的切身利益有直接关系。”

史沫特是一个面孔很严肃的中年男人，他很得意地讲着他妻子的事情：他最近接到她的来信，她说她已经组织了十

五个家庭妇女经常在家里开会进行和平工作。她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史沫特对费尔顿夫人说：

“大概你不会知道，她原来是怎样对政治毫无兴趣的人，可是现在她也觉醒了。我真为她高兴呵！”史沫特两眼流露着骄傲，两手抚胸，梦幻般快乐地说，“我将来回去，我们两个在一起做和平工作，该多幸福呢。”他是那样向往着和平，为妻子的进步而感到光荣。

“我们请求你回国后和我们的妻子取得联系。”密奇斯和安得乌一同在费尔顿夫人的小本子上写道，“英国社会是腐败的，我们的妻子是否得到了启发？我们热烈地希望她们参加和平工作。”

“我们在这里是好朋友，希望她们在和平运动中也成为好朋友。”

“恳请你向罗斯丁夫人说，我被俘后只接她一封信。请告诉她我是如何希望她和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站在一起！她是个暂时的寡妇。我未来的妻子。”戈尔大概是不好意思开口，也把他的希望写在费尔顿夫人的小本子上……于是那个红皮小本子上，充满了热烈的希望和恳切的寄语，也充满了人名和通讯地址。费尔顿夫人慷慨地说：

“这些事我一定尽量为你们办到，我正为此而感到光荣。”

“你这次回去，他们不会再对你迫害吗？”

“这是用不着为我担心的，迫害对他们并没有好处。”

接着，费尔顿夫人便在俘虏们要求之下，讲了她去年受迫害

的情形，

“去年我们国际妇女调查团来朝鲜，并非来支持朝鲜战争，而是来寻找真理，经过实地调查以后，真理是被事实证明了。我回到英国，立刻举行了记者招待会，英美报纸都派来记者参加。我报告了每一件暴行。有些人很窘，有的生气了。他们问了我很多莫名其妙的问题，想叫我不知所云。但真理是不会战败的，他们无可奈何地说：‘这个人，把她怎么办呢？’

“第二天，各报便开始攻击，但他们也发表了我讲的一切。这样一来，反而使人民了解了真相。……随后，政府就撤了我的职，要处叛国罪却找不到充分的证据。看吧，这就是有‘传统自由’的国家的状况。死刑！对一个妇女从来也没有过这种刑罚呢。

“受迫害并不是一件愉快事，但愉快的是：越迫害越使真理传开去。后来，他们发觉错了，报纸停止发表我的消息。沉默对待也没有成功，我继续到各地讲演。反动报纸竟对人民说：‘假如你们能把这个可怕的女人讲演的会场烧掉，没有人抱怨，这是爱国主义行动。’可是，非但没人烧会场，竟还有警察暗中保护我。一个警察对我说：‘不要担心，假如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一定保护你。’我做了这些有益的事情以后，比以前快活多了，而反动政府却失败了。”

费尔顿夫人的话，不住地被笑声打断，那是对英国反动政府的嘲讽。

俘虏们什么都关心，什么都想知道，他们有的是提不完

的问题：如象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意义啦，第三次世界大战啦，中英贸易协议的实行情况啦，以及什么美国大选的估计啦等等。他们了解中国，更想了解苏联……他们并不是不了解那些事情的情况，而是想听听他们自己国家的人的见解。当费尔顿讲到新中国的建设和苏联人民的幸福生活时，俘虏们简直就眉飞色舞了。

“在英国，一直听到‘苏联准备侵略’的宣传，但是，苏联军在战后时期中，就在乡村建筑了三百八十多万幢住宅。又要奶油，又要枪炮，这是可能的吗？完全是污蔑！”

费尔顿夫人要他们谈谈自己的事情，空气更活泼起来。俘虏们带着自嘲的口气讲着自己被俘时的窘相，就象讲着可笑的故事一样。那个面孔有点滑稽的俘虏把两手举过头顶，做着要跪倒的姿势幽默地说：

“看哪，我们被俘的时候，就是这个相！”他向在座的志愿军同志做了个鬼脸，惹得大家都笑了。另一个接下去说：

“那当儿，我们认定被俘就是死，没有第二种结论。在向这个世界告别之前，可能还要挨一顿非刑吧？可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军官走过来，和我们每一个人握手。这使我们感到迷惑。不，简直是惊呆了！这是什么阴谋呀？我们想。

“随后，志愿军告诉我们：他们不会以我们个人的罪行来处罚我们的。这话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理解。有的人死不肯走，有的人就叫起来：‘要枪毙就当场吧！’志愿军笑了笑说：‘放心吧，我们不会戳你们一手指头的。带伤的人还要

给你们治好呢。’”

那个有着一副滑稽面孔的人抢着说：

“谁相信他们的话呢？走是跟着走了，暗中却下了决心：走在半路上一定要打死押送的人。可是竟没有找到机会。”他停了一下又补充道，“幸亏没找到机会，如果遂了当时的心愿，罪孽就更大了！”

他们一个接着一个发言，描绘着志愿军的人道与友好的待遇，如何使得他们深受感动和大为吃惊。那个面孔很严肃的中年俘虏闪烁着愤怒的眼睛说：

“而美国军队不但制造巨济岛血案，还来轰炸他们自己的俘虏。这就够使我们清醒过来了。”

谈到人生观的改变时，他们讲了很多很多。他们认为：“应该向志愿军同志致以最大的感激和敬佩，志愿军不但有着无畏的神勇，更具有着超人的智慧。”真不能不叫他们五体投地了。

“志愿军从来不强迫我们接受任何东西，信就信，不信就不信。从前，我们连什么叫开会都不懂，现在却认识了美国为什么要进行侵略战争。”

在和美国俘虏的谈话中，一个美俘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一次，他们在被押送途中，吉斯不小心烧着了老乡的房子。他立刻被押送的志愿军班长带走了。留下的人你望望我，我望望你，都替吉斯捏了一把汗。他们想：吉斯一定被带去枪毙了，说不定还要连累自己。可是，过一会，吉斯却被带

回来了。进得屋来，那班长先让他坐下，然后说：

“吉斯，向大家做自我批评吧！”

“这就是我们学习的开端。”那个俘虏结束这故事时笑着说。

黑人俘虏亚当很天真地讲他被俘的故事，他说当时所发生的是他生平最意料不到的事：被俘还能不死吗？讲完，他憨憨地笑着说：

“假如那时死了，就没机会受到这么多对我有益的教育了。”

奎恩是在朝鲜投掷过细菌弹的美国空军俘虏，可是，他的人生观也在改变中。当他被召来谈话时，他手里还拿着一本《反人民的阴谋》。他对费尔顿夫人说：

“听说你去年回到英国，政府要处你叛国罪。可是根据这书上的定义，违背人民的才叫叛国罪。应该受到这种惩罚的正是我们国家的统治阶级自己。而你却是做了对人民有益的工作。”

一提到细菌战，奎恩就垂下了眼皮。他说他所有参加过细菌战的朋友，都感到可耻！感到罪不可赦！可是他们所受的待遇却是出乎意料的。他感激地说：

“不管我们做了多少罪恶，志愿军却叫我们学到很多东西。过去人家说我反动，我一点也不懂，现在却是耳目口鼻全张开了。我热爱中国，更热爱苏联……你是有机会告诉西方人民：中国人民是在做着怎样伟大的工作的……”

在欢送晚宴上，她举起杯来向管理俘虏营的志愿军同志

们致敬道：

“可敬的中国将军们，诚恳地感谢你们。你们不但英勇地保卫着世界和平，还不辞艰辛地为我们教育了千千万万受蒙蔽的人和头脑。这对和平的贡献，是不可以数字来计算的。现在，让我为伟大无敌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全体将士干这一杯吧！”

人·物质·精神

据〈新华社沈阳25日电〉：辽宁省新民车站职工全心全意为旅客和货主服务，已经成为全国铁路系统职工学习的榜样。六月十八日，铁道部在新民县召开了授奖大会，表扬了这个车站的职工，并授予他们“人民的好车站”的光荣称号。……

1. 《假如我是一个旅客》

一个休班的日子，客运主任张玉峰对服务员杨淑兰说：

“走，小杨，我带你上沈阳买《洪湖赤卫队》唱片去。”

“一块儿去买唱片？”小杨不是怀疑主任对她不放手，小杨更不是怀疑主任对她说瞎话，是小杨连高兴也来不及了。这位稳重的姑娘，笑却来得快，拿铁路运转术语来形容，她总是笑得“抢点”哩。她那两排匀整的含笑的小白牙，闪闪好一阵子，这才莺声细语地说道：

“旅客昨天在意见簿上建议多播《洪湖赤卫队》这类革

命歌曲，咱们今儿个就去买唱片，张主任办事真是雷厉风行。”

“就这样还赶不上群众要求哩。你看，咱车站唱的不还是五八年以前的老曲儿吗？落在时代后面了！”

都说小杨人小心术大，可这回她没听出主任话里还有话。她只觉得主任这人有意思，眼看奔四十啦，遇事一阵风，说话尽冒调。

“咱不明白，《小二黑结婚》到底落后《洪湖赤卫队》多老远呢？依我看都是挺好听的新曲儿……”上了火车，一路之上小杨跟自己辩论起来，不容分说就战胜了对面座上一劲转眼珠子的张主任。小杨不知不觉笑出小白牙，腰板在座席靠背上靠得俏直，悄悄地哼着：“洪湖水呀，浪呀么浪打浪……”

新曲也好，老曲也好，车站广播室添几张流行的歌曲片，候车室小喇叭一唱，旅客定准打心眼儿里欢迎，就不觉得候车腻烦了。只是今儿坐车可真腻烦，六十六公里，好比搭牛车上北京！其实才一个多小时，说话之间就进沈阳南站了，小杨却觉得把“浪呀么浪打浪……”唱了八百六十遍。

一出站，小杨反而走到“一阵风”前面。她带着主任走进车站附近一家大百货公司的乐器部，小杨露出小白牙一笑，彬彬有礼地说：

“售货员同志，我要《洪湖赤卫队》。”

“对不起，上个星期全卖完了，……”

“哎呀！千辛百里扑个空！”小杨直呆呆地竖在柜台

前，看了看张主任。一副莫可奈何的可怜相，真象个傻丫头。不曾想女售货员笑笑又说：

“同志，我介绍您到太原街商店去看看，听说他们那里进了一大批唱片，可能有《洪湖赤卫队》。”

拐个弯儿来到太原街一家大商店。真凑巧，小杨看得准，一个梳俩小辫的售货员正拿两张《洪湖赤卫队》给一位顾客。小杨指指片子说：

“售货员同志，我们也买一套。”

“没啦！”声音挺冲，眼皮也没抬。

“请您在架子上找一找，兴许还有哩。”

“我不如你？”

小杨想瞪她一眼，一看对方滴溜圆的大眼睛，不瞪都比自己的大，也就不敢招惹人家了。她回头又是莫可奈何地看着张主任：哎，人家碰硬钉子，你怎有心张大嘴笑呢？该冒调的时候，你怎不冒它一下子呢？可怎么解这个围呢？这时，一个中年的男售货员过来了，自自然然、亲亲切切、和和气气地问小杨：

“这位同志，您买啥片子？”

“《洪湖赤卫队》。”

“您要几张？”

“您先看看有没有吧！”

“保证有，”售货员一侧身，比变戏法“摸小二”都麻利，眨眼之间从货架上抽出两张《洪湖赤卫队》来，又风趣地念了一句：“记货好比带钱包，几元几角知多少。”

小杨扑哧一声，笑了，一高兴、一感动就说出心里话：“您真行。我不如您。”是呀，小杨在检查自己、比差距哩。谁想，俩小辫的“我不如您”心惊了，刷一下子脸红脖子粗，糟糕，小杨要挨倔了。可是，她反象学小杨似的扑哧一声，也笑了，扭过脸去悄默声说：“小辣椒。”

管她心惊不心惊，笑不笑，嘀咕啥，小杨一概不闻不见。她高兴、感动还没收场哩，一句话，买到手要买的“希望”，她满意；遇到个理想的售货员，她满意；连乍一进这家大商店第一个给她的不愉快的感觉——阳光不足，现在她也满意哩。“主任在不在身后呢？”付款的时候，姑娘这才想起“带你买唱片”的人。真有意思，主任是“跟”着来买唱片的？

说着啦，主任就是跟她来买唱片的。他是旁观者？不对，说他是观察员正对茬儿，在现场，他看成色，听分寸，不说话；一跨门坎，他就能写短评、写社论，也可能是个决策的发言人。

你看，客运主任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就问起服务员杨淑兰的观感来了：

“小杨，你看人家的售货员够标准吧？”

“嗯，业务熟，动作快，态度甬提了；又和气，又有趣儿……”

“说的哪一个？”

“男的呗。”姑娘有点自惊，脸蛋儿绯红。接着好象非让主任信服不可，庄重地说：“人家咋说的你没听见？‘记货好比带钱包，几元几角知多少’手一伸，有啦，正是它，

多带劲。咱们记站名，可倒好，一问两瞪眼……唉呀，忘记谢谢人家了，多不礼貌。”

可不是，不礼貌，不光是不够文明，也表现进商店唯一剩个等价交换关系，没什么感情上的呼应，这纯粹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要不得。这道理，看来姑娘懂得。售货员同志！小杨向你表示抱歉哩。不要怪她，她忘了；“忘了”也是因为你的服务态度感动了她。至于她的同伴，此次，他不负这个责任，人家是来看热闹的。你别看这姑娘脾气挺绵软，未曾开言先露两排小白牙。试试看，你再照说一句“我不如你”什么的，她一火，能把你摔个“麻花”样儿，那才好瞧哩。没有出现可能发生的场面，兴许张主任还感觉不满足吧，他趁势激了小杨一句：

“你也该谢谢女售货员——”

“谢她？差点把我鼻子气歪啦！”

“你还是应该谢谢她。”

“怎么？主任您别逗啦，我不唾她就是面子！”

“调她到咱站当服务员怎样？”

“哟，哟，哟，假如我是一个旅客呀……”

上面这段没头没尾的小故事，大约发生在两年前。故事的主人杨淑兰和张玉峰是新民车站的职工（应该补充说明一下，张玉峰同志还是这个车站的党支部委员）。据说在这段小故事的开头结尾，还有不少挺生动的情节。但它却是一个转折——一个人的生活态度的转折和一个车站的服务质量的转

折。1964年4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条“铁道部树立十面客运红旗”的消息。其中的一段写道：

锦州铁路局新民车站职工近几年来一直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根据农民旅客多而要求又不同的特点，逐步积累了一套深受农民旅客欢迎的服务经验。农民旅客看到他们那么周到热情地为自己服务的时候，总是情不自禁地赞扬今天的社会好，毛主席教育得好，共产党好。这个车站的职工们说：“我们服务一不为表扬，二不为感谢，只要旅客说一声今天的社会好，我们就很高兴。”

新民车站成为铁路红旗单位之一，自然不是偶然的；只是我读了那条消息以后，偶然联想起前不久听到的上面那段故事，引起我访问这个车站的兴趣。

在一个晴和的下午，我迎着宜人的春风，兴致勃勃地来到了新民车站。一下火车，就和一位年轻的女服务员打了个照面。也许因为我头发花白、腿脚不利索吧，她连忙抢上两步走过来搀扶我。走到检票口亲热地对我说：

“你老慢走啊。”我刚迈出两步，她却又跟上来夺我的小提包说，“还是我送你老下台阶吧。”

当时我还没来得及注意这车站还有九十五级台阶。我注意的是面前的两排小白牙。“是那个姑娘！怎么办呢？”我又兴奋、又发怵。真是无巧不成书，下车就碰上了她。多可爱的姑娘啊，说可爱，并不挺漂亮；说不漂亮，一看可就是

美。碰见了她，不算是好事——我不担心她把我“摔个麻花样”，怕只怕摆脱不开她的纠缠呵。你看，她搀着我，不松手，不离身，假如我不说明来历，下几步台阶，老寒腿一瘸一点，她不死乞白赖要背我才怪哩。我怎么撕掠得过她——一个比我高大、背老、病、残的能手，一下子就会把我背起来，那才有意思呢，若遇着个熟人，多新鲜。

灵机一动，我改变了先去县委的计划，不出站了。我说我要到车站党支部去，请她指给我地方，这样我就可以解放了，她就去忙她的吧，铃响了，她该去送车了。因此我向她道声谢，伸手去接我的小提包，哪曾想，她不撒手哩，她坚持送我到党支部去。她说她现在是歇班时间，不忙，也不想睡觉，盛情难却呀。

党支部书记就是站长王应田。老铁路扳道工人出身，四十多岁，一口牙全没了。看那朴实厚道的劲儿，却象年过半百的老农。他看过介绍信，很为难地说：

“有啥好写呢。全是普普通通的事儿。”

“我打算就住在站上，同大家生活一阵子……”

“好，日子长些，就看出岔子来了。”清汤寡水几句话，细品品，挺有滋味。我多么希望他讲下去呀。再讲下去，至少这个人的“岔子”可能看得更突出了。可是他转了话题，又表示为难起来：

“住在站上，住哪儿呢？”

那姑娘又拎起本已摆在椅子上的小提包，接着说：

“就住在我的床上吧。”象是这就决定了。站长王应田

也点了头，似乎很满意她的建议说：

“就这么办。杨淑兰今天值夜班。时候赶得巧，明早她又上锦州局学十来天毛著，你安心住着吧。”

一下车就遇到我计划访问的人物之一杨淑兰，偏又赶上她明天要到局里去学习。可算“时候赶得巧”了。看起来我不陪她值夜班、抽空接触，天亮一睁眼她就不见了。我怎能安心呢？可是这姑娘总象小燕子似地飞来飞去。一会儿送旅客上站，背这个病的、搀那个残的；一会儿车一进来，又扶这个老的、抱那个小的；一会儿又是肩扛手提、大包小篓。总是来去不空手。送往迎来完了，又倒痰盂，又清扫候车室，一会儿又跑出去拾掇女厕所，里里外外，手脚不失闲……弄得我眼花缭乱，哪儿找到抽空的机会？好不容易看她停了停脚，这可不错，一霎间，不知她又飞到哪儿去了。啊，原来是娘怀里的孩子哭了，她走上前去露出小白牙笑着问长问短。哎，可真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呀。谁给你这么多的精力，难道就不知道疲倦？

外面阴得很沉。春夜的风一阵阵吹进候车室，觉得凉嗖嗖的。我突然咳嗽几声，引得这姑娘朝我望了一眼。我心里说：“等你抽空谈哩。”好象她看出我的心思，果然向我走来了。而她却问我：

“您着凉了吧？”

“不是。老毛病，气管炎。”

“您回宿舍休息好了。这会儿没有车，我上卫生所给您取点药去。方便哪。”

我谢谢这姑娘，我告诉她我自己带着“小药箱”哩。我说：

“你应该歇一会儿，我看你够辛苦的了，照顾旅客太周到了。假如我是旅客……”原想接着说句什么“要心疼你的”，或者说句什么非常感动之类的话，话到唇边又咽了回去。说出来会起个什么作用呢？可是这半句话却把姑娘的脸弄红了。当时我很迟钝，什么原因，半点也不理会。

“底细您都知道了？”

“我知道什么底细呀？”

“比如前年上沈阳买唱片。”

提起唱片，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是我无意中半句话说走了嘴。为了解除姑娘的误解，我也只好装着说：

“不知道。”

“不知道才怪呢。我明白，您是怕磕碰着我，假装不知道，对吧？”

这个小机灵鬼，能掐会算似的。怎么不对呢？但事到如今，我更要一口否认到底了。若不然，这小鬼会认为我太不坦率，可能也会影响她无拘无束地谈出自己的事迹呢。

“我们这些黄毛丫头，还是磕碰磕碰的好呵，总那么娇生惯养，出息不了人。”出乎我的意料，她朗朗地讲了起来，态度那么认真。更使我吃惊的是，她竟在候车室大庭广众的所在，旁若无人、坦坦然然地进行起自我批评。虽说夜间来往的车次少，候车的旅客不多了。从外貌上看，这些行动全与这位娴静的姑娘多么不相称啊。可是她总还不忘我知道她什么底细，一接触事实的时候，劈头第一句就说：

“您知道吧。”停了好一会儿，才话归正题，“两年前，我还没调来新民车站那咱，我是在巨流河站当售货员，挎个箱子卖饼子、麻花什么的。从开头干上那天，就没安心过，我总嫌这行职业低气，有人一叫‘小卖’，就感到扎心。我也有个理想，在车站上当个服务员，脱下白罩衫，货箱子也甭挎了，穿戴得整整齐齐地倒背着手，在候车室里，在站台上巡来溜去，成千上百个旅客，全得听我的，看我的眼色行事，多神气呀。后来，我的理想果然实现了，服务的车站比原来的还高一等，一天三十二趟客车，上下三千多旅客，当个服务员够气派的。‘买票的旅客，站成一行，站直了！’‘上车的旅客分成两排，排齐了，跟我走！’‘维持候车室的清洁卫生，把废纸果皮捡起来！’‘旅客们，注意啦，133次13点54分进站，停车五分钟，请准备上车！’老乡问：‘十三点是几点？’我干脆回答：‘十三点就是十三点呗。’”

坐在长靠椅上候车的一位老农笑盈盈、幽默地出来作证说：

“头两年这姑娘可是洋气哩，我老汉就叫她转蒙过，上错车不打紧，差点误了上轿时辰。好姑娘，你咋不唠唠过后呢？……同志，看样子，你是新来乍到的，这疙瘩我倒是二贤王常来常往，好坏瞒不了我。现下这姑娘可大不相同啦，简直杆儿是吹喇叭的变成了刘海。打听个钟点儿啥的，也唠对炉啦。”我插问道：

“怎么对炉的？”

老头儿说：

“你没听她刚才跟那个妇道说，说那趟车‘天蒙蒙亮’才到站，‘晌午歪’就到山海关吗？这就叫‘对炉’。”

我望望杨淑兰会心地一笑。老头儿又说：

“同志，你别笑话，咱这号老庄稼耙子上啥阵也不赶趟啦，连说话离了土腥味都受憋。可咱大小子可是个机械化，能把铁牛开得突突跑。说到归终，嘿，年轻人走运气，赶上好朝代啦，毛主席逼着你学好哩。”说到这，老头儿沉吟了一下，咧开嘴笑起来了，“看咱哪去啦。说到归终，这姑娘出息得暴，这车站也好，一进站，就跟回到家一样，热乎乎的。”

杨淑兰接着说道：

“这位老大爷，别净表扬啊，我们车站的缺点还不少呢。你老说道说道吧。”

“让我说道，还真有。”老头儿绷着脸说，“嗯，还有个缺点，就是打票还要钱。”

对面座一位中年妇女格格地笑起来：

“看，这老爷子，多逗眼。打票不站队，随到随买，渴了有开水，闷了有小人书，就够瞧啦，还想白坐火车，心真高。”

“白坐火车？别见怪，我说妇道人家见识短不是？赶到共产主义还白坐火轮，白坐飞机呢。心可不高咋的？”

这位快活健谈的老头儿，打乱了杨淑兰的话头。也许她觉得老人说话太玄，前言不搭后语；也许她觉得老人世故，不肯提意见；也许她还急于要对我讲些什么吧，在大家一阵

笑声之后，她热情而有礼貌地向老人们打了个招呼，就同我走出候车室，来到静悄悄的月台上。在夜风习习，灯光四射下，花坛里的串红、龙头、鸡冠花含苞待放；大花盆里的夹竹桃伸展着碧绿的枝叶；一簇簇扫帚草列成长长的队伍，浑圆而茁壮……真是春嫩似翠，婆娑撩人。我问这是谁把车站绿化得这么好，杨淑兰很自豪地告诉我，那是她们的一位年已花甲的老客运服务员，人称“老解决”、“老义务”的蔡长清老大爷一手领导搞起来的。他不单是莳弄花草的老行家，而且还是为旅客服务和爱站如家的好榜样哩。紧接着这姑娘抱愧地说：

“已经到退休拿养老金在家享福的年龄了，老人家却心甘情愿给人民当老勤务员，整天价扶老携幼，张张罗罗不消闲儿。可是我们这号的，小小年纪，无功无劳，不过一张白纸罢了，就动不动想骑在人民头上，在旅客面前吆五喝六，指手画脚摆威风。反过来，旅客提点意见，领导批评几句，不光觉着委屈，还有对抗情绪呢。您知道吧，我没学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之前就是那样……”

我明明知道她确是经过教育才变成现在这样勤恳、老实而又热情，象个革命接班人的模样的；但我却不相信我面前这个姑娘曾经有一段不算进步的历史。因此我顺口说道：

“能是那样吗？”

“就是那样！”她象一个不肯服输的孩子，叨住一句话死不改嘴，“不信您去问问党支委张玉峰同志。那时候，我真是乱线难缠呢。动不动就发牢骚、耍脾气；给旅客服

务，扫地、倒痰盂，还要和颜悦色，低三下四说小话，都是人，为啥我该侍候你呀！侍候不周到人家就克你一顿。那阵子我真不想干了。我逢人便说：‘当服务员还不如当售货员卖麻花顺气，摔打麻花，摔碎了它也不吭声，可摔打旅客，不管有理没理，都算犯错误，干这行，倒一辈子运，别想翻身！’真的，前两年我还是满脑子剥削阶级思想呢。”

我看过材料，了解这姑娘的成分好。但我故意问道：“你是什么家庭出身，地主吗？”

她不慌不忙地带着自嘲的口吻说：

“我胎里红哩，爹是受过磨难的老扳道工，您说，这不算工人阶级子女算什么。我又是长在社会主义红色大花园里，可惜我这红色种子净开白花呀！”接着她就叙述了前年跟客运主任张玉峰上沈阳买唱片那段经过。末了，她考问我说：“您以为张主任真就是领我去买唱片吗？……过后我才明白，那是车站党支部有计划地抓我典型去受教育呀。谁曾想我无意中说了句‘假如我是一个旅客’，马上被张玉峰主任拿去当成客运全体的同志结合学习《为人民服务》和《纪念白求恩》的教材。在讨论会上他说：‘大家设身处地想想看，假如你是旅客，你希望什么样的车站；假如你是一个旅客，你欢迎什么样的服务员。’他还一再说，支部要求大家认真、具体地讨论和对照车站客运业务质量，对照自己的服务态度呢。哎呀，您可不知道，学习一开始我是多么紧张啊，我暗想，这回连麻花也卖不成啦；到结合两个文件一条条跟自己对号的时候，又真把我吓一跳啊。我心目中哪里有

‘人民的利益，人民的痛苦’，哪里有毫无自私自利的精神。您看，我不正是一个‘见异思迁的人’吗？”她一口气讲到这儿，看了看手表。她该准备接车了。我说：

“你忙去吧，等你从锦州回来再谈。”

“那好，您也该休息了。可是我还象有一大车话要对您讲呢。不过我想说的那些，如果您在这儿多呆几天，都是能看得到的。其实很简单，背着抱着一句话，您将看到我们车站全体职工是多么愉快、多么幸福呀！”

好久好久我没看见姑娘那两排匀整可爱的小白牙了。这会儿她才咧开了象涂口红的小嘴，笑了，那仿佛突然启开红绫宝匣闪出两串夜明珠，喜悦而明朗的微笑，证实享受那种愉快、幸福的也有她自己一份。

第二天一早，杨淑兰和我匆匆告别了。在极短暂的接触中，她给我留下一个比较完整的印象。同时她也给我留下一个比较模糊的问题：怎样才能看到这个车站全体职工的愉快和幸福呢？

十多天来，我作为一个特别旅客，白天：站里站外，在旅客与职工之间活动、观察；夜里：再回到姑娘的住处，记录下那数不清的“好人好事”，而后琢磨到入睡。我企图从每天积累的现象中，从每个职工习惯而忘我的劳动中找到问题的答案。归终，我想在职工身上找到的东西却在旅客中间发现了。

我亲眼看见：一位初次出门上石家庄探亲的农民老大娘拿着“向导签”，含着眼泪笑着上车时候表露出来的愉快和

幸福；

我亲眼看见：一位带着小孙孙去鞍山探望儿子的农民老大爷，在归返集宁途中因无票被叫下来后的焦急神态。原来他祖孙的客票被在沈阳送他们上车的儿子带走了。但当客运二、三两班的同志们轮番地用电话与沈、鞍两站联系，终于千方百计地为他找到了儿子，老大爷千恩万谢时表露出来的愉快和幸福；

我亲眼看见：一位快分娩的单身孕妇下车后，由服务员裴凤莲扶她一直走下九十五磴台阶，又扶她上了长途汽车。她连声说：“谢谢好妹妹”时表露出来的愉快和幸福；

我亲眼看见：新民县盲聋哑教学工厂的聋哑旅客到售票口买票，用手往专备的“选站表”上一指，售票员迅速、准确地递给他一张客票。他就用大拇指往另一只手掌上一顶时表露出来的愉快和幸福；

我亲眼看见：写在意见簿上的、寄来的和送来的那日益增多的无数封旅客表扬信中表露出来的愉快和幸福；

我亲眼看见：新民县盲聋哑教学工厂的盲人徐庆林、王少良请人代笔记录、写在一张红纸上的：

“鲜艳红旗迎着东风飘荡，早晨的太阳继续高涨，毛主席培养的好青年，真是我们亲姐妹一样。盲人过去无人管，只有新社会里变了样。每逢假日我回家探望，一登上候车室台阶，就有人拉住我的衣衫问寒问暖，找个座位倒茶一碗，我说买票她又帮忙，领我检票送上车厢，

我说谢谢，她说应当这样。回来时又是远接近搀，送下台阶找伴回厂。这些事情使我难忘，问她姓名她还不讲，问别人才知是杨淑兰姑娘。我心中感动没有别话可讲，只说毛主席教育下才有这样好心肠。祝你再接再厉永远向上，做一个标兵学习榜样，最后祝你身体健康！”

贺功信和从中表露出来的愉快和幸福：

我亲眼看见：每当大雨天，某些老弱病残的旅客和抱着小孩的妇女披着服务员从身上脱下的雨衣时，表露出来的愉快和幸福；

我亲眼看见：……

……

……

我也亲眼看见：挂在候车室一角为旅客专备的整容镜中，昨天面容衰老，今天精力充沛的我自己。什么缘故呢？不是因为身处愉快和幸福的重围，自己也分享了愉快和幸福吗？

那么，那些勤勤恳恳、无微不至、设身处地为旅客创造幸福的人，不是正应该享受最大的愉快和幸福吗？

2. 从一粒粮食说起

在铁道部政治部、锦州铁路局政治部工作组编印的新民车站几百条的模范人物和先进事迹中，我特别注意这样一条事迹：

“货运和装卸工人，特别珍惜国家的粮食，每次装卸车以后，撒在地上的，就扫起来；掉在水里的，就捞出来；混在泥里的，就一粒粒地抠出来；夹在道岔里的，就拣出来；掉在鞋里和漏在兜里的，他们回到休息室都仔细地抖落出来。他们将这些土粮全部交给了粮食部门。据新民县粮仓统计，几年来，共交国家土粮达二万四千多斤。”

就是这样一条事迹，一天，把我引到新民车站装卸作业所去。在未到那里以前，我顺便先到货场转了转。说1953年以前新民站的货场是一个四周高、场内低洼的“小盆地”，到处坑坑洼洼高低不平。雨季一到，积水成塘；来年春天一开化，又翻浆冒泥，踏上去一陷多深，拔不出脚来。在这样场地上作业，困难很多。后来货运和装卸作业所的职工就自己动手，利用工余或休班的时间整修货场。没有扁担，就砍树干来代替；没有土篮子，就自己割柳条编筐。附近无处取土，就到几百米远的地方去运。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和肩膀，一锹一锹，一挑一挑把土运到货场。经过四年多的艰苦奋斗，把一千九百平方米的货场抬高了半米。这还不算，一位装卸工人告诉我：过去从货场到站台是一条千分之三百二十的大陡坡，工人们装卸“零担”货物的时候，只能一件件地扛上来，背下去，累得喘不上气来。为了改善设备和劳动条件，货运和装卸作业所的职工，同样也是自己动手，从远处一筐筐地运土，垫在坡道上，原来不到十米长的陡坡，加长

到四十八米，把个大陡坡垫成了千分之一百六十的缓坡道，又安装上电动卷扬机，装卸货物装在小车上牵引，再也不用背扛了。说着，他顺手往前一指：“你看……”

原来这时坡道上正有两个装卸工人，一边说笑着，一边扶着满满一小车货物，在卷扬机的牵引下，缓缓地向坡上走去。我看着他们那轻松愉快的神情，随口说道：

“那么，现在装卸货物可以解除体力劳动了？”

“笨重的活儿早已解除了。”他解释着回答，“货物上下货车，还是得背背扛扛的。可是‘劳保’有个规定：搬运重量不准超过八十公斤，超过了还算违犯制度呢。”接着他又指着卷扬机的坡道告诉我：“伪满时搬运重量高到四百真不知累死多少工人。装卸工张宝山，家里没米揭不开锅，饿着肚子带着病去上班，咬着牙扛一袋二百三十斤重的黑豆，就是走在这个原来的陡坡上，一口气没上来，就活活地被压死了！哼，拿以前比如今，听听我们编的一首歌，就能品出苦甜啦。”于是他就挺正经地数落起来：“旧社会，扛脚行，身分低，三头上炕五害欺，吃不饱，穿无衣，干活被人管，死活没人提；新社会，党和毛主席，胜过亲爹娘，穿新衣，住新房，吃喝及时睡觉香，冬暖夏凉比家强。”

提到“住新房”，我联想起1953年国家给新民站装卸工人盖的休息室。翻开新民地区解放后的建筑史，这个有洗澡设备的休息室，它还是列在第一页第一行呢。在筹备新民车站展览列车的一部分大照片材料里，我曾看见过这休息室的一角，说明签上印着的“每人两条公备毯子”叠成长方垛

儿，有楞有角地在一大铺炕的脚底下一字儿排开，象战士的床铺那样整洁。也正象我眼前一排日型包装的货物井井有条地堆在货场上一样。

这个休息室就在装卸作业所的隔壁。由于我对这一具有历史价值的建筑物有了更深一层的印象，离开货场我首先来到休息室。刚跨进门槛，一位似曾相识的老工人的侧影就擒住了我。

他，斜楞着相当高大的身子坐在炕沿上。花白的头发衬着红扑扑的、孩子似的两腮，看上去，他的身体很结实，一张上唇浑厚的大嘴里噙着小烟袋，一边叭嗒叭嗒地抽着烟，一边弓着腰用一只手往放在地上的、一只装着刀、剪、钉、锤的旧帆布背袋里掏来捣去。从袋子里发出的那种悦耳的金属叮当声，仿佛迷住了他，完全没有理会有人走近他的身后。这时，我从种种间接印象中，已经十拿九准地可以证实他就是在货场内见到废钉破铁或绳头就拾起来，见到货物包装破了就给补好，有的包装木板坏了就给钉上，几年来为国家修补成千上万的麻袋和面粉袋，钉过不计其数的破箱坏板的老装卸工人、“爱货老英雄”，人称“百宝囊”的——王纯忠了。我第一次访问装卸作业所就碰见了他，真是巧遇啊，我情不自禁地叫道：

“您就是‘爱货老英雄’王纯忠吧？”

“哦，”他茫然地掉过头端详半天，而后笑咪咪地说，

“嗯，我也认识你哩，你是——”

“您怎么认识我，咱们没见过呀。”

“我听王站长说的就是你，错不了。你是来写咱车站的。对吧？”

“是呀，还想写写‘爱货老英雄’呢。”

“不能。”语气很绵软，神态却象是命令。我不待让坐，就坐在他对面了。不管能不能唠起来再说，可是，不等我发问，老头儿却先开口了：

“零头碎脑的事儿，费墨水，值不得，要写，写咱货场的巡守员老樊头——樊永生，人家爱惜国家财产数头排。不说别的，单讲1953年拨给货场垫货的七六〇根防湿枕木，算算到如今十一年多，只消耗二十三根。你别看小老头儿处世待人有个随和劲儿，可他对枕木可毫不让份儿，他带动大伙，哪根枕木没拿铁线捆过三四回。要问这么多铁线的来路呀，国家的台帐上你算找不着户头，全是东搜西凑的。”

我说：

“这是集体的光荣。听说几年工夫，你一个人就拣了旧洋钉二百六十多斤呢。”

“呸，人家老樊头他们光拣废铁线就是八百来公斤，怎能比。再说论个人，谁也比不了那小老头儿。他休班时，起早贪黑，闷着头一个劲儿在卸煤场前后左右的土里、泥里、沟里，连抠带挖就弄出三四十吨煤块儿交给国家。车站公用的又款式、又结实的牛皮纸信封你看见了吧？你可知道是哪家厂子的出品？你再也猜不着，那就是樊家文具工厂的货。说起来，老樊头拣货主扔掉的废洋灰袋，每月搭二斤白面糊信封，已经有十年光景了。站上有个约模，这十年他糊了不下三万个，

站上用不了，还拿它支援过咱们新民地区各单位呢。”

“前两年粮食困难的时候，照样糊吗？”

“呸，谁说不照样糊，逢年过节，一家老小认可少吃一顿馍，也得留出二斤白面！提起这，还有一段故事哩。”

“您自己不也有几段故事吗？”我预料到他要讲的故事是什么，就故意打断他的话头，有心引这老头儿多唠唠他自己。比如，怎样在他影响下，装卸工人每人身上都带个针线包，见货主托运的包装麻袋和面袋破了，就缝缝补补之类的事迹，也都挺动人的。可是，老头儿却成心跟我推磨磨。他说：

“啥故事，去了皮净是骨头，没意思。老樊头，才够质量，有头有尾成部书。你听我接着唠糊信封。老樊头有个好姑爷，去年过春节，姑爷千程百里来探望丈人丈母。按理就该给做顿面饭吃，可是剩的面不多了，给姑爷吃了，信封就糊不成了。咋好呢？小老头跟老伴俩开了个紧急会议，商量来商量去，还是给姑爷做了顿家乡的高粱米豆干饭吃，留下的面完成了糊信封的计划。呸，你看，这段书叫我说的颠三倒四，丢东拉西。记住，还得补上一小段：俗话说得好，‘丈母娘疼女婿，一顿一个老母鸡’。糊信封的白面省下了，他老伴却一刀杀了只快开裆的‘九斤黄’，炖了大半锅小鸡扣黄蘑……”

我正想打个岔，再打断他的话。恰好走进来一个四十多岁的装卸工人。他细高挑个儿，长方脸型，五官端端正正，风度稳健大方，很象个精明老练的干部。王纯忠看见他，好

象来了个接班的，拎起“百宝囊”往肩上一挎说：“我们的‘295’来啦。呔，这才是好材料。东挡西杀，以站为家，南征北战，包打关键，就是这条汉子。”也不给我介绍介绍，就大步流星往外走。“295”一伸胳膊拦住老王头的去路，一边推他仍旧坐在炕沿上，一边很风趣地说：

“我不是来接班的。”

“我要上班去。”

“别信他，净胡诌。我俩今天都休班。”

“295”的话是可靠的。可是这老头儿为什么要溜呢？为什么一再回避谈他自己，然而一聊起别人的好事却又津津乐道呢？看起来逼也是无用的，不如顺水推舟，就让他讲一讲货运和装卸作业所的情况，兴许能留住他。于是我说：“我知道他确实是休班，我也知道他休班还照常到所里来转游，我才到这儿来的。”我又说，在货运和装卸部门他是老臣了，听得多，见得广，希望他多介绍些好人好事，给我提供些写作材料。说到这，诚实的老工人的脸腮越发红了。他也不表示同意不同意，转脸向“295”用商量的口气说道：

“我看，咱们还是少表装卸，多表表货运吧，你说对吗？”

“295”同意地说：

“货运爱惜国家财产和尽心尽力给货物创造方便条件的事迹真是车载斗量。”

“你就坐下接着唠唠吧！”老王头说。

“好吧，我说说。”他坐在炕沿上，有条有理地说下

去，“不提远的，就单说去年开春几件事吧。有一次，记得是阳历年前一天晚上，费家岗子的两个生产队队长，忽然到货运室来请求车皮运羊草。他们说队里跟皇姑屯运输四社订了合同，如果一月十八日货到不齐就得挨罚。可是，他们是初次和货运打交道，一切手续都不明白，既没有提前要车，也不知道打什么样的草捆。要是按正规手续得二月份才能运走。那天值班员是杨春芝，一看老队长手捧着合同急得直冒汗，就一口答应下帮他们向局里请示，设法调整车皮，还怕他们捆不好草捆，又领着两个队长到粮库草站看了捆草架的样式，还主动地说：‘你们先回去按这个样子打草架吧，明天我们去人帮你们捆几个样子。’第二天正是元旦，刮老北风，下烟炮雪。杨春芝和吕秉衡已经值了一宿夜班，可是他俩不顾疲劳，顶着风雪就往费家岗子走去。走到柳河，正赶上有沿凌冰，他俩不知哪深哪浅，绕了半天，才找到一块水浅的地方，拿着干树杈子，一前一后试探着过了河。因为雪深迷了路，足足走了二十多里，找了两个村子，才算找到费家岗子生产队。这时候队里干部和社员正为捆草、打草架的事挠头呢。一见车站来了人，真是喜出望外。他俩也没喘气，就马不停蹄地指导木工打好捆草架，又动手教社员捆了几个草样儿，这时已经雀蒙眼了，生产队套上大车送他们过了柳河，回到车站已经十点多钟了。你看，货运的同志们就这样积极帮助公社，把二十万斤羊草，装了六个车皮按期运了出去。”“295”说到这，琢磨了一下，仿佛事情太多，无从谈起似的。终于果决地说：“就随便再举个例子吧。去

年春节从洛阳运来六台‘东方红’拖拉机，过几个钟头就要到站了。货运员得到确实消息，说这批拖拉机是分配给辽河以东几个公社的。可是这些公社都在兴隆车站附近……”这时王纯忠就象祸事临头似的，涨红了脸突然说：

“这要是在新民卸车，可怎么过辽河？那麻烦可就大啦！”

“是啊，托运人白白浪费绕道运输倒是小事，耽误了春耕可不得了呵！”那个“295”也颇为着急地提高了嗓门说，

“多亏货运员不怕麻烦，在火车没到站之前，连夜到处打电话找货主联系，建议变更卸车地点，替他办理了变更到站手续。要不，你看，真的在新民卸下来，辽河解冻过不去，得走公路绕道二百多公里才能到达分配单位，得耽误多少时间，这笔帐可怎么个算法。”

“怎个算法？”王纯忠激动地说，“还不是国家出一笔冤枉帐，粮食少打多少呵！”

说到粮食，我忽然想起二万四千多斤土粮的事，我问是什么力量支持他们一双双的手，一粒粒地搜集起来的。不凑巧，岗子外有人喊王师傅和厉师傅。“爱货老英雄”和“295”都站了起来，准备和我告别。而王纯忠这会儿却象有说不完的话来回答我的问题。这时候，窗外又连喊几声，他们不得不走了。我几乎遗憾地准备跟着出去。可是“爱货老英雄”却意味深长地说道：

“看看这所休息室，再看看墙上毛主席的像片，你找到力量的源头啦。”他第一个走出门去，似乎还要说什么，习

惯地吹了一声又不言语了。而“295”却象替他补充似的说道：

“新社会谁是货主呢？‘货主’就是国家，就是人民。一根针也罢，一粒粮也罢，哪点不是人民的血汗哪！”

3. 搭桥过河的人们

1959年从励家车站调到新民车站的一位装卸工人，过不长时间，同他一道调来的几个工人，又都转调大虎山。这个车站是北通郑家屯的支线，货运量较大，收入也多；同时，大虎山距励家很近，这对他通勤上下班也不必起大早贪晚黑。这一切自然比新民的条件好得多。可是新民站装卸部门骨干少，工作需要留下他。当组织上征求他个人意见时，他想的不是什么离家近、挣钱多，他想的是一个共产党员要无条件地服从革命利益、服从党的需要，他高高兴兴地留下了。从那时起，五年来他一直是两点多钟起床，赶295次列车上班，到新民不过四点多钟。有时大家还没起床，他就摸黑儿到货场找活儿干起来了。天长日久，这里流传两句歌谣：

“励有吃辛苦，常年295。”

励有便是今天的装卸组长，“295”成了他的光荣代号。

常年不欠勤，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干革命的心，在新民车站已经是红花满园开不败了。

然而，在新民车站全体职工面前还流着一条河，这条河不是泛滥不驯的柳河，却是一条通向建设社会主义和为人民服务大道上深阔的长河。没有船，或没有桥，他们就无法跨过彼岸，就只好留在河边，再也不能前进一步。但他们不是安于现状的人，他们要过河，他们也不怕千辛万苦，大家动手动脑搭起一座桥，这座桥就叫做如何为人民服务的桥。

他们是怎样搭起这座桥来的呢？请看下面几段并不惊心动魄，用王应田同志的话来说，只是普普通通的档案文字记载吧。

记载之一：

“人们乍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总是希望很快知道办事地点、交通路线以及食宿处所。作为旅客好向导的新民站的职工，并不把解答这类问题当做份外的事情。他们利用休息时间，详细地搜集了这方面的资料，对全县的机关、企业、学校、公社、饭店、文娱场所的地址、行走路线、办公时间，甚至哪个旅馆有什么样的床位，多少宿费，都摸得一清二楚。就这样，他们使乍到新民的旅客，都不会有人地两生的感觉。”

记载之二：

“新民县有个盲人聋哑人教学工厂。一些不在县城住的工人，每逢节假日都要乘火车回家探亲。有一次，

一位聋哑旅客来买票，拿出三角钱，用手乱比划。这可难住了售票员，到罗家、柳河沟、石狮的票价都是三角钱，到底是买哪站的呢？两个人比划来比划去，谁也弄不清谁的意思。买票的急得直呀呀，卖票的急得没办法，后面等着买票的旅客也很着急。后来售票员把三角钱的客票每种都拿出一张，叫他自己挑，才解决了这个问题。又一次，一个聋哑人买完客票在候车室里，因为听不见通告，险些误了车。这两件事引起了客运职工的重视，他们专门讨论了怎样才能更好地为聋哑人服务。根据这些聋哑人识字和使用手语的特点，他们制做了一个有二十四站名的买票选站表，只要聋哑人在表上一指点，售票员便明白了。他们还从盲人聋哑人教学工厂要来了一本‘手语草图’，学会了一些常用的旅行手语，用来为聋哑旅客服务。”

记载之三：

“服务员蔡长清，已年近六十。1963年10月开始做客运工作，经常碰到旅客打听列车到开时间和换车地点，自己业务不熟，只好找别人帮助。学习了《为人民服务》文章以后，他想：干这一行的，碰上的问题多，不懂业务就不能更好地为旅客服务。他决心练硬功，虽然他在旧社会一天书没念过，解放后又只参加了一个月的扫盲班，可是他不怕困难。不会写字就心记，不能看

就求别人给他念，找不好时刻表，求别人教，记不住东北换车站名，也求别人给画一张标准的东北铁路示意图，戴上五百多度的老花镜，一道道照着画。早晨起来在家画，晚上吃完饭也画，在班上间休时间还画，一天最少画三次，最多画过七次。一连画了有半个月的工夫，就记住了东北各线换车站。现在他不仅能背着画铁路示意图，同时列车的到开时刻也记熟了，遇到旅客问事，再也不用找别人了。”

记载之四：

“服务员高麟休班在家总是坐在炕上，戴着一千多度的老近视镜画来画去，画累了就往墙上一靠，家里的事儿却不管。他老伴儿叨咕说：‘谁象你，休班在家什么活也不干，尽画道道！’儿子们也调皮地跟着说：‘爸爸不干活，我们也不干，我们跟爸爸学习。’一天高麟召开了家庭会议，想把家务事儿分分工。两个儿子都说：‘爸爸在家包干儿吧。’姑娘绍环（车站售货员）却说：‘那可不行，爸爸在家还得练硬功呢。’老伴儿听心里才明白，原来高麟画道道是画线路图，随说：‘为了做好工作我支持，别分工了，买煤是你爸爸的事，别的活儿咱娘几个干。’姑娘、儿子一齐说，‘行，行！’从此，高麟画地图、背站名更起劲了，真是功到自然成，前前后后画了足有两千多张，测验时他仅用七分钟

就画了一个东北线路图。”

记载之五：

“服务员裴凤莲第一次站在旅客面前通告时，心里咚咚直跳，把准备好几天的词儿忘了个颠三倒四，只讲了一半就红着脸跑出候车室。从此，她下决心苦练硬功。夜班时，对着镜子练姿势，早晨起来，在院子里背通告词儿。就这样坚持不懈地练，终于练的态度大方，通告流利了。紧接着，她又苦练背站名，画铁路线图。回到家，天天躺在炕上背。一天被弟弟听见了，告诉妈妈说：‘我大姐夜里不睡觉，唧唧嚷嚷不知说啥，今晚你听听吧！’后来，又被串亲的大姨听见了，关切地对凤莲妈说：‘凤莲这孩子一到晚上就唧嚷，不是有啥毛病？’小裴的妈也说：‘这孩子现在回到家，抓着纸就画，躺在炕上就唧嚷，站在地上好发呆。’最后，当她们知道小裴是在练硬功的时候，这个谜才算解开了。”

记载之六：

“1961年以前，新民站的技术业务学习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职工们说：‘先生讲，学生听，规章制度一旁扔。’1961年下半年以来，他们整顿了学习组织，成立了学习委员会和教研组，制定了规划，固定了学习时

间，健全了制度，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学，带头练。起初大家信心不足，出勤率不高，支部书记、站长王应田就亲自听课，堂堂不拉。学习周王庙车站手比、眼看、口喊三结合的制度时，大家害臊，不肯认真做，王应田亲自带头比、喊；在假设表演时，有的职工不认真，他就严肃地做示范。就这样，经过几年的口传、身带，现在大家都养成了自觉地学本领的习惯，取得了一年比一年好的成效，各项工作大有起色！”

象这样的记载，真是可以分类成书，抄不胜抄呀。够了，就到此为止吧。不过在本文结束之前，我忽然想到必须补充一句，那就是：当我和新民车站全体职工同志们告别的时候王应田同志说的话：

“我们的工作还没做到应好尽好。还得不断努力来满足人民的要求。让普普通通的铁路服务行业通过人的活动，反映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来……”

1964年6月初稿

8月修改